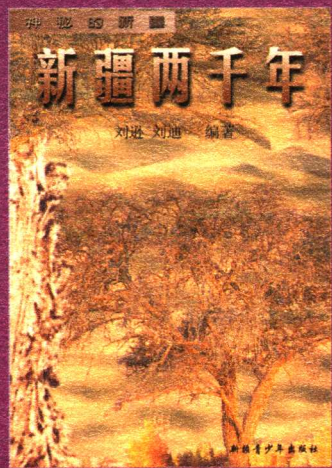




新疆两千年

刘逊 刘迪  
编著

# 新疆两千年



1998年版



2006年版

# 新疆两千年

策 划

韩全学

责任编辑

张红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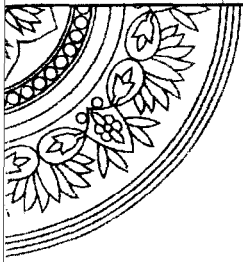
图片供稿

刘玉生 晏 先

艺术 设计

 XIAOQING DESIGN  
李倩颖工作室

薛思华



# 《新疆两千年》序

季敦林

在全国所有的地区中，新疆占有独特的地位。其所以独特，并非由于新疆幅员广、民族众，而是由于它对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宝库，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个国家的文化宝库中，主要的宝贝当然是本国产生的文化，但是“舶来品”也是绝对不会缺少的。舶来品之所以能够进来，这就要归功于文化交流。我曾在很多文章和讲话中提出一个观点：文化交流是促进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是不可或缺的。中外的历史事实都证明了我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如果不怀偏见，就不得不承认。

一说到中国的文化交流，首先想到的必须是新疆。我常常说，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惟一汇流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新疆。这四大文化体系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美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是几千年以来世界上各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智慧结晶。产生于过去，影响在未来，人类前途的荣辱盛衰，仍将决定于四大文化体系的前进与发展。不管人类社会在目前发展到什么程度，在未来向什么方向发展；也不管当前世界信息爆炸到什么程度，科技发展得多么眼花缭乱，人类要走的道路，总不会离开这四大文化在未来的世纪中的碰撞与融合。这一点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想，有人会怀疑我把新疆的地位抬得过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妨诉诸历史事实。众所周知，繁荣兴盛了数千年，长达几万里，从中国一直通到欧洲，沿途有无数国家和民族兴兴衰衰的“丝绸之路”，就正是横亘新疆的交通要道，这一条道路是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遥想中国汉唐时期，甚至在这之前，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发明创造沿着这一条路西传，西方以及沿途各国的发明创造以及动植物矿物，也沿此路东来。这种互通有无、“拿来”与“送去”的活动，就是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它丰富了交流双方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生活和文化的內容。如果没有这种文化交流，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今天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会是一种什么样子。虽然沧海桑田，时移势迁，中国同外国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越来越增多了，新疆在这方面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然而，新疆过去的辉煌，我们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忘掉的。

新疆这一段长达几千年的辉煌的历史，现在注意的人，包括新疆人在内，恐怕不是太多了。

关于这一方面的书籍出得实在是太少了，太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了。小友刘逊，长于新疆，得天时、地利，对新疆情况了如指掌，兼又勤学能文，学的虽然不是文学，但对中国文学是颇熟悉的。他在念书之余，写了这一部《新疆两千年》。老友王炳华先生介绍说，这一部书根据的是坚实的史料，而行文也生动流利，有极高的可读性。在当今的新疆，甚至全中国，无疑是一场“知时节”的“好雨”。我相信，它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缺憾，也会受到读者欢迎的。

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的大国。在中国，新疆是一个包括汉、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锡伯等等民族的大省(自治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中国需要的是全国各民族的安定团结；新疆所需要的也是境内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安定团结符合全国、全新疆人民的共同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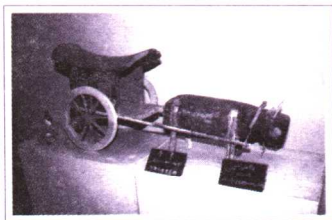
在今天世界上狼烟四起、战乱频仍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安定团结实际上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

而要取得安定团结，首先必须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友谊。没有了解，则友谊难成。了解过去的历史，了解过去各民族共同创业的历史，是了解中之最重要者。因为，它可以告诉我们唇齿相依的道理；告诉我们，各民族实有共同的命运。能获得这样的了解，其道多端，而著书立说实居其首。刘逊的这一部书对全新疆人民来说，会起到加强了解与友谊的作用的。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信念。

怀着这样的希望与信念，我写了这一篇短序。

1998.2.14

新疆  
两  
界



序



## 上篇 明月出天山



00二

### 第一章 西域古风


西域，是新疆古代的称谓，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个名称给新疆涂上了一层神秘而瑰丽的色彩，总是让人遐思无限，浮想联翩。

- 一、往事越千年 /3
- 二、西王母的象证 /5
- 三、西域岩画探秘 /9

01二

### 第二章 秦汉经行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关注西域；汉武帝励精图治，遣张骞通西域，开辟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密切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都护府，自此，西域归汉版图，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的文化对中原地区颇有影响，西域古国的遗迹也成为今天旅游者的向往之地。

- 一、张骞出塞 /13
    - 讳莫如深的奇计
    - “凿空”西域
    - 傅介子与陈汤
    - 解忧公主
  - 二、班超戍边 /26
    - 投笔从戎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子承父业
  - 三、梦幻尼雅 /33
    - 沙埋“庞培”
    - 佉卢秘史
    - 精绝之谜
- 

四、佛国与石窟艺术 /43

- 如来入西域    ○圣僧传道    ○千佛洞寻古    ○龟兹佛韵    ○高昌峥嵘

第三章 盛唐风采

○五三

立国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居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为世人瞩目和敬仰。唐朝统一西域，促进了边疆社会生产进步，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书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一、安西万里疆 /54

- 战狼的传说    ○大唐天可汗    ○再创辉煌    ○女皇的隐忧    ○帝国斜阳

二、维吾尔溯源 /69

- 回鹘衣装回鹘马    ○西迁漫记

三、丝绸之路 /78

- 丝路寻古    ○丝路苦旅

四、西域乐魂 /86

- 万方乐奏有于阕    ○南山截竹为觥篥    ○羯鼓声高众乐停    ○紫罗衫动拓枝来

第四章 大漠烟尘

○九六

从五代到宋朝经元朝至明朝，中原政权几度易手，而此时的西域也同祖国内地一样，风云变化，时统时分。在这些动荡的年代里，西域各个民族不断发展融合，与中原地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创造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

一、马可·波罗的惊叹 /97





○过客的困惑    ○三国对峙    ○西辽传奇    ○蒙元  
神话    ○群雄逐鹿

## 二、宗教战争 /112

○诸神在人间    ○真主的感召    ○“春秋”无义战

## 三、流星·蝴蝶·剑 /122

○智者闪灵    ○爱情经典    ○英雄史诗

## 四、十二木卡姆 /132

○木卡姆之谜    ○绝代佳人绝代歌    ○十二个月亮

一四一

## 第五章 紫塞流沙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他的边塞诗《边庭落日》中，曾有“紫塞流沙北”之句。紫塞，古时指边塞，此句描绘的是西域边关的独特风光、磅礴气势。西域，自西汉以来就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清代初期，中央政权先后平定多次叛乱，为统一西域，加强边疆与中原的交流、联系做出了重大努力。

### 一、无边瀚海定 /142

○天戈万里下风霆    ○无边草色入天青    ○二万舆图  
通指掌    ○横绝大漠回奔星

### 二、东归英雄行 /156

○拳拳赤子心    ○回归的启示

### 三、玉石的魅力 /160

○古玉出昆仑    ○美玉质如兰

## 下篇 百年荣辱

一六八

## 第六章 国耻家仇

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渐显颓势。而这

时，欧美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对外实行野蛮的疯狂的殖民掠夺。富庶的中国很快就成为西方列强劫掠的对象，新疆这片祖国西北的宝地，也没能逃脱侵略者罪恶的魔掌。

一、林则徐的忧虑/169

○“补天派”的疾呼      ○砥砺戈壁      ○潘朵拉之匣

二、边疆危机/179

○引狼入室      ○杀戮时刻      ○边城浩劫      ○风雨伊犁

## 第七章 还我河山

一九一

当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从来也没有屈服过。为了解除新疆危机，收复失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军事家左宗棠效命疆场，建树奇功；外交家曾纪泽据理力争，“探虎口索已投之食”，收复伊犁。其后，新疆建省，其一系列措施或可对后世有所启发。

一、大将西出师/192

○海塞之争      ○回疆凯歌

二、塞外定风雷/201

○生死豪情      ○长治西睡      ○帕米尔悬案

## 第八章 西部烽燧

二一二

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疆，处于动荡和纷乱之中，革命党的志士为推翻清朝统治而抛洒鲜血，然而他们的胜利果实却被军阀政府窃取。三十年代，大批共产党员来到新疆，他们坚决抵制反动势力，不怕牺牲，谱写了一曲曲感人的革命诗篇。

一、辛亥风云录/213

○山雨欲来      ○迪化枪声      ○伊犁狂飙



## 二、黑手悬鞭/222

○镇边楼上的奸雄    ○昏庸的“亲乡”督办    ○边疆“混世魔王”

## 三、天山正气歌/232

○陈潭秋鞠躬尽瘁    ○毛泽民血洒边疆    ○林基路一心为民    ○杜重远执着人生

二四六

## 第九章 走向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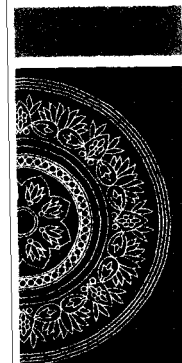
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这场三区革命，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它牵制了国民党的大批军队，为新疆的解放做了准备。与此同时，在境外帝国主义的煽动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姑息纵容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在新疆猖獗一时，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新疆各族人民与这股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1949年9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三区民族军的配合、新疆各族人民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和平解放。

### 一、边城波涌/247

○三区革命    ○联合与破裂    ○沉渣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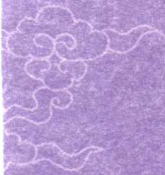
### 二、挺进新疆/254

○黎明前奏    ○和平解放



# 上篇

明月出天山



新疆两千年

第一章

# 西域古风

一层神秘而瑰丽的色彩，总是让人遐思无限，浮想联翩。  
西域，是新疆古代的称谓，意思是中国西部的疆域。这个名称给新疆涂上了

002

“西域”之称在公元前1世纪已经流行。《汉书·西域传》卷首即云：“西域以孝武时始通。”《通鉴·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在《汉书》以后的正史中，如《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直到《明史》，都以西域之名立传，即使不以西域之名立传者，西域之名也习用为常。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历史上，除了西域这个区域地名外，还出现过南域、东域的地名。但南域、东域等区域地名，不过在史书上偶然一见，未得流传。而西域之名却绵延长久，影响深远。西域范围广、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文复杂，加之她在丝绸之路地段上的重要位置，以及中国历代的群雄豪杰在这个地区的擘划经营，特别是汉、唐两代的光辉业绩，奠定了这个地区不断发展的基础，使西域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地区。

西域的神秘，来自她雄奇的地理景观和无数美丽的传说。人们通俗地用“三山夹两盆”来形容新疆的地形，“三山”是指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两盆”则是指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

天山由东至西横贯新疆的中部，把新疆分成了南北两个各具特色的区域。有诗云：“一山横亘界南北，万古奇雄塞大荒。”天山的雄伟壮丽，素来为古人所称道，唐初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就曾赋诗：“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华。云疑上苑叶，雪是御沟花。”关于天山的传说和奇闻逸事数不胜数，甚至许多文艺作品也要借助天山的神奇来增添自身的魅力。

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雄峙于新疆之南，它们是新疆与西藏的分界线，也是把这两个兄弟区域联结起来的一道纽带。这道山脉往东又同青海西部、甘肃及陕西南部诸山联成一体，同在山南北相望，所以在汉代，人们又给它们取名叫做南山。“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或许昆仑山的万年不倒之势，就是人们常说的“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用意



所在吧。

阿尔泰山位于新疆东北部，它从东南向西北延伸，长约2000多公里，“阿尔泰”译自突厥语，意为金子，以盛产黄金而得名。历史总是有无尽的相似之处。当19世纪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引发大规模“淘金热”的同时，中国西部的阿尔泰山也成为人们狂热的向往之地，在那里发生的不少西部传奇一点都不逊色于美国的牛仔故事。

天山和昆仑山之间，是辽阔的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约56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盆地。盆地中央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流沙滚滚、瑰奇变幻，面积达33.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沙漠，沙漠底部石油蕴藏丰富。发源于天山和昆仑山的细流汇成我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流向盆地。古时候，塔里木河沿着大沙漠的北缘从西向东奔流，最后注入罗布泊；但现在，在塔里木河下游与罗布泊之间却是一片大沙漠。关于这条河和这个湖有许多离奇的传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人认为塔里木河流入罗布泊后潜入地下，往东南流入青海后又露出地面，成为黄河的源头。目前塔里木河下游的断流似乎已否定了这种说法，但要断言塔里木河与黄河完全没有联系似乎又为时太早。至于罗布泊，美国人很早就以卫星照片为据说它是行踪不定的“游移湖”，并且在逐渐消失。1959年新疆综合考察团进入湖中时，发现湖水平均深度只有25公分，但其中竟有一米多长的大鱼在挣扎，这令他们大惑不解，有人翻出清代方志，其中记载道：每年春天，罗布泊中之鱼便上岸幻化成鹿，而鹿到秋天又滚回湖里再成为大鱼。这亦真亦幻的传说令人玄而又玄。1980年，罗布泊的探险勇士——科学家彭加木在考察过程中失踪，他的失踪牵动了亿万人民的心，也使罗布泊带着诡秘之气蜚声海内外。



阿尔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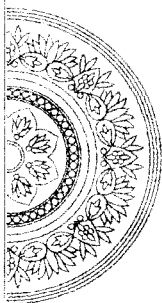


16年之后的1996年，又一位孤胆英雄——余纯顺，在徒步环游全国的过程中，离奇地葬身于罗布泊，中国的科学考察界再次陷入罗布泊的迷梦。罗布泊，是在向世人昭示自然的威力，还是在20世纪末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给科学界再出一道“哥德巴赫猜想”的难题？

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另一大盆地，大致成三角形，这就是准噶尔盆地。盆地的中心是固定或半固定的沙漠，周围是绿洲和大片草原。发源于阿尔泰山西南麓的条条河流汇合而成为额尔齐斯河，它从东向西流入斋桑湖，再向西北而流入北冰洋。这条河及其支流的两岸，几千年来均是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发源于天山北麓的最大河流是有名的伊犁河，向西流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河谷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气候宜人，向来有“塞外江南”之美称，是“天马”的故乡。

帕米尔高原——在汉文史籍上一般被称为葱岭——是昆仑山和天山的两道山脉的连体处，它以险峻而著称于世界。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从这里通过，这儿曾为航海业兴起以前沟通亚、欧、非洲各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 二、西王母的象征



西王母是中国古典神话中很有代表性的“诸神”之一，至今新疆人民仍流传着关于天池和西王母蟠桃盛会的传说。

据说西王母居于昆仑山，《山海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胜，虎齿有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西王母的原型是西羌的母虎图腾；据历史学家考证，西王母实际上是新疆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领袖的象征。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解放后在全疆各地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陪葬兵俑

差不多都有发现，如哈密地区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雅尔湖、辛格尔；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天山北麓的木垒、奇台、吉木萨尔、伊吾、巴里坤及伊犁河谷；天山南麓的库车、巴楚、柯坪；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博斯腾湖沿岸；昆仑山、喀喇昆仑山下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且末、民丰、于阗、皮山等等。

新疆的新石器文化从石器的型制、打磨技术、种类、用途及陶器色彩、花纹等方面看，与内蒙、宁夏、青海、甘肃等地的细石器文化有密切联系。当时人们的生活因居住地方的自然环境不同，有的以狩猎、游牧为主，随水草迁徙，居无定所；有的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相对稳定。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有分工，产品交换已经出现。人们过着氏族社会的生活，先是母系，随着生产的发展，在晚期渐渐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对于新疆古代居民，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很难下一个确切的定论。新疆处于亚洲腹地，是古代中西交通孔道，也是历史上各色种族、民族迁徙角逐和交汇融合的地方。由于自然、社会或战争的原因，一些种族

民族迁入、游牧、定居、繁衍生息；又因同样的原由，他们或者迁往他处，或者被征服，或者部分地留下来与后来的种族、民族融合同化，成为新的种族、民族。就这样东来西往、南迁北移，形成了新疆古代史上复杂的居民关系。考古、历史、语言、人类学家们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对新疆的居民状况作一个推测。

从人种学方面讲，具有西方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居民，在体质上有与地中海东支类型接近的成分，以短颌为特征的西方人种成分和蒙古人种成分都是新疆古代居民的种族起源。从民族学上说，小月氏、羌氏族、塞人、大月氏人、乌孙人都与新疆古代居民有血统关系。另外，这一时期活动在天山南北的还有匈奴人、丁零人、乌揭人和汉人等等。从语言学方面讲，新疆古居民分别属于印欧语系、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

人面虎身的西王母是人们対氏族领袖的神化，然而中国人造神又始终使神保持着人气——要么成天想着下凡，要么就干脆在神界过着世俗的生活，于是西王母被神化后又被人格化。她和周穆王的相会就是典型的例证。据先秦奇书《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第六代君主姬满（即周穆王）在位时突发奇想，仅依靠马匹就开始了他的旷世奇举——西巡昆仑，而他会见西王母，是其西行最具光彩的篇章。《列子·周穆王篇》又载：“（穆王）遂宿于昆仑之阿，赤水之阳。别日有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治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之和。”这次“划时代”的会面不仅有着某种浪漫的意味，更象征着西域与中原地区的日益密切的联系。

除了周穆王与西王母瑶池相会这个半神话半现实的传说之外，仍有许多事例可以作为秦汉以前的西域与中原地区相互交往的佐证。



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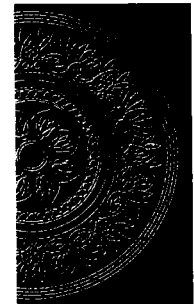
考古学家在罗布泊地区的古墓葬中，曾发现一种用海菊贝壳制成的随葬饰珠。这种海菊贝壳只产于东南沿海一带，新疆所发现的，无疑是从内地转输来的。

“玉门关”是新疆与内地的交通枢纽，在古代它是边塞诗人的诗作里经常咏叹的对象；但它之所以得此名，当是与新疆玉由那里入内地有直接关系。新疆产的玉石早就闻名于内地，在原始社会的历史传说中，就有了新疆玉器向东流传中原的记载。《玉海》引南北朝孙柔之《瑞图》说：“黄帝时，西王母乘白鹿献白环之休符，舜时复来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曾以不少篇章叙述了古代帝王“贵用禹氏之玉”和昆仑墟之“璆琳琅玕”的情景，说这种玉石是来之不易的，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历尽艰险。近人考证，所谓“禹氏”，即“月氏”之异译，那时他们分布在敦煌一带，正处新疆玉进入中原的孔道，所以中原人就称新疆玉为禹氏玉。因此有人提出，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就存在着一条“玉石之路”。

新疆地区的畜牧业发达，所以输往内地的物品又有骏马、骆驼等牲畜。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说，莎车、匈奴、月氏等少数民族地区所产的白玉、骆驼、野马、骡最为有名。《穆天子传》中说，周穆王西行时，沿途各地向他赠送了大量的马、牛、羊以及酒等物。

经济文化上联系的加强，使内地同新疆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逐步加深。新疆地区的自然面貌，如山脉、河流、物产等，在先秦的汉文古籍中早就有了反映。在《山海经》中对昆仑山和罗布泊都有较详细的描写。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在其所写的《招魂》、《天问》等诗中，也曾述及西部浩瀚的流沙、高峻而又雄伟的昆仑山，并且由于对它们还不很熟悉而提了一些疑问。至于新疆地区的各族人民对内地的了解，突出的感觉就是内地富庶殷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虽然新疆正式列入中国版图，是以公元前60年汉在西域设都护府为标志的，但中原和西域在那以前的大量交往已经使得两地日益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岩画是原始社会的居民用独特的方式对历史的记录，是绘、刻在岩石上的形象性“史书”，它对文字的史书是一个极大的补充。从阿尔泰山、天山到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帕米尔高原的辽阔山区和广大草原上，自古以来一直是各族狩猎和游牧人民生息繁衍的地方，但是，关于他们创造的牧猎文明却没有正史的记载，因此，他们留下的岩画就成为研究那个时期文明的宝贵而独特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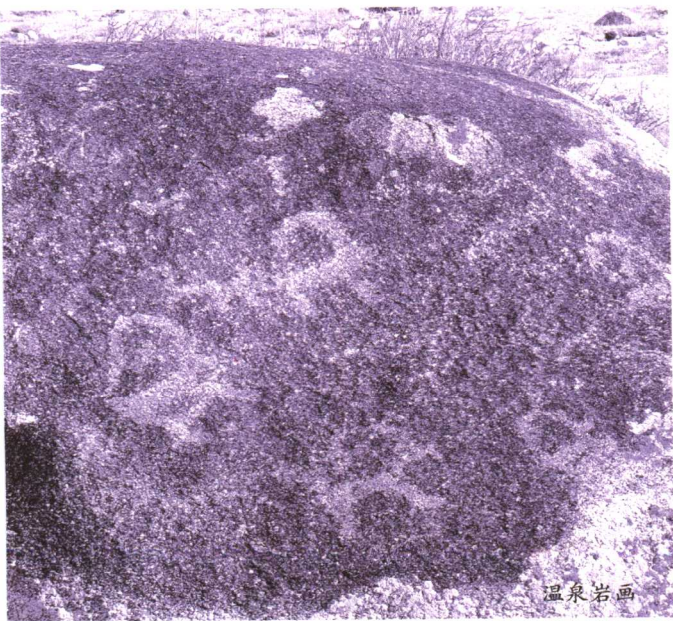
解放以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新疆的三大山系阿尔泰山、天山和昆仑山中发现了大量岩画。这些岩画有的在洞中，有的

在壁石上。有的是彩绘，有的是雕凿或摹刻。这些岩画是新疆早期游牧民族生产、生活和社会的真实写照。

仔细研究分析这些岩画所表现的思想内涵，就会觉得它十分丰富深刻。首先，新疆地区古代各族先民是把繁殖人口作为自己最庄严、最神圣的事业来看待的，因而使男女生殖崇拜的文化显出了夺目的光彩。与此同时，反映



〇〇九



温泉岩画



康家石门子岩画

各族先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是在与众兽搏斗以及与险风、恶浪、地震等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狩猎业。畜牧业发展起来以后，狩猎业降至辅助地位。因此在岩画上可以看到各种家畜的放牧场面、毡房、各种车辆，以及氏族部落间充满肃杀之气的战斗情景。已经发现的那些丰富多彩的岩画充分反映了猎人和牧民各种不同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他们英勇拼搏的狩猎业绩；他们艰苦的放牧劳动；他们的欢笑和娱乐；他们的信仰和崇拜；他们的喜好和情爱；他们的认知和科学水平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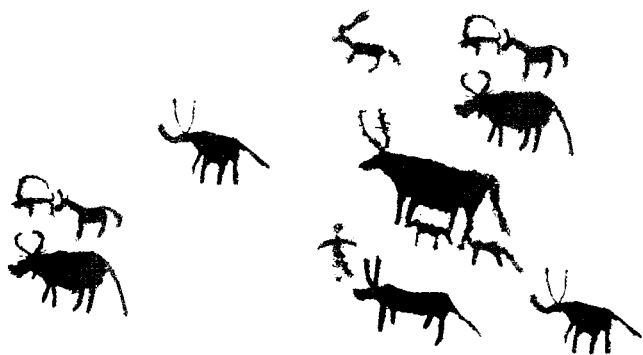
在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有古代居民塞人留下的二三百人大型裸体岩画。塞人是一个强悍的民族，他们当时地处欧亚战略中心地带，顶住了四面八方涌来的袭击者和征服者，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公元前6世纪初，著名的帝王居鲁士在征服米地亚、阿尔明尼亚、巴比伦等地后，入侵里海和锡尔河之间的一支塞人部落萨盖塔依人，萨盖塔依人的女王托米丽司拒绝了居鲁士的各种要挟，毅然率军抗击入侵的波斯军，取得了胜利，并杀死了居鲁士。女王托米丽斯割下嗜血成性的



居鲁士的脑袋，扔在盛血的革囊中，豪迈地说：“让你喝个痛快吧！”公元前4世纪，不可一世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也是栽在塞人手里，当他亲率大军想冲过滔滔的锡尔河，占领塞人的广大草原时，被英勇不屈的塞人用箭射穿了大腿，因腿骨粉碎，亚历山大被迫撤军，饮恨锡尔河畔。从康家石门子的岩画中完全可以看出塞人的健美体格和英勇顽强的精神。



总之，散布在草原和山区各处的岩画，是留在石头上的史诗长卷，系统记录了当时人类发展的进程，及狩猎、放牧、征战、娱乐、宗教等各种采撷不尽的艺术之花和文化之果。岩画的天地是一个天真烂漫无所畏惧的广阔世界，没有儒家的严肃，没有道家的玄虚，倒是有一点巫术的疯狂。因此，岩画中充满了狂妄的气势奔放的速度，总在不停地运动、奔跑、射猎、战斗，人物、动物都在活动中显示生命的可贵和力量的威风。这种动的旋律，是处于上升飞腾的民族的心理表白，也是对前途、命运、力量、生命的赞美，充分显示了古代新疆地区人民的斗志与活力。



# 秦汉经行

化对中原地区颇有影响，西域古国的遗迹也成为今天旅游者的向往之地。

域设置都护府，自此，西域归汉版图，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域的文化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密切了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公元前111年，西汉在开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开始关注西域；汉武帝励精图治，遣张骞通西域，开

## ● 讳莫如深的奇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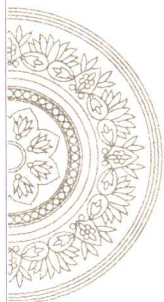
万里长城是中国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但建筑它的初衷却远远不是让2000年后的宇航员从月球上眺望称奇。当年秦始皇用它来抵御匈奴时肯定想不到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奇迹。

匈奴是我国古代的北方民族，春秋战国时代，他们就游牧在蒙古高原上，当时各诸侯国逐鹿中原，无暇北顾，匈奴乘机向南发展，在阴山河套地区活动。这里气候适宜，沃野千里，草木茂盛，匈奴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发展了游牧经济，很快壮大起来。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匈奴就成为中央政权北方的心腹大患。

秦朝时，匈奴经常越过河套进入内地骚扰，秦始皇命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上抗击匈奴，夺回了河南地（内蒙古河套一带）。匈奴力不能敌，向北退却700余里，转移到蒙古高原中部。为了防御匈奴的骚扰，秦在河套一带建44个县实行移民屯田，同时把原来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筑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郡（今鸭绿江边）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命蒙恬带兵坐镇上郡（陕西榆林东南）以为守卫。

讲到匈奴，就不能不提冒顿单于，他是匈奴奴隶制国家的创始人。冒顿自小性格坚忍，行事果断，手段毒辣。幼年时，他的父亲头曼单于面对强大的月氏人，被迫臣服，并把长子冒顿送到月氏作人质，后来头曼单于欲立幼子为单于，故领兵攻打月氏欲假月氏人之手杀冒顿，多亏冒顿已长大成人，他对月氏人把他当人质的耻辱和父亲头曼不顾自己的死活的无情都怀恨在心。

公元前209年，冒顿得到机会，用箭射杀其父头曼，做了单于。随后大力发展军事，开始向四方征战，其势力慢慢渗入西域并成为主宰。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先后东破东



〇一三



张骞出塞图





胡，西败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公元前177—前176年，冒顿派右贤王大规模西征，攻灭河西走廊的月氏，终于雪了人质之耻。大部分月氏人被迫迁至伊犁河流域，史称大月氏；小部分未迁者向南越过祁连山与羌人杂居，史称小月氏。

匈奴攻占河西走廊后，继续大规模西征，平定楼兰、乌孙、乌揭等部族，天山南北诸国均被匈奴征服。这样，匈奴就控制了东起辽河、西至葱岭、南抵长城、北及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结束了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互不相属的分散局面，实现了北方地区的统一，在客观上为后来全国的大统一创造了条件。

冒顿单于把匈奴的疆域分为中、左、右三部分，中部由单于直辖；左部在东，由左贤王统领；右部在西，由右贤王统领。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属于匈奴右部，日逐王是这个地区的最高统帅。

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后，高唱着气势磅礴的

《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显然已经感到了匈奴强大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200

年亲自率32万大军北拒匈奴，结果由于战略失误，被匈奴围困在雁门关一线的平城，全军绝粮长达7天，只好使用谋士陈平的“奇计”解围，汉高祖侥幸逃脱。刘邦在“扫平六合”之后居然以32万大

军栽在匈奴手上，这被他视为平生大耻。至于陈平，他的

“奇计”被史家称作“薄陋拙劣”，所以像《史记》这类正史竟以“其计秘，世莫得闻”为托辞，不载其具体内容，并以春秋笔法在陈平的传记中写下这位美男子自称“我多阴谋”，必将“以吾多阴祸”。结果，陈平退匈奴的“奇计”，成为历史的又一个问号。刘邦回到中原，元气大伤，未敢再与匈奴起战事。及至吕雉继刘邦主政，匈奴单于进一步致书调戏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女皇”，说什么吕后是寡妇，而自己则“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显然没把她放在眼里，阴险毒辣的吕后面对匈奴也只能忍气吞声，以和亲俯事匈奴。



● “凿空”西域

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匈奴单于给汉文帝写了一封踌躇满志的信，宣称自己“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特意强调已使楼兰、乌孙这几个西域强国臣服，只是想证明他已完成了对汉帝国的钳形包围，从北方、西方都构筑了扼制汉朝国力扩展的壁垒。这封著名的信对西汉朝野上下震动极大，毕竟汉帝国的东方、南方是那时尚不能征服的海洋，如果不想听任匈奴耀武扬威，不想沦为二流强国，就必须走向西北，这种形势就最终引发了张骞通西域的旷世壮举。

张骞，汉中人（今陕西城固人）。出使西域以前，任郎官，地位低下，一直不为世人所知。所谓时势造英雄，张骞之所以后来能够做出那一番业绩，也是有赖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汉高祖败于匈奴之后，汉朝不敢公开与匈奴对抗。迄汉文帝即位之前，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和亲”策略，即汉朝把皇室宗族的女儿冒充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为妻，每年还按期馈赠匈奴单于大量丝织品、粮食和酒，以换取边境的安定。汉朝对匈奴的忍让和不抵抗政策只是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后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此外，历经六七十年的励精图治，汉朝国内割据势力逐渐削弱，农业生产也逐年得到恢复，“天下殷余，财力有余，士马强盛”。国力的强盛给汉武帝解决边患问题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尽管如此，对匈奴之役，由于事关汉朝边境安危，所以，汉武帝仍是以非常审慎的态度对待此事。他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寻找机会进行战略反攻。一次，从一名降汉的匈奴士兵口中，他了解



张骞出使西域图





到，居于匈奴西部的月氏人，屡遭匈奴掠夺，其王被杀，头颅被匈奴单于当作饮酒的器具，迁往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人对匈奴仍痛恨万分，一心想报仇雪恨。汉武帝由此萌生出一个对付匈奴的大胆设想，这就是派遣一个使团前往大月氏人处，与他们



取得联系，晓以利害，共同对付匈奴。当时匈奴“右（西）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南接羌，隔汉道焉”，所以如能联合大月氏，从西边打击匈奴，就可断其右，并绝其后，使匈奴陷入绝境。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计划。汉武帝同时也深知，此使团西行途中肯定艰辛万分、危险重重。因此，使团的首领必须有超群的胆略和过人的智慧。为找到最佳人选，汉武帝下诏公开“悬赏”征募使者。此时的张骞，正是血性男儿，不愿顶着小小郎官的乌纱帽终此一生，他期待为国效力，做一番事业，于是踊跃前往应征，也是天遂人愿，张骞竟在上百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汉朝第一位以官方身份出使西域的使团首领。

张骞奉诏出使西域，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被征募后，即率领一个百余人的使团由陇西启程。踏上西行的征程。使团中有各种人才，其中有一位叫作堂邑父（本名叫甘父）的西域胡人，据载此人极善射箭，他受命充任张骞的贴身随从。如前所述，当时河西走廊及其南部的羌族部落皆在匈奴的控制之下，所以，为了避免与匈奴人遭遇，张骞一行行踪十分秘密小心，然而，尽管如此，他们出陇西不久就被匈奴的巡逻兵发现并全部俘获。匈奴骑兵把他们辗转押送到匈奴王廷（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单于得知张骞一行是经其地而到大月氏去，便勃然大怒道：“月氏在我北部，汉使怎能前往，我如果派使节出使南越，汉朝能听从我的命令吗？”于是软禁了张骞，并且一关就是10年。在这10年里，张骞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匈奴单

于为了软化、拉拢张骞，把匈奴女子嫁给他为妻。他虽然在匈奴有了家室，但这并未动摇他完成使命的坚强意志。司马迁在《史记》中盛赞张骞“持汉节不失”，这说明张骞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对汉朝始终忠诚不渝。

在张骞身陷囹圄的时候，外界已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汉朝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新的突破性进展。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在大将军卫青的带领下，由云中出击，一举收复了河套地区，第一次给匈奴以沉重打击；第二件事就是大月氏人的南迁，他们的迁徙是为乌孙的西击所迫。月氏人在其强盛时曾打败乌孙并杀了乌孙王难兜靡，并占据了乌孙人的地盘。当月氏人为匈奴所迫退居伊犁河流域后，乌孙王——难兜靡之子昆莫在匈奴人的纵容支持下挥师西进，向月氏人发动进攻，以报杀父之仇。大月氏人无力抗拒，只好向南迁至中亚地区大夏人活动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阿姆河以南诸地。

公元前129年，张骞趁匈奴的监视有所放松，便毅然同贴身随从堂邑父从匈奴营中逃出。张骞脱险以后，并无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羞于东归，于是他和堂邑父继续向西进发。他们首先取道天山南麓的车师（今吐鲁番盆地），从那里穿过沟通天山南北的重要交通孔道，进入焉耆，再从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经过龟兹（今库车东）、疏勒（今喀什）等地，行抵大宛（今吉尔吉斯共和国费尔干纳）。一路上，张骞跋山涉水，备尝艰辛，加之又是匆匆逃出，经常缺粮断水，有时一连几天见不到人烟，只好靠堂邑父沿途射猎禽兽充饥。所以，从匈奴西部到大宛这段路程，他们一连奔波了几十天。

张骞到达大宛后，看到大宛农业发达，盛产稻、麦和葡萄酒。富人藏酒多至万余石，能保存几十年不坏。大宛的良马也非常著名。大宛王早就听说汉朝富饶，早想跟汉朝交往，只是“欲通不得”，因此非常热情地款待了张骞。逗留大宛期间，张骞才知道大月氏人已迁走，于是他匆匆与大宛国王相别，继续西行。但当张骞费尽周折最后找到大月氏人时，发现这时的大月氏人已臣属于大夏人，又因该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盛，使其“户口殷盛，安居乐业”，早已将昔日与匈奴人的仇怨忘之脑后，已无意东返。张骞见状，知无论如何劝说，月氏



人也不会勒马东归了，于是怏怏不乐地踏上归汉的路途。

回归途中，张骞再次为匈奴人所俘并关押了一年多，后来乘匈奴单于卒亡造成的动乱才得以逃出。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骞和贴身随从堂邑父终于回到阔别13年之久的长安城。

张骞这次西行，出发时率众百余人，前呼后拥，归来时却仅剩主仆两人，并且也未达到预定的与大月氏人结盟共击匈奴的目的，其狼狈窘态是可以想见的。但是，由于张骞给汉武帝带回了急需的西域各国的地理状况、民族分布、习俗、兵力等方面的重要信息，所以，张骞不但未受处罚，反而荣膺爵位，被升作太中大夫，其随从堂邑父也获奉使君的封位。因张骞熟悉西域情况，又在西域地区滞留数年，了解匈奴的活动范围和作战方式，因此，汉将卫青于元朔六年（前123年）率10万大军北击匈奴，张骞便以校尉从军。此次战役，大败匈奴，匈奴单于远遁，汉朝地域向北扩展了百余里。张骞立了大功，遂又被封为“博望侯”。

经汉军数次出击，匈奴弃漠北，据守西域。为了打通西域，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即利用乌孙人与匈奴有世仇这一点，联络位处匈奴西北部的乌孙，东西夹击，以彻底击垮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诏再次出使西域。

张骞这次出使和第一次出使相比已大不一样。首先，随员、物资成倍增加，他率随从300人，每人各备两匹马，并携带大量的金币丝绸和1万多头牛羊；其次，还有许多“持节”副使同行，以便沿途派往各地。同时，由于汉朝已赢得了对匈奴战争的胜利，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已经在汉朝的统治之下，张骞和他的随从人员大可跃马扬鞭，奋力前行，不必再担心匈奴骑兵的袭击了。所以，这次张骞率领的既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又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队。

张骞顺利抵达乌孙国时，适逢该国内讧，昆莫的子孙争夺王位，正闹得你死我活，他们自然无心顾及与汉朝结盟攻打匈奴之事。所以张骞西使的目的仍未达到。但是乌孙昆莫还是接受了汉使的礼物，并且遣使臣携良马随张骞回长安朝贡，以示答谢。张骞在逗留乌孙期间，另遣副使分别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身毒、于阗等地，与这些地方建立了广泛的政治、经济关系。这些活动对于孤立匈奴，增强和扩大西域

各地对西汉中央王朝的了解和认识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张骞归国不久，这些地区和部落的首领纷纷派使臣至汉廷朝贡，即是有力的明证。

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东归长安。汉武帝封其为大行，位列九卿，以作为对他一生功劳的肯定。同年，张骞，这位伟大的探险家和政治家，因长年奔波，身劳心悴，于长安溘然长逝，结束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德国人夏德和俄国史学家都将张骞西行与后来哥伦布美洲之发现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相媲美。我国的古籍，则形象地将张骞西行壮举称作“凿空”，即“原来不通，凿之，现在通也”。

史书称张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这反映了张骞本人优秀的素质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以至于后来出使西域的汉使都皆称“博望侯”，打着张骞的旗号以取信于各地。这些都极大地加强了西域诸地对中原的认识，对后来西域归属汉朝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无怪乎史书谓：“西域之统一，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首任西域都护）。”张骞的西行首次开通了“丝绸之路”，不仅使中原的丝绸、手工艺品等传入西域，传至西方，而且也引入了一系列以“胡”命名的食品、植物和那时对于中原人民来说还相当稀罕的事物，让他们大开眼界。张骞西使归汉后，将其经历和对西域及中亚各地的了解以书面报告之形式呈于汉武帝。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即以其报告为蓝本，班固亦将其记述收入《汉书·西域传》中。

张骞的活动，使得中国、印度、波斯、希腊这些原先被山海沙漠相隔着的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国第一次有可能体会到几千年来由人类的劳动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伟大和美好。在他的推动下，一个新的纪元开始了。但据说张骞临死时惟一的遗憾是两次出使均未达成其初衷，但“无心插柳”的收获业已使他永垂青史，或许正应了那个亘古不变的哲理：“有缺憾的美才是真正的完美。”



## ● 傅介子与陈汤

在西汉与西域交往，打击匈奴，直至最终统一西域的过程中，不但有张骞这样宏才大略的外交家，而且也有一些艺高胆大、敢于以生命为赌注的冒险家，傅介子和陈汤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汉武帝派兵击败匈奴后，匈奴向西退却，而楼兰、龟兹等国由于地处汉朝与匈奴势力的夹缝之中，经常采取暧昧态度，两边讨好。曾经出使西域的汉朝使节傅介子，对楼兰、龟兹等国对待汉朝使团的模棱两可甚至阳奉阴违的态度，有较深切的体会。所以在汉昭帝时，当名将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当权之后，身居平乐监丞的傅介子提出了打击西域楼兰诸国，以削弱匈奴势力的建议。

傅介子最初建议，由朝廷派自己出使龟兹，以便刺杀龟兹王，作为对亲匈奴者的惩戒。但霍光却说：“龟兹路比较远，先到楼兰试试效果如何再说罢。”

汉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奉命出发，很快就到了楼兰王都，他此行的公开身份是汉朝赏赐西域各国的特使，除了卫士，还携带了大量金币。一开始，楼兰王安归并未亲自接见傅介子一行，对他们比较冷淡。傅介子故作受了冷落而要离去的姿态，率随从离开王都西行。到达楼兰西部边界时，他对前来送行的楼兰国译员说：“皇帝派我以黄金锦缎遍赐西域各国，既然你们的国王不肯亲自来接受这些赏赐，我只好把它们送到其他国家去



龟兹故城(库车)

了。”说完，还故意让译员看了所带的大量金币。译员立即向国王报告了此事，国王马上赶来见傅介子。傅介子设宴款待楼兰国王，在宴席前还陈列着那些黄金丝绸。贪财的楼兰国王被美酒黄金弄得头晕眼花。傅介子说：“天子让我私下里跟你谈点事。”楼兰王此刻已完全丧失了警惕性，还以为有什么好事，就屏退左右，随傅介子进入帐篷中谈话。刚进帐篷，两边埋伏好的壮士就从背后向楼兰王行刺，利刃穿胸，楼兰王登时毙命。楼兰王的亲信仆从得知其遇刺后大乱，傅介子则镇定地大声宣布：“楼兰王安归对汉朝负有罪行，常受匈奴指使，拦杀汉朝派赴西域的使节、大宛派赴汉朝的使节，盗取节印和献物。天子派我来处死有罪的楼兰王，并立在长安作侍子（即人质）的前太子为新的国王。汉朝大兵压境，尔等若敢轻举妄动，就会遭到灭顶之灾。”楼兰人还真被傅介子给镇住了，乖乖地散了伙。于是傅介子持楼兰王安归的首级安然返回长安，受到汉昭帝的嘉奖。楼兰王的首级被悬于北阙，而傅介子则被封为义阳侯。

当死不瞑目的楼兰王从北阙城头俯视长安的熙来攘往时，他只能慨叹自己时运不济，不识时务。毕竟楼兰王也有自己的苦衷，由于楼兰尴尬的地理位置，他也就只能扮演这个骑墙的尴尬角色。至于傅介子，他能只身立奇功于塞外，靠的是过人的胆识和审时度势的能力，倘若任何一个环节出一个小差错，身首异处的恐怕就是他而不是楼兰王了。

200多年以后，公元152年，东汉的西域长史王敬，欲效法傅介子杀于闐国王以扬威，但他的魄力远不如傅介子，于闐也不是楼兰，局势并未因杀掉国王而得到控制，王敬自己反被于闐军官杀死。

傅介子行刺后，新的楼兰王尉屠耆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处境之难。以前数代楼兰王都是因为身处汉、匈奴两强之间无法平衡，而身遭横死，自己摆脱厄运的方法就是不再“骑墙”，而是完全依附于汉。于是他向汉昭帝请求派兵到楼兰驻扎，汉昭帝应允，立即派司马1人，率吏士40名，前往伊循屯田，并借之镇抚楼兰，伊循城后又设置都尉，成为汉控制西域的重要支撑点。

公元前74年，汉朝与乌孙联合击败匈奴。这年冬天，匈奴骑兵万余人到乌孙报复，归途中遇大雪，损失惨重，又遭乌孙、丁零、乌桓夹





# 新疆两千年

击，匈奴从此一蹶不振。而汉朝自此以后威震西域，多数国家臣属西汉。

公元前60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内部发生纷争，日逐王先贤掸归附汉朝。汉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管南北二道各地，都护府设在乌垒城（今轮台东北）。西域都护府管辖的范围，东起阳关、玉门关，西至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北抵巴尔喀什湖，南括葱岭山区；西域55国中，除鬲宾、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安息5国因距离中原“绝远”而不属都护外，其余50国，均在西域都护府的管辖之下。

西域都护府的建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汉朝版图，成为中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朝的西域统一大业自张骞始，到郑吉止，终于完成了。

郑吉任西域都护之后，匈奴的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最后两单于并立，即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人先后降汉。呼韩邪单于是真心臣属于汉，还娶了后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为妻。但郅支单于却对汉阳奉阴违，他眼看呼韩邪单于由于受汉朝帮助而实力强大，自己无法与之抗衡，就一方面向汉称臣，一方面向西发展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他联合康居，骚扰乌孙、大宛，压迫西域各族人民，还屡杀汉使，这对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汉元帝即位以后，于公元前36年派甘延寿为西域都护，陈汤为副校尉。陈汤为人机敏、果敢，做事一向雷厉风行，当他到达西域，看到了郅支单于造成的严重局势后，就马上提议发兵平乱。甘延寿说要先请示朝廷，但陈汤认为汉元帝软弱无能，他周围又是一群胆小怕事的佞臣，事情汇报上去一定没有结果，就毅然决定，征发各地方军及戊己校尉屯田士卒，准备出发；同时上书朝廷，自认假传圣旨有罪。陈汤讨伐郅支单于的军队势如破竹，最终攻入都赖水上郅支城，郅支受重伤而死。陈汤此举，为西域各族人民铲除了一个祸害，其英雄气概堪与傅介子相比，而汉元帝，还不至于昏庸，最终因陈汤的大功而折了他的“罪”，并予以嘉奖。这一仗稳定了西域的局势，此后数十年内，西域基本上未发生什么大的动乱。



## ● 解忧公主

在汉朝经营西域的历史中，还有一些深明大义、不畏艰苦的奇女子，她们不畏塞外的艰苦，远嫁他乡，谱写了一曲曲决不亚于热血男儿的光辉诗篇。

张骞二出西域10年以后，汉武帝为了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猎骄靡，细君在历史上被称为江都公主。

乌孙，是今天新疆哈萨克族的祖先，生活在现在的伊犁地区。他们和汉朝一样，也一直深受匈奴之害，张骞第二次通西域就为了联系他们一起抗击匈奴。细君到了乌孙以后，经常和她的丈夫乌孙王一起谈论乌孙政务，并向乌孙王和他的近臣们宣传汉朝的富饶强盛，借以巩固汉朝与乌孙的联盟。可惜的是，这位汉族人民的友好使者，由于体质纤弱，水土不服，只在乌孙生活了5年，就与世长辞了。

江都公主逝世后，为了不使汉族人民和乌孙人民的友情变成断线珍珠，应乌孙的再次请求，汉武帝把楚王刘戊的孙女封为公主又嫁给了乌孙王，这就是后来被誉为乌孙国母的解忧公主。解忧公主为人乐观开朗，身体健康。她虽然自幼生在深宫闺院，但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来到乌孙之后，很快就适应了草原生活。她喜欢骑马，还学会了打猎，她常常穿着乌孙服装，皮衣革履，头戴孔雀翎帽，身穿貂狐裘，肩披狼尾，乘乌孙天马，和乌孙王一起巡视部落。她对乌孙的人畜的繁衍、政务的盛衰，都极为关心，因为她知道乌孙的兴亡，直接关系到汉朝与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的成败。

汉武帝末年，匈奴首领看到乌孙与汉朝友好，不再受它的奴役，就怀恨在心，发大军先吞掉乌孙的近邻车师，置乌孙于唇亡齿寒的境地。接着又以车师为跳板，长驱直入乌孙腹地，掠人抢畜，无恶不作，并一再扬言只有乌孙交出解忧公主，断绝与汉朝的来往，它方肯罢休。如此



〇二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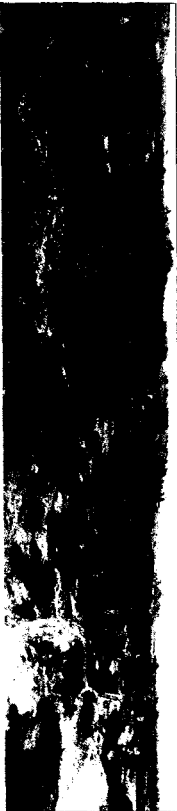
# 新疆两千年

形势下，乌孙的命运如危巢之卵，时刻都有倾亡覆灭的危险。谁能力挽狂澜呢？乌孙内部议论纷纷，有人主战，有人主降。乌孙王和解忧公主联名向汉朝上书，请求支援。但不巧正赶上汉昭帝病危，朝臣对军国大事不敢作主，就没有轻易答复。一时间乌孙内部投降派意见甚嚣尘上。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解忧公主建议乌孙王盛宴群臣，地点就在她居住的汉宫。公主为乌孙权贵们准备了各种美味佳肴，全都是由她带去的汉族厨师烹制的，格外鲜嫩可口，席间的美酒，也是公主的宫人酿造的，其味之妙，其色之艳，实在令人陶醉。前来赴宴的人们争着夸赞汉朝的食品之美，进而又引申到汉族人民的聪明智慧，汉朝的富饶强盛。解忧公主不失时机地对大家说：“有人怀疑汉朝不会出兵援助乌孙，这是没有根据的。我以汉朝公主的身份向大家担保，汉朝的军队一定会来的。”乌孙王接着说：“对！我们乌孙人，要信任汉朝，忠于联盟，只要我们坚持到底，等汉朝的军队一到，胜利就是我们的。老王猎骄靡的子孙们，乌孙的英雄们，我们乌孙的历史，只有光荣的胜利！可耻的投降，从来就和我们没有缘分！”

此时，汉朝已由汉宣帝即位，他接到乌孙王与解忧公主的第二封信之后，马上派15万大军，分兵5路，齐头北进，攻打匈奴。这5路大军如五齿钢叉一般，狠狠地插向匈奴腹部。匈奴由于紧逼乌孙，大军西下，造成本部空虚，听说汉朝出兵，匆忙西兵东遣。汉朝的这一计，很快替危急中的乌孙解了围。与此同时，汉朝政府又派校尉官常惠持节前往乌孙，与乌孙王一起率领乌孙5万精壮骑兵，从西面配合汉军攻打匈奴，“造成钳击夹攻之势”，迫使匈奴顾首失尾，结果，这一仗匈奴大败，汉、乌孙联军全线获胜。乌孙获得大量战利品，汉朝还派人携带珍贵礼品对乌孙进行了犒劳。

这一次巨大胜利，使乌孙在伊犁地区站住了脚跟。因此，解忧公主不仅在乌孙享有极高威望，而且在整个西域地区也有了很大的影响。匈奴横行西域，各小国由于城小力薄，又各自为政，一直吞声忍气地过活。现在有人敢站出来制服匈奴，他们的感激之情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他们看到强大的汉朝能够平等地对待乌孙，他们对汉族人民的感情就更加亲近了，因此普遍要求与汉族人民增加友好往来。为了满足西域各



国的友好愿望，解忧公主就派她的侍女冯嫫，以解忧公主的身份，持汉节到各国进行友好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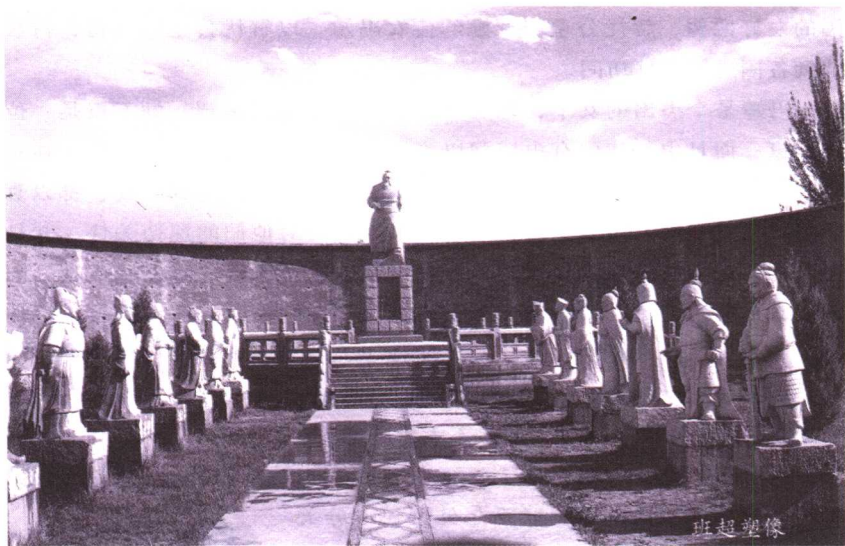
冯嫫是个杰出的女子，她通晓经史，为人精明多智。她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也是我国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女外交家。解忧公主在乌孙的政治生活得到她很大帮助。冯嫫周游西域各国，每到一处，都以真挚的感情对当地人民表达汉朝政府和汉族人民对他们的深切关怀。并且还对各敢于抗拒强敌匈奴的首领和人民，给予积极的赞助和鼓励。因此，她在所到的每一个国家，都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人们都敬重地称她为“冯夫人”。她的出使，大大加强了西域诸国与汉朝的友好关系，对于后来（公元前60年）汉朝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和西域三十六国正式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一部分，都是不无影响的。

解忧公主的一生除了费尽心血，极力维护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尤其是和乌孙人民的血肉联系之外，还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教育，想方设法培育出她的事业的继承人。因此，从她的大儿子元贵靡记事的时候起，她就委托冯嫫代她给以良好教育，教他要向父亲乌孙王学习，热爱乌孙、热爱汉朝。解忧公主的二儿子、三儿子和大女儿、小女儿也都受到了同样教育。这种教育，就连乌孙王廷权贵们的子女都受到了影响。后来解忧公主的大儿子元贵靡继承父业做了乌孙王；二儿子万年，做了莎车王；三儿子大乐做了乌孙左大将；大女儿弟史嫁给龟兹王绛宾做夫人；小女儿素光为乌孙呼翁侯的妻子。他们都秉承解忧公主和冯嫫的教导，维护了汉朝和乌孙的亲情关系。



冯嫫夫人画像





班超塑像

## ● 投笔从戎

如果说张骞是西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那么及至东汉，在西域的威名能与张骞比肩的人就非班超莫属了。

班超系出名门，他的一家在中国历史上都颇有影响。其父班彪乃东汉一代儒学大家，他在世时曾决心嗣司马迁之后，撰写太初以后的汉朝历史，然而壮志未酬，仅仅写了10卷便溘然长逝。班超的兄长班固，是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他继承父亲未竟的遗业，博采群籍，发奋图强，历20年之久，终于写成自司马迁《史记》后又一部史学巨著——《汉书》，一代英名，流传后世。而班超的妹妹班昭（又名班婕妤），深受家学熏陶，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女才子。她曾协助

其兄班固查询资料，著书立说，并参加了《汉书》一些篇目的编撰工作。另外，班婕妤自己也有极出色的文学作品，如《胡笳十八拍》就是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她在我国妇女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书香门第出身的班超却走了一条与其家世相背离的路，他并未成为文学家、史学家，而是最终成为东汉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史书上说班超自小“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其父去世后，家里一度陷入财政危机，兄班固只是宫廷里一个校书郎，俸禄低微尚不足糊口。班超随其母至洛阳，不得已也常帮官府抄写文牍以辅助其家。尽管家境贫寒，处境艰辛，但班超仍时刻保持高昂的斗志，准备干一番大事业。

当时，东汉王朝的西北边患十分严重。本已稳固的西域到王莽篡权后又变得动乱迭起。公元9年，王莽登基后，派人到匈奴宣布他做皇帝的消息，并改换单于的印。西汉发给单于的印的印文是“匈奴单于玺”，表示单于的地位是在汉朝诸王之上；而王莽改的单于印印文是“新匈奴单于章”，那单于的地位就与王莽的臣下毫无差别了，所以匈奴对王莽很是不满。与此同时，王莽亦将西域诸王一律改称为侯，也引起了西域各地的普遍反抗。在混乱中，西汉武帝以后一度衰落了匈奴又渐渐强盛起来。原来曾归属汉朝的西域各国被迫“复役属匈奴”，匈奴敛税重苛，使他们处境十分困难。东汉初年，西域各国纷纷遣密使到汉京都“愿请都护”，也就是愿意继续处在汉王朝的统辖保护之下。然而光武皇帝刘秀态度暧昧，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由，拒绝派兵前往西域，这样就愈发助长了匈奴的气焰。他们经常发兵南侵，骚扰汉朝边境，此时汉朝的西域都护已不复存在，东汉的社会经济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蒙古草原发生空前的旱、蝗之灾，“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大半”。单于怕汉朝乘虚而入，就主动向汉朝请求和亲。此时，原呼韩邪单于的孙子比因未做上单于而心怀怨恨，秘密派人向汉朝献匈奴地图，请求臣属于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表示忠于祖父的事业），得到了汉朝的认可，匈奴由此分裂，原来的单于称北单于，呼韩邪称南单于。非常有意思的是，小呼韩邪时代的匈奴局势竟和老呼韩邪时代极其相似，北单于也像当年的郅支单于一样，权衡利弊后不再与汉公开对抗，

玩弄阳奉阴违的花招，积蓄军事力量。汉永平八年（公元65年），北单于发兵企图侵扰内地，只是因为发现汉朝已有准备，才退了回去。后来又屡次侵扰内地，致使河西一带“城门昼闭”。像西汉时期一样，历史又迫使东汉把反击北匈奴的政权和统一西域的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东汉朝廷上，首先提出反击北匈奴政权的是大臣耿秉，他认为“中国虚费，边陲不宁，其患专在匈奴”，应该“以战去战”。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刘庄把耿秉的建议交给了了解边情的窦固等人讨论。在讨论中，耿秉援引汉武帝开辟河西，统有西域以削弱匈奴政权的例子，指出应先攻打天山，夺取伊吾（今哈密地区境内）、车师等地，联络乌孙及其他地方，以断北匈奴之右臂。汉明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准备发兵西征。

久居京都，整日抄写官报文牒的班超听闻此事之后，大为兴奋，叹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究事研闲乎。”言罢毅然投笔从戎，加入窦固将军的部队，向天山进发。

## ●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班超在窦固军中任假司马之职。汉军出发后，在蒲类海（今巴里坤湖）与匈奴大军相遇，汉军大败匈奴，给匈奴以沉重打击，而班超则因为在这次战役中表现突出而立功。窦固看他智勇双全，颇富才干，便令他率领一支小部队沿昆仑山北麓西行，招抚西域各国，以使当地摆脱匈奴的控制。

班超仅带领36名壮士首先来到了鄯善国（即以前的楼兰国）。班超是东汉出使鄯善的第一个使节，一开始，鄯善王对久盼而至的汉使招待得非常周到，但不久之后，忽然变得十分怠慢。班超之所以后来能在西域反复变幻的政局中从容处之30年，并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上得助于他敏锐的感觉——对潜在的敌意、阴谋、即将来临的灾祸，他具有非同寻常的直觉。他立即觉察出鄯善王态度的变化不是礼数不周，也不是一时疏忽。他召集属下，说：“你们感觉到鄯善王对我们的轻慢了吗？这必定是因为匈奴也派了使节来到鄯善，他一时还未拿定主意采取什么立场。果



断的人能够见微知著，何况其心迹已彰！”接着，班超召见了驿馆接待他们的楼兰侍者，故意诈他，问：“匈奴的



汉代玉门关

使者来这里好几天了，他们住哪儿了？”侍者以为班超已洞悉隐情，只得照实回答。班超立即把侍者关起来，和随行的36名壮士豪饮了一番之后慨然宣称：“各位随我出使西域，为的是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现在匈奴使者才来了几天，鄯善王对我们就不予理睬了。假如他把我们抓起来交给匈奴，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部属都说：“眼下是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一定舍命听从您的指挥！”于是班超就说出了自己的应变之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只有乘夜色以火攻匈奴使团的驻地。他们不知我们的底细，一定惊恐万分，措手不及，这样就能一举歼灭他们。制服了匈奴使团，必使鄯善王胆破心惊，这样才能扭转噩运。”这时有人想起了同行的从事郭恂，提出是否应与他商议一下。班超激愤地说：“成败在此一战，郭从事是文官，听到这个计划必定手足无措以致泄密，我们死也死得冤枉，这不是壮士的作为！”大家为班超的胆略所震慑，纷纷赞同。天黑之后，他们直奔匈奴人的驻地。那晚正赶上刮起大风，班超让10名壮士拿着军鼓埋伏于驿馆之后，约好一见火起，就击鼓狂呼，其余人手执兵刃潜伏于大门两侧。班超在上风头放了一把火，火起，鼓声震天，匈奴使节一片惊乱，不知发生何事。班超亲手格杀了3个逃出来的匈奴人，部下又杀死30多匈奴人，剩下100多人都烧死在驿馆里。到第二天，班超才通知了从事郭恂，并带着匈奴人的首级去见鄯善王，鄯善举国震怖，血淋淋的现实让鄯善王想起当年葬身于傅介子剑下的祖先，摸摸自己还完好无损的项上人头，鄯善王深感汉使的神勇非自己能敌，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背离匈奴，归附汉朝，稳定了鄯善的局势。班超再次为汉朝打开了通向西域的大门。





# 新疆两千年

班超立此大功后继续西行，率领36人到达于阗，当时有匈奴使者常驻于阗，进行监督，故于阗王广德对班超很是冷淡。于阗人笃信巫术，于阗王后宠信的一个巫师玩弄巫术，亦阻止于阗王臣属于汉。班超识破了这个巫师的险恶用心，用计将他杀死，于阗王广德见此情形，就杀掉了匈奴使者，归附东汉。

班超到达疏勒后，又用诈降的方法将匈奴强加给疏勒人的疏勒王抓了起来，拥立原疏勒王的侄子为王。疏勒人非常高兴，对班超感激万分，自然也心悦诚服地归了汉。

班超以一支人数极为有限的分遣队伍，发挥了千军万马的作用，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成功地从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驱逐了匈奴势力，为东汉在天山南北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稳固的基础。班超完成的任务，不啻为一个军事奇迹。汉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汉朝又重新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任命西域都护，并在车师后部金满城（今吉木萨尔）进行屯田，使自王莽后中断60余年的中原同西域的交通得以恢复。

公元75年，汉章帝即位初年，中原连年灾荒，社会动荡不安，匈奴乘隙遣军重又攻取了汉军控制下的天山北部诸城。东汉统治者惊慌失措，汉章帝下诏驻西域汉军皆撤出。班超也要奉命撤离。临行前，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说罢拔刀自刎。班超行至于阗，于阗王侯竭力挽留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拦马不肯放行。班超深受感动，不惜违抗圣旨，决心留驻西域，故又折回到疏勒。

回疏勒后，班超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团结、联合西域各地反对匈奴的力量，先击莎车，后打龟兹，皆大获全胜，将匈奴势力逐出，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军事实力。班超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在平定各处战乱后，才向中央详报其在西域的活动和当时该地的形势。汉章帝看到班超的奏折，深为其卓越的军事才干所折服，不仅收回了从西域撤兵的成命，还派人前往增援。班超得援后，继续出击，横扫匈奴残余，使其被迫西迁，西域各地尽归东汉辖属。班超也因此受命担任西域都护，同时因功勋卓著又被封为“定远侯”。他在任期间，还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只可惜甘英被波斯湾的滔滔海水吓了回来，否则中西方的官方

交往至少可提前1000年。

汉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班超以71岁高龄荣归故里,他在西域整整度过了30个春秋,几乎完全凭借个人的机智、机敏和卓绝的政治、军事、外交才能,使西域保持了长期的、异乎寻常的稳定和繁荣,书写了西域戍边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 ● 子承父业

班超有3个儿子,其中以二子班雄和三子班勇最为著名。尤其是班勇,他自幼就随其父班超戎马为生,有时还协助父亲处理一些政务。班超的言行举止无疑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故史书说班勇“少有父风”。由于自幼年起,他便常年随父征战驰骋于荒山雪原、天山南北,因而对祖国的西北山水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

班超东归以后,接任西域都护府都护的是夜郎自大的任尚,他既无班超那样的才略,又无班超那样的胸怀,本人

对边务一窍不通,还无视班超临行前的忠告,行事峻刻,一意孤行,致使域内怨声载道,人民

反抗如火如荼。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东汉政府终于以“西域阻远,难以管制,

吏士屯田,耗费亦多”为由再次将其军政机构和屯田戍边的将士撤出西域,当时

奉旨护送西域都护和屯田吏卒东归的就是班勇与其兄班雄。看到父辈辛辛苦苦创下的业绩,任凭佞臣如此糟践,兄弟俩心中的酸楚是可以想见的。

随着东汉军队的撤离,匈奴乘虚而入,重新征服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地区。东汉数十年在西域卓有成效的统治至此中断。匈奴得寸进尺,又开始不断劫掠河西走廊地区。



班氏父子双雄图



# 新疆两千年

此时汉朝宫廷中，就是否关闭玉门关，仍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观念保守陈旧的权臣贵戚数列与西域交通的不利之处，力主关闭玉门关，断绝与西域的联系。而以班勇为代表的少壮派则从国家大局出发，据理力争，强调同西域往来对于巩固汉边境安定的意义，反对东汉放弃对西域各地的管辖。最后保守派得势，东汉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而班勇等人的建议则被搁置起来。

直到延光二年（公元123年），汉廷中少壮派的意见才复得重视。次年，汉安帝任班勇为西域长史，令其重新打开同西域的通道。班勇十分高兴，他以能有这样一个机会，继续其父的遗业而自豪，于是便率军以极快速度开进西域。汉军在西域的重现，令倍受匈奴压迫的西域各地民众的士气为之一振，不多时，龟兹、姑墨（今阿克苏）、温宿诸地便竞相归附。班勇又率兵击败匈奴伊蠡王，收复了车师前后部。从而使天山南北除焉耆外，匈奴兵马绝迹。

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班勇乘胜追击，发各国兵马4万人联同敦煌太守张珣的郡兵3000人分南北两道并进焉耆，约期在焉耆会师。敦煌太守张珣心胸狭小，他以前犯过错，故此被贬敦煌，所以急于邀功赎罪。他清楚地知道，由于班勇几年的努力征战，西域大部已经平定，焉耆守军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斗力，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戴罪立功的机会。于是他便违背预约，率军提前进攻焉耆，果不其然，还未怎么打，焉耆守军即打开城门自愿归顺，张珣因此而免罪。而班勇则因领兵后至，贻误战机之罪含冤入狱。后来虽然获释，但终日闷闷不乐，怨死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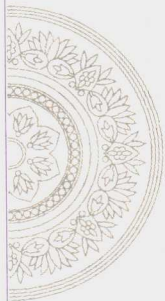
班勇嗣父遗志，请纁率军西行，为东汉王朝再度恢复对西域的管辖权立下卓绝的功勋，然而最后却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这是班勇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悲剧。时隔数十年后，《后汉书》的作者范曄在为班超、班勇所写的传记中评论道：“定远（班超）慷慨，专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龙沙，懂亦抗愤，勇乃负荷。”这段评价悲苍激愤，甚是中肯。

班氏父子之后，东汉在西域的统辖力量渐弱，而匈奴也日渐衰微。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有魏、蜀、吴三国，短暂统一的西晋，南北对峙的十六国和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朝



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中原处于大动荡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此时的天山南北，各个政权也相互兼并，形成七国对峙局面。鲜卑、柔然、高车等几个民族在西域进行了长期的争霸战争，形成了西域的战国时代，一时间大漠狼烟四起，不知又上演了多少英雄成败、悲欢离合的故事。

### 三、梦幻尼雅



#### ● 沙埋“庞培”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初年，西域地区有许多处于相互分割状态的城邦和行国，史称“西域三十六国”。它们由于戈壁大山的阻隔，分散、闭塞，各自为政，正如史书所说，“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西域统一于汉的版图之后，这些小邦国有些成为边塞重镇，有些却逐渐掩埋于大漠黄沙之中，销声匿迹。这些消失了的邦国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疑问与悬念。它们消失的原因？它们土地上原有的臣民的去向？是否还有前人遗留的珍宝……考古学者和探险家们经过几个世纪的追寻和探索，终于有一座极具传奇色彩又颇富学术价值的古城重见天日，

#### 尼雅遗址

映入他们的眼帘，这就是当年西域精绝国的遗址——尼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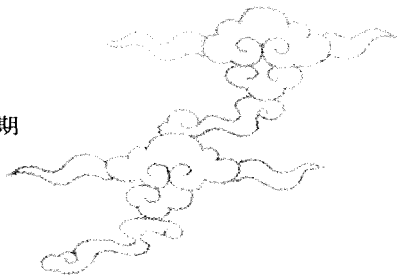
20世纪初，一名英籍匈牙利人潜入新疆，他就是后来臭名昭



〇三三



著的文物大盗——奥利尔·斯坦因。他在新疆期间，挖掘、窃取了大量珍贵文物，其劫掠式的挖掘方法也给后世的考古工作造成极大困难。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正是斯坦因发现了尼雅废墟。



《汉书·西域传》对尼雅的描述是：“精绝国，王治精绝城，户480，口3360，胜兵500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路过尼雅，称其为“王治尼壤城”。他在《大唐西域记》里写道：“东入沙碛，行二百余里至尼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泽中。泽地热湿，难以履涉，芦苇荒基，无复途径，惟趣城路仅得通过，故往来者莫不由此城焉。”

1901年，斯坦因根据《大唐西域记》中的线索，来到了塔克拉玛干南部腹地的尼雅绿洲的民丰县。当时的新疆民丰县城是一个对外毫无吸引力的平平常常的偏僻村落。但就是在民丰县集市上，斯坦因发现了两块写有字的木板。斯坦因面对木板，目瞪口呆，虽然他还不能识读文意，但他立刻判断出这是一种目前已无人使用的“死去”的古文字，它的时代是相当古老的。后来，语言学专家的辨认证实了他的判断，木板上的文字就是失传已久的西域古文字——佉卢文。

斯坦因以佉卢文木简为线索，请发现木简的当地居民带路，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找到了木简的源出处——位于民丰县城大约100公里处的尼雅遗址。这是一处旷世罕见的古遗址，是大体保存了十几个世纪前的风貌的古代居民区。遗址没有围墙围护，这说明它的上限可能十分古老。古房址散处于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大体可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南部只有十余间房子，北部则三五成群地造有数以百计的民宅，这也许是按当时居民贫富状况作的划分。遗址中心立有一座佛塔，虽然破败，但仍有佛韵古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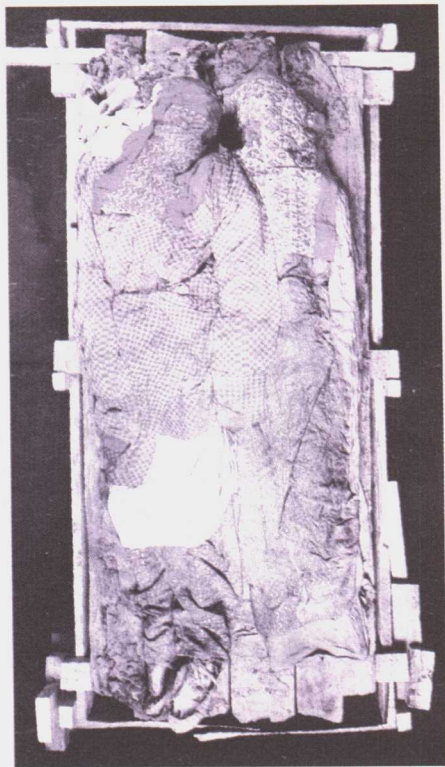
看到这一切，斯坦因的血液几乎都凝固了，他不敢相信是自己发现了这个已失踪了千余年的古城遗迹。古代罗马斯巴达克时期曾有一个城市叫做庞培，后为火山爆发所湮没，上个世纪，考古学家从千年的火山灰下发掘出一个完好如初的庞培城。尼雅与庞培何其相似，只不过它是



为流沙所埋，此后，“沙埋庞培”就成为尼雅的代名词。

斯坦因从尼雅遗址掠走了700余件出土的佉卢文、汉文简牍和具有希腊风格的精美的木雕艺术品。这些盗自中国的珍贵文物至今还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印度新德里的博物馆里。斯坦因此后又两次潜到尼雅遗址，带走大量佉卢文木简和木牍。斯坦因回去后写了一本3英寸厚的巨著《西域考古记》，引起了许多中外人士对尼雅的关注。自斯坦因探险以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冒险家纷纷步其后尘，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与酷热和沙暴抗争，满心希望从这个古代的王国里挖掘出更多的文物来。解放后，新中国的文物工作者多次深入尼雅考察，获得不少成果，然而，尼雅遗址蜚声海内外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后的事。90年代初，一支配备了各种精密的高技术装置，包括有可精确地判定尼雅地理位置的卫星定位仪的中日联合考察队进入尼雅遗址，翻开了尼雅考古的新篇章。

1995年10月至11月，中日联合考察队对尼雅进行第7次调查，获得了重大发现。中方队员发现了露出沙漠的一部分木棺。在尼雅遗址，人们曾发现不少木棺，但这次发现的却与众不同，为了保护它，考察队慎重地进行了发掘。10月14日，开启了第3号棺。当中方队员小心翼翼地打开棺盖之后，大家都被棺木中的景象惊呆了：一对看上去已成为“木乃伊”的男女合盖一床色彩斑斓的锦被，安详地躺在棺内，



第3号棺男女墓主人



而锦被上居然织着“王侯合婚，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小篆汉字和纹样。躺在左边的男子身穿锦袍、锦裤、丝绸短袄、绸衣、绣鞋，头戴绸面丝绸风帽，身旁随置锦袄、强弓箭囊。腰带上配刀鞘、束发锦袋和箭囊中的箭杆、镞完好如初。躺在右边的女子身着锦袍绣鞋，她身穿的通幅大花锦袍上展现出虎、蛇、舞人、龙、狮、鹿、豹、马、孔雀等大花图案。女子耳垂串珠、金叶，配以红色料珠项链。身旁随葬着她生前用过的梳篦、化妆品、陶罐、首饰和一面龙纹铜镜，铜镜仍光可鉴人，陶罐上有汉文墨书“王”字，字迹清晰。

接下去的发现更加振奋人心，发掘队员打开了8号棺木，其中躺着一名男子；在棺木上层发现一只色彩艳丽的锦袋，上面有篆书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汉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的句子，《晋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中国利”的文字记录。专家指出：“尼雅这次大发现揭示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王朝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 ● 佉卢秘史



在尼雅遗址发掘出的绝大部分文书上都是一种奇怪的文字——佉卢文。“佉卢”是“佉卢虱吒”的简称，“佉卢虱吒”是梵语的译音，原意是“驴唇”，那是古代印度神话中的一位仙人的名字；就像是传说苍颉造汉字一样，据认为是驴唇仙人创制了佉卢文。佉卢文在公元前曾在印度北部使用，后来又在西域流行一时，但七八百年后，突然失传，灭绝干净，此后任何地区与国家再也未有人使用过。特别是，它死就死个干脆利索，并未演变蜕化为其他的现行文字，这一点是极令人费解的。幸运的是，从1901年斯坦因发现佉卢文文书起，中外语言学家就开始重视、研究这种古老的文字。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林梅村是中国第一个掌握佉卢文的考古学家，他在外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沙海古卷——外国所出土佉卢文书初集》，不但有拉丁文转写，还把佉卢文直接译成了中文。佉卢文被解译，古代精绝王国的某些隐秘、神奇、不可思议的内容已渐为人们知晓，这无疑为黑暗难明的古史缺环打开了一扇豁亮的天窗，使精绝这个沙埋千余年的古国更具魅力。

读了佉卢文书，当年西域的精绝国，完全就像一个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活化石似的城镇。我们了解它的每一个侧面，探悉它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喜怒哀乐，牵动着我们的神经；它的兴衰际遇，融进了我们的关怀。它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如此逼真的历史活剧，总使我们在冥想中走进它的生活，参与它的管理，甚至还试图扭转它的噩运。

那时的精绝国，国王是最高权威，他直接领导着每一个村落，甚至直接接受每一个臣民的申诉，不论是司法案件，还是民事纠纷，国王都将对当地行政长官作出指示，并有全权否决任何动议。但是，在权威背后，则绽露出国力衰微的征兆：税收难以完成指标，国家利益受到直接侵犯，国家法令屡受轻视。比如第70号文书中，国王指责税吏摩跋耶经常侵吞税收，竟将4年的税收全部据为己有，而不上交王廷；而另一税吏伐伽佐同时将4峰骆驼侵吞。

并不富足的精绝国还有更大的忧虑，那就是水的短缺，风沙日益严重和植被恶化。第160号文书披露，精绝的水与种籽都是由身居王廷的





# 新疆两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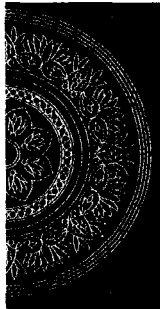
国王亲自管理的。第368号文书提及由于河渠已无水致使耕地得不到灌溉，这引起国王注意，国王亲自出面干涉水的分配。第125号文书提到“现在精绝正需要水”。此外，关于争水、浪费水资源的内容也一再见诸于文书内，可见当时水是精绝人的命脉。

更为意味深长的，是著名的第482号文书。居民舍伽所种的树木被百户长强行砍伐出售，舍伽一气之下，越过州长，直接向国王告御状。国王受理了他的申诉，并下达了一道敕谕，即第482号文书。首先国王宣布百户长的行为非法，必须立即制止，并引述了王国严苛的法律：“活树严禁砍伐，违者罚马一匹；哪怕只砍了树枝杈，也要罚母牛一头。”同时国王命令，如果州上不能正确执法，便将有关人员押送王廷，由他亲自审理判决。这就是被人誉为世界上最早的“森林法”的出处。

小国寡民在自然环境的轻忽虐待下，怎样力图绝处逢生，扭转不利形势，成了佉卢文书中许多案例与事件的因由。时过千余年后再读它们，那种严酷、紧迫、孤寂的氛围仍让人感到压抑。佉卢文书中的另一个常见内容，就是处理逃亡事件。逃亡者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不管他们是什么人，逃亡都对人口稀少的精绝国构成威胁，因此制止逃亡就成了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第621号文书与第632号文书记载了一件相当典型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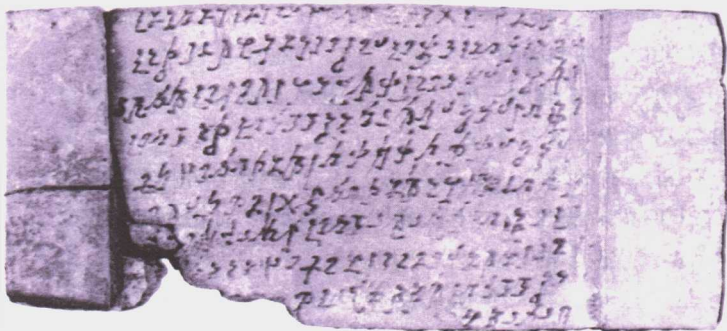
在精绝境内，有一个名叫沙迦牟韦的青年，他年轻时与贵族佐多为邻。沙迦牟韦和佐多的妻子善爱成为情人，并且一同舍弃家园，逃亡到龟兹国。他们长期客居异国他乡，后来受到国王感化，又重返故国，那时这对当年私奔的情侣早已成为夫妻。回到家乡，沙迦牟韦表示，他放弃原属他所有的妻子、奴仆及庄园，要与患难爱妻善爱开始新的生活。但善爱的父亲和沙迦牟韦的前妻却不肯善罢甘休，他们控告沙迦牟韦，索要赎金及赔偿。为此国王专门向州长下达命令：如确有其事，州长必须制止诉讼人的要求，让沙迦牟韦和善爱漂泊半生后，在故乡安居乐业。这两则内容相关的文书，让人读来深受感动，这些佉卢文文书几乎不用作什么艺术加工和虚构，就已成为内涵丰富、感人肺腑的故事。

佉卢文文书几乎涉及了当时精绝王国日常生活的每一个侧面。透过这些保存在木简上的、从右向左书写的古老文献，我们能够置身于当年



## “童格罗伽”

王纪年木简，是写于鄯善王童格罗伽（目前已知最早的鄯善王名）在位第36年有关精绝州毗陀镇土地买卖的契约文书



精绝僧团4月8日浴佛节的盛大游行行列。绿洲倾巢出动，群情激跃，人们把一桶桶清水泼向雕檀佛像，高僧向虔诚的信徒宣讲“法悦境”的意义：

“愿世间时刻丰衣足食  
愿经管圣雨的释天  
增多雨水，树木长绿，五谷丰登  
王道昌盛  
愿彼在诸神佛法庇佑下长生”

我们还注意到，尼雅河上的大桥是精绝绿洲的脉门。每年都将以一头牛来祭祀守桥之神，而过桥的税收，则是精绝公共收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大桥上来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就表明古丝绸之路兴旺发达，精绝国民无衣食之愁。一旦桥头冷落，精绝绿洲就成为被上苍遗忘的弃婴。这桥已成为精绝的门户与象征，肯定得到了极好的维修保养。1000多年后，当斯坦因闯入这“沙埋庞培”时，大桥仍无视岁月的摧折、人类的冷落，枯立在干涸已久的尼雅河河床中。它虽已失去往日的雄风，但仍以自己的存在提醒着不速之客：掠去浮沙，精绝绿洲的历史必将重现辉煌。

从卢文文书所再现的精绝国，没有经历重大战争，国家相对稳定，成为某种程度上的世外桃源。然而，像每个大漠居民点，像每个求生意识强烈的民族一样，精绝对水、对风沙、对植被相当敏感，深知上天待



他们苛刻，没什么资源可供挥霍，为了保住家园，固守乡梓，他们只能惨淡经营，省吃俭用。连王后回于阕省亲，也只有几个随从；使节出访，仅备两峰骆驼来壮声势。国王虽是一国之尊，他也事必躬亲，在全国实行直接治理，颇显小心翼翼、底气不足。

看了精绝国的 佉卢文文书的译文，抚卷深思，不禁想起梁启超对二十四史的评价：“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也！”而正统编年史的泰斗《左传》，也被魏晋史家魏禧称作“相斫书”——一本充满血腥的杀戮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尼雅遗址发现的 佉卢文文书似乎更像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它是未经史官修饰的原始文献，更贴近生活底层，更富有人情味。黎巴嫩诗人纪伯伦在《沙与沫》中写道：“能唱出我们的沉默的，才是伟大的歌唱家。”而正是 佉卢文文书吟唱出了沉默千年的精绝古国的心曲。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盘腿而坐，用削好的木笔书写别别扭扭的从右至左的文字的精绝书吏，也应该与司马迁、班固、陈寿一样，成为不该被历史遗忘的人。

## ● 精绝之谜



尼雅遗址出土的 佉卢文文书，从内部向人们展示了精绝这个西域古国的历史风貌。在尼雅，人们同时看到了西亚的玻璃器皿、希腊风格的艺术品、印度的棉织物、黄河流域的锦绢、漆器、铜镜、纸片等，又证实了尼雅是丝路古道上重要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汇点。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尼雅是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和古波斯这四大古代文明在地球上的一个罕见的交汇点。

但究竟是因为什么，这里不再有人烟，而只剩一片沙埋的废墟？

民丰县里的百岁维吾尔老人总是向人们讲着这样一个故事：“1500年前，一位老国王和他的3个漂亮女儿一起住在尼雅这片佛地，他掌着一枚金骆驼大印和一支500名士兵的军队。汉族、藏族、蒙族一共有3000人和和睦睦地生活在这个王国里。”

“可是不幸，国王溺爱他最小的女儿，想把她嫁给本部落最勇敢的战士，而小女儿实际上却想嫁给另一部落的首领。于是，暗算、残杀和



战争接连发生。老天爷大发雷霆，就用一场大沙暴把国王和他的3个女儿以及他的金骆驼全部埋葬了。这场沙漠风暴大得吓人，整整刮了6天，连天都遮住了。”

维吾尔老人的故事给尼雅埋没沙中提供了一种道德解释。但就像所有的传说故事一样，它更多体现的是老百姓丰富的想像力而不是历史事实。人们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古人遗骸大多是处于墓葬中，而不是因突来的自然灾害困死在房中的。考古学家因此而判断，古代精绝国的居民是集体迁徙走的，他们抛下了尼雅这个世代居住的家园。

那么，精绝国的居民为何要迁走呢？

有人认为，尼雅的废弃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尼雅河下游干枯造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可能有两个，一是河流改道，二是河的上游出现大规模的其他居民聚居点，对河水消耗大增。人们并没有在尼雅遗址周围找到关于尼雅河大规模改道的证据，同时也并未在尼雅河上游发现任何人类聚居点的遗迹。另外，在尼雅不少住宅周围都有巨树环绕，树干粗大至一人不能合抱，果园中林木整齐，桑木排列整齐，不少为数十年之巨桑。住处附近，从堆积的淤泥看，有水塘的痕迹。尼雅在这样好的生存环境中，很难说尼雅河会突然断流，导致精绝王国覆灭。

在尼雅遗址的房屋内发现的许多简牍文书还未及开封，它们堆放整齐、覆盖完好，主人看上去离开得很匆忙，他们把文书档案放好、盖好，是希望稍后还可以回来进行处理。他们的离家出走，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他们认为自己是还会回来的。如果是因为水流改变、气候变化，导致绿洲放弃，应该是一个徐缓的有组织的撤离过程，不会连公文

简牍都来不及处理。

又有人提出，尼雅遗址之废弃或许是因为战乱。人们从尼雅的佉卢文文书上可以看到，当年精绝的统治者始终对来自东南方

尼雅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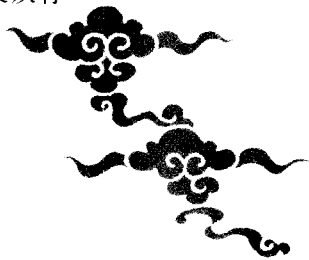


# 新疆两千年

苏比士 (Supis) 人的威胁而忧心忡忡：“有来自苏比士人之危险，汝不得疏忽，其他边防哨兵，应迅速遣来此”、“现此处听说，苏比士人4月间突然向且末袭来”、“现有人带来关于苏比士人进攻之重要消息”、“苏比士人曾抢走彼之奴隶一名”、“现来自且末消息说，有来自苏比士人之危险，命令信现已到达，兵士必须开赴，不管有多少军队”等等。关于苏比士人的所指，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有人认为所谓“苏比士人侵”可能只是这个绿洲小国对外界侵扰的病态幻觉产物。人类文明史上有一个怪现象，似乎总是文明高的民族怕文明低的“野蛮人”，苏比士人或许只是对一些半开化的以劫掠为生的零散游牧人的代称，而并不是什么有组织的大规模势力。毕竟，在尼雅第133号文书上曾提到苏比士人入侵并要求支援，而支援的具体内容是“迅速派一名骑兵至此”，而119号文书内容也相同。因此，这种苏比士人的威胁很可能只是精绝人由于饱受磨难而产生的一种无端恐慌。如果真的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乱，那么这些木制的房屋是最易在战火中被烧毁的，但尼雅的房屋却见不到任何火烧或人为拆毁的痕迹。

不是自然力，不是战乱，那么精绝人为何而迁走呢？考古学家在尼雅遗址的一所房子废墟中发现一只狗的遗骸，它的脖子上还拴着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拴在柱子上。显然是主人离去时忘记解开绳子，而将这只狗活活饿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主人匆匆离开，连爱犬的绳子都忘记解；或许，他以为一会儿就能回来，但为何又一去不返？如果说精绝国的居民真的集体迁徙了，他们究竟迁到了哪里？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而古老的佉卢文也正是在尼雅废弃之后就失传“死亡”了，难道几千精绝居民连同他们的国王、公主和金骆驼都在1500年以前的某一天突然消失了？

精绝，这个西域古国的历史，就像一条源于雪峰、渗于沙漠的内陆河，它有值得称赞、夸耀的源头，却没有让人放心的结局。精绝之谜仍等待世人去破解，说不定它就像塔里木河渗入沙漠，又从青藏高原涌出而成为黄河源头的传说一样，在某一天突然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让所有的人都恍然大悟。





飞天

#### ● 如来入西域

新疆地区在历史上曾流行过多种宗教，在伊斯兰教由阿拉伯传入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之前，袄教、景教、萨满教、摩尼教（亦称明教）、佛教等都曾在西域各国盛极一时。其中佛教的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直至今日，新疆各地以石窟为代表的大量佛教遗迹仿佛仍在向我们诉说着佛法无边的如来当年在西域的辉煌。

佛教于公元前6至5世纪产生于北印度的迦毗罗卫（今尼泊尔境内），其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关于他放弃王位，在菩提树下静思7天而顿悟成佛的故事可谓尽人皆知，他亦被后人尊为如来佛祖，成为神话中永生的和绝对的众神之尊。佛教在最初一段时间中只传播于恒河流域一带，约公元前273年，著名的拥护佛法的阿育王登上印度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的王位后，佛教才在印度全境传开。相传，阿育王原为婆罗门教徒，在他统一印度全境的过程中，因战事甚为剧烈，他亲眼目睹到战争中杀戮惨痛的场面，顿起“忏悔”之心，故而“放下屠刀，衷心礼佛”。他之所以要大肆宣传并支持这个慈悲为怀的宗教，无非是想把地上的王权和天上的神权结合起来以巩固他的统治。因为孔雀王朝从表面上看起来强大威武，内部却矛盾重重，危机四伏。而佛教的理论，从宗教上打破了种姓制度的桎梏，提出一致的道德观念，用“因果轮回”的说法，来证明



任何人都有求得解脱的可能。阿育王正是借助这一点来麻痹人民的斗志，也正因如此，他可以虔心事佛，乐闻僧徒讲经说法，广建寺塔、石碑，派人到四方号召人民巡礼佛迹。阿育王的种种措施，从客观上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

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如来佛祖的宝像尊严却并非阿育王的杰作。在阿育王及其后继者时，由于印度本土的教徒对于释迦牟尼本身的无限尊敬和热爱，还不敢以有限的形体来描写无边伟岸的主宰。众所周知完成于公元前2世纪的桑奇大塔面坊上的浮雕佛传故事，在描写“成道”、“说法”、“涅槃”等主题时，涉及释迦牟尼的部分，都分别以“菩提树”、“法轮”、“舍利塔”等有代表性的纪念物来作象征。阿育王死后，国势渐衰，继阿育王的孔雀王朝，管辖范围越来越小，最后终于崩溃，由北方来的印度希腊人则建起了大夏国。

大夏，又叫巴克特利亚 (Bactria)，是中亚古国。公元前3世纪，它脱离亚历山大的部将塞琉古一世所建立的塞琉西王朝而独立，但统治者仍是希腊贵族的后裔。公元前2世纪初，它曾经侵入印度河流域，占领犍陀罗。强弩之末的希腊黠武主义者的残余，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和统治势力，曾经采取种种措施企图淡化他们与被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尽量使自己同化到印度地方的语言习俗和文学艺术中去。为此他们甚至信仰佛教，崇拜释迦牟尼，并对佛教的内容和偶像的形式作了一些创造性的修正。首先，他们模仿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仪容，作为释迦牟尼生前的造像。后来他们又大胆地把释迦牟尼的造像演变成纪念和崇拜佛的偶像。这就是印度希腊佛教徒在艺术上的新贡献，这种艺术后来就被称为犍陀罗佛教艺术。

至于佛教传入西域，则是大月氏人的功劳。关于大月氏，本书前面已作介绍。大月氏人在西迁大夏地区后，逐渐放弃了他们的游牧生活习惯，同化在当地民族中，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在



佛像

这个王朝著名的君主迦腻色迦在位时，它的疆域西起咸海，东连葱岭，北有康居，南部包括整个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王国的首都从中亚迁到了北印度犍陀罗地区的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正好处于“丝绸之路”的交通大道上。迦腻色迦王笃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佛教在中亚又有了新的发展。但此时的佛教日益增多地接受了婆罗门教的影响，并在公元前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教派——大乘佛教。据说，迦腻色迦为恢宏佛教，曾于公元2世纪初于克什米尔召开佛教经典集结大会，重新审订了佛教经典和教规，佛教就更进一步地在印度和中亚发展起来了。

佛教就是这样通过贵霜王朝而传入新疆的，这点从最初前来中国翻译佛经的多半是大月氏僧人和在“丝绸之路”上发现的大量焉耆文可以较肯定地推证出来。

至于传入时间，史籍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种说法是：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兵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大破匈奴，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据说金人一拿走，匈奴居地便坍塌百里。后人认为，这祭天金人即为佛像，如果此时佛像已在匈奴中传播，那么西域有佛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对于这些无正史记载的说法，我们只能作为参考，已故的考古学家常书鸿先生认为：佛教在新疆的传播可能略早于内地，但也是公元1世纪以后的事了。

## ● 圣僧传道



佛教传入西域之后，一位生于西域的僧人又将佛教典籍系统地介译到中原地区，为推动佛教在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就是被后人誉为“圣僧”的两晋南北朝时代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生在当时西域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的父亲名叫鸠摩炎，原籍印度，是龟兹国的国师，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她聪明贤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鸠摩罗什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就受着



佛教思想的影响。

鸠摩罗什长到7岁那年，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龟兹最著名的佛教学者佛图舌尔门下学习。当时龟兹不仅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之一，还是佛教文化从印度传入我国内地的必经之路。可是，鸠摩罗什的母亲并不满足于儿子在龟兹所学到的知识。特别是考虑到家庭的显贵地位以及舒适生活会影响儿子的上进心，她不久就带着儿子出国游历。她们母子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往前走，翻过帕米尔，跨过印度河，到达印度北部。在那里，鸠摩罗什拜著名僧人盘头达为师，学习佛教小乘派的经书法典，鸠摩罗什聪慧勤奋，“日诵千偈”，深受教师赞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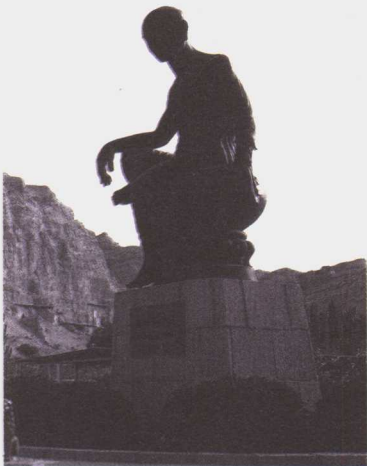
鸠摩罗什在外游历了几年后，又与其母一起回国。在归国途中，路过疏勒的时候，遇见一位名叫须利耶苏摩的大乘派高僧。在这位教师的帮助下，鸠摩罗什花了一年的时间，对大乘派学说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最后他放弃了从前学过的小乘派学说，确立了对大乘派学说的信仰。

后来，他路过温宿国（今阿克苏一带），听说那里住着一位博学多才、能说善辩的法师。这位法师当时名扬诸国，他常吹嘘说：“谁要能辩赢我，我情愿砍下自己的脑袋作为酬劳。”可是，当鸠摩罗什和他辩论时，还没说几句，他就服输了。这件事让鸠摩罗什声名鹊起。龟兹国王听说了这个消息，感到特别光荣，亲自到温宿去迎接他。

鸠摩罗什还不满30岁，就已经名满西域了，但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当时，中原地区的佛教经典还很不齐备，鸠摩罗什就立志去内地翻译佛经。有一次他母亲对他说：“能够把大乘派的学说传到内地去，这全靠你的努力了。可是，这样做会很苦，你愿意去吗？”鸠摩罗什回答说：“只要能佛家的教义传到东土，就是让我忍受赴汤蹈火的痛苦，我也在所不辞。”

公元385年，鸠摩罗什进关了。他走到河西走廊的重镇——凉州（甘肃武威县）时，就在那里定居下来，开始学习汉文，为大规模地翻译佛经做准备。他苦学了十五六年，在汉文方面有了很深的造诣。到了公元401年，割据关中的后秦王姚兴，以上宾之礼把鸠摩罗什迎进关，当他来到长安时，已经是年近六旬的佛教大师了。后秦王姚兴用敬待国师的





龟兹佛学大师鸠摩罗什塑像

大礼招待他，把他安排在逍遥园的佛寺里。逍遥园就是后人所称道的关中八景之一。当时，由于鸠摩罗什的到来，这块京城郊区的清静佛地顿时热闹起来，很快就成为了长安研究佛学的中心。在这里，鸠摩罗什大师以他广博的学识和滔滔的辩才，给包括后秦王姚兴在内的3000弟子讲经说法。姚兴为了能经常听到他的讲解，还特地在逍遥园里建造了一座行宫。此外，为了听他讲经，从千里之外赶到长安来的佛教徒也是大有人在。

鸠摩罗什除了在长安讲授佛法以外，还不遗余力地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他和他的弟子僧肇等800多人在一起，通过讲学记录，用意译的方法，共翻译出佛经47部，384卷。

鸠摩罗什对学问的态度十分严谨，他每次在翻译之前，都要对原文进行反复的研究，甚至在遣词造句上都要经过再三推敲，力求保存原文的意思和风格。译经时，他在法座上手持经卷，把古代印度文译成龟兹文的经语，又口译成流利的汉语，他的弟子就在下边记录。为了记录的准确，每一句话他都要读三遍。译完，他还要亲自校对一次，一直到毫无差错，才最后完稿。因此，他所翻译的经文，篇篇都是文笔流畅，内容深入浅出，使人读后易懂易记。鸠摩罗什是我国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大翻译家中最早的一位，另外两位是真谛和玄奘。鸠摩罗什的一生不仅对于我国佛教思想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而且他那高深的中文造诣，通过经文的翻译传播，对于扭转当时士大夫们片面追求辞藻华丽的形式主义的文风，也起了推进作用。

鸠摩罗什的活动，对于我国文学和哲学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了很多文艺性很强的佛经。在他译著的《维摩诘经》里，有许多绝妙的借物言情的文艺作品；他翻译的《杂譬喻经》里讲了好多小故事，是一部通俗的民间文学汇集；《大乘庄严论》的文章，结构也初步具备了短篇小说的规模。这些东西介绍过来以后，对于我国文学，特别是口语化的通俗文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他的影响，我们从



后来的变文、俗文、小说、弹词甚至戏曲中都可以清楚地找到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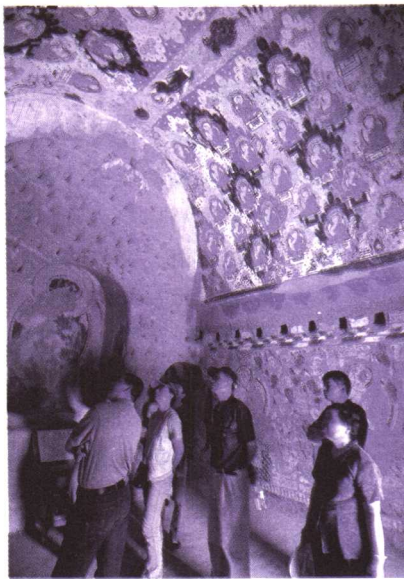
## ● 千佛洞寻古



千佛洞是老百姓对于石窟通俗的称呼，是由于石窟的建造鳞次栉比，似有千佛居处其中，故得此名。

石窟在古代也是一种宗教场所，但它和通常所说的“寺院”又有一定差别。在中国，东汉以前，“寺”这个称呼是专指帝王将相的官邸，自东汉明帝时用白马将天竺取来的佛经珍藏于洛阳雍门西的白马寺以后，“寺”或“寺院”就成为佛教徒传教念经的地方了。但在印度，由于气候炎热，每年自5月开始至10月又是雨季，几乎每天都要下雨，佛教徒外出化缘、传经讲道都有困难，因而他们选择的胜地都是依山傍水，在丛山中开凿大型石窟。公元前后开凿的阿旃陀就是印度最有名的石窟，其中有修行坐禅、讲经说法和朝拜圣骨的地方，按照印度习惯的称呼，前者叫Vihara（直译毗诃罗，意即僧舍，或称精舍），后者叫Chaity（直译支提，意即庙堂）。毗诃罗，梵语为Sangaram，直译为僧迦蓝摩，缩译即称为“迦蓝”。印度古代著名的迦蓝有竹林精舍、祇园精舍等。实际上，迦蓝本意是不包括“支提”的，但是古往今来我们是把所有的石窟寺都当成“迦蓝”，一概视之为“寺院”了。

新疆石窟的开凿动机虽然是受佛教影响，其建成过程却非常具有新疆的特色。从新疆的地理环境方面看，环绕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交通情况是极其险恶的。数百里水草俱无的戈壁沙漠，难于攀登的巍峨高山，干燥而骤烈的气候变化，都为旅途往来增加了极大的艰难。特别是流沙的移动，往往会把仅有的河流和田舍掩埋起来，使昔日繁华的大道变成人烟荒芜的沙漠荒



野。4世纪时著名的西行求法高僧法显在其《佛国记》中对沙漠有形象的描写：“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目极望，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帜耳。”

这些“死人枯骨”，都是沙漠中的旅客，因受不了干旱冷热煎熬而不幸中途捐弃了性命的人。从法显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东西交通旅行中极端艰苦的情况。这种旅行不啻是生与死的搏斗，成功与失败的考验。少数幸而度过难关的，像法显等人，也都是在九死中得到了一生，自然是值得庆幸。而那些不幸遇难中途殒命的孤寂的旅行者们，也就只能凭他们的遗存白骨来博得后人的几分同情了。

但如果这些遗骸是属于往来东西“为普度众生求法殉道”的僧侣甚至是有德高僧的，那么他们获得的礼遇将不是一时的哀悼与膜拜，十分可能有一些忠实的信徒，随时中止他们的旅行，将高僧的遗骸烧成灰烬，变为“舍利”，然后像对佛的“舍利”、“圣骨”一样，虔诚地守卫在“舍利”的坟塔旁长年不再离开。于是他们就孜孜不倦地为后来经过这里的信徒、商贾或长途跋涉、背井离乡的远征将士们讲述已死的高僧的品德戒行和他们出生入死、不屈不挠而牺牲的经过，并求得人们的同情和布施。当然，正处于这样艰险过程中的旅客，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是十分容易被打动而愿意停下脚步听听同路人不幸遭遇的故事的，同时也可以顺便打听一下未来的旅途情况，诸如到前站还有多少路，中途有无水草等问题。或许过路的恰是又一位有道高僧，或是一个擅长佛画的高手，于是守护“舍利”的信徒就会看机会邀请他们临坛说法，或给自己传授一点佛和菩萨画像的样本。诸如此类等等，就渐渐在该地创立了一个小的佛教宣传中心。这个中心，起初像是简单的支提。但后来的发展，就需要一个能容纳更多人的环境和有关的生活供应条件，人们在附近的土地上耕种了一些农作物，修盖了一些简单的房屋和说法的讲堂等等，逐步具备了塔寺的规模。围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绿洲并不是很富足和丰盛，它们要靠天山和昆仑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进行灌溉，这使得去西域的交通也就势必沿着山坡行进，僧侣们经过一天的劳累奔波之后，有时就停下来建造庙堂，或在山上开凿石窟。新疆的石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根据日前的情况推断，新疆的石窟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左右。当时，印度佛教与希腊艺术的结合体，即所谓犍陀罗艺术传入新疆后，很快为聪明、好学的古代新疆人民所接受，并加以改进和创造，与我国传统的艺术方法相结合，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富丽堂皇的新疆石窟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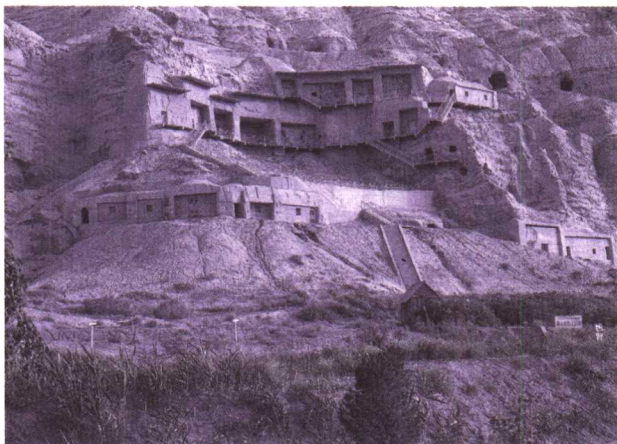
## ● 龟兹佛韵



古龟兹国是新疆佛教传播和佛教艺术，特别是佛教石窟艺术生长、发展、形成的中心。古龟兹国位于天山以南“丝绸之路”北道的中心地区，从今天的地域来看，大致包括今库车、沙雅、新和、拜城、轮台五县。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龟兹国隶属于其管辖。东汉和帝时，班超废掉不忠于汉朝的龟兹王尤利多，另立白霸为王，并将西域都护府迁于龟兹都城延城。从此直到回鹘西迁占领此地为止近千年中，龟兹一直为白氏这一显赫的家族所统治。龟兹国好佛，素有“西域佛国”之称。《晋书·西域传》说其都城：“龟兹国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今天，虽然古龟兹国早已不复存在，但那些遗留下来的宝贵的石窟仍能让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古龟兹的悠悠佛韵。

古龟兹境内共有8处石窟，分别是：库木吐拉石窟、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苏巴什佛寺、森木塞姆石窟和玛扎伯赫石窟、吐火拉克埃肯石窟。

龟兹石窟壁画的内容受大乘佛教影响极深，大乘佛教即唐玄



克孜尔石窟



奘历尽万苦千辛去西天取的“真经”，而它很早就开始在西域流传。大乘佛教表现在佛教文字和美术上最为生动有趣的是描写佛的前生无数次牺牲为善的故事，一般称为本生谭。本生谭如许多宗教的行传那样，为了把佛陀的难行苦节叙述得生动感人，往往把事情的经过穿插了人的生活 and 自然景物，使故事的情节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像“舍身饲虎”，“割肉喂鹰”这些故事都充满了丰富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描绘这些故事的画面同样生动美丽，可以比佛和菩萨的像更有说服力地感染善男信女。

龟兹石窟的壁画，还有很多画着佛本行经变的“降魔变”和“涅槃变”。它是佛教传入初期常用的描写释迦牟尼入灭的历史事迹的手段，也是佛传“八相”中最末的一相。一般讲来，佛教图像分为：一是单纯的佛、菩萨、弟子、飞天、罗汉的像；一是佛经故事用图画来表示的情节。有时只画故事的一个场面，有时从故事中摘取若干有代表性的重要场面，有时像今天卡通连环画那样用连续的图画来叙述故事的过程，目的是使信徒更加明白，这种情况就叫做“变相”或“变”等等。

在石窟的建筑形式上，龟兹石窟极具自身的特点，以至于这种形式被专门定名为“龟兹式”。“龟兹式”的主要特点是石窟分为前、主、后室，前室现在一般不存，主室宽阔、高大，有大型的佛龛，龛周围画着姿态优美的飞天和供养人，使人感到有一种光明和希望的象征。然而通过狭小的甬道进入后室，一种悲悯和感伤的情调则袭面而来。从直挺挺在右横卧的释迦牟尼造像、举哀的弟子，一直到火化圣骸、分舍利，把生前死后的事迹、过去和现在糅杂在一起，联系起来的确是一幅十分庄严悲哀的画面，使进入后室的每一位巡礼者都产生了那种宗教上的神秘与悲哀的感情。这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当年的艺术大师们竟使壁画产生了舞台戏剧的效果。

### ● 高昌峙嵘



新疆石窟的另一集中地在古高昌国境内，主要有吐鲁番市的雅尔、胜金口、伯孜克里克和鄯善县境内的吐峪沟等4处。

# 新疆两千年

佛教大约于4世纪传入高昌并开始兴盛，6世纪的高昌国王麴亮为纪念其父麴斌生前施舍田宅、建造佛寺的功德还专门立了“麴斌造寺碑”。此碑为佛教在高昌盛极一时的力证。但20世纪初此碑突然失踪，至今仍未得其下落，成为新疆史上又一大谜。

从4世纪到6世纪，古高昌国佛教传播虽然兴盛，寺庙林立，但却也没有完全佛教化。这个时期由于中原战乱，大量汉人迁入高昌，在高昌称王者又大多为汉人或汉化了匈奴人，因此汉族文化在高昌根深蒂固。就佛教在高昌的发展来说，它一开始就受到汉族宗教信仰和当地民族风俗习惯的强烈影响，甚至相互掺杂在一起，因而使得古高昌国佛教艺术具有与古龟兹国完全不同的风格。这一点在其石窟艺术上有极突出的体现。

首先，古龟兹国的石窟形式，多为西域式，即在一个长方形直洞的底端两面，开作甬道，以通后室，使中间部位成为一个中心塔的样子，或形成一道屏风式的照壁。甬道左右墙壁开凿小龛或制作壁画，后室在光线最暗处布置涅槃图像。而古高昌国地区的石窟形式，多数仅是一个长方形或长方形直洞，不分前后室，亦无甬道，构造比较简单。这种形式与我国内地佛庙殿堂极相似，可视为我国佛教艺术的创造。

其次，古高昌国石窟的壁画题材，大多是窟顶画千佛，左右两壁的中部画各种经变故事画，如西方净土变、观音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报恩经变和法华经变等，构图紧凑而完整，图中组织佛、菩萨、种种人物及花树、鸟兽，边饰又多为莲花图案。更让人瞩目的是，高昌壁画还掺杂有祆教、摩尼教，特别是道教的内容。诸多的道教神仙不时地出现在壁画的移文中，念着“急急如律令”的咒语，这种宗教文化的糅合，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

不管是龟兹石窟还是高昌石窟，都是我国石窟艺术的精华和古代新疆人民智慧的结晶。尽管千百年的风吹雨蚀已消弭了它们的绝代风华，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文物大盗又窃取了许多宝贵的壁画，那些幸存下来的遗迹和尚未发现的石窟宝藏仍会向世人昭示它们曾经沧桑的历程。



盛唐风采

立国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居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为世人瞩目和敬仰。唐朝统一西域，促进了边疆社会生产进步，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书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 ● 战狼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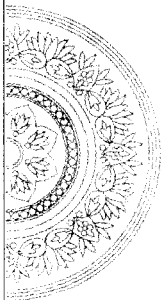
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分裂动荡的局面，而此时的西域，一支强大的力量正悄然崛起，这就是突厥。

突厥 (Turks) 是我国古代北方和西方的一个游牧部族的名称，也被用来称呼他们所建立的汗国。突厥部族的统治氏族姓阿史那，他们以狼为图腾，并在战旗上饰以狼头的形状。突厥早先被柔然逼至金山 (今阿尔泰山) 南麓，金山形似兜鍪 (古代打仗时戴的头盔)，俗称突厥，突厥由此而得名。突厥为柔然贵族锻冶铁器，被柔然可汗称为“锻奴”。柔然也是一个游牧部族，只是当时已建立了国家。

突厥人生性好斗，不甘居人下，他们养精蓄锐，到阿史那土门担任酋长时，突厥部落已强大起来，于是派人与中原地区沟通，进行贸易往来。公元545年，西魏的权臣宇文泰派酒泉人安诺瞿陀出使突厥，突厥部众受到极大鼓舞，上下都认为“大国使者到来，预示着突厥部落要兴旺发达了”。于是他们便大胆地向柔然可汗请求结亲，柔然可汗大怒，派人去辱骂土门：“你是我的锻奴，怎么敢提出这种要求！”土门极为光火，一怒之下杀了来人，和柔然断绝了关系。552年，突厥举兵进攻柔然，大胜而归，于是土门自立为伊利可汗，建立了突厥汗国。正是这个突厥汗国，在此后百余年中成为中央政权统一西域的强大阻力。

到土门之子木杆可汗时，突厥彻底消灭了柔然汗国。567年左右，突厥又与波斯萨珊王朝联手铲除了哒哒，于是东起辽河上游，西到里海，南至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都落入了突厥草原帝国的控制之下。

当时中原正是北齐和北周对立，双方连年交战，国力衰竭，疲惫不堪，都争相与突厥交好，以引其为外援。公元585年，北周武帝娶突厥



木杆可汗的女儿为皇后，并行迎亲大礼。

此后，北周以和亲的名义每年送给突厥各种丝绵绸缎十万段，来到长安的突厥人都受到殷勤款待，衣锦食肉者常常有上千人。而北齐也害怕突厥的侵犯和掠夺，尽其本国珍宝，与北周争着以厚礼贿赂突厥。突厥的可汗因此而十分骄横，他曾得意地对其臣下说：“只要我在南面的这两个儿子孝顺，就不必担心受穷了！”突厥可汗成了北部中国的太上皇。

公元581年，北周的隋王杨坚在消灭了内外政敌后，接受周静帝禅让，称帝建立隋朝。杨坚即隋文帝，他经过几年准备，又消灭了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中国。隋文帝为人果决，认为不可再向突厥示弱，他下诏书说：“从前周、齐抗衡，中原分裂，突厥却与双方都有联系，玩弄平衡。北周和北齐相互猜忌，都怕突厥偏向对方，他们搜刮百姓去喂养豺狼。而突厥不但不感恩，反而更加贪婪凶恶。本朝应正确处理，不要白白花钱。我们要进攻突厥，打得它再也不敢向南窥测，从此害怕本朝威严。”

当时突厥内部混乱，五可汗并立，其中沙钵略最强。鉴于此局面，隋文帝的大臣长孙晟（即唐初名臣长孙无忌之父）献计说，五可汗之间已有嫌隙，如加挑动，必将发生内讧。不如采取战国时范雎给秦王提供的策略：远交近攻，离强合弱。这样使突厥内部离心，相互猜疑，就可以一举消灭之。

隋文帝依言行事，主要派兵攻打最蛮横的沙钵略而交好其他几个可汗，果不其然，突厥中计，只一年工夫，公元583年，突厥就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汗国在史书中仍被称为突厥，也常称作北突厥，与西突厥相对，并与后来复兴的东突厥（学术界又称之为突厥第二汗



草原石人



国)相区别。

“和亲”在中国古代像一件百祭百灵的法宝，当突厥沙钵略可汗屡遭兵败之后，又赶紧向隋朝请求和亲，他致书隋文帝说：“皇帝您是我的岳父，就跟我父亲一样。我是您女婿，就是儿子辈。两地地域虽然不同，但情同一家。从今以后，子子孙孙乃至万世，双方亲好不绝。”沙钵略的继任突利可汗也娶了隋朝公主，又被隋册封为启民可汗，汉语直译为“意智健”（聪明健壮）。此时西突厥又无力与隋对抗，当初长孙晟设计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终于实现了。

隋炀帝即位后，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多次出边关向突厥炫耀中原的富足与强盛。据说炀帝的巡游队伍有披甲战士50万，马10万匹，加上仪仗后勤，浩浩荡荡，千里不绝；随行的还有上面能容纳几百人的观风行殿，周长达2000步的行城，极为壮观。游牧民见了这样的场面几乎吓倒，以为是神仙下凡，一望见炀帝行营，远在10里之外就跪下磕头，不敢骑马。启民可汗则精心布置好天幕大帐等待隋炀帝驾临。炀帝赏光进了启民的帐篷，启民斟酒举杯祝他长寿，下跪伏地，极为恭顺。突厥其他王公贵族都在帐篷前以本族礼节脱衣割肉表示忠诚，甚至都不敢抬起头来看一眼。

然而纵观历史，相互关联的各族各部，其盛衰兴亡总是表现出一种连环性。隋文帝的成功，使隋朝迅速达到极盛，为隋炀帝提供了夸富四海、骄奢淫逸的条件，而他最终因滥用民力导致身败国亡。突厥这匹充满野性的战狼，并未因短暂的驯服而失去活力，当隋朝内乱四起，无力旁顾时，突厥重新成为西域的霸主就成了必然。



## ● 大唐天可汗



隋朝末年，天下骚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集，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于是中原群豪四起，各自割据一方。当时北突厥的启民可汗已死，其继任者都黠武好战，趁中原之乱常来大肆掳掠。因北突厥强大，各地割据势力纷纷向其称臣朝贡，就连



后来的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当时也不得不忍辱负重，对北突厥曲尽礼节。

公元617年11月，李渊的军队攻克长安，拥立13岁的代王杨侑为帝，晋封李渊为唐王。618年5月，唐王李渊受隋恭帝禅让即位为帝，正式建立唐朝，李渊即唐高祖。李渊称帝前后，不断向北突厥大量送礼以加强联系，求得支持。突厥可汗自恃有功，更加骄傲，派到长安来的使者大多也横行不法。唐高祖越是想博取他们的欢心，反而越是增长他们的傲慢。北突厥颉利可汗即位后，凭借父兄创下的基业，非常瞧不起中原王朝，不断派人或写信向唐王朝索取财物。唐高祖因中原尚未完全平定，还顾不上对外经营，所以对北突厥的要求总是极为宽容，但唐朝倾尽全力，也难以满足突厥毫无节制的要求。加之颉利又受人煽动，于是开始不断向唐朝发动进攻，进行抢劫掠夺。

公元623年，唐朝统一中原的事业基本完成，边疆问题日益明显，但刚刚完成统一的唐朝国力还很弱，要打败强大的突厥支持的边疆分裂主义势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由于突厥不断入侵，有人曾对唐高祖建议说：“突厥之所以屡次进攻关中，是因为妇女儿童、金银财宝都在长安。要是把长安烧掉，不再作为首都，那游牧部落的入侵自然就停止了”。唐高祖居然觉得有道理，就派人越过秦岭去樊、邓（今湖北襄樊、河南邓县）一带巡视可以建都的地方。我们有时不能不惊叹历史的偶然性，如果当时唐朝真的因为李渊的一句话而迁都，那么后来“冠盖满京华”，成为各国人士向往的“圣地”的长安将不复存在，今日的古城西安也只能是一堆也许还不及圆明园遗迹的残垣断壁。

多亏秦王李世民，他的盖世豪气在那时就显露出来了。他劝阻其父说：“北方部族劫掠中原的事，自古以来就没有断过。皇上刚刚建立基业，统一中原，精兵百万，所向无敌，怎么可以轻易迁都向蛮族示弱呢？想当年霍去病不过是汉朝的一员将军，就能立志消灭匈奴。何况我现在作为一个王子，希望能给我几年的时间，我要把颉利可汗作为俘虏抓来献给您。如果做不到，那时再迁都也不迟。”太子李建成很不以为然：“从前樊哙（汉朝初年猛将）想以10万之军横行于匈奴之中，秦王的话不是也像他一样夸口吗？”李世民说：“形势变化了，用兵的方法也不同，樊哙这样的人还值得提吗？不出10年，我定会平定漠北，此非戏言！”唐





高祖这才放弃了迁都计划。

公元626年6月，唐朝发生“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被唐高祖立为太子，掌握了实权。8月，唐高祖传位于太子李世民，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其时北突厥大兵压境，气势汹汹，企图一举消灭唐朝。当他们行至长安城外时，唐太宗亲自出城迎敌。他一面斥责突厥人，一面向他们展示唐朝军队的阵容。颉利可汗见唐军旗帜鲜明，不免心生怯意，于是马上派人讲和，唐太宗当即应允。次日，太宗到城西，按突厥习俗杀白马一匹，和颉利在渭水桥上发誓结盟，然后突厥兵退。

唐太宗英雄孤胆，不战而屈人之兵，臣属不解，太宗便解释说：“我刚即位，国家还不安定，老百姓还不富裕，需要社会稳定以利生产发展。一旦和突厥开战，损失必然很大，突厥虽败而未必灭亡，若其汲取教训而发愤图强，再来报仇，我们就不一定能取胜。今天我们同意休战，送其金银，他们得其所好，自然就会退兵。这样下去，突厥必然骄傲自满，不再防备；而我们却可以养精蓄锐，将来找到机会，彻底消灭它。骄傲是败亡的开始，所以古人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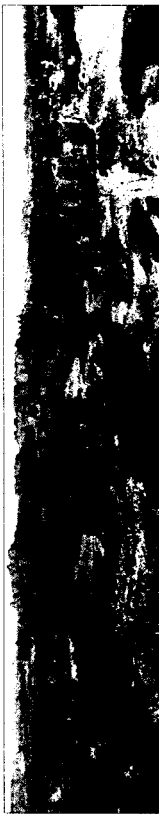
这个道理了。”

唐太宗能屈能伸，到公元629年8月，他终于感到时机成熟，下决心对北突厥用兵。是年隆冬，唐太宗命令唐朝10万大军在兵部尚书李靖统率下分6道出击，消灭盘踞在北方草原的北突厥汗国。新年将至，前方捷报频传，突厥酋长纷纷缴械投降，唐太宗激动地对大臣们说：“我大唐王朝刚建立时，突厥强盛，先父为了让人民休养生息，忍辱负重，向突厥称臣纳贡。我经常为此难过，总想有一天能洗刷这一奇耻大辱。今天，各路出兵所向克捷，我的愿望要实现了。”随后不久，东北的靺鞨也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唐太宗说：“靺鞨远道而来，这是由于突厥被平定的缘故。前人说处理周边部族问题没有好办法，我现在使中原得到治理，实现安定，周边各族就前来归顺，这不是好办法吗？”

公元630年正月，李靖率精锐骑兵3000赶到亚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夜袭定襄，攻破大利城，颉利可汗想不到李靖来得这么快，他以为：唐朝若不是倾全国兵力来进攻，李靖绝不敢孤军深入。他的部众被吓得人人如惊弓之鸟，连忙将牙帐北迁。李靖又派间谍到颉利的心腹中间施行反间计，结果颉利亲信的胡商首领康苏密带着隋炀帝的萧皇后以及炀帝的孙子杨政道前往李靖处投降。同时，另一支唐朝军队在通漠道行军总管李世勣的率领下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出击，与突厥大战于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大败突厥。最后唐朝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活捉颉利可汗。

颉利被捕以后，北突厥汗国灭亡了，大漠以南全部成了唐朝疆域。西域伊吾（今哈密）一直臣服于北突厥，北突厥一灭，伊吾城主就把全境共7座城镇转而奉献给唐朝，唐朝马上就在这一地区设立了西伊州（后改称伊州）。

唐朝消灭北突厥的战争在周边地区引起极大反响和震动。公元630年3月，周边各国各部国王酋长云集长安，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即周边各部共同的盟主。唐太宗矜持地说：“我是大唐天子，又降尊再做可汗！”意思是接受了大家的请求，唐朝大臣和周边来客们高兴得喊“万岁”。从此以后，唐朝皇帝在赐给西边、北边的诏书中就都称己为“天可汗”。



## ● 再创辉煌



唐王朝灭掉北突厥以后，要统一西域的障碍就是剩下的西突厥了。当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边的是北突厥，西边的就是西突厥了。隋朝末年，西突厥处罗可汗入朝不归，大臣们就拥立了他的叔父射匮可汗作了大可汗。射匮当上大可汗以后，致力于开疆拓土，把地盘向东扩展到金山（今阿尔泰山）一线，向西到了西海，把可汗的牙帐设在龟兹北面的三弥山，与北突厥为敌。唐朝初年，射匮死，其弟统叶护即位。统叶护可汗文武双全，有勇有谋，善于攻战，每战必克，于是北边吞并了铁勒，西边与波斯毗邻相抗，势力南抵闐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东北），骑射战士几十万，又把作为统治中心的汗廷迁到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北面的千泉，称霸西域。

西突厥力量强大，但唐朝在解决西突厥问题之前还碰上了一点小麻烦，这就是伸出螳臂欲阻挠大唐统一趋势的高昌国。

高昌国与唐朝的关系一度很亲密。后来，高昌王麴文泰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的影响，与西突厥联兵进攻唐朝的边城伊吾。唐太宗写信责备他，麴文泰置之不理。隋末有许多流民逃入高昌，这时要求返回内地，唐太宗让麴文泰遣送，他也顶着不办。从前，西域焉耆各国与中原的往来都是经由大碛路直接到敦煌。隋末动乱，大碛路因无人管理而封闭，于是西域到中原全部改道高昌，高昌王趁



《兵部条例买马用钱头数奏》残卷（麴氏高昌王国的官方文书）



做中介之机，大肆攫取利益。公元632年，焉耆王龙突骑向唐朝请求重开大碛路，唐太宗同意其请求。麴文泰因失去课税西域商人的大量收入，大为恼火，便勾结西突厥，攻下焉耆的5座城，掳掠了大量财富人口。焉耆王向唐太宗哭诉，唐太宗派人责问麴文泰：“你为什么要高筑城墙深挖沟，是不是想和唐朝打仗？”麴文泰居然说：“鹰飞于天，雉窜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快活！”言语中明显有不再臣服之意。唐太宗命令他人朝，他也推病不从。

麴文泰的嚣张气焰激怒了唐太宗，公元639年冬天，唐太宗派兵部尚书侯君集统兵数万，西征高昌。麴文泰听到消息，满不在乎地对亲近的人说：“唐朝离我7000里，中间要走2000里沙漠，无水无草，冬天寒风如刀，夏天热风似火，平日100人走，尚不容易过来，何况大军？唐军粮食吃尽，饿得站不起来，到那时，我们只管拿绳子捆俘虏好了，愁什么呢？”

公元640年，唐朝西征军兵临高昌城下，情况完全出乎麴文泰的意料。唐军以抛石车和推撞车攻城，很有成效，狂妄的麴文泰当时就吓死了。其子麴智盛只好投降。唐太宗随即在高昌设立西州，不久又设立安西都护府，府址就在西州。

西突厥统治者挑唆麴文泰搞分裂的阴谋失败后，又以武力挟制焉耆王和龟兹王反唐。公元641年，唐太宗派突厥族出身的将领阿史那社尔和铁勒族出身的契苾何力平定了焉耆和龟兹，打败了西突厥的军队。将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

西突厥新可汗乙毗射匮即位后，将与其不和的叶护阿史那贺鲁赶出西突厥。阿史那贺鲁见唐朝强盛，就率领3000部众东投唐朝，到长安觐见唐太宗，唐太宗特意任命其为左卫大将军，并在庭州莫贺城设立瑶池都督府，任命他为都督，让他招抚西突厥。

阿史那贺鲁是个有野心的人，他归附唐朝是迫不得已，授权他招抚西突厥，无异于太阿倒持，将生杀之柄送至他手，加剧了他的野心膨胀，从而加速了他发动叛乱的步伐。

阿史那贺鲁打着唐朝的旗号，扩充自己的实力，他的部众越来越多，逐渐全部占领了西突厥的领土，自称沙钵罗可汗。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唐高宗即位，贺鲁乘机反叛，大举东侵，进攻庭州，劫掠轮台、蒲





戈壁中的海市蜃楼



类两县，唐高宗派大将梁建方和契苾何力西征贺鲁，收复了失地。

听过《说唐》的人对程咬金这个人物是再熟不过了，历史上还真有其人，其人本名程知节，是唐朝大将，至于是不是有“三斧头”的绝活就不得而知了。公元653年，正是程知节西征贺鲁，并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取得大胜。

至于最终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的人则是名将苏定方。公元657年，大将军苏定方带领步兵和回纥骑兵进攻贺鲁。苏定方率军来到阿尔泰山下的额尔齐斯河西岸，贺鲁带兵10万前来抵抗，他见唐军不多，就心生轻视，扑过来包围唐军。殊料苏定方用兵如神，使计将贺鲁杀得大败而逃。苏定方紧追不舍，此时正遇到大雪纷飞，积雪三尺，有人要求雪晴后再追，但苏定方说：“敌人恃雪深，以为我们一定不会追击，必然停马休息，我们紧追，定能赶上。”他命令部队日夜兼程，到离贺鲁牙帐200里时，就排开阵势，长驱直入。这时，贺鲁正在雪中打猎消遣呢，苏定方攻其不备，又获全胜。贺鲁远逃石国，结果石国人将其捆起来交给了唐军，带回了长安。阿史那贺鲁自知有罪，痛悔万分，唐高宗就免其一死，让他在长安终其一生。

唐朝平定了西突厥之后，在其地设置各级军政机关，都护府以下设置镇、军和守捉，如安西都护府在龟兹、于阗、疏勒和碎叶设立四镇，分驻3万多兵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西四镇”。至此，唐朝已完全统一了西域，唐对西域的统一和管制都比汉代强，终于在汉亡几百年后又在西域创出一片更辉煌的天地。

## ● 女皇的隐忧

突厥的生命力很强，总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从679年10月开始，被安置在漠南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突厥降部就断断续续地进行叛乱，拥颉利的同族之子阿史那伏念为可汗，但被唐朝派名将裴行俭镇压下去。裴行俭文武全才，平阿史那伏念时大施反间计，结果伏念捆另一个反叛头目前来投降，裴行俭同意饶他不死。到长安后，权相裴炎嫉妒裴行俭的功劳，说动唐高宗把伏念杀了。唐朝的这一举动，激起了突厥人更为激烈的反抗。

公元682年，阿史那伏念的余党阿史那骨咄禄、阿史德元珍召集逃亡分散的叛乱分子，占据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反抗唐朝，骨咄禄自称可汗，建立了东突厥汗国。因为东突厥汗国是由投降唐朝的突厥人建立的，所以学术界又常常称之为突厥第二汗国或后汗国。这样，唐朝西北部重新出现了一个强敌，从此又恢复了烽火连天的战争局面。

公元691年，骨咄禄病死，他的儿子年纪太小，于是骨咄禄之弟默啜自立为汗。几乎与此同时，在中原地区，武则天作了女皇。这位女皇帝虽然严刑苛政，但也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不过那个与她同代的默啜，却让她伤透了脑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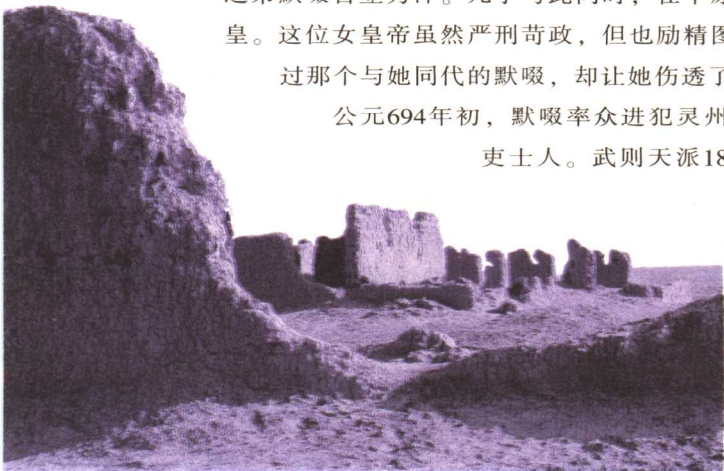
公元694年初，默啜率众进犯灵州，大肆屠杀、掳掠官吏士人。武则天派18名将军领汉蕃步骑各

种军队讨伐默啜。岂料默啜先行退兵，唐军出长城一无所获，劳而

将军戈壁遗址



〇六三



# 新疆两千年

无功，只有班师回朝。695年10月，默啜又派使者前来请求投降，武则天大喜，册封其为最高武职左卫大将军、归国公。默啜为人极为狡黠，表面上看，他在这一时期对中原王朝的政策反复无常，而实际上，他是在当时亚洲大陆上的强大政治势力间寻找机会，利用矛盾，纵横捭阖，为自己获取最大的利益。可以说，他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公元696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东突厥默啜就上书武则天说：“我愿意当您的儿子，希望把女儿嫁到中原来，请国家把河套及其以南的突厥降户放还给突厥，我愿意马上率兵马为国家讨击契丹。”武则天同意了他的请求，派大臣阎知微、回归道去册授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然而默啜别有用心，他袭击了契丹后，又继续进攻抄掠灵、胜二州，杀人放火。突厥进攻灵州时，押着被俘的唐朝凉州都督许钦明，想让他劝告守城将士投降。许钦明到灵州城下大声呼喊，向守城将士要良酱、精米和墨，意思是让城里选良将精兵趁黑夜突袭突厥营地，可惜城里人没有明白他的隐语。突厥攻胜州，被唐朝将士奋力击退。

公元698年6月，武则天让他的侄孙武延秀去突厥娶默啜的女儿做妃子。命令阎知微代理礼部尚书，带着成千上万的丝绢钱财作为聘礼，护送武延秀去突厥。哪知默啜轻蔑地说：“我女儿是要嫁给李唐皇子的，你却送了个姓武的来，这是皇帝的儿子吗？我突厥世代降附的只是李家，听说他家被消灭得只剩两个儿子了，我就要带兵拥立他们。”于是默啜就把武延秀关押起来。阎知微奴颜婢膝，马上向默啜表示屈服，默啜就封他为南面可汗，意思是让他主管中原百姓。接着，默啜发10万大军，带着阎知微进攻唐朝。默啜攻隐蔚州飞狐县（今河北涞源），于是经著名的飞狐道穿过太行山南下，攻下定州，杀刺史孙彦高及官吏、百姓数千人，焚烧房屋，将乡村聚落荡为一空。武则天大怒，下诏宣布，谁砍下默啜的头来，立即封王，并改称默啜为斩啜。

9月，默啜派阎知微去招降赵州（今河北赵县），阎知微和突厥人在城下手拉手跳踢踏舞，唱《万岁乐》。唐将陈令英在城上对他说：“你官拜尚书，地位也不低了，还和突厥一起唱歌跳舞，羞不羞啊！”阎知微哼哼唧唧地说：“不得已啊，《万岁乐》。”默啜在定、赵一带来回掳掠，坑杀百姓，唐朝名臣狄仁杰领兵10万出击，默啜撤离；但阎知微为





北庭都护府遗址

唐军所擒。武则天对这个汉奸毫不手软，下令将他公开千刀万剐，祖孙三代以内全部抄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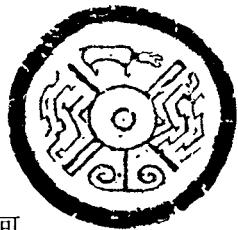
公元699年，默啜任命其子为拓西可汗，将军事活动重点放在了在西域的扩张之上。对此唐朝不能置之不理，702年，武则天在庭州（今吉木萨尔北）设立北庭都护府。然后联络草原突骑施等部落联合向突厥作战，一度令默啜疲于奔命。

盛极必衰，东突厥汗国最终也难逃这一历史规律。默啜到了晚年，身体衰老，而脾气更加暴躁，经常虐待部下，残酷搜刮掠夺部属，搞得部属怨恨，众叛亲离。公元716年，默啜遭铁勒九姓的拔曳固部伏击而身亡。当时唐朝的大武军子将郝灵荃正好在出使西域，他记得当年对默啜的悬赏，就拿了默啜的头回长安请功。此人钻营投机，也该他倒楣，当时唐玄宗刚即位，其宰相姚崇、宋璟担心有人投年轻气盛的玄宗所好，对外发动战争以立功，所以严格限制军功赏赐。郝灵荃邀功一年多，最后好不容易才授他一个郎将（从五品上），比他原来子将的职务（从五品下）只升了一级，郝灵荃气得吐血而死。这又成为唐征突厥中的



一段插曲。

默啜死后，其子小可汗即位，但随即就发生了一场政变：骨咄禄的儿子阙特勤发动自己的人马，攻杀小可汗，并把小可汗的兄弟也杀得一个不剩，连亲信也统统杀光，之后拥立自己的哥哥默棘连即位，称毗迦可汗。毗迦向唐朝求和，唐应允，此后20年双方相安无事。



毗迦可汗死后5年，东突厥内部大乱，唐玄宗抓住机会，联络回纥、葛逻禄、拔悉密等突厥的部属，准备除掉东突厥这个边防大患。回纥在这场打击突厥的长期战争的尾声中充任了主力，745年，回纥怀仁可汗攻杀了突厥最后一任可汗——白眉可汗，将其头献于长安。

东突厥汗国彻底灭亡了。突厥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威胁唐朝的西域统治近200年后终于退出了舞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东突厥汗国灭亡时如释重负地说：“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

## ● 帝国斜阳



唐统一了西域，但到唐朝中后期，由于西域形势的复杂变化，加上唐朝本身实力渐衰以及一些错误的决策，表面上稳如泰山的安西、北庭都护府实际孕育着深刻的危机。

首先，吐蕃的力量渐渐渗入了西域。吐蕃是我国藏族的祖先。唐朝初年，吐蕃即同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其著名首领松赞干布（又名弃宗弄赞）娶唐文成公主为妻。到松赞干布死后，他的一个很年幼的孙子即位，大权旁落至一些大臣手中。这些人违背了松赞干布的宿志，对唐朝发动了进攻。在西北方，他们进攻的重点就是安西四镇。西突厥被灭之前，吐蕃就与他们狼狈为奸。

公元679年，吐蕃攻占安西四镇，692年，武威道大总管王孝杰率兵收复了四镇。武则天决定增兵西域，在朝廷上引起了一场争论：一派以崔融为代表，赞同增兵；一派以狄仁杰为代表，赞同撤退四镇。武则天最后否定了撤退的意见，沉重打击了吐蕃贵族。

吐蕃贵族眼看武的不行，就用文的。他们的主要头目论钦陵亲自出



马，以求和为幌子，妄图骗得安西四镇及原西突厥王俟斤（即王弩失毕）之地。武则天只差了一个仅做过县尉的小官郭元振批驳了论钦陵的种种借口。谈判结束后，郭元振向朝廷提出两项建议：第一、为了堵住论钦陵的嘴，可以向他提出反要求，要他退出青海一带地方；第二，经常派使与吐蕃通好，以暴露论钦陵好战的实质。实行了郭元振的建议，特别是第二项建议后，果然生效，论钦陵不久被杀。

西域的另一个不稳定因素是突骑施，他们是在西突厥汗国灭亡后发展起来的草原势力。突骑施的首领叫苏禄，他与吐蕃相勾结，结为姻亲；对唐朝阳奉阴违，一边进贡，一边又攻打唐朝在西域的边防。公元724年，苏禄派人到安西卖马，他的妻子金河公主给安西都护杜暹写了一封信，她摆起公主的架子（她是唐朝以公主名义嫁给苏禄的），称自己的信作“教”（唐朝将亲王公主的下行函件称为“教”）。杜暹见到信很生气，把使者打了一顿，置之不理。恰好又下大雪，苏禄使者带的1000多匹马全被冻死。苏禄以此为借口，发兵攻打四镇。后来他又勾结吐蕃赞普攻打安西，但被新都护赵颐贞所击退。

但是唐朝在西域的某些措施，已越来越不得人心。唐朝一贯派遣突



# 新疆两千年



厥汗室后裔到西域作统治者，这是为了利用他们在本民族、本部落的影响。其实，这些突厥汗室后裔却多数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他们一到西域，往往引起反抗，西域发生的很多动乱，都是与他们有关的。在西域的唐朝军政官员，有的措施“颇失于宜”，致使“蕃情不得其所”；有的“共行割剥”，致使一些部落“相继离散”；有的官员对少数民族滥施“决罚”，致使“刑法不中，心固不安”。

在对待大食（阿拉伯）入侵中亚问题上，唐玄宗李隆基的做法直接违背了西域各族人民的愿望。7世纪时，以伊斯兰为旗帜的大食国兴起于西亚，并迅速入侵到波斯及受唐朝管辖的中亚大部分地区。中亚各都督府抵挡不住这种侵略，便纷纷向唐朝求援。他们在奏表中表示了自己对唐的忠心，控诉了大食侵略者的横征暴敛，请求唐朝派兵与他们一起抗击大食。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唐朝也完全有能力这样做。但是，李隆基一概拒绝，听任这些地方长时间地落入大食人之手。尤其严重的还是在对待石国的做法上。741年，石国上书唐朝：“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李隆基拒不接受。石国多次派人到唐朝纳贡，但是到750年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却硬说他们“无蕃臣礼”，请求发兵征讨，而李隆基居然也同意了。高仙芝率兵攻入石国，获得了许多珍宝、名马，俘虏了石国国王，并把他送到长安处决。这就引起了西域各地的极大不满。

公元755年，唐发生“安史之乱”，盛唐由此一蹶不振。暴乱发生后，李隆基逃到四川，他儿子李亨于756年即位登基，各地响应，举兵平乱。安西副节度使李嗣业和安西军司马李栖筠先后率军到达，继之而至的还有拔汗那、于阗、龟兹的地方武装。当时，李亨的兵力相当薄弱，主要依靠的是这支西域军队。李亨的宰相李泌说：“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这支军队分别转战于今陕、晋、豫一带，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重要贡献。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朝虽然得以继续，但藩镇割据局面逐渐形成。在西部地区，安西四镇，安西、北庭两节度使虽仍驻原地，但在吐蕃政权占据了河西、陇右大片土地以后，他们同中央政府的联系被切断



了。约在8世纪60年代，吐蕃政权加紧了对西域的进攻，安西、北庭等地驻军奋起抵抗。874年，唐朝命令安西、北庭二都护府撤退，将地方让给吐蕃政权。安西、北庭军民没有听从，又继续坚持了好几年。8世纪90年代初，回鹘汗国从北向南，吐蕃政权从南向北推进，他们在西州北庭一带相遇，经过反复争夺，互有胜负。至此，今新疆南部大部分地区便落入了吐蕃贵族手中。吐蕃的势力虽然于公元866年被人民起义逐出了西域，但西域地区也进入一个新的纷繁动荡的时期。

## ● 回鹘衣装回鹘马



“明朝腊日官家出，  
随驾先须点内人。  
回鹘衣装回鹘马，  
就中偏称小腰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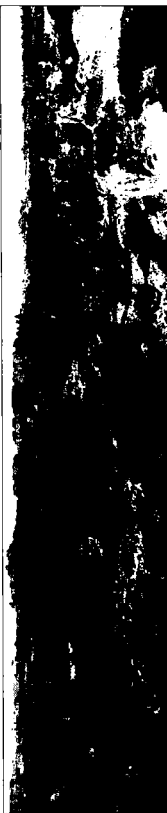
这是唐朝著名的花蕊夫人写的《宫词》诗，宫词中提到的“回鹘”，就是在唐朝时对今天维吾尔族祖先的称呼。那么，维吾尔族在唐以前又被称为什么呢，他们的经历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追忆罢。

关于维吾尔的起源，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匈奴之北的丁零（或西令、丁灵）的后裔；有的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同匈奴有某种血缘关系。总之，他们是公元前3世纪游牧于我国北方的某个或某些氏族、部落的后裔，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

4世纪时，维吾尔正式出现于汉文史籍，那时译作袁纥，5至6世纪时，叫作韦纥、乌纥，到了唐朝，才改称回纥（鹘）。

回纥最初是一个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活动在仙娥河（今蒙古色楞格河）、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和独洛河（今土拉河）流域一带。实际上，他们是由药罗葛、胡咄葛、咄罗勿、貂歌息讫、阿勿喃、葛萨、斛温素、药勿葛、奚耶勿9个部族组成的联合体，通常称为内九族，

一、维吾尔溯源





# 新疆两千年

总称九姓回纥。到了唐朝初年，回纥部与仆固、浑、拔野古、同罗、思结等部组成联盟，贞观二十七年（公元646年）又吸收契苾部，到唐玄宗天宝年间，又收并拔悉密、葛逻禄两部，通常叫外九部，也叫九姓铁勒，加上后来参加联盟的阿跌部，又称为十姓回纥。

回纥部落原来没有固定的酋长，它的南面住着强大的东突厥部落，东突厥的贵族和大牧主强迫回纥人给他们当牧工进行残酷剥削，附近的薛延陀部落也常来骚扰，抢掠牲畜、霸占土地。回纥人为了摆脱被奴役的痛苦，就商量从九姓部落中公推酋长时建俟斤的儿子菩萨为首领。后人经常笑谈说，此人名为“菩萨”，还真像是救苦救难的神仙菩萨般将回纥人从受奴役的痛苦中解脱了出来。这位菩萨王子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在他的领导下，又联合了邻近的部落，在唐朝大将李靖的协同下，终于推翻了东突厥的统治。不幸的是，薛延陀又代替了东突厥继续统治回纥，而这时，人们爱戴的菩萨去世了。大家又推举菩萨的继承人吐迷度为继承人。从此九姓回纥确定了以药罗葛部为首领的世袭制度。

吐迷度是回纥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他审时度势，清楚单靠回纥自己的力量是打不过薛延陀的。要战胜这个强敌，只有得到唐朝的援助才行，不久，借助唐太宗派遣李勣出兵讨伐薛延陀的机会，灭掉了薛延陀。公元646年，吐迷度自称可汗，设置百官，完全按突厥汗国的样子去做。后来，他觉得自己在其余各部中还没有绝对威信，这样下去，恐怕会像薛延陀一样在短期内垮台。于是他带领回纥各部，朝见唐太宗，请求在其统治区内设置唐朝的官吏。唐太宗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回纥当时居住的中心地带——从鄂尔浑河到金山（阿尔泰山）以东，按唐朝的行政区划制度，设立了六府七州。其长官均由当地回纥各部落的首领担任。并且还任命吐迷度为唐朝怀化大将军瀚海都督府都督。

为了庆贺这件大喜事，唐太宗大摆国宴，并对回纥各部首领赏赐甚重。回纥的首领们都请求说：“我们既然都成了唐朝的子民，往来参见天可汗，就像来看望父母亲。请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修一条大路作为‘参天可汗道’，我们愿世代代臣服于大唐。”唐太宗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下令从漠南鹈鹕泉往北设置68所驿站，各有驿马，并备有酒肉供应



过往使者和客人。从那以后，回纥与唐朝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

吐迷度和唐太宗是回纥与唐朝友好交往的创始人。吐迷度的儿子婆闰继位后，唐朝又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公元651年，他派出5万大军协助唐朝平息了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的叛乱，收复了后来的北庭都护府管辖的广大地区。

到骨力裴罗担任回纥首领时，他东征奚、契丹，西破拔悉密、黠戛斯、葛逻禄，自称为骨咄禄阙毗迦可汗，将牙帐建立在乌德鞬山，正式建立了回纥汗国。关于这位回纥汗国的开国君主，还有一段很神奇的传说。据说在回纥人居住的地方，有两道河流，分别是秃忽刺和薛灵哥。在这两条河交汇之处，有两棵树相邻，一天，有天光降于树，两树之间忽有小丘，且日渐增长，还有声音从丘中传出，如同歌唱，每夜皆然。长成以后，忽开一门，内有5室，如同帐篷一般。上悬银网，各网有一婴儿坐其中。5婴儿与空气接触，即能行动。回纥人忙命乳妇哺育他们，而且都把这5人当王子看待，认为他们是上天所赐，决定选其中一人为主。而第5子最终成为首领，就是骨力裴罗。744年，他接受唐朝册封，称为怀仁可汗。

公元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唐玄宗仓皇出逃，长安陷落，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当时回纥可汗葛勒听到消息，马上派使者到灵武来，要求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公元757年，葛勒可汗派儿子叶护、将军帝德率精兵五千，战马万匹，与唐将郭子仪合兵进攻长安。叛军10万迎战，并事先在唐军的阵地东边埋伏了骑兵，准备偷袭。回纥侦知这个情况，就在唐朝回纥将领仆怀恩的



指挥下，一举全歼了这支敌人，又与唐军夹击正面的叛军，大获全胜，收复了长安。但是，由于唐肃宗不从人民的安危出发，一心想早日进京过皇帝瘾，竟然纵容回纥军，让他们进城后可以三天无军纪、为所欲为，这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后果。回纥虽助唐平叛有功，但也同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页。

公元788年，经唐朝同意，回纥将族名改为回鹘，取“捷鸞犹鹘然”之意，即回纥人都如鹘鹰一般轻捷勇猛。

## ● 西迁漫记

回纥是从什么时候西迁来到西域——新疆的呢？那还是公元840年以后的事。这是回纥汗国衰亡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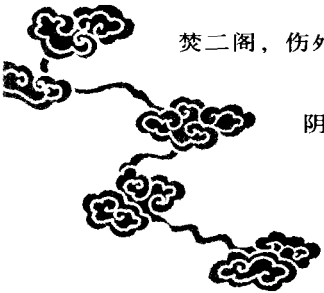
回纥汗国在协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由于军事上获得了成功，因而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权，在经济上掳得了财富。这时的回纥汗国，可以说是既强盛又富足。汗国统治

阶级，特别是在镇压史思明叛

乱中亲率大军出征的登里可汗，因强盛而变得骄横起来。洛阳收复以后，登里可汗纵容部下大肆掳掠，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白马寺惨案。《旧唐书》中记载道：“初，回纥至东京，以贼平，恣行残忍，士女俱之，皆登圣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回纥纵火

克孜尔尕哈烽燧





焚二阁，伤死者万计，累旬火焰不止。”

公元780年，唐德宗皇帝初立，登里可汗受奸人煽动，阴谋乘唐朝皇位更迭之机，对唐发动掠夺战争。宰相顿莫贺达干顺应回纥部众不愿与唐作战的情绪，起兵袭杀登里可汗及其二子。顿莫贺达干自立为汗，并遣使向唐朝说明事变原委，请求册封。唐遂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其后的岁月里，回纥统治阶层内部接连不断地发生内讧，汗国围墙上的裂缝日益扩大。

这一时期，回纥汗国除了统治阶层动荡不安外，还孕育着其他不安定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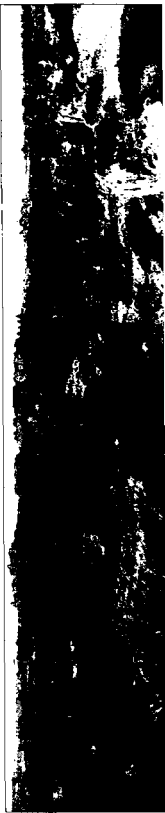
回纥汗国是靠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它赖以存在的支柱是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严密的行政体系。当汗国处于上升阶段时，汗国所辖各游牧部族，迫于强大的武力威慑，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做出越轨行为。及至汗国后期，上述条件逐渐变化。可汗的不时更替，迫使汗国境内的诸游牧部族必须随之改弦更张，作出抉择，往往将自己的命运系于某一个可汗的成败兴亡之上，从而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失去保障。更严重的是可汗的更替常常伴以各种规模的战争或冲突，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凡此种种，加剧了汗国所属诸游牧部族的离心倾向。

第一批脱离回纥汗国的，是游牧在北庭附近的沙陀部、白眼突厥和葛逻禄部。公元790年，这几个部族投向吐蕃，配合吐蕃攻击回纥汗国军队。在汗国军队与吐蕃作战失利以后，葛逻禄部又乘机攻占了回纥汗国的浮图川。

继沙陀、葛逻禄脱离汗国后，汗国在天山东部又遭到一次道义上的失败。公元790年，回纥汗国军队在北庭配合唐朝军队对吐蕃作战失利。统率回纥军队的宰相颉干迦斯迁罪于人，诱杀了唐朝的北庭节度使杨袭古，引起西域诸地人民的不满。

回纥汗国内讧不止，所属诸部离心倾向日益严重，外部又化友为敌，呈现一派没落景象。这说明，汗国的车轮已经越过其鼎盛时期，向衰败的深渊滑去。

公元808年以后，回纥汗国在保义可汗的领导下，曾有过一段复兴的



# 新疆两千年

时间。这期间回纥汗国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一方面是由于吐蕃国势的一度衰落，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保义可汗本人的才能。但是，回纥汗国中兴时期取得的这些胜利，对于阻止其衰败已经不再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了。

对于回纥汗国来说，诸多不幸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其中黠戛斯人的进攻成为汗国最终灭亡的主要原因。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在唐以前我国汉文献里，称作“坚昆”、“结骨”；唐朝时始称黠戛斯。黠戛斯起先受匈奴、柔然、突厥以及薛延陀的统治和奴役。回纥立国期间黠戛斯又成为回纥的属部。黠戛斯的首领在795年与回纥作战时被回纥怀信可汗一箭射死，因此黠戛斯始终保持着对回纥的深仇大恨。

公元839年，回纥发生内乱，宰相安允合和王子柴革相勾结，阴谋篡位，被彰信可汗发现后杀死。副宰相掘罗勿与王子柴革关系密切，这时带兵在外，听说柴革被杀，就用马300匹作为礼物，向沙陀突厥借兵，进攻可汗，彰信可汗兵败自杀。掘罗勿扶王子廆馭为新可汗。是年冬天，大雪不停，牛马冻死很多，回纥缺少食物，国势急剧衰落。公元840年，将军句禄莫贺痛恨掘罗勿和廆馭，投奔黠戛斯请兵。这正中黠戛斯首领的下怀，于是黠戛斯出兵10万，在句禄莫贺的引导下，由北向南风暴般地横扫回纥汗国，攻破汗国都城，杀廆馭可汗，毁坏城郭，掳走财富。立国百年的回纥汗国在天灾和人祸的双重打击下，终于灭亡了。

汗国灭亡后的回鹘部众分别向南、向西两个方向迁徙。向南迁的部众是住在汗国都城附近的13个部落，约10万户，他们越过蒙古大沙漠，南迁到唐朝振武军和天德军的驻防地区。南迁的回鹘部众于841年拥立乌介特勤为可汗。当时，乌介可汗的牙帐设在大同附近，尚有10余万人口。向这样众多的人口提供粮食和衣物，对于唐朝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唐朝提出用粮食和衣物交换马匹。但乌介可汗却拒绝了唐朝这一合理建议，纵兵天德、振武防区，以及大同附近，大肆掠夺党项、沙陀等游牧部落，掳去的马匹、牛羊达数万之多，甚至发兵围攻大同。

公元843年，唐朝将领石雄、张仲武大败乌介可汗。乌介可汗逃往今河北北部黑车子部，几年后，他被部下所杀，其弟遏捻特勤被立为可

汗。他率领的回鹘部众几经波折，所剩无几。公元847年，遏捻可汗为躲避其他游牧部落追杀，逃入山林，不知所终。其部众也悉数为黠戛斯追兵擒获。这一支南迁的回鹘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向西迁徙的回鹘幸运地选对了方向，他们不但未受致命打击，还有很大的发展。西迁回鹘分为三支：一支迁往河西走廊；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另一支迁往中亚草原地带。

迁往河西走廊的回鹘部众起先受吐蕃统治，后来他们积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10世纪初，他们成为河西地区首屈一指的势力。他们的势力范围东起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至敦煌、玉门、安西一带。他们就是今天裕固族的祖先，所以裕固族在历史上又有西刺玉固尔、萨拉维吾尔、黄维吾尔之称(因为维吾尔族改信伊斯兰教后，裕固族还在信仰佛教)。现在，裕固人仍自称“尧乎尔”。

西迁的第二支回鹘队伍，大约在9世纪中期以后，逾越阿尔泰山脉，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东北部。这支回鹘逐渐强大的事实，到公元866年才得到明确的显示，这一年，回鹘与吐蕃大战于北庭，回鹘大胜，北庭为其占有。北庭一役，是西迁进入天山东北部的回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他们不仅有了立足点，掌握了深入天山南部的交通枢纽，而且北庭在天山南北的重要地位也给回鹘增强了自信心。从此以后，一个游牧

部族——回鹘，成为这一地区的历史活动的主要角色。

回鹘攻占北庭之后，接着攻占了轮台，然后南逾天山，占领西州(今吐鲁番盆地)，后来，建立西州回鹘政权。西州，原来是麹氏政权建立的高昌国，后来麹文泰狂妄自大，向唐朝挑衅，



北庭西大寺遗址



落得个国灭身死，高昌也被改为西州。

回鹘在西州建立国家，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比原来的回纥汗国远为发达，这一巨变，为维吾尔民族在天山南北的壮大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西州回鹘最初进入天山东部时，完全处于逃亡和流徙的状态。他们最初的胜利——对吐蕃的胜利，并不完全基于自身的强力，而是利用了吐蕃的虚衰。此时的回鹘实力，相对于其仍要直面的敌对势力，还是较软弱的。

在这些敌对势力中，居首位的是因击溃回纥汗国而称雄漠北的黠戛斯部。黠戛斯与回鹘的世仇并未因后者的国破家亡而烟消云散。汗国崩溃后，回鹘部众逃离蒙古草原的鄂尔浑河流域，虽避开了黠戛斯的直接压力，却未完全逃脱黠戛斯部的势力所及。残存的回鹘部众，仍被黠戛斯视为心头大患。

与西州回鹘政权为敌的第二股势力，是吐蕃王朝。吐蕃在天山南部经营多年，历来将这一地区看作自身的安全屏障。尽管在与回鹘的最初较量中，吐蕃接连失利，但它决不肯轻易认输。

这一切，都一度使西州回鹘处于不利的境地。但在这危急时刻，我们再次看到了百余年来存在于回鹘与唐朝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发挥的作用。唐朝继续站在回鹘的一边，给予他们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

公元856年，唐宣宗发布诏书说：“回鹘有功于国，世为婚姻，称臣奉项，北边无警，……近有降者云，已特勤今为可汗，尚寓安西，俟其归复牙帐，当加册封。”后来，当唐朝确切地知道庞特勤（即已特勤）已立为可汗后，立即予以承认。

公元863年，黠戛斯遣使入唐，要求唐朝允许他们攻击进入天山一带的回鹘部众，并把安西以东土地归还给唐朝作为交换条件。而唐朝运用自己的正当影响，制止了黠戛斯的行为，让回鹘避免了一场血火之灾。作为中央政权象征的唐朝，对于力争与其友好相处的黠戛斯，无疑是有约束力的。对于和唐朝处于敌对状态的吐蕃来讲，唐对西州回鹘的态度虽然不会产生约束力，但唐朝的支持必然增加回鹘的实力，这一点，在吐蕃看来也是非常清楚的。

对于西州回鹘自身来讲，唐朝的大力协助使他们暂时免去外患，获



得了统一内部、积蓄力量的机会，为他们以吐鲁番盆地为基地，作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西迁的第三支回鹘进入中亚草原地区。因为他们起初主要活动在帕米尔高原以西，所以史书称之为葱岭西回鹘。10世纪时，这支回鹘建立了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向东扩展势力，进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在龟兹一带与西州回鹘相对峙。关于喀喇汗王朝和西州回鹘王国，本书在后面的章节还有详细的记述。

总之，唐末西迁进入今天新疆地区的回鹘人，与原有的土著居民相融合，逐渐成为天山南北的主体民族。到元代时，他们被称为“畏兀儿”，后来渐渐成为“维吾尔”，维吾尔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一起，为保卫祖国的边疆，建设祖国的边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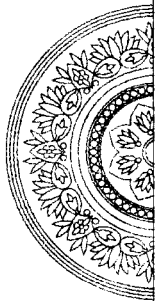
## ● 丝路寻古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因为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开始，将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欧洲这两处代表东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地方紧紧联系起来的那条交通大动脉——丝绸之路，正是以新疆为中转的枢纽。丝绸之路像一条缀珠联璧、光彩斑斓的彩带一般，以长安为起点，从东而西，经过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入新疆，蜿蜒穿过绿洲、大漠，翻越帕米尔高原，西行经波斯，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转达罗马等地。另外，丝路偏南行，可到印度；偏北行再西走，可到里海沿岸。由于这一条交通大道的存在，古称西域的新疆不仅早在古代就发展起了当地的璀璨文化，而且也为后代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增添了无上光辉。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为开辟和发展这一条横跨欧亚的、最早的也是最长的陆上通道所做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丝绸之路”经现在的甘肃敦煌进入新疆，起初只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边沿而行，所以《汉书·西域传》称它有“南、北二道”。后来，经过我国西汉、东汉政府的艰苦经营和西域地方政权的积极配合，人们又开辟了从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到伊犁河谷，再到巴尔喀什湖沿岸和现今独联体各共和国的那一条线路，即新北道。所以，著名史书《魏略》又称它“有三道”。到了唐朝，许多新的支线被探查和开辟出来，古道出现了空前繁荣和畅通的局面。唐代时，沿着各条线路，驿站遍布，市镇联珠，“葱岭无尘，盐池息浪”，东、西方以及西域和内地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空前密切。

虽然由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到了十五六世纪，这条曾经把古代东、西方各国人民紧密联结起来的艰险通道最终被海上交通所代替。但是，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许多遗迹仍闪耀着当年那种夺目的光华。“千秋功罪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博望凿空”、“班、甘之



迹”并未因古道的凋零而被忘却。现在，假若我们在丝路中段即新疆路段的各条古道上旅行，那么就可以在各处看到那些令人神往的古城、古烽燧、古驿站，它们屹立在沙漠之中或古河道旁，或帕米尔高原的崇山峻岭之间，向人们诉说着当年“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其中，坐落在敦煌西160多里的所谓“大方盘”和“小方盘”遗址，就是古代边塞诗人们讴歌不绝的丝路古道上的雄关玉门。

玉门是北路古道新疆路段的起点，出玉门关或出它南面的阳关，丝路便进入了楼兰古国。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这个神秘的西域王国，它地处罗布泊附近，是近年来丝路探险的大热门。现已干涸的罗布泊是当年商人、使节、僧人们所必经“盐泽”，它的北岸和西岸，还留着古人的营地或烽燧。西岸的一座古城，有些学者认为就是西汉时楼兰王国的都城。

坐落在火焰山下的吐鲁番盆地，是当年丝绸之路的北道必须穿行之地。著名的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是当年古丝路这条彩带上的两颗明珠。它们从公元前2世纪起，经历了车师王国时期、高昌王国时期、唐朝的西州时期、西州（高昌）回鹘时期直至现在，前后共2000多年时间，真可谓历尽人间沧桑，是古丝路的强有力的见证之一。

出高昌，向西行，就踏上了古丝路的北道，在这条古道上，至今尚存许多烽燧遗址和其他一些遗迹。其中和硕县境内有古危须国都城，焉耆境内有古员渠城，库车县内有龟兹古城，东西昭怙厘寺院遗址（即著名的苏巴什故城），拜城县境内有克孜尔千佛洞和库车西面渭干河谷中的库木吐拉千佛洞，巴楚县境内有唐谒者馆废址、尉头州城



龟兹国昭怙厘寺院遗址



(又名史德城或握德城) 废址，喀什境内有疏勒古城、盘橐城遗址以及疏附县境内的乌即城遗址。

古丝路的南道，早就以沙漠的广袤无垠而被古人视为畏途。现在所存遗址，也多在沙漠之中。据古代中外旅行家的记载和近代考古学家的考证，现今若羌县境内的米兰古城，在西汉时属鄯善古国管辖，若羌县即古若羌王国的所在地。

且末县是古且末国的所在地。从且末往西，有河名安迪尔，其下游，就是吐火罗故地，再往西，就是这两年的新闻焦点——古代精绝国。位于洛浦县西北沙漠中的阿克苏皮勒古城，一般认为是古代于阗国的一座城池。

和田，这片丝路南道上的绿洲，古代称作于阗，后称和阗。远在西汉初，张骞首通西域时就已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后来佛教传入，又是一个著名的佛国。唐代大画家尉迟乙僧父子的故乡就在这里。这个丝路古国以产玉而驰名中外。现在城南有古城名米力克阿瓦提，一般认为是于阗国的城池之一。城西南的约特干古城遗址，可能是丝道上著名的于阗西城。

古丝道的南、北道都要“西逾葱岭”，即西跨帕米尔高原。所以，在现今的叶城西部、莎车西部、疏附西部和阿克陶、乌恰、塔什库尔干等县的境内，都还存留着许多足以反映丝路畅通时期盛况，而且具有高原特色的古堡、古驿站。其中，塔什库尔干境内的“石头城”即为汉时的蒲犁国城和唐时的羯盘陀国城。关于羯盘陀国，还有一个神奇的“汉日天种”的传说。据说古代有一位中国公主远嫁波斯，送亲队伍行至此地时，突然发现公主怀孕了，百般盘问之下，公主的婢女才承认，每晚都有一位王子从太阳中走下来与公主相会。送亲使臣们既不敢前进，回去又怕杀头。于是，就在此地立公主为女王，建立了羯盘陀国。

从哈密到吉木萨尔、伊犁这一线，是古代游牧民族驰骋的舞台，也是古丝路新北道穿行的地区。现在遗留下来的古迹，最著名的有吉木萨



铜灯盏 / 唐代

尔的“北庭”遗址，霍尔果斯城境内的“阿里麻里”古城。

丝绸之路的辉煌已成为昨天，它留给后人恐怕不只是供我们凭吊追念的城垣、驿站，它更留下一种精神，一种感召人类相互交流、永不封闭的精神。

## ● 丝路苦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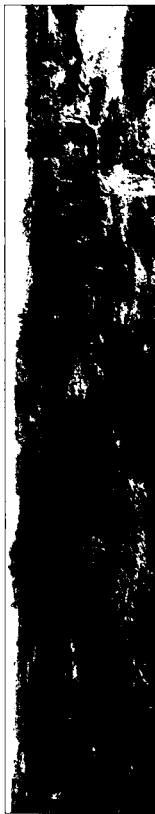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以浪漫的笔触，大胆而奇特的想象，记述了唐僧师徒4人历尽千辛万苦，上西天求真经的故事。小说中唐僧的原型就是唐朝著名僧人——玄奘，真实的玄奘全然不像小说中那样懦弱胆小，因为他完全是凭借个人的力量，而没有什么神通高徒，沿着丝绸之路，到天竺取到真经。这位伟大的旅行者又为丝路古道平添了几分光辉。

《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吃唐僧肉，因为他是有道高僧；这也成为使整个故事始终充满一波三折的情节的主要线索。真实的唐僧玄奘也的确精通佛法，知识广博。玄奘本姓陈，因家境贫寒，年纪很小时便落发为僧，这使他深受佛教文化熏陶。玄奘聪慧刻苦，求知欲很强，他年轻时曾先后拜学于国内知名的景法师、严法师等13位大德高僧，潜心钻研佛教经典，并对佛教的唯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唯识学源出于印度大乘教内瑜伽宗。与小乘教相反，唯识学认为人生在世均可成佛，这点对于广大佛教信徒具有很大吸引力，但唯识学最主要的经典《瑜伽师地论》当时国内还没有。所以玄奘就“誓游西方，所问所感，并取《瑜伽师地论》以释从疑”。

西行取经是一桩极为艰难的事，因为不仅路途险恶，当时唐朝也禁止西行。但玄奘义无反顾，他的舍命求法的精神感动了戍边将士，他们竟曲法徇情，让玄奘顺利过关。

玄奘曾收了一个名叫石磐陀的人当徒弟，一起西行。可是石磐陀才过了玉门关就不敢向前，私自跑回家去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曾几去几回，而石磐陀则压根再也没回来。玄奘只好一个人带着一匹瘦马



走入茫茫大漠。对于他经过的那条八百里沙河，玄奘描写道：“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遇到危险时，他总是呼唤保佑旅行者的观音菩萨，并且默念他曾经从他照顾过的一位病人那里得到的《般若波罗蜜心经》。他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沙漠是否真有“恶鬼”不得而知，但玄奘的确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奋力前行。在沙漠中，玄奘不慎打翻水袋，那宝贵的水马上渗入沙中，化为轻烟。“千里之资，一朝斯罄”。懊丧的玄奘曾想过东返，但他转念又想：“我先发愿，若不到天竺不东归一步，今何故来？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于是拨转马头，口念观音，继续西行。就这样，在燥热难耐的沙漠中，玄奘走了五天四夜，其间人马皆无滴水沾喉。到了第五天，玄奘终因缺水过多而同那匹饱经风霜的老马双双跌倒在沙漠之中，到第五天半夜，在习习凉风的吹拂下，玄奘居然又醒转过来，那匹老马凭着本能居然将玄奘带到了一片绿色草地，草地旁有一池塘，玄奘终于得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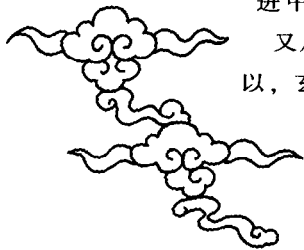
两天后，玄奘到达伊吾（今哈密），对玄奘西行早有所闻的高昌王鞠文泰也已派人在此等候，欲邀他至高昌王城布道。盛情难却，玄奘便跟随使者前往高昌。此处的高昌王就是前面讲过的那个螳臂挡车，与唐朝作对的高昌王。鞠文泰虽然在政治上很投机反动，却



说法图(吐鲁番伯孜克里克)

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玄奘在高昌讲经三月有余，麴文泰看到玄奘学识渊博、谈吐文雅，执意请求玄奘留在高昌担任国师，玄奘婉言谢绝坚持西行取经，并且以绝食相抗。玄奘坚定的信念和决心打动了麴文泰，他应允放玄奘西行，于是二人和好如初，并结为兄弟。麴文泰向玄奘赠送了大量物资，又给前方沿途各国写信，请他们沿途提供方便。

离别高昌后，玄奘爬冰山、过草原、穿越戈壁沙漠，历尽磨难，最后进入佛国天竺（印度）。到达天竺后，玄奘如鱼得水，四处拜师觅经，吮吸着佛学理论的精义奥妙，足迹遍谒于整个印度全境。他先由北天竺进中天竺，而后转入东天竺境，由此行抵南天竺，又从南天竺进西天竺，终由西天竺复归中天竺。所以，玄奘是第一位周游当时五天竺全境的中国旅行家。



玄奘在天竺居住数年，对佛经义烂熟于胸，还成为天竺最高佛寺烂陀寺的主讲。公元641年，玄奘在曲女城的佛教教义辩论大会上，技压群雄，他主讲的《制恶见论》18天内无人敢于反驳。这次大会使玄奘在印度佛学界树立了崇高的威望。大乘教誉他为摩诃耶那提婆（大乘天），小乘教赠他为本又提婆（解脱天）。

当玄奘觉得自己已掌握了瑜伽宗的玄妙精髓之后，就决定东还故国。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五天竺许多国家首领执意挽留，鸠摩罗国王更是许诺，如果玄奘答应留下来，他愿以建造100座佛寺相谢。但玄奘对这些盛情邀请都婉言谢绝，表示坚决不改初衷。

于是玄奘从中天竺启程，经北天竺，进入睹华逻国境，又过达摩悉铁帝国（今阿富汗）境内瓦汉南部。东行700里逾越波迷罗（即帕米尔高原），据研究，玄奘是最早下这一名称的旅行家。今天的帕米尔便是由波迷罗衍化而来的。穿过帕米尔，来到了前文提到过的“汉日天种”的赧盘陀国，之后又到了乌铄国（今英吉沙）、佉沙国（今喀什）。过了斫句迦国（今叶城县）之后，按玄奘计划，是循原道东归，即仍经由高昌东行回国，那条路比较好走，而且玄奘和麴文泰还立有再会之约。但此时高昌国已成为唐朝的西州，麴文泰也已死去，玄奘认为没有必要再走高





说法图

昌，就折向南边，缘“丝绸之路”南道，经于阗东行。这样玄奘取经往返之途就几乎涵盖了丝绸之路的全部。

公元645年初，历经艰险的玄奘终于回到他阔别19年的故乡长安，他将从天竺带回的佛经、异物珍奇在长安繁闹的朱雀街南端进行了展出，其中佛经520夹，657部，许多是当时国内之孤本。争相观摩的人群排列了十几里路，形成了万人空巷的盛况。之后玄奘将这些佛经收藏于城中的慈恩寺中，今天慈恩寺大雁塔仍屹立于西安

市中，成为中外游客凭吊瞻仰的名胜之一。

玄奘归唐后，马上疾笔撰书，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千古奇书——《大唐西域记》，他本人在将书敬献给唐太宗时毫不谦虚地简介说：“班超定而未远，张骞望而非博。至于玄奘所记，微为详尽，其迂辞玮说，多从翦弃，缀为《大唐西域记》一十二卷，缮写别如。”中华民族是个酷爱历史、地理并专注于著书立说的伟大民族。玄奘西行以前，由于丝绸之路的发展，我国关于西域诸地，特别是古代印度的地理、历史的著述已有多部。如法显的《佛国记》、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传》、智猛的《游行外国传》等。但是，就像我国当代著名的印度学研究专家，北大的季羨林教授指出的：“所有这些书同《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比，还是从质的方面比，

都如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像《大唐西域记》内容这样丰富、记载的国家这样多，记载的又这样翔实，在玄奘以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

《大唐西域记》对公元7世纪五天竺境内100多个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及民俗风情的描述是了解古代印度历史的罕世之作。至今，世界各国研究古代印度史的人们还得惠于这本书。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无论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大唐西域记》中对西域诸地，主要是今天新疆境内的这一段（焉耆、库车、高昌、阿克苏、喀什噶尔、于阗、塔什库尔干、英吉沙、叶城、且末、楼兰故地）的记载，语言洗炼，叙述详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书中对这些地方的名称及衍变、地理方位、都城分布、民族宗教、语言、文字以及社会经济情况的记述都是我们今天认识和了解古代新疆历史的珍贵材料。

玄奘回到长安后，还组织了“译场”，大量翻译梵文佛教经典，自创既忠实于原文又通俗易懂的“新译”风格，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的一代宗师。

玄奘为经求学，“无顾身命”，“冒越宪章，私往天竺，践流沙之浩浩，陟雪岭之巍巍，铁门巉险之途，热海波涛之路”，19年经行5万余里路，历130多个国家，“闻所未闻，得所未得”。他是行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最伟大的探险家和旅行家。

玄奘之后的西游者仍不乏其人，他们或僧或俗，或生自中原，或来自海外，每位旅行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了这条古道的兴衰和沿途各地的风情。时至今日，仍有络绎不绝的考察者、探险者试图唤醒这条古道上沉睡



玄奘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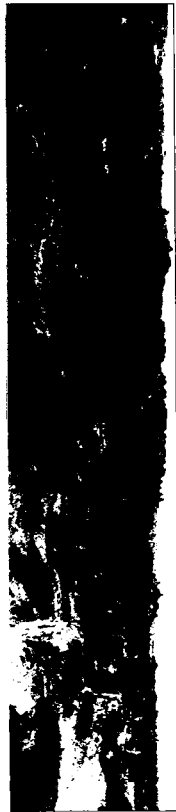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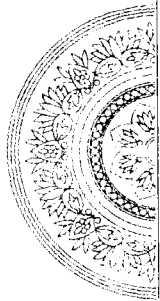
的遗迹。虽然在这其中，投机者有之，打着寻找什么辉煌的旗号欺世盗名者有之；但是，更有一些循着唐三藏的精神，兢兢业业，不畏艰险，为丰富祖国和全人类的文化而工作的人们，我们相信，古老的丝绸之路会因他们而重新焕发年轻的光彩。

## ● 万方乐奏有于阗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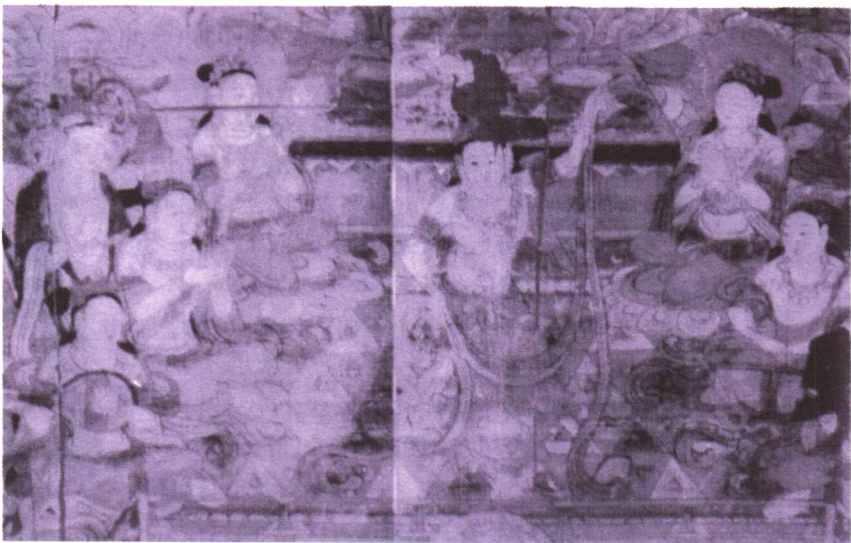
这是当年毛泽东主席写的一首《浣溪纱》，词中的“万方乐奏有于阗”不是单指古代于阗讲的，也不是今天的和田，而是泛指新疆。天下皆知新疆是“歌舞之乡”，因此，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古代，新疆的音乐舞蹈艺术也是十分发达的，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音乐事业给予了深刻的影响。

自从汉武帝时代张骞凿空闯出一条“丝绸之路”，打开东西方陆路交通的大门之后，我国与西亚、中亚、欧洲和非洲的物质文化交流日益繁盛，作为“丝绸之路”要冲的新疆地区与内地的交往也自然更加密切了。单从音乐上来说，汉代以前，是曾经让孔夫子“三月不识肉味”的周乐占主导地位，虽然也受到一些外来的影响，但还是基本上保持了汉族的传统体系。可是从汉代开始，特别是到了隋唐时代，可以借鉴和吸收的外来营养越来越多了。



隋朝破格地大量吸收外来的音乐成份，建立了新的音乐体系“九部乐”。这九部乐中就有两部是新疆地区的，即龟兹乐和疏勒乐。唐承隋制，唐太宗又增设了高昌乐，合称“十部乐”。这样一来，唐朝的“十部乐”里就有三部是新疆地区的了。

特别是龟兹乐，它的乐律对隋唐的音乐理论有很大影响。据说隋朝刚建立时，隋文帝为了避免“礼乐不兴，国家将亡”的危险，就命令几个大臣负责整理国家乐队，创作歌颂皇恩帝德的新乐曲。当时的社会风尚，很崇拜周乐，于是隋文帝就叫大臣找来一个懂得周乐的乐工，改换声律，创造新音乐。结果改了个乱七八糟，根本没法用。不久，又一个叫郑译的大臣，奏请隋文帝让几个主管礼乐的大臣共同研究新乐曲。可是这几个大臣各持己见，搞了好几年，还是没有结果。隋文帝因之大发雷霆，他怒斥大臣们说：“我做皇帝已经六七年了，难道还能让乐队老唱那些歌颂旧王朝的歌曲吗？”这时一个大臣出来奏道：“从前周武王伐纣灭了殷朝，直到周公保成王的时候，才把礼乐制成，由此可见要办好这件事求快是不行的。”隋文帝听完，态度缓和下来，他又下诏招聘天下深知音乐的人才。大臣郑译借着这个机会又向隋文帝说：“我翻了许



伎乐图



多从前的音乐书籍，那里都有七声的说法，可是这七声中有一声，现在人们分辨不清。后来我遇到一个跟随突厥皇后到我们这里来的名叫苏祇婆的龟兹人，他弹琵琶很高明，我听他弹奏七声俱全，详细一问，原来他的父亲是西域的乐师，他们世代相传的都是用的七个音调，这七个音调与我们古书中记载的七声相比较，恰好完全符合。我又经过一番苦心钻研，就写出一部有关音乐理论的书籍。所以我主张我们应该用七声来写新乐曲，制造新乐器。”隋文帝听了很赞赏，大臣们也都认为郑译的七声学说比起当时流行的五声更完满，所以大家都同意参照龟兹音乐来整理汉族音乐。后来，正是依靠这个理论体系，演变出了隋唐燕乐二十八调。隋唐音乐理论家兼演奏家万常宝主要就是依据龟兹乐理重新阐述了我国古代音乐旋宫理论，又以他自己创造的“水尺”为律尺，制定了八十四调，并且还按照新的音乐律制改造了不少乐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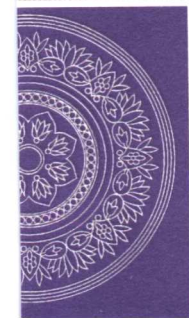
龟兹乐器的种类很多。据《隋书》和《旧唐书》记载，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笙、横笛、埙、篪、箫、毛茛鼓、都县鼓、答腊鼓、腰鼓、鸡娄鼓、铜钹、贝、弹箏、侯提鼓、齐鼓、檐鼓等19种之多。唐高宗曾把著名的龟兹艺人白明达接到宫中去演奏龟兹乐器，他的技艺很高，特别是他作的舞曲《春莺啭》最为有名。

唐代《教坊记》里记载说：“高宗晓声律，闻风叶鸟声，皆蹈以应节。尝晨坐闻莺声，命乐工白明达写之为春莺啭，后亦为舞曲。”这在唐诗中也颇多记载，如元稹的《法曲》里的“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张祜《春莺啭》里的“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唐高宗固然风雅，草长莺飞皆为音乐，但若没有白明达这样高明的乐师，世人又哪能感受到音乐和自然的相通呢？

元稹诗里提到的《火凤》也是一个舞曲，作者名叫裴神符，是疏勒人。贞观年间在长安当过太常乐工，后来被聘为宫廷乐师，他会弹奏多种乐器，尤其以擅长弹琵琶而闻名。他是最早废除拨子而改用指弹的人，从而革新了琵琶的演奏技艺。此外，还有一位叫李暮，也是唐代人，他以吹一口好笛而闻名。有一次他吹《凉州曲》，刚一吹



竖箜篌



完，有个叫独孤生的听众问他：“喂，你吹的笛子真好听啊！声调中杂龟兹韵味，你一定有龟兹朋友吧？”李暮点点头说：“嗯，你辨音能力很强啊！我的师傅就是龟兹人。”

每当人们追思大唐的兴盛和歌舞升平时，都应该记得：在那些悦耳的丝竹声中，是西域的龟兹乐、疏勒乐和高昌乐，又给大唐增添了几分瑰丽、几分旖旎。

### ● 南山截竹为箚篥



“南山截竹为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这是唐代诗人李欣的《听安万善吹箚篥》一诗中的开头两句。在这首诗里，诗人把箚篥的声音描绘得十分悲壮、新丽、变幻多姿。一会儿是虎啸龙吟，一会儿是暗云悠悠；一会儿如闻杨柳春，一会儿繁花照眼新。作者对这个乐器及其演奏者赞不绝口，品味无穷。

这两句诗不仅点出了箚篥是从龟兹传来的，而且说明汉族人已能够制造了。箚篥，也叫做箚篥、悲篥、笳管，简称管。制作方法是“以竹为管（最早以骨为管），以芦为首，有九孔”，近似唢呐。

关于箚篥是如何从西域传至内地的，还有一段非常浪漫的故事。公元1世纪中叶，西域的龟兹国王名叫绛宾。绛宾酷爱音乐，提倡歌舞。他是一位很有志向的君主，主张以礼乐治国，为了把国家治理的更好，他深感龟兹的制度很不完善，龟兹的乐器也不够丰富。正在此时，乌孙国的一位妙龄女子去京都长安学琴路过龟兹。这位女子是乌孙国的公主，名叫弟史。弟史就是乌孙王的右夫人、著名的汉朝公主解忧的长女。龟兹王绛宾早就听人说过，乌孙国有一位公主长得非常美丽，她弹的一手琵琶和她的容貌一样动人。绛宾对弟史倾慕已久，只是苦于无缘相会。这次天赐良机，他当然不会错过。于是，为了欢迎弟史的到来，他特意在王宫中安排了盛况空前的音乐会。音乐会上，在龟兹国著名乐师演奏过之后，绛宾亲自上阵演奏龟兹特有的乐器——箚篥，显示了卓越的音乐才能。然后，他又彬彬有礼地邀请弟史也弹奏一曲琵琶。弟史弹起琵琶来，动作轻盈、旋律悠扬、音韵和谐、仪态万方。绛宾听得如

醉如痴，等到曲罢歌终，听众喝彩，他才如梦方醒，此时的绛宾对弟史就更加倾心。其实，当绛宾演奏时，他那不俗的仪表和横溢的才华也令弟史十分动心。

绛宾将弟史挽留了好几天，最后弟史必须要启程了，绛宾亲自前去送行。临行前，弟史从怀中取出一封信交给绛宾，绛宾拆信看罢喜形于色，急忙问：“你为什么不早把它交给我？”弟史一愣，不解地说：“冯夫人嘱咐我，要我在离开龟兹时才能交给你。”绛宾又问：“你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吗？”弟史摇头。绛宾就把信给她看，弟史看完信脸上涨得通红。原来这封信就是冯嫫写给绛宾谈论他与弟史的婚事的。绛宾早就曾托冯嫫做媒，现在乌孙王和解忧公主都已同意，汉朝也赞同这门婚事，冯嫫特地写信告诉绛宾。

绛宾、弟史二人完婚之后，一同前往长安。他们俩将促成二人婚姻，象征彼此爱情的乐器箜篌、琵琶带入长安，献给了皇帝。他们受到汉廷的热情款待，在长安住了一年多，学到了很多东西之后才返回西域。绛宾回国后，很快就把汉朝的礼仪制度推广至龟兹全境。从此以后，他和弟史还每隔几年就去一趟长安，对西域和中原的文化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到了唐代，箜篌在内地更广泛地流行，白居易在《小童薛阳陶吹箜篌歌》中说：“剪削乾芦插寒竹，九孔漏声五音足。近年吹者谁得名，关雎老死李滚生。滚生又老谁其嗣？薛氏乐童年十二。”这几句诗不仅说出了三代人里都有会吹的，还着重描写了12岁孩子的高超技艺：之下师授专，含嚼之间天与气。润州城月明，吟霜思月欲发生；山头江底何悄悄，不啻鱼龙听。翕然声作疑管裂，泚然刀截；有时婉软无筋骨，有时顿挫生移节。急志员转促不断，辘辘辘似珠贯。缓声展引长有条，有条直直如笔描。下声乍坠石沉重，高声呼举云飘萧。”通过诗人的记载，足可以说明，在唐代会吹箜篌的人并非少数。不仅男人吹得好，女人也有吹得好的。对此白居易在《霓裳羽衣舞歌》里也有记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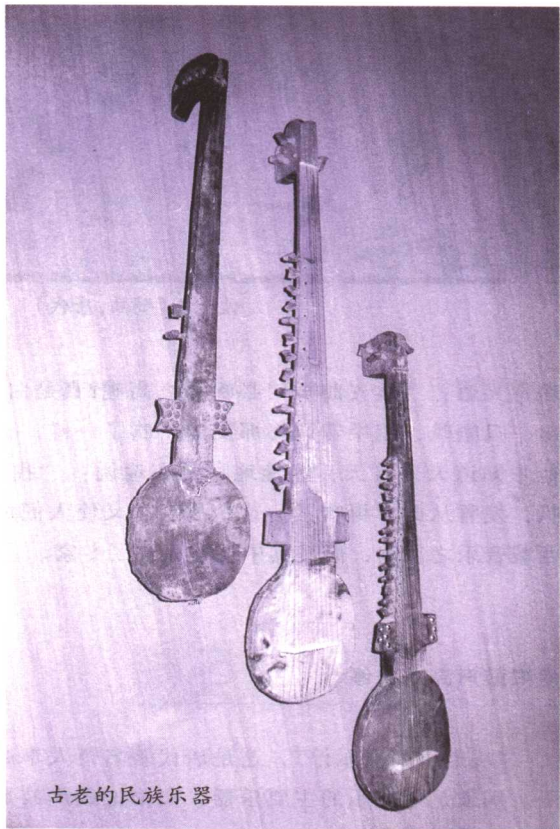


“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箜篌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

唐代，西域由箜篌还发展出了另一种著名的吹奏乐器——喇叭。同样，当时也有一些极擅长吹喇叭的人。这里有一则小故事可作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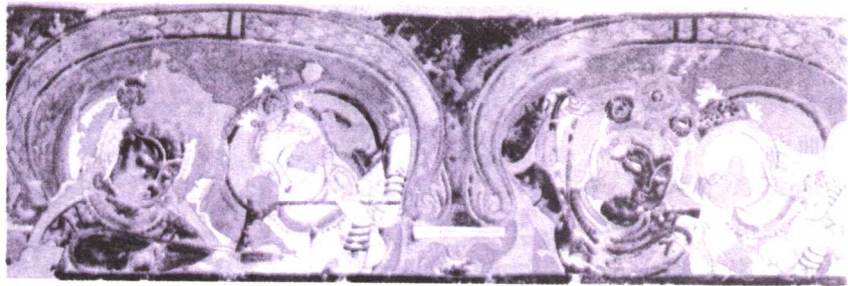
唐德宗时，有一位将军叫尉迟青，很会吹喇叭。当时河北有个人叫王麻奴，他因为常和西域人来往，学会了吹喇叭，在河北一带很有名，他自己就因此骄傲起来，认为除了西域乐师，中原是没有能超过他的。

将军元帅以下的官吏都没资格请他去演奏。有一次当地一个姓卢的小官要调到京城长安去，临走前亲朋相聚，就去请王麻奴来吹一支曲子，王麻奴坚决不答应。姓卢的小官一见王麻奴那种自高自大的样子，就生气地说：“你这点水平根本没什么，长安尉迟青将军的演奏，才真是千古绝唱呢。”王麻奴听了很不服气，就马上来到了长安，打听到尉迟青的住处，就在附近租房住下，一天到晚用心吹奏；可一连好几天，尉迟青从他门口路过就好像没听见一样。这下王麻奴急了，他直接跑到尉迟青府上。两个人行过了见面礼，王麻奴就坐下来开始演奏，他为了表现出自己的全部才能，就用高音调吹了一曲，吹完之后汗流浃背。尉



古老的民族乐器





伎乐图(壁画,唐代)

迟青笑道：“这支曲子何必吹那么高呢？真是白白浪费力气。”说罢也取出一只喇叭，用中音调将那支曲子吹了一遍。王麻奴听得出神，听完后他才知道天外有天，惭愧地拜倒在地说：“我太少见了。”然后摔碎喇叭，发誓从此不再吹了。这个故事，又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到唐朝人学习西域音乐之普遍，而且其中还有人成了专家。

## ●羯鼓声高众乐停

“羯鼓声高众乐停”，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龙池》一诗中的句子。羯鼓是龟兹乐的主要乐器，史书记载羯鼓是从西域传入，它很可能就是由著名的西域音乐家苏祇婆带来的。这种乐器到唐代盛极一时。它是用山桑木制作，形状很像漆桶，演奏时放在小牙床上，两手持杖敲击，所以又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两杖鼓”。

唐玄宗李隆基非常偏爱羯鼓，据说他练习羯鼓光鼓槌就打坏了几箱子。唐玄宗曾说：“羯鼓，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方也。”

唐玄宗时，著名的宫廷乐师李龟年就是以善于打羯鼓和吹筚篥而名动天下。天宝之乱以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大诗人杜甫碰见他，还特意写一首诗《江南逢李龟年》

“歧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唐玄宗喜爱羯鼓，使得演奏羯鼓蔚然成风，段成式在《酉阳杂俎》里记载：“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常夏中挥汗挽鼓，所读书用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醉乐耳。”不仅宁王爱打羯鼓，宁王的儿子汝南王，又名花奴，也极擅打羯鼓。

### ●紫罗衫动拓枝来



“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兢纷泊。”元稹的诗句描述了唐代时西域文化在中原的广泛流行。西域乐舞是唐代举国崇尚的乐舞艺术，它不仅包括“洪心骇耳”的音乐，更有“浓丽多姿”的舞蹈。

艺术来源于生活，龟兹舞蹈中的“乞寒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每年初冬季节，人们都希望天气寒冷多降雪水，来年水源就会更足，这时候他们就举行“苏幕遮”大会，跳大型舞蹈。这种舞蹈先是由会乐舞的人做表演，舞蹈者头戴各种面具，装成鬼神、飞禽、走兽和武士等。舞蹈进行到高潮时用皮囊盛水向四周观众泼洒，最后用绢索勾套行人；群众情绪沸腾，难以抑制。这种群众性舞蹈反映了人们祈望丰收和富裕的愿望。

还有一些西域舞蹈是纯观赏性的，如胡腾舞、拓枝舞、胡旋舞等。

胡腾舞是一种来自西域的男子独舞，唐代诗人李端的《胡腾儿》和刘言史的《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两首诗，都对胡腾舞的艺术风貌作了真实写照和概括描述。胡腾舞节奏很快，伴奏的音乐自始至终都以欢乐跳跃的旋律为基调。它一开始就进入热烈的狂欢的气氛。“手中抛下葡萄盏”，舞者将杯中酒一饮而尽，甩手把酒杯一抛，纵身跳跃起舞，情绪极为激昂。西域人历来喜纵酒，古代西域许多国家都盛产葡萄酒，胡腾舞用酒来渲染和烘托那一味纵乐的痴情，是极为重要的点睛之笔。“醉却东倾又西倒”，舞蹈所突出表现的动态颇有醉意。它不仅显得诙谐生动，而且使人感触到舞蹈的情感如同酒一般



浓烈，观之令人陶然欲醉。胡腾舞之所以又叫“醉胡舞”，就是因此而得名。

“横笛琵琶遍头促”，舞蹈进入了高潮，音乐的节奏愈加急促，舞蹈的步伐快急，出现了“乱腾新毯雪朱毛”的情景。正当狂欢情绪的热度达到极点时，舞蹈戛然而止，“丝桐忽奏一曲终”，弹指之后，所有的伴奏乐器又一起轰鸣，胡腾舞的表演便在一个雄浑的长音中结束。

李端和刘言史对胡腾舞的动态作了生动描写。诗中“弄脚缤纷锦靴软”，“双靴柔弱满灯前”的句子，就是对变化纷繁的各种步伐的写照。西域舞蹈惯用碎步、移步、蹉步、踏步、跺步以及各种跳跃步，种类繁多，变化复杂。胡腾舞的动作技巧性也极高，“蹲舞樽前急如鸟”，用飞鸟的形象来比拟曲膝下蹲，步伐急速变换的动作。至今，新疆塔塔尔民间舞蹈，维吾尔民间舞蹈的“纳孜库姆”，还存留着类似的舞蹈动作。“跳身转毂宝带鸣”，即是说舞者纵身跳起，出现了如车轮般旋转似的动作。“反手叉腰如却月”，是说舞者将整个身体弯曲成一个圆弧。体态柔和的造型，于雄健之中又表现出柔美，对比强烈，相映生辉，刚中有柔，刚柔相济，故此唐诗中才有“胡腾醉舞筋骨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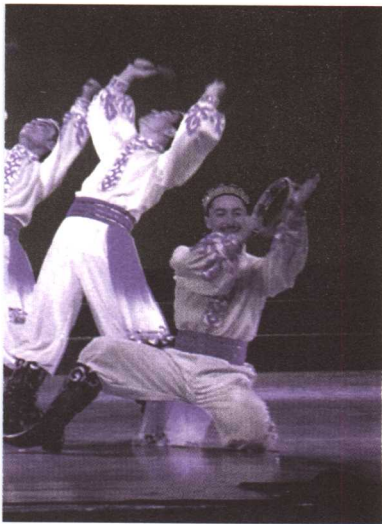


之说。

如果说胡腾舞以激烈奔放见长，那么拓枝舞则纤柔、轻巧，另有一番风味。白居易的名句“红蜡烛移桃叶起，紫罗衫动拓枝来”就是描写拓枝舞的优美动作的。拓枝舞起源于石国，就是前面提过的高仙芝讨伐的那个石国。在高仙芝做出愚蠢行动之前，石国的几代君主和人民一直是心向唐朝的，他们创造的拓枝舞也传入内地。拓枝舞节奏明快、舞姿美妙、变化多端。开始是单人舞，后来又发展成双人舞，到了宋代又进一步发展为多人的队舞。关于舞蹈的衣着装束和舞态动作，唐诗为我们留下了很好的记述，像白居易的《拓枝词》：“绣帽珠稠缀，香衫袖窄裁。”刘禹锡的《和乐天拓枝》里的：“鼓吹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沈亚之的《拓枝舞赋》中的：“差重锦之华衣，俟歌络而薄袒。”等等，都写得绘声绘色，令人心驰神往。

至于胡旋舞，那又是另一种特色了。白居易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飏转篷舞。”胡旋舞发源于康居，唐朝永徽年间，曾在此地设立过都督府。胡旋舞因其主要动作是急促地旋转而得名。据唐人记载：“舞有骨鹿舞、胡旋舞，俱于一小圆球上舞；纵横腾踏，两足终不离于球之上，其妙如此也。”

西域的舞蹈，或迅急敏捷、举止轻飒，或腾踏跳跃、情不自己，体现了古代人民独具一格的艺术特色、雄豪奔放的民族性格，以及风趣和谐的民族情调。那欢悦激烈的跳荡，如痴如醉的跃舞，恰正体现了当时大唐繁荣蒸腾的隆盛之貌和各民族相知相敬的欢愉之情。



大漠烟尘

灿烂文化。

展融合，与中原地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创造和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地一样，风云变化，时统时分。在这些动荡的年代里，西域各个民族不断发从五代到宋朝经元朝至明朝，中原政权几度易手，而此时的西域也同祖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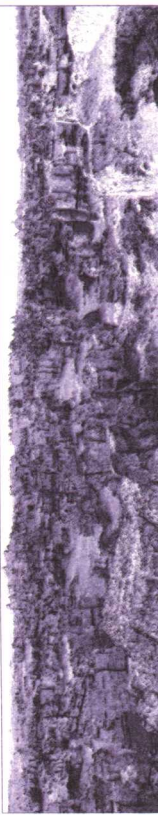
## ● 过客の困惑

公元1271年，一队金发碧眼的意大利人，从威尼斯启程，经陆路向远东进发，他们此行是奉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世之命出使中国。这一行人中，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日后，由他口述而产生的那本记述此次欧亚大陆冒险和旅行的游记《东方见闻录》，使古老的中国几乎完全展现在古代欧洲人的眼前。他，就是马可·波罗（1254—1324年）。《东方见闻录》，也就是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这本在中外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也使马可·波罗名列西方中世纪最有名的四大旅行家之首。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马可·波罗详细记载了他的东行路线。逾帕米尔高原后，马可·波罗一行行抵可失合儿（今喀什噶尔），有感于可失合儿地区繁荣的商业，他赞叹道：“居民为工匠商贾，……有不少商人由此出发，经行世界贸易商货！”过可失合儿，经鸭儿看（今莎车）南行，再经和阗城东行，行抵培因城（今地不详）。马可·波罗记载道：“境内城镇和塞堡不计其数，……有一条河流横贯全省，河床中蕴藏着丰富的玉矿。”这又让这个意大利小伙子惊叹不已。可是，由培因城继续东行的马可·波罗来到车尔成城（今且末）时，却摇头不已，遗憾地说：“古代这里本来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然而，由于鞑靼人的破坏，现在已经变得满目荒凉



马可·波罗像



了。”为什么马可·波罗会在途经西域时发出如此之多的惊叹?自唐末至马可·波罗来华前后,这几百年的悠悠岁月中,西域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答案……

## ● 三国对峙

公元840年,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主力从蒙古高原西迁进入西域。至北宋时,西域已存在西州回鹘王国、于阗王国、喀喇汗王朝三个并立的地方政权,他们之间因为宗教、土地等因素不断进行着争斗。

西州原名高昌(今吐鲁番高昌故城),传说其因“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今天,许多中外游人都曾漫步于高昌故城的遗址,他们因城池的雄奇而每每流连忘返,但是他们又哪里知道这许多年来古城所经历的风雨和离乱……

840年,鄂尔浑回鹘汗国因天灾、人祸和黠戛斯入侵而灭亡,15部回鹘部众西迁进入北庭(今吉木萨尔县),驻扎在天山以北,唐朝派册封使王端章前往册封,因在中途受阻,未能实现。866年春,回鹘首领仆固俊率部击败吐蕃,斩其首领尚恐热,将首级送往京都长安,进而占有北



庭、西州、轮台直至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建立了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

西州回鹘王国的国都设在高昌城，第二首府设在北庭。其疆域东起哈密，西抵阿克苏北的冰达坂。其最高统治者称可汗，也称阿斯兰，突厥语意为狮子王。

西州回鹘王国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907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朝，当年，西州回鹘王国即派使臣朝贡，以后多次向辽朝进贡，据史料记载，西州回鹘前后向辽进贡达24次之多。

951年，西州回鹘王国也曾向后周进贡大批珍贵土产，《旧五代史·后周太祖本纪》记载：“广顺元年（951年）二月辛丑，西州回鹘遣使贡方物。”

宋朝建立之后，西州回鹘与宋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宋史·高昌传》载：“建隆三年（962年）四月，西州回鹘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来贡。”“乾德三年（965年）十一月，西州回鹘遣僧法渊献佛牙、玻璃器、琥珀墓。”

西州回鹘王国不仅多次向北宋进贡，更有趣的是，他们把自己与宋朝的关系比拟为外甥与舅舅的关系，西州回鹘王国国王对宋朝自称为“西州外甥狮子王”。宋朝也曾于981年派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人出使高昌王国，这次西行，王延德写了《高昌行记》一书，记述得非常详细。

这段时期鼎立于西域的三国中，西州回鹘王国和于阗王国的势力都相对较弱一些。但要说起于阗王国，其国祚之长，令人惊讶，这个由尉迟氏建立的王国，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到北宋前期仍有极强的辐射力，与中原王朝联系不断，朝贡不绝。其王朝至少跨越了13个世纪，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如此惊人的生命力与延续性，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整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相当罕见的！

历史悠久的于阗王国，10世纪早期的国王是李圣天，本族语叫尉迟娑缚婆。他统治时的于阗王国的疆域：东起罗布泊，南邻吐蕃，西南至葱岭，西北到疏勒，是极负盛名的佛国。



# 新疆两千年

于阗王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也极密切，于阗国王李圣天称自己为唐的宗属，他“衣冠如中国，其殿东向”，穿汉式服装，戴汉式皇冠，住汉式宫殿，连他的年号“同庆(912~940年)”也同中原王朝一样。938年，于阗王国派遣使臣到后晋进贡，晋高祖即册立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北宋建立的第二年(961年)，李圣天就遣使向宋朝进献圭、玉、玉枕、琉璃瓶、胡锦涛等贡品，此后岁贡不断。同时，于阗使者也曾到辽朝进贡。11世纪初，于阗王国发生巨变，但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于阗王国对宋朝仍然一如既往，同样有趣的是于阗国王也同宋朝皇帝以甥、舅相称。1063年，宋朝册封于阗王为“归忠保顺金翅鸟黑韩王”，1081年，于阗王在写给宋神宗赵顼的信中自称是“于阗国缕缕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称赵顼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由此，于阗王国与宋朝的关系可见一斑。

魏、蜀、吴三国演绎出的故事可谓流传久远，人人皆知。而西域新三国的故事里却显然缺少了那许多诸如“桃园结义”、“单骑救主”的精彩片断。可是，这其中也有一个不能不让人记住的国家，它颇具魏国当年的风范，曾掀起了西域大地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灭法“圣战”，也因此写下了新疆历史上不可或缺的浓重一笔。它就是——喀喇汗王朝。

喀喇汗王朝是西迁回鹘的一支到达中亚葛逻禄驻牧地区后，联合葛逻禄、样磨等族，于9世纪中叶所建立的政权。喀喇汗王朝是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王朝。据传说，喀喇汗王朝的汗萨图克·布格拉汗·阿布德·阿勒·克里木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第一人，他死于回历344年(955—956年)。萨图克·布格拉汗的儿子木萨极具扩张野心，继位后他不仅进一步推行伊斯兰教，而且发动了旨在征服佛教中心于阗的“圣战”。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持久战，木萨及其后继者花了24年的时间，终于在11世纪初使于阗王国臣服，但在北方，喀喇汗王朝的扩张遭到了西州回鹘阿萨兰王的坚决抵抗，致使其势力长期(直到13~14世纪)未能超过库车一线。

无论三国如何争斗，他们的首领都认为自己与中国皇帝是甥舅关系，喀喇汗王朝的首领们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自称“桃花石汗”，其意义就是“中国的汗”，他们称喀喇汗王朝的地方为“下秦”，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切都表明，西域三国不过是三个地方割据政权而已，他们之间

苏勒堂麻扎（喀喇汗王朝的汗萨图克·布格拉汗·阿  
布德·阿勒·克里木的陵墓）



的种种恩怨，也只是中国这个大家庭大背景下几朵跳跃的火花。而在他们之后，西域这块神秘的土地也依然在平静地诉说着那些令人兴奋的神秘。

## ● 西辽传奇

西辽（1132—1218年），是一个仅仅在西域存在了86年的王朝，但在她短暂的生命中，曾吞并了河中地区的各个割据政权，统一了中亚，成为整个中亚最强大的国家。确切地说，西辽仅有的一点辉煌，全都集中在它建国初期的十几年中，也就是其开国皇帝耶律大石在位的时期；更确切地说，所谓西辽的传奇，就浓缩于耶律大石个人传奇的一生之中。

和少数民族的杰出人物耶律楚材一样，耶律大石也是契丹人，字重德，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第八代孙。耶律大石曾考中进士，提拔为翰林，人称大石林牙（翰林），同时他还通骑射征战，史称其“通辽、汉字，善骑射”，是个文武双全的人物，也正是他这一身过人的技艺和胆



— 〇 —





识，使他成为乱世的枭雄。

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当时国号契丹），至辽天祚帝时，辽朝已入残年。这时候，黑龙江和松花江一带的女真族日渐强盛，1122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就是金的开国皇帝，统率其部众不断南下攻辽，1124年，女真人终于攻下了辽朝的南京（燕京），天祚帝遂即逃往夹山避难，而辽的宗室耶律大石则仍顽强抵抗，并与宰相李处温等人一起拥立留守燕京的耶律淳为帝，建号天锡，改元建福。但耶律大石等人的行动仍无济于事，12月金兵入居庸关，辽南京陷落。耶律大石领兵逃出重围，归见天祚帝，天祚帝得到耶律大石的部队后，企图立即去收复失地，但此举遭到耶律大石的反对，他认为复国时机尚未成熟。由于政见不一，而且耶律大石看到辽朝大势已去，于是他率200铁骑，于同年向西北方行进并自立为王。当年，耶律大石在可敦城召集边地7个州城及18部王开会，凭借其极富煽动力的讲话和无穷的个人魅力，

他得到各部的支持，获精兵万余人，紧接着他设置官吏，建立排甲，准备武器，重新组织起了一支极具攻击力的新的军事力量。但这支新军也没能使耶律大石复国成功，当时的金朝正处于势力上升之时，耶律大石复国未果，反而遭到金朝派兵追讨。于是，1130年，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耶律大石决定继续西行，他给西州回鹘可汗毕勒哥写信，要求借道去大食。这次西进是分兵两路，到喀什噶尔的军队被打败了，但是到八拉沙衮的军队却受到那里的统治者——喀喇汗王朝北部总督的欢迎，因为巴尔喀

耶律大石像



耶律楚材像

什湖一带游牧民族的起义正需要派军队去镇压。耶律大石审时度势，认为这是个利于自己立足于此的好机会，他遂即出兵平息了这些起义，而后便进驻八拉沙衮城，并与原来在喀喇汗王朝的契丹人结合在一起，继续向南、向西推进，占据了起儿漫等地。1132年，耶律大石就在河中地区的起儿漫称帝，号噶尔汗（意为 大汗），不久改为天祐皇帝，建元延庆。这就是史称的“西辽”，又称“喀喇契丹”。

1134年，耶律大石返回八拉沙衮，并在此建都，改名为虎思斡尔朵（契丹语：强有力 的宫帐），改延庆三年为康国元年。从此，西辽一直以虎思斡尔朵为国都，东部喀喇汗王朝则成为西辽的附庸。同年，耶律大石再次发兵东征，企图推翻金朝，恢复辽朝，但西辽军队在中途因“牛马多死”而折回，耶律大石的反金复辽的希望也最后破灭。在复国情结无法解开的情况下，耶律大石开始全力西征。1137年，西辽军与喀喇汗王朝交战，西辽军获胜，同年又攻打高昌，攻下别失八里，回鹘王不再称汗，改称“亦都护”，至此西州回鹘王国成为西辽的属国。1141年，西辽又帮助葛逻禄人反对塞尔柱汗国，并与西喀喇汗王朝和塞尔柱汗国联军决战于撒马尔罕，西辽再胜，西喀喇汗王朝归属西辽。以后西辽又向西北进攻花刺子模，花刺子模王阿提西兹投降，愿作西辽属国。这一连串的胜利，使耶律大石迅速完成了其西域霸业，这时西辽的疆域：北到巴尔喀什湖以北的巴哈台山；西达咸海，统有花刺子模；东到今新疆中部，领有别失八里，东南抵和阗；西南界阿姆河，成为整个中亚最强大的王国。在耶律大石心里，西辽是中原辽王朝在西域的延续，建立西辽也许就是他心中复国情结的另一种方式的发泄。因此它的政治制度仍保持辽王朝的传统，且整个西辽王朝宫廷与官府，都通用契丹文和汉字，其钱币上都印有汉文年号。这一切，都使这个在中亚统治不足百年的西辽，在亚欧大陆的历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以至于“契丹”一词变成了中亚各族用来称呼中国的名称，后来这个名称又经中亚传到俄罗斯和欧洲，俄语中的Китай和英语中的Cathay，都是契丹一词的谐音。



1143年，耶律大石走完了其传奇的一生，其后的西辽君主都不值得一提，而西辽这个本该随他而逝的王朝又在他余威的震慑下延续了数十年之久。后来，耶律楚材的诗文中有“后辽兴大石”一句，并自注说：“大石林牙……克西域数十国，幅员数万里，传数主，凡百余年，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可见，契丹的西辽，实为耶律大石的西辽。大石在，则西辽盛；大石去，则西辽亡。难道耶律大石的威力竟至于斯？西域大漠里总是充满如西辽传奇般难解的谜……

## ● 蒙元神话

公元13世纪初，在蒙古草原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崛起。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英雄，以其雄才大略，与其后继者一起在世界的东方建立起了一个自己的强大帝国。对西域来说，他结束了几百年来的混乱割据局面，使帝国的版图以此为基点不断向西延伸，并最终创造了一个令前人难以想象、令后人难以置信的帝国神话。

12世纪末，居住在蒙古高原斡难河畔的孛儿只斤部贵族铁木真顺应历史趋势，立志统一蒙古，并开始对其他部落进行吞并战争。他采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先联合势力较强的克烈部的王罕、扎答兰部的扎木合击败了塔塔儿、蔑儿乞、泰赤乌等部。1201年，铁木真又联合王罕打败了扎木合，1202年又消灭了王罕的势力。1204年，铁木真率部征服了强大的乃蛮部，杀死其首领太阳罕，



成吉思汗

并迫使其子屈出律逃奔西辽。之后，其他的蒙古部落慑于铁木真的威力，纷纷归附。1206年，蒙古各部贵族在鄂嫩河畔举行大会，推举44岁的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号成吉思汗，意思是“无比伟大的大可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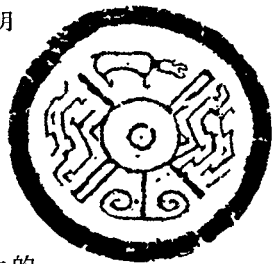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在完成了全蒙古的统一，建立了蒙古帝国后，为了实现其千秋霸业，决定向外扩张，降服蒙古境外政权。其扩张的目标：一是向西，一是向东。向东，自然是南宋；而向西，则面临着西域及其以西广大地区。1207年，铁木真先派遣他的长子术赤收服了散处于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被称为“林木中百姓”的斡亦剌惕部。接着，成吉思汗就准备进攻西辽王朝。当时，西域中亚均属于西辽王朝，但是13世纪初的西辽已不是耶律大石在位时的西辽，其统治腐败，衰弱无力，早已雄风不再，并且其统治下的诸属部已开始反叛。同时，此时西辽的政权也已为成吉思汗的宿敌、逃奔西域的屈出律所篡夺，这些乃蛮部的残余势力颇令成吉思汗不安，于是他派帐中大将哲别率军追击屈出律。而这时西辽的辖区内又出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插曲：1209年，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王）巴尔术阿忒的斤因不满西辽派驻高昌的少监的所谓“骄恣用权，奢淫自奉”，下令将少监关进一幢大屋，让民众推倒墙壁，压死了少监，事后他派代表去见成吉思汗表示归附，而成吉思汗也对他大加赞赏，并认其为第五子，还把公主婚配给他。成吉思汗的这一举动也马上得到收效，同年，海押立（今塔尔迪·库尔干）和阿力麻里（今霍尔果斯附近）的葛逻禄部首领，也投附了成吉思汗，这样，当1218年哲别率2万大军进攻屈出律时，已内忧外患的西辽很快被攻灭，屈出律本人也被哲别的前锋所斩。至此，西域再次统一。值得一提的是，在征讨西辽的过程中，高昌亦都护奉命率300士兵参加征战，再次发挥了作用，成为成吉思汗的一队尖兵。

西域的统一为蒙古军的西征扫除了障碍。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20万远征中亚和伊朗高原。这支蒙古大军如天兵一般，战战皆胜，所向披靡。次年，攻灭阿姆河下游的花刺子模，兼并了中亚地区。之后，蒙古大军越过高加索山，进入钦察草原。1223年在阿里吉河（今乌克兰境内的迦勒迦河）击败了俄罗斯8万联军并占领斡罗斯。在兼并中亚和南俄以后，成吉思汗分封四子，长子术赤分得钦察草原；次子察合台分得



伊犁河流域、河中地区、焉耆以西直到咸海地区；三子窝阔台分得天山北路的塔城、额敏、和布克赛尔、阿勒泰等地和蒙古高原西部；幼子拖雷继承成吉思汗领地，即蒙古中心地区。高昌的亦都护，由于最先降附蒙古，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优待，被允许保有自己的疆土，并相互通婚。

1227年，成吉思汗在进攻西夏的途中死去，自此射雕英雄传由其子孙开始续写。在经过一系列的皇族纷争，在拖雷、窝阔台、贵由相继掌权后，1251年，蒙哥汗继位。此时，蒙古帝国仍在进行着对外征服的战争。由于中原地域相对有限，东扩目标的完成已指日可待，所以要进一步扩张只有西征。这样，西域的地位在蒙古帝国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成了西征军在漫长战线上的重要补给源。蒙古统一西域时，即在高昌、别失八里（即北庭，今吉木萨尔县内）、阿力麻里、哈实尔（喀什）、叶尔羌（今莎车）等地设立达鲁花赤（地方最高长官），监治西域各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并为第三次西征做准备，蒙哥汗又于其继位的同年，在西域设立了别失八里和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分别用以管理天山南北和统管河中地区。同时，蒙哥汗又在中央设置波斯令史、汉地令史、畏兀儿令史这样的官职，畏兀儿令史专门管理西域的天山以南地区与帝国中央的往来公文。很明显，帝国通过一系列措施将西域地区完全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之后，1253~1258年，蒙哥汗派他的胞弟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继拔都第二次西征进抵奥地利和意大利国境之后，这一次，蒙古大军又攻灭了木剌夷（今伊朗），攻下了报达（今巴格达）和西利亚（今叙利亚），再次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260年，蒙哥汗在围攻四川合川钓鱼山时，受伤死去。蒙哥汗之后，帝国皇族内部因继承权问题，第一次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同年，忽必烈在开平宣布继位，与他争夺汗位的是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武装冲突牵动面很大，成吉思汗四大后裔差不多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这场战争，战火从蒙古高原一直蔓延到天山南北地区。为了控制察合台地区，忽必烈



忽必烈像

火速派察合台之孙阿卜失合回察合台封地执政，结果在途中被阿里不哥部下俘虏。阿里不哥派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阿鲁忽取代倭耳干纳（察合台封地统治者）。阿鲁忽则乘机把封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号令撒马尔罕等地，然后反戈投奔忽必烈，取得了忽必烈的支持，承认了他的统治权，并任命他防守自阿尔泰山至阿姆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此举使阿里不哥怀恨在心，1262年，他率军大举进攻阿鲁忽，占据阿力麻里，阿鲁忽南逃斡端（于阗）。其后，阿鲁忽与倭耳干纳结为夫妻，才稳定了统治地位。经过几

年的争战，1264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皇族纷争暂时平息后，忽必烈便继续进攻南宋。1271年，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

但忽必烈的汗位也并非稳如磐石，在阿里不哥之乱不久，战乱就又一次出现在天山南北地区。战争的起因与前次完全相同，惟一不同的是，这次与忽必烈争夺汗位的是窝阔台的后裔海都。支持海都的，是察合台的后裔都哇。

海都、都哇之乱可谓很有背景和曲折。海都是合失之子，窝阔台之嫡孙。在阿里不哥叛乱时，他就曾支持叛乱。阿里不哥降元后，海都就返回叶密立河畔（今塔城附近），聚集力量阴谋反抗元朝。1265年，阿鲁忽死，倭耳干纳擅立其子木巴刺沙为察合台汗，忽必烈又派察合台的曾孙八刺为其辅弼，八刺废掉木巴刺沙后，夺取汗位，海都立即与其联合。1268年，海都以海押立为基地，公开发动反对忽必烈的叛乱。1269年，海都在中亚塔拉斯河畔召集西北蒙古诸王大会，宣告窝阔台汗国、



-07



# 新疆两千年

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摆脱蒙古大汗独立。这一举动也标志着蒙古大帝国开始解体。1271年，察合台汗八剌被海都毒死。1274年，海都扶植八剌之子都哇为察合台汗，开始与忽必烈争夺西域。天山北部的额敏河流域，是窝阔台后裔的牙帐所在，塔里木盆地以南，是察合台封地的组成部分。不言而喻，海都和都哇在这里拥有绝对优势。忽必烈在天山北部的数十万大军很快被叛军击溃，元朝丧失了天山南北的大片土地。1275年都哇又率兵12万围攻火州（高昌故城），遭到亦都护火赤哈尔的斤的抵抗，暂时使元朝在天山南部保存了一块土地。

1279年，忽必烈消灭了南宋，统一了中原地区。这一巨大胜利，从根本上加强了忽必烈元朝的地位，使那些与他为敌的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各地业已立国的成吉思汗后裔——包括海都、都哇——都承认了忽必烈大汗的地位。但是，蒙古帝国事实上的分裂已使这时的大汗地位失去了昔日的意义和辉煌。而一年后，元朝10万水军对日本远征的失败，则使蒙古帝国的神话完全地消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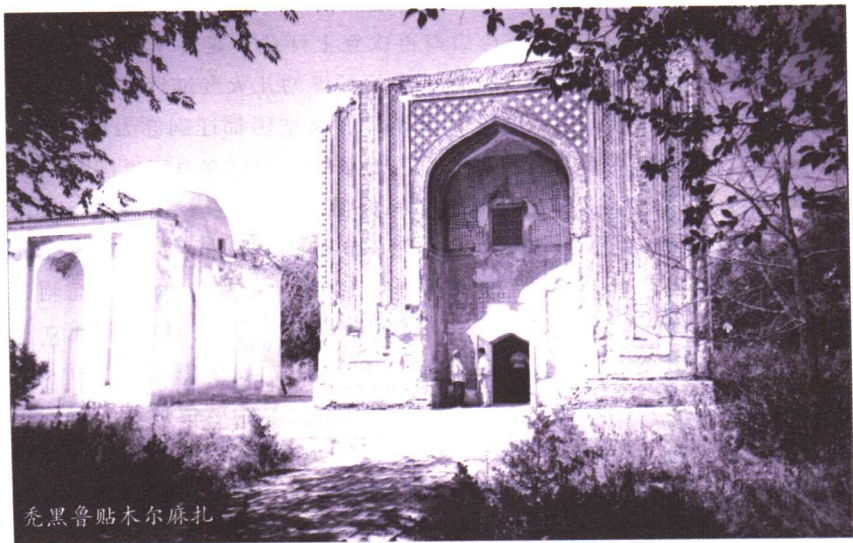
失去蒙古大帝国的忽必烈仍然励精图治。为了对付海都和都哇的叛乱，他派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以重兵镇守阿力麻里，命万户綦公直驻守别失八里。1281年改畏兀儿断事官为北庭都护府，1295年又立北庭都元帅府、曲先塔林都元帅府，统辖南北疆的军政事务。由于采取了上述防范措施，有力地打击了海都、都哇的叛乱行动。1302年海都、都哇联军越过阿尔泰山攻入蒙古草原，被元军打败，海都负伤死去，都哇中箭瘫痪。其后，都哇立海都之子察八儿为窝阔台汗。1306年，察八儿被元军打败，也投降元朝，其他跟随海都叛乱的蒙古宗王也先后向元朝投降。此后，窝阔台的封地尽归察合台所有。

战乱给西域地区造成巨大的灾难，土地荒芜，生灵涂炭。但平乱后元朝中央政府的势力又达到了包括河中在内的察合台全境，并且元朝中央政府对西域地方的管理也大大加强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元朝中央政权的势力在忽必烈之后不断衰微。1314—1323年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在西域再次发动大规模、长时间的叛乱，虽然元政府派兵镇压成功，但西域地区也没能逃避得了重新陷入混乱割据状态的命运。大漠又一次进入“生死轮回”的宿命怪圈。

● 群雄逐鹿

14世纪下半叶，祖国中原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运动。只几年时间，元朝在大江南北的各级军政机构便纷纷崩溃。1368年，一个新的朱姓王朝——明朝在建康（今南京）建立。正当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西域烽火重燃，群雄并起，呈现出多个政权共存的局面。但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大多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其中主要的几国：东察合台国、吐鲁番王国、叶尔羌汗国的统治者都是察合台汗的后裔，哈密王国、瓦剌汗国的统治者也是蒙古贵族。

元末，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以阿力麻里为中心，包括喀什、吐鲁番一带；西部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统治河中地区。1321年和1330年，东、西察合台汗相继死去。蒙古各部群龙无首，开始各自为政，互相攻杀。1348年，统治天山南路的杜格拉特部权臣布拉吉，找到一个18岁的贵族秃黑鲁贴木尔，宣布他是先汗之子，并在阿克苏拥立他为汗。历史上把秃黑鲁贴木尔统治的地区称为东察合台汗国，这也是明



秃黑鲁贴木尔麻扎





朝前期西域最大的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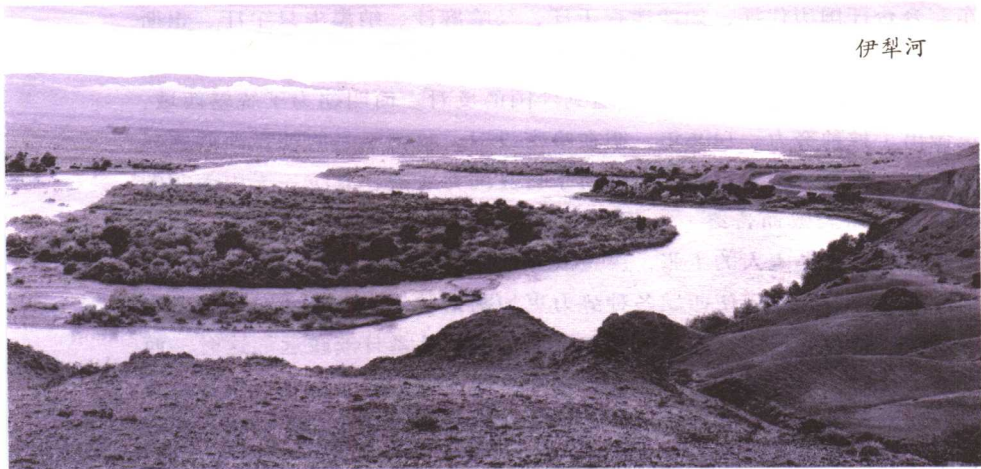
和其勇武有加的祖先一样，秃黑鲁贴木尔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霸气和胆略。从1360年起，秃黑鲁贴木尔对河中地区的同族不断用兵。不到两年时间，他就对西部察合台汗国作战达20余次。利用西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内部的倾轧与混乱，秃黑鲁贴木尔于1362年最终征服了河中地区，接着将自己的势力伸向阿姆河以南地区。而这时，巴尔赫地区成为察合台汗国在伊朗高原的第一块落地。这样，秃黑鲁贴木尔又重新使察合台汗国得到统一。但，这一次的统一是短暂的、不稳固的。1363年，秃黑鲁贴木尔死后，中亚的巴鲁刺思部的艾弥尔（将军）贴木兰便趁各地大乱之机起兵，打败察合台汗国军队，于1370年占据了撒马尔罕，接着又很快占领了整个河中地区，从而完全结束了察合台汗国在河中地区的统治。不久，贴木兰便脱离了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建立了贴木兰政权。察合台汗国又一次消失了。

东察合台汗国也很快衰败下去，其最严重的衰败发生在秃黑鲁贴木尔之子伊力亚斯汗死去的时候。当时，布拉吉的胞弟卡马鲁丁发难，此人手段毒辣，居然血杀连环——“一天之间屠杀了秃黑鲁贴木尔的十八个儿子”，并夺得汗位。察合台后裔再次登上汗位，是在卡马鲁丁逝世以后。1389年，幸存的秃黑鲁贴木尔的幼子黑的儿火者继汗位，建都别失八里；1418年，黑的儿火者之孙歪斯汗，又把国都迁到亦力把里（今伊宁市），所以东察合台汗国也称“别失八里国”和“亦力把里国”。

这里不得不提起一个迅速强盛而又突然衰败的王国——瓦剌汗国，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明朝初年，瓦剌人分布在今蒙古西部、新疆东北部和西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猛可贴木尔（1368—1403年）时期，瓦剌开始崛起，成为我国北方拥有4万户以上部众的强大力量，1399年建立了瓦剌汗国。脱欢继位后，于1434年灭鞑靼汗国，统一漠北东西两大蒙古，又于1436年统一瓦剌三部使瓦剌空前强大。其疆域包括整个蒙古高原和准噶尔盆地。到也先继位（1439—1454年），其势力达到全盛。1449年，也先因邀赏不遂，以互市中明朝裁抑马价为名，率瓦剌诸部大举攻明。宦官王振挟持明英宗率50万大军亲征，结果兵败于大同。明军死伤



伊犁河



过半，败退至土木堡（河北怀来县境内），英宗被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这一役使瓦剌汗国名声大振。可是，也就在此之后，1454年，瓦剌内讧，次年也先被杀，瓦剌从此一蹶不振。瓦剌汗国的盛衰，又给西域增添了一段谜一般难解的故事。

东察合台汗国的第12任汗阿黑麻在位时，把都城设在吐鲁番，他死后，长子满速儿即位，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第13任汗。1514年夏，满速儿汗的三弟赛依德推翻了杜格拉部在天山南部的统治，同年9月称汗，定都叶尔羌（今莎车），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叶尔羌汗国。这时，在东察合台汗国境内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1543年，满速儿汗死，其子沙汗继位。后来，沙汗在一次袭击瓦剌的战斗中身亡。叶尔羌汗国的第三代汗阿不都克里木（热西德汗的次子）乘机出兵占领了吐鲁番、哈密等东部地区，结束了自东察合台汗国中期以后天山南路分为东西两部的局面，实现了统一。这时的叶尔羌汗国，也达到其鼎盛时期，其疆域包括天山南部、巴尔喀什湖以南地区、伊赛克湖地区、费尔干纳盆地、巴达克山和瓦汗地区，管辖着祖国西部的实际版图。


尽管西域在此时期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但其各个政权同中原王朝则不约而同地保持着友好关系。东察合台汗国黑的儿火者汗登上汗位不久，便遣使到明朝进贡，明太祖盛情接待、赏赐，并派使臣回访。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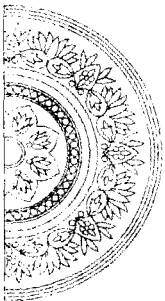
东察合台汗国历代汗，如沙迷查干汗、马哈麻沙、纳黑失只罕汗、歪斯汗等都尊奉明朝为宗主。叶尔羌汗国则把同明朝的贸易往来视为“金路”。一旦谁妨碍其畅通，就会遭到汗国的反对。而明朝为了统辖西域，也做出了种种努力。1406年，明在哈密设卫，哈密卫是明朝在西域建立的行政、军事机构。但是，明朝由于自身国力所限，其统一天山南北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一系列的失败，使明朝中央信心大失，1529年，认可了唐泽等人的主张，决定放弃哈密，关闭嘉峪关。如此自毁西部屏障的错误，不但使西域各种势力更加割据纷争，而且使明朝失去了通往西域各国的道路，致使明朝和西域各国的关系日渐疏远。这时，西域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继续生活在天山南北，守卫和垦拓着祖国的这片疆土。可是西域该向何去呢？人们也不禁再次产生疑问：苍茫大漠，谁主沉浮？

## 二、宗教战争

### ● 诸神在人间



同世界各地的远古人类一样，居住在西域地区的古人对许多自然现象，如雷雨闪电、日月星辰的运转等无法解释，却以为有什么冥冥之灵在主宰着人们的活动，只好乞求于灵为崇拜。于是，各教各派、林林总总的各路神仙纷纷降临到了这片本就神秘的土地上。



在史称西域的新疆，多数民族的先民中，最早广为流传和信奉的宗教，是产生于古代我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萨满教。“萨满”是通古斯语的音译，即“巫”的意思。萨满教是一个相信万物有灵、灵魂不灭和多种崇拜的宗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据记载，公元前11世纪，萨满教已在天山南北各地流行，匈奴和乌孙尤盛行萨满教。

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的琐罗亚斯德教、佛教、摩尼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先后传入了西域。琐罗亚斯德教又叫火祆教、祆教、拜火教等，在两汉时流行于西域，据说东汉的班超在到达鄯善国时，就发现有信祆教的事迹。而摩尼教则更为古代回纥汗国人民所普遍信仰，直到回鹘大量西迁后，还有很多人信仰摩尼教，在西州回鹘王国时期，就有不少国王是摩尼教的信徒。至于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它于7世纪传入西域，也曾流行一时，今天吐鲁番的高昌故城里，就有一座景教教堂的遗址。诸如此类的多种宗教的传入，使西域成为世界各种宗教的汇集和争衡之地。在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纷争中，有两种宗教脱颖而出，10世纪以前是佛教，10世纪以后是伊斯兰教。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印度，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公元前4世纪，孔雀王朝在今印度东北部兴起，佛教遂成其国教。凭借着孔雀王朝强盛的国力，佛教像一条兜满了风的帆船，乘风破浪驶向世界。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传播到安息、大夏、大月氏、康居，以至克什米尔地区。又经克什米尔传到天山南部，龟兹、于阗、高昌成为当时佛教在西域的主要活动中心。

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西域达到鼎盛状态。此时，西域佛教信徒极多。比如，于阗国老百姓才几万人，而和尚就有万余，一个瞿摩大寺，有和尚三千，就餐竟需击鼓集合。龟兹是当时佛教中心之一，也有僧众万余人，而且龟兹的塔寺很多，装饰华丽，连王宫里也塑刻佛像，如同寺院一般。各



# 新疆两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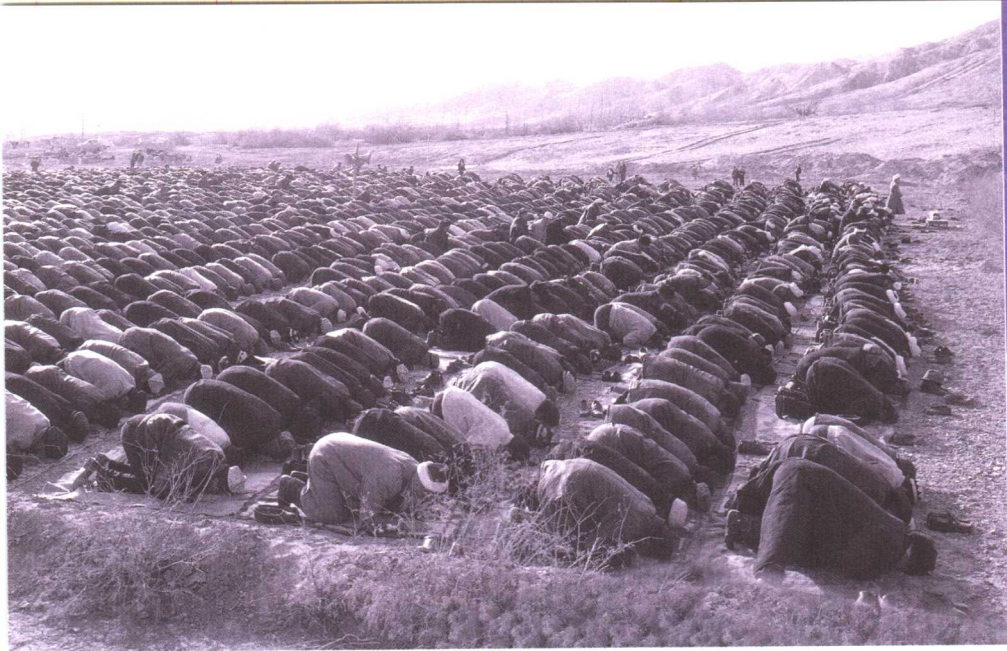
国僧众更是天天燃香念经，月月道场，年年举行盛大的佛会。

同时，西域的佛教热潮迅速东传，内地成千上万的僧人西行取经，“丝绸之路”上，僧迹不绝。曹魏时的朱士行、西晋的竺法护、僧建、后秦的法显、智猛、刘宋的昙无竭、北魏的惠生和宋云等等都是西行僧人的代表。而这时，西域高僧到中原说法、译经者也不在少数。其中著名的有被后赵皇帝宠信而称为“大和尚”的佛图澄，以及被后秦尊称为“国师”、精通梵文和汉语的龟兹佛学大师鸠摩罗什。他们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极为深远。唐朝时期，西域的佛教仍然广为流行。7世纪初，西突厥汗国对佛教采取保护态度，使佛教在西域得到进一步地发展。这时西域出家信佛的人数更多，佛教寺院规模进一步扩大。高昌王麴文泰笃信佛教，高昌国有僧人数千，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僧徒以千万计。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况。

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至西域，进入北庭的一支，建立了以高昌为中心的西州回鹘政权。为了维持其统治，西州回鹘王改信佛教并加以扶持，佛教在王国境内占了统治地位。高昌、交河、北庭、库车是当时的佛教中心，均建有大量寺院。西州回鹘王室在招待来宾时，往往有佛教僧侣参加，而且邀请客人到寺院来观光。每当春暖花开、风和日丽的季节，居民们便成群结队到寺院游玩，并且沿途弹唱聚乐，举行带有佛教色彩的活动。传统的佛教节日，如五年大会、乞寒节等，都是群众十分重视的节日。随着佛教在回鹘中间的传播，回鹘和尚也逐渐成为西北地区佛教事业最活跃并享有权威的传播者和代言人。他们的活动不只限于天山南部地区，就是在西夏，回鹘和尚也享有很高的声誉。

西州回鹘皈依佛教，对其民族的文化艺术史来说可谓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几乎与他们同时西迁入西域的另一支回鹘部众，他们越过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草原，并于10世纪末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变化不能不说是其民族精神生活领域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它的影响之大，意义之深远，不可估量。





## ● 真主的感召

“伊斯兰”一语出自阿拉伯语，意思是“恭顺”、“皈依”、“服从”。伊斯兰教的教徒统称为“穆斯林”，意思是“恭顺者”、“皈依者”、“服从者”。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当伊斯兰教于7世纪初叶出现在阿拉伯半岛的红海沿岸地区的时候，回纥正活动在远离阿拉伯半岛的鄂尔浑河流域。此后，由于缺少直接的接触，回鹘对于这个宗教，还是全然陌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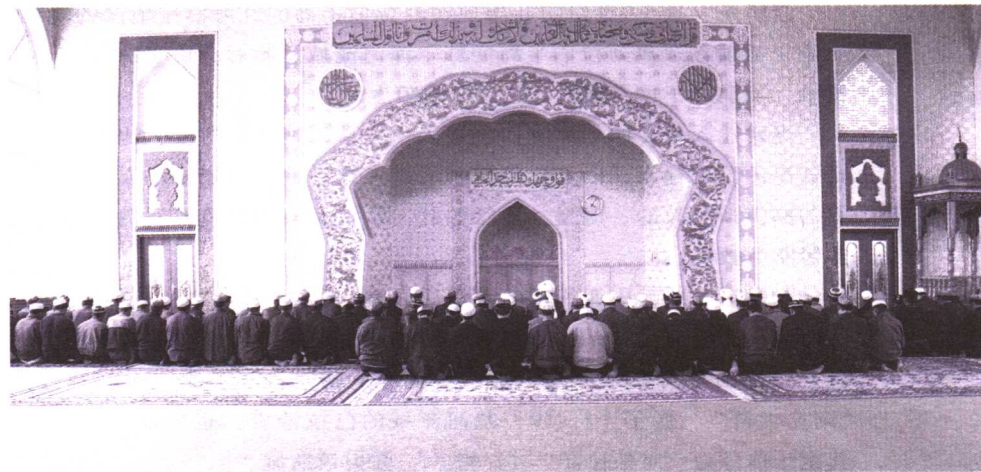
当西迁入葱岭西的那支回鹘进入中亚草原地带的时候，比他们早来到这里的葛逻禄人，以及比他们稍后进入这一地区的亚格玛人中间，都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葱岭西回鹘，仍然是非伊斯兰教徒。

10世纪以后，中亚纷乱的政治局面改变了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葱岭西回鹘开始强大起来，并以喀喇汗王朝的名义进入西域的政治历史舞台。按照阿尔泰语系民族传统，喀喇汗王朝实行双王制。大汗称号为“阿斯兰汗”（狮子王），驻在楚河流域的巴拉沙衮，也称虎思斡尔朵。其副汗称号为“布格拉汗”（公驼王），驻怛逻斯城。



大约在乌古斯汗统治时期，即喀喇汗王朝建立的初期，伊斯兰教开始逐渐进入葱岭西回鹘地区。虽然乌古斯汗是一位热心伊斯兰教的人，但伊斯兰教并没有因为他的庇护，一跃成为这支回鹘精神生活的主要支柱。不仅如此，在喀喇汗王朝的势力深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以后，伊斯兰教在葱岭西回鹘中间，反而近乎销声匿迹了。因为，一方面，它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佛教；另一方面，喀喇汗王朝被迫将其统治中心移往天山南部的喀什噶尔以后，它与中亚河中地区的伊斯兰教政权萨曼尼王朝（874~999年）——正是这个王朝在893年攻占了怛逻斯城——处于完全敌对状态。所以，当时的喀喇汗王朝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严厉的态度，禁止自己的臣民们信奉伊斯兰教。

当伊斯兰教的传播在葱岭西回鹘中遇到最强有力的挑战时，事情的发展却有了转机，并且这个转机很快就使整个事情变得比较顺利了。在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是喀喇汗王朝王位的合法继承者，布格拉汗家族的一个传奇人物——萨图克。19世纪在中亚问世的一部名为《歪斯传》的书里，记述了与此有关的一个传说：“萨图克出生的时候，大地为之震动，以致地下水都涌到地面之上。当时虽然已是严冬季节，可是百花仍然为之吐艳。……萨图克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



亲转嫁给萨图克的叔父阿隆可汗。阿隆可汗抚养萨图克到了12岁。有一天，萨图克带着39个亲信侍从到下阿图什的拜库地方。他们见到一批相貌端正、衣着整齐的商人围坐在一片草地上。萨图克对其周围的人们说，我们这个地方不曾见过这样的人，这个商队是从何处来的？如果他们来自远方，一定会带来有趣的见闻。萨图克带领自己的侍从朝着商队的方向奔驰而去。

“这个商队的首领是和卓·纳赛尔·萨曼尼。纳赛尔看到奔驰而来的人马，立刻明白了：为首的就是那位将要成为萨图克·布格拉汗的人。他对自己的佣人们说：我们的目标，今世和来世的帝王，正在向我们奔驰而来。佣人们，立即给我打开行装，为这位王子准备适当的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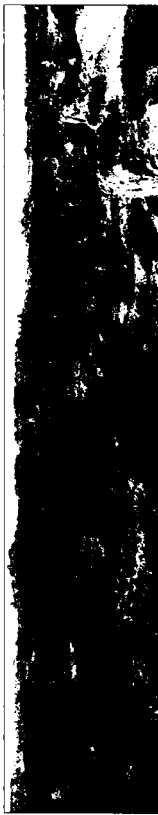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站起来召唤礼拜。正在析解行装的人们立即停下手里的工作，开始礼拜。打开的行装，散放在各处。礼拜以后，大家又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

“这一切都无一遗漏地映入萨图克的眼帘。这些人居然将自己的行装散放在周围而不顾，却不停地起跪礼拜。这使萨图克大为惊奇。

“和卓·纳赛尔·萨曼尼来到萨图克面前向他致敬。萨图克下马和纳赛尔行见面礼。纳赛尔请萨图克到自己的帐篷做客。萨图克进入帐篷后，纳赛尔向他赠送了各种各样的双份礼品。接着，和卓·纳赛尔·萨曼尼向萨图克作了开导。萨图克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因为在这以前，贺则尔圣人曾向萨图克指点过，将来有一个人将把他带入伊斯兰世界……”就这样，萨图克皈依了伊斯兰教。

如果《歪斯传》中的这个传说多少有些真实的话，那么，这一批穆斯林表现出的纪律和虔诚，正是这位急于夺取王位的王子所迫切需要的。经过一番准备和策划后，萨图克拉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穆斯林队伍，在喀喇汗王朝的都城——喀什噶尔城下击败了他的叔父，并且在其叔父拒绝信仰伊斯兰教后，杀害了他。于是萨图克成了喀喇汗王朝的新可汗，称萨图克·布格拉汗。他也是喀喇汗王朝统治层中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汗王，教名为阿卜达勒·克里木。

由于萨图克在夺取汗位的过程中，得到了伊斯兰教的支持，因此在他称汗以后，伊斯兰教在喀喇汗王朝疆域内自然获取了合法地位并迅速





发展起来。

萨图克·布格拉汗一生最重要的业绩就是接受伊斯兰教，并使其成为喀喇汗王朝政治活动的基石。他在位45年，其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志哈德”——圣战——的口号下，消耗于对佛教政权的征伐之中。据说，他最后是死在对佛教政权西州回鹘汗国作战的战场上的。

萨图克汗时期，喀喇汗王朝逐渐强大，夺回了被萨曼尼王朝占领的怛逻斯城。944年，萨图克·布格拉汗攻占了巴拉沙衮，统一了喀喇汗王朝，定都喀什噶尔。自此，为了完成传播伊斯兰教于天山南部的宏愿，萨图克·布格拉汗开始了他对佛教政权的讨伐“圣战”。喀喇汗王朝四面出击，与当时佛教政权中的两强——于阗王国和西州回鹘王国——几乎同时作战。但这些战争都没有如萨图克汗所愿成为速决战，而是无一例外地都成了持久战。由于当时交战的诸方都受本身的力量所限，且都无正义可言，因此，直至955年萨图克逝世为止，仍然看不到这场旷日持久战争的尽头，也没有迹象表明，谁将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

## ● “春秋”无义战



“火法”——佛教受不可抵抗之力而灭绝不传——一直是中世纪佛教信徒“胎里带”的梦魇。自萨图克领导的伊斯兰教的东进开始，佛国于阗便成为伊斯兰“圣战”锋镝的最直接面对者。这种无形的压力，对寂寞的沙漠王国于阗举国上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亡国灭法的前景令当时的于阗国王李圣天（912—966年在位）不寒而栗，他甚至在萨图克汗在国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时，就已颇感不安，并曾援助和支持喀什噶尔佛教徒们的反抗。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伊斯兰教的势力很快占领了喀喇汗王朝全境，于阗王国与喀喇汗王朝间的关系也很快就恶化并破裂了，战争还是如期而至。背负高山，面临大漠，几乎得不到什么援助的于阗，从一拉开战幕，就认清战争是不可调和的、没有退路的。于是，李圣天提出了非常时期的治国国策，那就是：西拒疏勒（即喀什噶尔），东联河西，极力发展与河西统治者张氏（张氏之后是曹氏）的传统联系。这一国策也的确起过一些作用。

战争一开始，双方互有胜负。955年，萨图克逝世，其长子木萨继承了汗位。同年，于阗利用这个新的变化，派大军直逼喀什噶尔城下，猛攻伊斯兰教在天山南部的这个最重要的据点。由于攻城不下，于阗军队遂向本土方向退去。数万喀喇汗王朝的军队，在萨图克的外孙阿里·阿尔斯兰的率领下，尾随追击于阗军队。在瓦旦哈刺列（今英吉沙尔县），喀喇汗王朝军队遇到了布防于此的于阗军队的阻击。于阗军队猛烈出击，一举击溃了喀喇汗王朝的这支军队。阿里·阿尔斯兰在格斗时被击杀。这次失败后，木萨亲自指挥大军向于阗方面出征，于阗军队也主动出击。两军在柯克亚尔（今叶城县南部山区）展开大战，双方激战七昼夜，不分胜负。稍后，于阗军队退往于阗。喀喇汗王朝军队也因伤亡惨重，不敢深入敌境，遂退回喀什噶尔，进行休整。

于阗方面在作殊死较量之后，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因而，无力再兴师动众。在这样的情况下，喀什噶尔和于阗之间出现了一段时间的休战。

966年，李圣天逝世。此后，又有尉迟输逻等三四位于阗王先后继位，他们基本上都继承了李圣天的国策，视河西曹氏为奥探，视中原王朝为宗主，力拒萨图克的后裔东进。但因为河西曹氏自身并不稳固，且



残存的佛窟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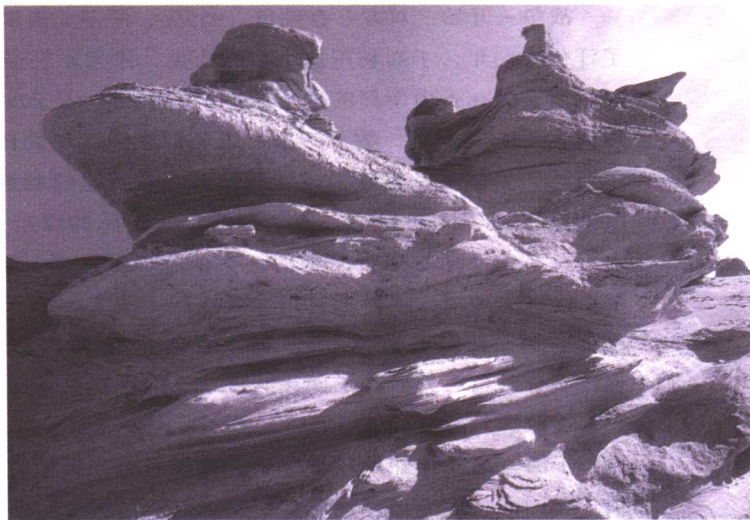
北宋又一直处在辽国的巨大压力下无暇西顾，所以这一国策在10世纪后半期将于阗置于阻击伊斯兰东进的第一线，却得不到任何实质上的援助。

而木萨则继续大力推行伊斯兰教，并

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同时，他还进行着对河中地区的征服战争。

969年，喀喇汗王朝都城喀什噶尔发生了武装起义，由于起义被宗教上层所利用，致使以佛教为旗号的于阗军队轻而易举地攻入喀什噶尔城。第二年1月9日，尉迟输逦向沙州曹元忠写信，报告了于阗的胜利，同时，据《宋史·于阗传》记载：971年，“其（于阗）国僧吉祥以其国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诏许之。”这一胜利使于阗王国浮想联翩，甚至考虑要在疏勒（喀什噶尔）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卫星国。但是战争是长期惨烈而又颇多反复的。喀什噶尔城很快被夺回，两国军队又再次处于拉锯状态。

980年左右，木萨死，其子阿布·哈桑继位。他趁萨曼尼王朝内乱之机，兵分两路，向河中地区发动进攻，占据了中亚重镇撒马尔罕和萨曼尼王朝的都城布哈拉。正当阿布·哈桑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时，于阗军队从东方进攻他的身后，警报不断传来。阿布·哈桑急忙挥师东向，行程万里，仓皇应战，结果被于阗军队击败。998年，阿布·哈桑·布格拉汗也在和于阗王国进行的这场宗教战争中战死于英吉沙尔的沙场上。



—20—



由于阿布·哈桑的阵亡，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喀喇汗王朝军队丧失了进攻的势头，进而全线崩溃，于阗军队一鼓作气，再度攻占喀什噶尔城。但这次胜利却成了于阗王国在这场战争中名副其实的“回光返照”。

阿布·哈桑的侄子玉素甫·卡德尔汗听到叔父阵亡的消息后，急忙在撒马尔罕宣布继位。他继位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招募雇佣军。从此，喀喇汗王朝的军队，在这个战场上所向披靡。

公元999年，一支伊斯兰十字军集结在喀什噶尔城下。他们中间有来自巴格达的，有来自伽色尼的，还有来自花剌子模的，他们号称14万大军。雇佣军迅速为玉素甫·卡德尔汗夺回了喀什噶尔城。接着，他们又去完成布格拉家族所未竟的事业——向信仰佛教的于阗地区进军。于阗方面在库姆热瓦特（今叶城县附近）对雇佣军进行了抵抗，但从库姆热瓦特到于阗之间的数百里行程中，于阗方面组织的一系列抵抗相继被粉碎。喀喇汗王朝的雇佣军直抵于阗城下。于阗方面的首领朱克提和努克提拒绝了雇佣军要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的要求，带领一部分军队和民众向昆仑山区退去。雇佣军不经战事便占领了天山南部最重要的佛教中心。其后，这场在宗教旗帜下发生的战争的尾声继续回响。双方的战场逐渐转入昆仑山区。但这时，喀喇汗王朝已占绝对优势了。

1006年，在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玉素甫·卡德尔汗终于作为终结者全部征服了于阗。此后，伊斯兰教在于阗地区取代了佛教。

在北方，喀喇汗王朝遇到了比于阗王国强大得多的阻力。当时信仰佛教的西州回鹘王国的领地包括库车、且末、高昌，阿斯兰王对喀喇汗王朝的扩张进行了坚决抵抗，致使伊斯兰教势力长期未能超过库车一线。但是，喀喇汗王朝在它的疆域内大量修建伊斯兰寺院，开办宗教学校，培养传教骨干，这样，伊斯兰教在西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

到蒙元帝国时期，西域的穆斯林聚居地区归察合台汗国统辖。根据政治需要，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伊斯兰教时而利用、时而疏远。但即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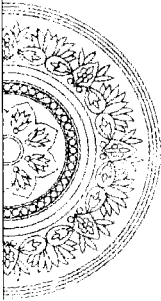


疏远，也没有达到冲突的地步。14世纪以后，元朝势力退出了天山南北地区，同时，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自秃黑鲁帖木尔汗于1322年皈依伊斯兰教起，成为清一色的穆斯林。到了贺则尔汗时期，汗国全部国务活动，包括军事和行政机构，都涂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成吉思汗的这批后裔，以难以想象的狂热，完成了当年布格拉家族的未竟之业。他们用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将其他宗教从吐鲁番盆地排斥出去，使伊斯兰教普及到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最后一块空白地。至此伊斯兰教在西域的传播大获全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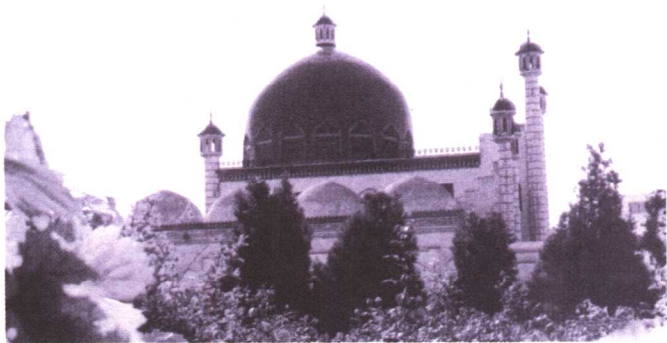
从10世纪开始的伊斯兰教的东传，无论是在维吾尔民族的历史上，还是在西域的历史及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通过伊斯兰教的传播不断传入西域，使西域各个国家固有的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光彩，同时伊斯兰教的传播有效地促进了西域民族大融合；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的所谓“圣战”使西域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受到极大损失，而且由于宗教的偏见，又使历史悠久的、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佛教文化和艺术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特别是维吾尔民族的绘画、泥塑、雕刻等造型艺术方面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空白。

### 三、流星蝴蝶剑

#### ● 智者闪灵



自唐末至明的漫漫800多年里，西域各族人民经历了战乱、统一的分分合合的历史循环，但时代的动乱，并没能阻挡民族文化的发展，维吾尔、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字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得到确立，《拉失德史》、《福乐智慧》等著作的诞生引人注目，而集中了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的民间文学，更是得到了一个辉煌的大发展。自此，智者的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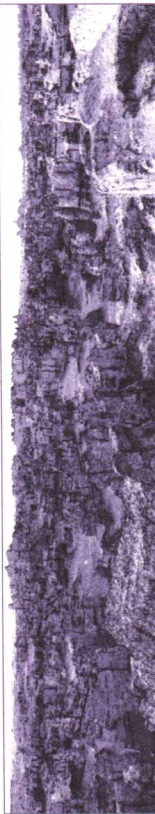


喀喇汗王朝诗人、学者和思想家，著名长诗《福乐智慧》的作者玉素甫·喀什·哈吉甫麻扎。

如流星一样总是不断划破后世的天空，给人以启迪；恰似蝴蝶成双般浪漫的爱情故事不胫而走，令人神往；而仗剑倚天的英雄所写下的悲壮诗篇，更使人至今犹感荡气回肠。

《阿凡提的故事》就是产生于察合台汗国时期的民间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阿凡提是维吾尔族传说中的一个典型人物，“阿凡提”意思是老师、有知识的人，是个尊称，而不是名字，他的名字叫纳斯列丁，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大家又称他为霍加·纳斯列丁·阿凡提（霍加也是称号，意思也是“老师”）。在人民心目中，阿凡提是智慧的化身、欢乐的化身，只要一提起他的名字，愁眉苦脸的人就会展开笑颜。他嘲笑世人的愚蠢，嘲笑投机的商人、受贿的法官、伪善的毛拉们逞威作福的万恶的社会……一句话，他嘲笑那些假仁假义的人，这些人在自己为了欺骗而制造出的宗教法律的掩护下，吸干了穷人的血。阿凡提的笑声是温和的，也是极具穿透力的，它响亮地经过了好多个世纪一直传到今天。而他的形象：头戴一顶民族花帽，背朝前脸朝后地骑着一头小毛驴，也早已深入人心。至于他的故事，也就是阿凡提的笑话，长时期是以民间口头形式流传着，且流传的地区非常广，其中包括小亚细亚半岛（即土耳其）、阿拉伯、中近东、巴尔干半岛、高加索、中亚细亚和我国新疆，在维吾尔族人民中间更可谓是家喻户晓。关于他的故事，维吾尔族通常叫做“纳斯列丁·阿凡提蓝提凡”，“蓝提凡”的意思实际是笑话或趣事。

和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诗一样，阿凡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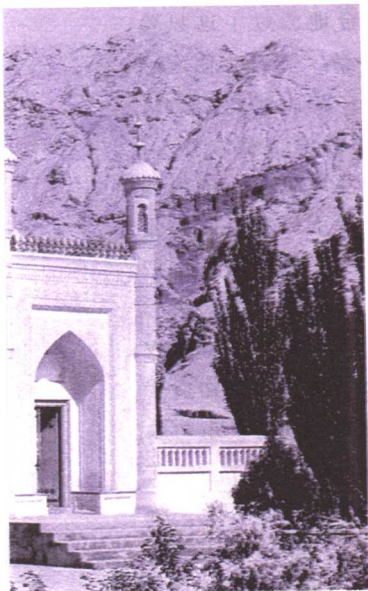


喀喇汗王朝时著名语言学家巴赫穆德·喀什噶里的麻扎全景。他著有世界上第一部被称为“百科全书”的《突厥语词典》

故事也是人民用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强有力的武器但有所不同的是，阿凡提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创作成果，而是许许多多劳动群众共同智慧的结晶。同时，它又不失其应有的美学意义，并且更加贴近人民，通俗易懂。阿凡提这个并非虚构、但在流传中集群众智慧于一身的人物，总是用其特有的幽默，嘲弄与讽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种种丑恶行径，暴露他们麒麟皮下的马脚。在许多阿凡提的故事中，国王、大臣、法官、财主、官吏等很多统治者，在阿凡提的对比下显得特别愚蠢：《种金子》是利令智昏；《会念经的毛驴》是自作聪明而显得更加愚蠢；《国王和线绳》中则是说了蠢话受到赞扬反而自鸣得意，暴露出双料的愚蠢……

都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西域各族人民用他们雪亮的双眼审视着周围的一切，为了发泄自己胸中对反动统治者的愤怒和不满，他们又不断赋予“聪明的阿凡提”新的智慧，让阿凡提去智斗形形色色的





剥削者。而这些劳动人民自己创作的小笑话、小段子里不断抖出的“包袱”又让劳动人民自己得到某种畅快的感觉。可以说阿凡提的形象是民间幽默最光辉、最出色的创作之一，乃至今天在出现关于他的笑话的地方，都还有着生动的反应。对于他，民族的爱好和概念都不是障碍，而他也确实实已经被列入那些称为“世界的形象”之列了。许多国家都曾出版过阿凡提的笑话集，甚至还有一本国际高能物理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集中印上了几十个阿凡提笑话并以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作论文集封面。在新疆，直到现在维吾尔族人民还把善于引人发笑的滑稽人物叫阿凡提。新的时代，人们赋予阿凡提新的意义、新的生命，他响亮的笑声还将会更长久地传下去。

## ● 爱情经典

远在11世纪初的喀喇汗王朝时，维吾尔族人民中流传着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经过几个世纪的民间传诵，约10世纪初，维吾尔族人玉素甫阿吉把这个故事写成了叙事长诗，以后民间乐师们又给它配上了几十种曲调，在欢庆的节日里，在麦西来甫（民间的一种歌舞聚会）上广为演唱、流传，于是它成为维吾尔族人民家喻户晓、世世代代诵唱的诗篇，维吾尔族人称这首长诗为《艾里甫与赛乃木》，也有人把它叫做《痴情的艾里甫》。

艾里甫与赛乃木的爱情故事非常曲折，因此，《艾里甫与赛乃木》这首诗也相当长，而且也有好多种流传的手抄本。其中一个版本中，其叙说部分有442行散文诗，弹唱部分有1262行双行诗，共1704行，可谓名副其实的长诗。长诗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国王阿巴斯和宰相艾





# 新疆两千年

山外出狩猎，都遇到一只怀孕的羚羊，两人不谋而合地放过了这只羚羊。当他们互相问起原因时，都说自己的妻子身怀有孕，不忍心伤害这只羚羊。于是国王和宰相相约，如果生下一男一女，就让他们结为夫妻，并且立了婚约。后来，王后生了女孩儿，取名赛乃木，意为美人；宰相夫人生了男孩儿，因为宰相已经死去，所以取名艾里甫，意为孤儿。艾里甫与赛乃木从小一起读书玩耍，形影不离，长大后相互倾心爱慕。可是艾里甫家境越来越贫寒。国王阿巴斯背信弃义，撕毁婚约，把艾里甫一家流放到巴格达。艾里甫在遥远的地方日夜思念赛乃木，决心与赛乃木相会。途中，艾里甫被强盗所卖，成为给国王修建花园的奴隶。艾里甫隐姓埋名，在花园里劳动，终于和赛乃木相会。国王知道了艾里甫已经回来，派人搜查花园。在善良的人们的帮助下，艾里甫与赛乃木巧妙地躲过了搜查，逃出牢笼，自由地飞向太阳升起的地方。《艾里甫与赛乃木》所叙述的故事深受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喜爱，解放前就曾搬上舞台，解放后，经过几次加工创造，又用歌剧和话剧上演，1982年，天山电影制片厂还根据这个故事拍成了同名的电影。

就长诗及其整个故事来看，它所体现的人民群众的爱与憎、褒与贬、同情与反感是十分鲜明和强烈的。长诗一开篇就满腔热情地唱道：“这首长歌流自我智慧的源泉，像夜莺的悲鸣激荡在每个人心间。我放开歌喉唱艾里甫与赛乃木，为忠诚的恋人献上爱情的花环。”接着，笔锋一转，用叙述语言斥责国王阿巴斯虽“威震四方，却暴虐无道”。人民在其创作中，没有把阿巴斯描写成一个回心转意的人，而是无情地揭露了他的专横凶残，以及不愿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和幸福的本性。正如长诗中所描写的那样，当他听宫女阿奇科克孜一番挑唆的话后，立即暴跳如雷地唱道：“你的话把我心中的怒火点燃，仇恨的波涛在我的胸膛中滚翻；真主赐给我的权力至高无上，谁敢违抗，等待他的是荒凉的坟园。真主赐给我宝剑为的是维护王室的尊严，谁敢蔑视，立即把他的头砍断。我要痛饮艾里甫的鲜血，只有他的血才能熄灭我心中的怒火；我要把赛乃木的辫子剪断，只有这样惩治她才能保住



王家的尊严。”在这样一个国王统治下的国度里，人民能有什么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可言？长诗把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与国王的暴虐无道尖锐地对立起来构思故事，使其在古代少数民族人民中引起广泛的共鸣。

同时，《艾里甫与赛乃木》这首长诗也同其他许多文学作品一样，充满了人民群众神奇的想象，而且这些想象又常常带有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色彩和美感，这些都使这部作品显得清新和充满活力。如长诗中艾里甫在去寻找赛乃木的途中，在已精疲力竭、口渴难忍的极度困难

的情况下，角乃依特圣人出现的情节。这不仅给故事增添了奇异和神秘的色彩，而且也很好地描绘了艾里甫谦恭、聪慧的性格特点，其表达的内容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如角乃依特圣人和艾里甫的问答中有这样的精彩诗句：角乃依特圣人：“什么树吮吸自己的血生长？什么鸟能自由地飞遍四方？什么人的脸没有血色？孩子呵，请回答我的询问。”艾里甫：“生命的树靠自己的血液生长，智慧的鸟能在世界自由飞翔，说谎人的脸就像一张白纸，圣人呵，艾里甫回答了你的询问。”又如，角乃依特圣人：“什么样的人不怕灾难？什么样的东西宁折不弯？什么样的人的心贪得无厌？孩子呵，请回答我的询问。”艾里甫：“勇敢的人不惧怕灾难，勇士的剑宁折不弯，守财奴的心贪得无厌，圣人呵，这就是我的答案。”长诗充分体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的智慧与才华，它其中所表达的真挚情感，犹如一朵美丽的玫瑰花，永远陶冶着人们的情操。

西域各族人民所创作的民间文学作品并不止于此，可以说像这样引人入胜的作品还很多很多，它们也同西域这块神秘的土地一样，都伴随着谜一般诱人的色彩，永远值得人们回味与研究。



## ● 英雄史诗



在宋元明这个中原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西域地区也诞生了以后被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中的两部英雄史诗——《玛纳斯》和《江格尔》。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久而古老的民族之一。千百年来，勤劳、智慧、勇敢的柯尔克孜人民为缔造伟大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玛纳斯》就是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

《玛纳斯》是一部传记性的英雄史诗。史诗以玛纳斯的名字为全诗的总名称，其余各部又都以该部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如《玛纳斯》、《赛麦台依》、《赛依台克》、《凯乃木》、《赛依特》、《阿色勒巴恰与别克巴恰》、《索木碧莱克》、《奇格台依》。它通过动人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语言，极其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玛纳斯家族八代英雄为维护柯尔克孜人民利益的战斗业绩，反映了柯尔克孜人民反抗卡勒玛克·克塔依统治者奴役、压迫的斗争，表现了古代柯尔克孜人民争取自由、渴望幸福生活的理想和愿望。

史诗《玛纳斯》最初产生于9至10世纪，后来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柯尔克孜天才歌手们世世代代的琢磨，融进了全民族的智慧，使玛纳斯等众英雄的形象丰满神奇、真实动人，既有历史的真实性，又有形象的鲜明性，“诗”、“史”并茂，互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壮丽的画卷，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浓烈的民族特色。这里，让我们来听一曲《玛纳斯》气吞山河的开篇序诗，诗中唱道：“……为了人们的心情愉快，我给大家演英雄，这是祖先留下的故事，我不演唱怎么能行？……大地经过了多少变迁，戈壁沙漠变成了林海，绿色的原野变成了荒滩，一切的一切都在变化，祖先留下的史诗仍在流传。”非凡的英雄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民理想中的英雄，“他有青鬃狼一样的胆量，有雄狮一样的性格，有巨龙一样的容颜，有大山般的体魄和力量”。“木盆里的肉像座小山，他只抓着吃了三次；倒在肉沫上的汤像小湖，他一下子把它喝光。”就



是这位智勇双全的英雄，他深谋远虑、慷慨大度、勇猛顽强，对敌人像豹、像猛虎般凶狠，对人民、对伙伴却能礼贤下士、襟怀坦白。他对老英雄巴卡依十分尊敬，采取他的计谋，接受他的教诲，对年轻勇士阿吉巴依、楚瓦克等十分信任。为了柯尔克孜族人民的自由、幸福，他容得下一切愿意与他合作的人。他对来自克塔依的阿勒玛别特更是器重，当内部有人起来反对这个外来者的时候，他循循善诱，规劝阻止，终于让阿勒玛别特成了他同生共死的战友，成了他置敌于死地的得力助手。因为玛纳斯具有高尚的美德，使各路英雄紧紧围绕在他身边，为共同的事业英勇奋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辉煌战绩。玛纳斯是柯尔克孜人民的骄傲，柯尔克孜人民由衷地赞颂他的功绩，诗中唱道：“玛纳斯是我们的靠山，他是柯尔克孜人的支柱，是举世无双的英雄；卡勒玛克践踏柯尔克孜，我们的人民到处流浪，自从玛纳斯登基以来，柯尔克孜的生活才欢乐安宁。玛纳斯是贤明的汗王，爱护自己的黎民百姓，为我们做着有益的事情。他如明月高悬，柯尔克孜听从他的命令。”史诗《玛纳斯》在柯尔克孜人民中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至今，柯尔克孜人中仍在传说着玛纳斯英雄没有死去，依然活在人间，可见史诗影响之深远。

同《玛纳斯》一样，《江格尔》也是一部民族民间文学巨著，它是诞生在蒙古族卫特拉部的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是民间口头创作，人民一代代耳口相传，未经文人修改，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原始状态。千百年来，它流传在蒙古族人民中间，家弦户诵，直到今天。《江格尔》代表了蒙古族文学的最高成就，它是蒙古族古代文学的巅峰。

《江格尔》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西域的苍茫大地上，史诗中出现的阿尔泰山、白头山、额尔齐斯河、奎屯河，都是今天新疆人民非常熟悉的地方。正像高尔基所说：“从远古时代起，民谣就是不断地和奇特



地伴随着历史。”《江格尔》确实保留了中国古代西域的历史的某些痕迹。她的语言是活的土尔扈特蒙古语，其中夹杂着不少古今西域各族的词汇，如维吾尔、哈萨克、布鲁特等族的词汇。《江格尔》讲述的是蒙古人民的英雄江格尔和他所创立的理想国宝木巴国的故事，它的篇幅很长，而到底有多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过去在民间流传着迷信的说法，谁要将《江格尔》唱完，谁就会立刻死掉。因为没有一个人能把全部《江格尔》学会，也没有一个人能将全部《江格尔》唱完。据记载，能演唱70回《江格尔》的艺人就已经被称为“史诗的口袋”了。由此可见，《江格尔》的确是罕见的长篇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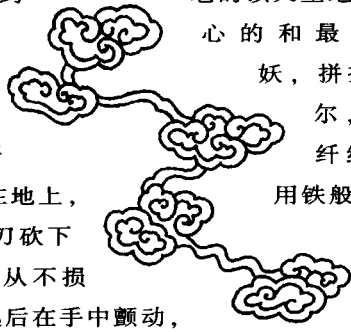
《江格尔》在艺术上具有浓厚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常常将恢宏的想象与夸张手法结合起来使用，使整个史诗造成粗犷豪迈、气象阔大的艺术特色。对宝木巴理想国，诗中唱道：“没有衰败，没有死亡，一切万古常青，那里的人们永远像25岁的青年那样健壮，在宝木巴，寒冬像春天一样温暖，炎夏像秋天一样凉爽。孤独的人来到宝木巴，就能人丁兴旺；贫穷的人来到宝木巴，就能富庶隆昌。在宝木巴地方，人们的财富均衡了，贫富的界线消亡了。”对英雄江格尔，史诗中如此描写：“江格尔是尊宝的化身、荣耀的圣人。有了江格尔，受伤的人能恢复健壮，死人能复活再生。跟他走，好像生活在33层天上。”不仅如此，而且《江格尔》中出现的主要人物都很像神话中的人物，他们的英雄行为都有神话色彩，他们能施展法术，使自己能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始终立于不败之



江格尔塑像

地，但真正有血有肉的英雄的树立，还是通过对英雄的战斗活动的具体描写。作为群英之首的江格尔，是史诗的主人公，是牵动全书的主要人物，对于这个活到老、战斗到老的老的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与敌人的战斗总是最激动人心的和最惊心动魄的——“江格尔同浩尔图小妖，拼搏了整整14天后，惯于征战拼搏的江格尔，突然以万钧劲力的扳子，对准小妖的纤细腿，连续发了82次猛击，把小妖摔倒在地上，用铁般的巨臂按住小妖，顺手抽出阴阳双刃宝刀砍下去。宝刀本是削铁如泥，砍刺多少妖魔从不损刃。如今好像遇到石岩，宝刀只是弹起后在手中颤动，小妖却安详地说：‘你虽然是宝木巴之乡的理想，但时不过3个月，让你永远成为宝木巴的虚幻！’小妖又跳起来，像鹭与虎般向江格尔扑去。机智勇猛的江格尔，捉住小妖的双手，连连发扳3000次，从背后侧扳4000次，猛击其天灵盖10 000次。当曙光初发时，江格尔举起小妖细瞧，在他气喘喘的胸部，有个针眼般的地方闪闪发光。江格尔抽出左胯上的匕首，顺那小孔刺入左肋，又猛地转向右肋处，准备刺出其心脏时，突然那心上喷出三股烈火，团团裹住了江格尔。江格尔急呼众神灵，顿时暴雨从天降，霎时灭了魔火。”这就是江格尔的一次战斗，这就是神勇无比的江格尔。史诗中，以江格尔为首的众英雄，他们都生机勃勃，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坚强不屈，他们光辉灿烂的形象，如同十五的月亮照耀全诗。他们的精神也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对于《玛纳斯》和《江格尔》，它们的很多篇章已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得到国际上的重视。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学者在从事这两部史诗的专题研究。这两部史诗都是少数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无疑，这两部史诗也是中国艺术宝库中的珍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且，就像《荷马史诗》是希腊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一样，《玛纳斯》和《江格尔》则是柯尔克孜族人民和蒙古族人民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 ● 木卡姆之谜



### 四、十二木卡姆

著名的历史学家季羨林先生曾说：“全世界历史悠久、范围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只有四种。它们在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国家。然而，这些文化的荟萃之处只有一个，它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位于古代交通线“丝绸之路”枢纽处的维吾尔民族自古以来便同邻近国家在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知识等方面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所以维吾尔民族为丰富中华文化、丰富东方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是决不可忽视的。维吾尔族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及之后的文明史正是一部完整的维吾尔文化史。而处于这个整体之中的维吾尔族离开了十二木卡姆就根本无法解释维吾尔文化史。维吾尔音乐十二木卡姆是东方音乐文化的无价之宝，它像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英雄史诗一样，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是维吾尔音乐之母，是新疆这个“歌舞之乡”的象征，“是流传千余年的东方音乐历史上的巨大财富”。我们这里所说的十二木卡姆就是指叶尔羌汗国时代在著名的木卡姆学家喀迪尔汗等人和阿曼尼莎罕王后共同主持下，根据维吾尔族乐曲规律，重新整理使其成套化和系统化的大型音乐主体，并不包括各个地区独具特色的地方歌曲。可是提到十二木卡姆，就不能不让人先产生一个疑问：什么是木卡姆？由于“木卡姆”这个术语来自阿拉伯文，因此木卡姆的起源引起了不少推论：有人认为木卡姆来自阿拉伯半岛的汉志地区；有人认为源自中世纪的波斯；有人认为源自中世纪的印度；有人认为是来自中亚……而关于木卡姆的含义，则或解为“音乐史诗”，或释成“调式”，至于木卡姆的形成及其发展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这一切，都成了一个“谜”。“木卡姆——也称“马卡



姆”、“玛卡玛”，都是阿拉伯文的不同音译，是伊斯兰音乐中的一个特有名称，有“曲”、“调”、“古典音乐”等含意。作为伊斯兰音乐的共同财富，木卡姆分布地区很广，种类繁多。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印度以及中亚等地均有木卡姆，但就其种类来说，目前在世界上，新疆的木卡姆种类最多，结构形式也最完整。

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作“博雅婉”，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经不断融合，衍变发展形成了组曲——木卡姆。

相对于传说，追溯木卡姆的历史渊源，则必须与曾兴盛一时的龟兹乐、于阗乐等联系起来。我国的二十四史中记载了现在新疆（甚至延续到张骞及其同伴们去过的西亚这一广大地区）的哈密地区有“摩诃兜勒（mahadur）”大曲的名称。这是公元前1世纪时的情况，它说明在这一地区，公元前木卡姆式的大曲就已经存在了。而汉武帝宫廷乐师李延年以“摩诃兜勒”大曲为基础创造了新声二十八解，更是证明来自哈密的这个大曲是重要的乐曲。但是，很明显汉语中的“摩诃兜勒”这个词并不是意译，而是音译的，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词呢？它是不是和公元4世纪前后用龟兹文记述的《艾尔乃姆的故事》中所说的维多萨迦和他的五个徒弟的《玛卡——雅玛（maqa-jama）》乐曲中的玛卡一词有联系呢？是“玛哈都尔（mahadur）”——伟大的木卡姆吗？这无疑关系到木卡姆的起源问题。但这幅文化史上久远的景色至今仍然十分迷茫和模糊……

众所周知，到隋唐时期，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已在中原乐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代中叶，除了一般的乐舞外，一部分属于“穷乃合曼”

（它是以后十二木卡姆音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即大曲）类型的俗乐也进入了长安。见于史的有“伊州





乐”、“龟兹乐”、“高昌乐”等等，这些乐曲也都为以后十二木卡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历史的车轮驶入10世纪之后，西域大地上相继出现了三位在伊斯兰音乐中堪称伟大神秘的人物：一个是法拉比（870—950年）；一个是伊本·西纳（980—1037年）；另一个是纳瓦依（1441—1501年）。他们对于以后十二木卡姆的形成可谓功勋卓著。

喀喇汗王朝时代的音乐家法拉比，编著了《音乐大全》等书，并模仿龟兹琵琶五弦，对乌德乐器（琵琶）进行了改革，在五弦琵琶的基础上把阿拉伯音乐提高了十八调，最重要的是，他把以前波斯、阿拉伯音乐通常用的九律延长到十七律，形成了波斯、阿拉伯的典型乐系。

法拉比的学生，思想家伊本·西纳吸收了西突厥汗国以来突厥文化的营养，在自己的《医疗书》、《尼加德书》等著作中提倡突厥音律中的十二音调形式。他通过苏美尔·巴比伦和摩尼教中重新崛起的将“十二”视为神圣的观念，以十二品律传统和以前歌曲音乐中的组合为基础，推出了十二套曲。到13世纪，阿塞拜疆的突厥人安勒乌尔买维首次把“木卡姆”一词作为十二套曲音乐体系提了出来。

察合台汗国时的撒马尔罕人纳瓦依，在法拉比和伊本·西纳所创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他把一系列木卡姆的名称如：“等级”、“住地”、“地方”包括音调都作为双关词使用，甚至直接提出“木卡姆”就是声音的形式的观点。他的艾则里（抒情诗）诗中就曾暗示：木卡姆的这一名称也就是地方的名称，往往一语双关，既是木卡姆名称，又是地名。例如：“哦！纳瓦依，我尽情弹唱伊迦孜乐曲，接下来，就要弹唱依拉克曲或是埃介姆乐曲了！”也可译为：“哦！纳瓦依，我一直有远游伊迦孜的愿望，而眼下，我可要去依拉克或埃介姆了。”伊迦孜、依拉克、埃介姆三个词都是双关的，既是木卡姆曲名，又是地名。诸如此类的词汇的双关意义在当时被广泛使用，它们已经普及到文字游戏的程度了。

伴随着木卡姆生命的并不总是神秘和奇异，当16世纪来临的时候，一个美丽的姑娘和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的出现，使这种维吾尔古典音乐走入了高潮。

## ● 绝代佳人绝代歌

公元16世纪初，赛依德汗苏丹（1490—1533年）从正在崩溃的察合台汗国后裔手中夺取了政权，以叶尔羌为砥柱建立了赛依德王朝，史称叶尔羌汗国。自此，天山南部地区、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伊赛克湖地区、费尔干纳盆地等地区都归其统治，同时，在这个强大的汗国里也出现了自喀喇汗王朝之后的另一次文化繁荣。

1533年，赛依德汗死，其子阿不都热西提汗继位。阿不都热西提汗颇有才华，他不仅是诗人，还是一个音乐家和书法家。相传，一次阿不都热西提汗率领大臣、官员、卫士，从首都叶尔羌出发沿着塔里木河岸，来到卡勒玛克戈壁，他们在那打了几天猎。每天夜晚，苏丹都要化装成农民，穿着破烂衣服，装出一副可怜样子，以一个投宿者的身份到乡村土屋里去借宿，借以体察民情。一天晚上，他来到一个颓垣断壁的土屋前并进去借宿。这个屋的主人是个打柴人，名叫马合木提，他有个女儿叫阿曼尼莎罕。苏丹进去后，见墙角上挂着把弹拨尔，就请主人给弹几首乐曲。马合木提说：“我不会弹，这琴是我女儿的。”苏丹说：“那就请你女儿弹弹吧。”马合木提便让阿曼尼莎罕弹奏，阿曼尼莎罕拿起弹拨尔奏起“盘吉尕”木卡姆，并唱道：“我们



阿曼尼莎罕





的主啊，万分感谢你，你把一个公正的人封为国王，阿不都热西提汗为弱者穷人遮住炎阳。……乃裴斯啊，要为神圣的胡大祈祷，如若不为公正的国王祷告，就要受到狠狠的惩罚……”她的弹唱异常绝妙，使苏丹感到万分惊奇。当她唱完，苏丹急忙问道：“名叫乃裴斯的诗人是谁？这首格则勒是从哪儿学的？”姑娘说：“难道我非要背诵别人的格则勒不成？我只读纳瓦依·裴祖里·翟利里的诗。刚才演唱的是我自个写的，乃裴斯是我的笔名。”苏丹问姑娘有多大了，马合木提说13岁了。听到此话，苏丹更是惊叹不已。这中间，阿曼尼莎罕又站起来朗诵了几首诗，这些诗不仅写得深刻，而且文笔非常漂亮。苏丹不信是她写的，就对她说：“那么再写首诗给我看看。”于是姑娘拿起笔墨纸张，写了如下小诗句：“胡大啊，我面前的这个奴仆把我愚弄，今晚顿觉屋子里荆棘丛生。”苏丹笑了笑说：“相信我吧，但别讥笑。”接着他说：“我出去一会儿再来。”这时，苏丹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阿曼尼莎罕。他回到卫士驻地后，把情况向大臣、官员说了一遍，然后头戴王冠，披上斗篷，准备了10头羊和茶叶、绸缎，又带了4个官员来到马合木提家里。他向主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然后请求主人把女儿嫁给他。于是，阿曼尼莎罕就成为了叶尔羌汗国的王后。

阿曼尼莎罕美丽动人，从小爱好民间音乐赛乃姆和麦西热甫，并对维吾尔古典诗歌有浓厚的兴趣，她自己还擅长写诗、弹琴、唱歌。进入宫廷后，阿曼尼莎罕萌发了改革木卡姆的想法，阿不都热西提汗知道后，非常高兴并给予她极大的支持。在她开始工作后，曾遭到依禅和卓穆罕默德·赛里甫的抵制，但却得到广大维吾尔人民的支持。这时，阿不都热西提汗请木卡姆演唱家——高明的音乐大师喀迪尔汗加入到这项工作中，这样阿曼尼莎罕的工作便坚持了下来。

在阿曼尼莎罕的主持和喀迪尔汗的引导下，对当时的木卡姆从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一，使维吾尔木卡姆与其他民族木卡姆之间的混杂情况得到了改革。维吾尔人民是在10世纪接受伊斯兰教的，而法拉比正好是10世纪在伊斯兰地区开展了他的音乐活动。维吾尔木卡姆流传到巴格达、大马士革，以及阿拉伯——伊朗的乐曲传入中亚和维吾尔地区的情况，一直继续到15—16世纪。此时，阿曼尼莎罕觉察到了民族学在



中亚、钦察戈壁、花刺子模有重新形成以及分散的政权统治有加强的势头。她根据当地维吾尔传统的木卡姆民族调式的特点，按照7个主音、5个副（半）音调式，使维吾尔木卡姆得以整理规范，成了“十二木卡姆”；其二，这次改革，使“木卡姆”的概念扩大了。以前，木卡姆的概念表示篇幅较大的一个或好几个调式，到后来木卡姆的概念则表示诸麦西热甫简短的序乐，在这之后它表示除达斯坦·麦西热甫之外的穷乃合曼（大曲）。阿曼尼莎罕、喀迪尔汗则以木卡姆发展的新形式，组织了现在的由“穷乃合曼”、“达斯坦”、“麦西热甫”这三大大部分组成的巨大篇幅和按照一种调式给以配套组合的“十二木卡姆”。在这项工作中，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先前“穷乃合曼”中的散序、太孜和带舞的朱拉·赛乃姆的传统，以及民间麦西热甫中最初的穷乃合曼作为散序，然后向带歌唱的舞蹈过渡的传统，并使之扩大；其三，在阿曼尼莎罕的主持下重新确定了木卡姆歌词。以前的歌词一方面充满了晦涩难懂的阿拉伯——波斯语句，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一直未能从极其陈旧的充满宗教色彩的宫廷诗词上摆脱出来。而在阿曼尼莎罕和喀迪尔汗的努力下，木卡姆的歌词改用了流畅的、文雅的回鹘——突厥诗词，其内容则多以纳瓦



阿曼尼莎罕麻扎



依的抒情诗为主。同时，阿曼尼莎罕和喀迪尔汗自己也都写下了许多诗词填入木卡姆曲调，比如阿曼尼莎罕创作了木卡姆乐舞“欢乐行”，喀迪尔汗创作的“维沙勒”木卡姆等。阿曼尼莎罕和喀迪尔汗对木卡姆演唱艺术所做的贡献，是与他们能够对历史资料和当时民族学的变迁的分析，以及能预见其后果联系在一起的。舍此，任何高超的乐师都不能窥测到这种历史必要性。

阿曼尼莎罕可谓是一个奇女子，她是从中亚突厥人民中间涌现出的著名诗人孜布吐莎伯克、娜蒂莱·热比亚、欧皖依斯等人中的佼佼者，她的有关妇女和品德方面的作品《美德》、美学作品《心灵的协商》和抒情诗集《精美的诗篇》都十分引人注目。但阿曼尼莎罕（1534—1567年）的生命令人扼腕的短暂。正当她在才华横溢的青年时期，在34岁因生育而去世了。阿不都热西提汗深爱着他美丽多才的妻子，他为阿曼尼莎罕写了许多挽歌。在阿曼尼莎罕逝世不到三年的时候，阿不都热西提汗也追她而去。而这段爱情故事和这位奇女子的事迹却随“十二木卡姆”的流传而为后人所世代传诵下来。

维吾尔木卡姆，经过16世纪的规范整理和定型直到20世纪，经历了400多年漫长岁月。在此期间，它虽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但是木卡姆的主体、形态、结构、排列顺序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成为现在所说的不朽音乐——十二木卡姆，成为维吾尔族人民的骄傲。

## ●十二个月亮



古维吾尔人崇尚黄道十二宫，于是他们取“十二”为吉祥数，加在木卡姆一词前，称为“十二木卡姆”。寓意在浩瀚的夜空，闪烁着亿万颗星星，其中最耀眼的要数十二个星座。维吾尔人也有无数的歌曲，其中最精华的要数“十二木卡姆”。

叶尔羌汗国时代的著名维吾尔族学者、诗人和音乐家喀迪尔汗·叶尔羌也高度地赞美十二木卡姆。他写道：“当我弹起心灵的琴，我的心

底就是无际的乐园，那迷人的歌像百灵飞窜在麦西热甫乐曲中间。十二木卡姆套曲像是十二个月亮照亮每个人的心田，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万众欢乐的源泉。”

天空有黄道十二宫，每个宫由三个星座组成，维吾尔的十二木卡姆，每个“木卡姆”也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穷乃合曼、达斯坦、麦西热甫。演出时均按此顺序进行。而所谓“十二木卡姆”的十二套大组曲，它们的名称是：1、拉克；2、且比亚特；3、木夏乌热克；4、恰尔尕；5、潘吉尕；6、乌扎勒；7、艾介姆；8、乌夏克；9、巴雅特；10、纳瓦；11、西尕；12、依拉克。这十二套大组曲都有自己的音乐特色。乐曲中有序歌、叙诵歌曲、叙事组歌、舞蹈组歌、间奏曲等等，体裁多种多样，曲调极为丰富。伴奏的乐器有沙塔尔、弹拨尔、热瓦甫、手鼓、独他尔等。

十二木卡姆的歌词主要归功于察合台文化时代著名的诗人鲁特菲、纳瓦依、诺毕提、麦西热甫、依瓦依答、傅祖勒等人，自从阿曼尼莎罕将纳瓦依、傅祖勒等诗人的许多诗词填入木卡姆曲调，后继的木卡姆音乐家就不断地用纳瓦依、孜莱丽、麦西热甫等著名诗人的珍贵诗词来丰富十二木卡姆：如《热克木卡姆散序》唱的是纳瓦依的一首富有哲理性的政治抒情诗：“爱的秘密，问那些离散两绝望的情人；享受的技巧，问那些掌握着幸运的人。爱情不贞，就是命运对我们的注定；欺骗和背信，问那些缺乏慈爱的人。时间的辛劳使我们消瘦又苍老；美丽的力量，问那些拥有青春的男女。孤独的滋味，富贵有权的人不懂；穷困的苦楚，流浪者了解得最深。弱者的处境——爱侣们只有等待死亡来临，谁能下死亡的判决，是那残横的暴君。被猜忌的爱侣们所感受的滋味，好人不会知道，要请教我这样的坏人。朋友们！纳瓦依生活在爱的戈壁里，要知道他，去问那里来的旅群。”

虽然，其他诗人的诗词在十二木卡姆中也不少出现，如喀迪尔汗的诗：“木卡姆是黎明的晨风，它是世上哈伦（套曲）的前奏，百灵在它面前也觉得惭愧，世上再无超过它的价值。”又如麦西热甫的诗：“你要远离仙女般的姑娘，在她们面前死亡，不如忍受孤独。语言劝不住失恋的人，痛苦和失恋是一对双生婴儿。”还有胡迈达的诗：“哎，迪丽

# 新疆两千年

拜尔，你让我在你爱情的路边休息一瞬，让我们再仔细看看你的美容。胡迈达的心已被你占据，我总想和你共枕在一起。”他们的诗词和纳瓦依诗词一起，使十二木卡姆的音调更加充满魅力。但是，纳瓦依的歌词以其内容上的别具一格，语言上的善辩，巧妙的人物刻画，想象上的深入，思想上的崇高而别于其他诗人的歌词。尤其纳瓦依在关于爱情的歌词中，技高一筹，就像他在歌词中写的一样：“纳瓦依笔下的爱情描述谁也比不上，语言是火，笔是利剑，诗行是山峰。”十二木卡姆歌词中，纳瓦依写下的爱情名篇比比皆是，比如有一段这样写道：“你的眼眉像是圣坛，你的心在思念着我，不是别人？你的容颜温和，你明亮的心在思念着谁？”还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谁的心灵上压满了爱的忧伤，他会觉得自己的孤单，最终会死亡在爱的火山之间。曾有人死在姑娘的两条辫子上，也可能死在默合麦德写的两行文字中间。”纳瓦依在关于爱情的歌词中，宣扬一种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对不忠贞的人只有愤怒的利剑，对于饱经忧伤的人给予爱抚。纳瓦依把爱情这一主题当作诗歌的旗帜，宣扬公正与善良并使这一主题贯穿于爱情生活的各个领域。他和别的诗人所填的这些极富音乐性的木卡姆歌词，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为争取自由和幸福的爱情所作的斗争。

“十二木卡姆”中的达斯坦部分的唱词，则是由民间叙事诗组成的。作为木卡姆中叙事音乐部分的达斯坦乐章，都是选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产生过共同的艺术效果的民间传说、民间传奇和民间诗歌。“十二木卡姆”中就有《艾里甫与赛乃木》、《赛诺拜尔》、《迪拉热姆》、《巴巴·茹仙》等民间叙事中的代表性片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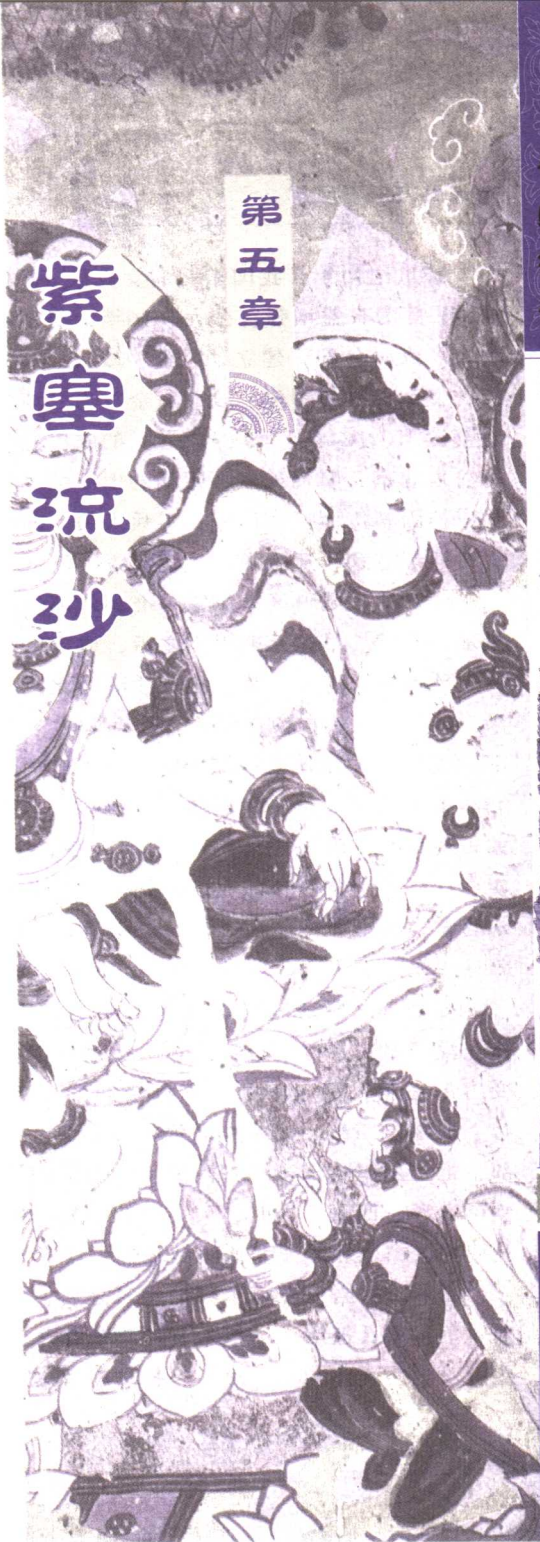
十二木卡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会有各自不同的歌词。但在南疆边远村庄里，用相同的木卡姆音调唱着波斯歌谱的老人，在今天也常能见到。总的说来，十二木卡姆的歌词都还是古代诗人写的歌词，这些歌词使木卡姆这朵芳香溢人的鲜花更加娇艳，并且有无可比拟的娇容。

十二木卡姆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作为维吾尔人民心中的神圣的艺术之神，为人民提供了精神力量和美学享受。从前，它以不可言状的程度颤动着人们的心弦，同人们的心理发生共鸣而合为一体，随着时代的前进，十二木卡姆将更具光彩。



第五章

紫塞流沙



乱，为统一西域，加强边疆与中原的交流，联系做出了重大努力。

西汉以来就成为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到了清代初期，中央政权先后平定多次叛乱。紫塞，古时指边塞，此句描绘的是西域边关的独特风光、磅礴气势。西域，自『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他的边塞诗《边庭落日》中，曾有『紫塞流沙北』之



## ●天戈万里下风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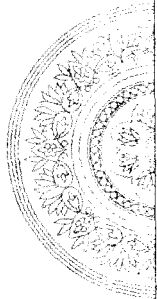
17世纪初年，我国东北的女真族（后称满族）势力日益增强。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皇太极继皇帝位，改“后金”为“清”，建都沈阳。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明朝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因私仇而投降清军，引兵入关。顺治皇帝迁都北京，开始了统一全国的斗争。

此时的西域地区，以蒙古准噶尔部的力量最为强盛。早在元朝灭亡之后，成吉思汗的子孙就退归塞外，驻扎在大沙漠南北，逐渐形成漠北蒙古、漠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部。这些蒙古部族之间相互攻打，还经常南下骚扰内地。后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用征讨、联姻和结盟的办法，把漠南蒙古征服了。清朝设立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把漠南蒙古分为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这样漠南蒙古各部成了清朝当权者最可靠的朋友。漠北蒙古又叫喀尔喀蒙古，继漠南蒙古之后，也跟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每年向清朝进献一头白骆驼、八匹白马，称为“九白之贡”。

可是，这时还有居住在天山以北和伊犁河流域的漠西蒙古不肯合作。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在清代也称卫拉特，是由明朝制造“土木之变”的瓦剌发展起来的。厄鲁特蒙古包括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准噶尔四部。其中准噶尔部最强大，它兼并了和硕特部和杜尔伯特部，把土尔扈特部排挤到俄国伏尔加河流域一带，又把和硕特部的人赶到了青海、西藏。当时，天山以北全是准噶尔部的势力范围，所以今天我们把天山以北的大盆地叫做准噶尔盆地。

当噶尔丹当上准噶尔部的头目之后，他利用天山以南伊斯兰教的派别斗争，出兵征服了塔里木盆地，他在位时，准噶尔部的势力达到了鼎盛阶段。公元1688年，噶尔丹越过阿尔泰山向东进军，想占领漠北广大

一、无边瀚海定





地区。喀尔喀各部抵挡不住准噶尔骑兵，只好奔向漠南请求康熙皇帝加以保护。康熙派人劝说噶尔丹返回阿尔泰山区，退还喀尔喀故地。但噶尔丹自认为兵力强盛，根本不把康熙的命令放在眼里，他向康熙致函说：“你做南方的皇帝，我做北方的君长。”然后率领10万大军到漠南蒙古乌珠穆沁草原，想和康熙帝一较短长。

康熙见噶尔丹如此猖狂，不但已经成为统一西域的大碍，而且威胁到内地的安全，就在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秋高气爽、草肥马壮的时候下令征讨。他亲自率兵驻扎在长城口外，任命他的哥哥裕亲王为大将军，在离北京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展开决战。

噶尔丹从未与清军正式交过锋，还不知深浅。他依山列成“驼城”，把1万峰骆驼捆住脚，让它们卧在地上，又在骆驼背上搭起箱垛，盖上湿毡，然后让主力部队隐藏在“驼城”之内，从箱垛的空隙放枪射箭。清军隔河列阵，先用大炮轰击“驼城”，打死许多骆驼；骑兵、步兵随后冲杀过来，大败准噶尔军。噶尔丹这才知道打不过清军，当晚就把军队撤到高处，第二天一大早，派随军的西藏喇嘛到清营求和。

大将军裕亲王马上派人向康熙帝报告，又派使臣到噶尔丹营内，让噶尔丹向“威灵佛”起誓，保证不再向内地进犯。噶尔丹连忙当着使臣的面跪在“威灵佛”面前磕头，样子显得很虔诚。使臣看到这种情况，



就放心地回去了。康熙得到噶尔丹乞降的报告，担心大将军受他愚弄，当即派人去对裕亲王说：“噶尔丹为人狡猾，不可不防。”没想到这个命令还没有到达，噶尔丹已经拔营走了。

噶尔丹丢下辎重，狂奔不止，沿途放火烧毁了草场，想断绝清军追路。士兵一路病死、饿死的不计其数，回到老家一清点，10万大军只剩下几千人。

噶尔丹失败之后，并不死心。只过了5年，他又率领3万骑兵侵入巴颜乌兰，大肆掠夺，还扬言借来了俄国鸟枪兵6万，要兴兵深入内地。

康熙皇帝接到消息，决定第二次亲征。他命东三省清军为东路，陕甘宁地区清军为西路，自己亲率中路大军浩浩荡荡向大漠进发。清代诗人褚廷璋《西域诗》中“天戈万里下风霆”之句，就是描写这支大军横扫叛匪的雷霆万钧之势。康熙率大军日夜兼程走了两个多月，终于到了噶尔丹的驻地克鲁伦河。当天，他就派使臣渡河到噶尔丹大营，约他次日决战。

噶尔丹根本不信康熙皇帝会亲征至此，他放声大笑说：“哪能来得那么容易！”可是，当他登上克鲁伦河边的北孟纳山，见到河南岸清营黄幄龙纛，十分鲜明，大兵屯集，漫无边际。他吓得六神无主，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哪能来得那么容易！哪能来得那么容易？”随后跌跌撞撞地回到军营，闷头不语。当天晚上，他故伎重演，丢下营帐辎重，率领部众向西逃走了。

次日清晨，清军前来决战，只见噶尔丹的营盘已空无一人。康熙马上派人通知西路大军火速阻击敌人。几天之后，西路清军与噶尔丹在昭莫多山下相遇并展开决战。西路军大胜，噶尔丹只带着几十个亲信逃走



康熙大帝

了。康熙得到战报，十分高兴，命人在昭莫多山上树立石碑，记述此事。

这时候，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得到康熙皇帝的支持，占领了准噶尔故地阿尔泰山以西的地方，同噶尔丹作对。噶尔丹想回老家又回不去，只好收集残兵败将，在阿尔泰山以东地方游荡，靠打猎捕鱼过日子。同时，因为噶尔丹连年兴兵打仗，弄得准噶尔人长期不得安宁，人们越来越怨恨他，追随他左右的人纷纷离去，最后只剩下1000多人，康熙得知这个情况，就派人去对他说：“只要你肯投降，入朝谢罪，皇上一定依照优待喀尔喀蒙古的规格招待你。”但是噶尔丹不肯认输，拒绝了劝降。

为了免除后患，康熙在公元1697年第三次亲征。噶尔丹连忙派他儿子到哈密借兵，没想到哈密王把他的儿子捆起来献给了清朝。他左右的亲信不是远逃就是投奔清营。无论噶尔丹把营帐扎在哪里，都不断地收到告急的警报，弄得他疲于奔命，连个囫囵觉都睡不了。他常常迷惑不解地对周围人说：“世界上的人真的不一样吗？听说皇上无论走到哪里，那里的沙滩就要涌出甘泉，石头上也生出青草，是天助他吧！我部下的人都投奔他去了，是人助他吧！如今我如何是好呢？”后来，噶尔丹在绝望中服毒自尽。他的手下人把他的骸骨和女儿钟齐海献给了康熙皇帝，追随他左右的300户人也全部投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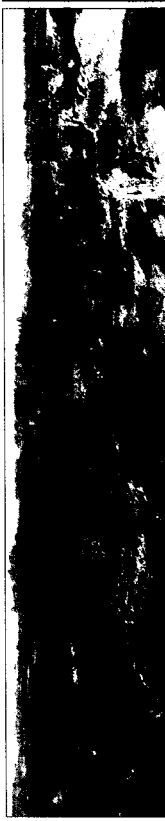
康熙皇帝下令赦免准噶尔各部侵扰内地的罪过，封噶尔丹的儿子为一等待卫。又把喀尔喀蒙古各部增编为55旗，命令他们回阿尔泰山以东故地驻牧。他还下令在狼居胥山建立一块石碑，记述了平定噶尔丹这件大事。

## ●无边草色入天青



清朝康熙皇帝文韬武略，才智非凡，他在我国历代帝王中，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在统一西域问题上，就可以充分看出他的过人之处。

康熙统治前期，清朝的军力和国力都不很强盛，三讨噶尔丹又使国



# 新疆两千年

库将近空虚，同时，准噶尔部内部的情况仍很复杂，此时兴兵统一西域还未到最佳时机。因此，噶尔丹败亡之后，康熙对准噶尔采取了“严兵以待，诱至邀击”的方针，没有立即进军准噶尔，而是划定阿尔泰以西的地区为准噶尔部的游牧地。

公元169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在伊犁称准噶尔汗，并派使到北京请安纳贡。为了加强经济实力，策旺阿拉布坦除重视发展传统的畜牧业外，还提倡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一时间准噶尔牧地千里，牛肥马壮。甚至还建立起呢绒、皮革、布匹、造纸、造炮、冶炼等手工业作坊，其中尤其以兵器制造及冶炼的规模最大。准噶尔“控弦近百万人，马驼牛羊遍满山”，势力大增。

18世纪初，沙皇俄国的侵略魔爪已经触及我国的西北边疆，策旺阿拉布坦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坚决斗争。1715年10月，沙俄侵略军4000多人侵入准噶尔管辖的亚梅什湖畔，修筑堡垒，策旺阿拉布坦派兵2万击退了沙俄侵略军。1719年，俄军400余人侵入斋桑泊，策旺阿拉布坦派其子噶尔丹策零率军反击，沙俄侵略军战败北还。

1715年，由于归属清朝的哈密王阻截准噶尔商队到内地贸易，策旺阿拉布坦派兵报复，攻掠哈密。清政府一面派兵援助哈密，一面调解纠纷，但策旺阿拉布坦一意孤行，拒绝调解，从此与清朝关系破裂。1717年，策旺阿拉布坦派其弟大策零敦多布率军侵袭西藏，攻占拉萨，杀死拉藏汗。次年，清军入藏，大策零敦多布战败退出西藏。史学家评论说，进攻西藏是策旺阿拉布坦一生中的重大过错，但他发展准噶尔社会经济，为保卫祖国领土做出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策旺阿拉布坦死后，其子噶尔丹策零继汗位。他基本上继承了其父的政策：发展经济，抗击沙俄，对抗清朝。1729年，噶尔丹策零派兵击破清军布置的哈密——阿尔泰山防线之后，连年发兵进攻喀尔喀蒙古，1732年，噶尔丹策零在漠北被喀尔喀部和清兵的联军击败，由此一蹶不振。

公元1745年（清乾隆十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死，这位强悍的首领一死，准噶尔部马上陷入内乱纷争，这就给虎视眈眈的沙俄创造了侵略的机会，此时已经到达鼎盛时期的清朝看到统一西域已迫在眉睫。终



于，康熙皇帝未竟的事业留在了他的孙子，一位同样很有作为的帝王——乾隆来完成。

准噶尔内部经过一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连环厮杀之后，由策旺阿拉布坦的侄孙达瓦奇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夺得汗位。而阿睦尔撒纳是真正的野心家，他自恃功高，横行无忌，与达瓦奇的矛盾日益尖锐。二人的冲突公开化以后，阿睦尔撒纳不是达瓦奇的对头，便以退为进，率众2万投奔清朝。他定一条借刀杀人之计，极力向清廷诉说达瓦奇如何暴虐荒淫，不堪一击，欲假手清军除去自己的敌人。

公元1755年，乾隆派两路大军直攻达瓦奇的大本营博尔塔拉。乾隆并非看不出阿睦尔撒纳的用心，他顺势采取了以“准”攻“准”的策略，指示道：“此次即满兵亦不出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乾隆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和北路军副将，以归降的准噶尔军为主力。实际上乾隆出的力只是给征讨大军一个“清军”的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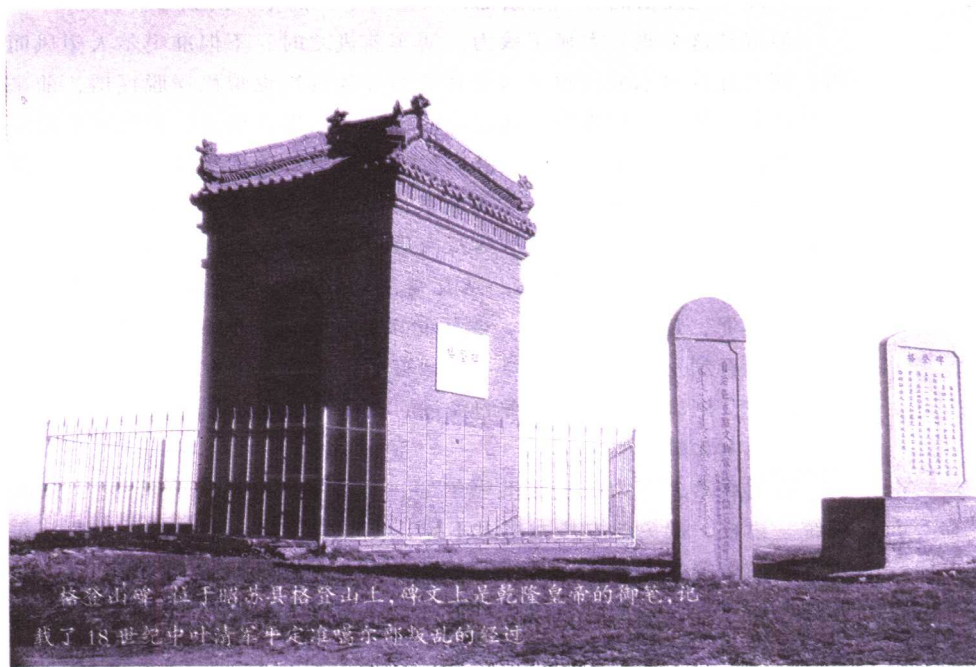
但就是这个旗号大显了威力。清军前进之时，不但准噶尔人望风而附，而且在准噶尔的压迫下深受其苦的各族百姓也乘机摆脱桎梏，前来归顺清朝，协助清军作战。达瓦奇的统治虽然迅速崩溃，但他并不肯主动投降，而是退往格登山，负隅顽抗。素以勇武著称的清军军官阿玉锡带领24名勇士夜登格登山，奇袭准军，以25人收降准军7000余人，立下奇功。达瓦奇则带领贴身随从落荒而逃，他翻越天山逃到乌什，被乌什伯克霍集斯擒获，押送北京。达瓦奇表示归顺，乾隆皇帝采取怀柔政策，免其罪，还封他为亲王，赐住北京。在今天伊犁境内的格登山上，我们仍能看到一座当年由乾隆亲笔题写的记功碑，上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记载着平定达瓦奇的经过。至此，准噶尔汗国灭亡，清政府统一了天山北部。

清朝积蓄多年力量平定准噶尔部，是为了“众建而分其势”，以实现统一集权，避免地方势力尾大不掉，再形成封建割据局面。为此，在出兵之前乾隆皇帝就指示，平定准噶尔部后仍然要设立四个卫拉特汗，并已内定了人选。野心勃勃的阿睦尔撒纳仅为四汗之一，他心里恼火，始终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政府颁发的印，而以卫拉特四部总汗自居，



妄想专制西域。对卫拉特各部他则否认曾投附过清朝，说是由他自己率领满、汉、蒙古军队来平定达瓦奇。乾隆听说了他的行为，为防止他叛乱，就下令让他9月到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朝见。阿睦尔撒纳迟迟不肯动身，后乾隆多次派人催促，他才启程。但走到半路，他心虚胆怯，便逃回伊犁，利用清军大队人马已撤走，只有500人留守的机会，煽动各部发起叛乱，劫掠军台，围攻清军，留守的清军全部战死。

乾隆盛怒之下，于1756年派两路大军西征，长驱直入。阿睦尔撒纳抵挡不住，便逃亡哈萨克，投奔中玉兹汗阿布赉。沙皇政府知道后，连写四封信给阿睦尔撒纳，劝告他加入俄国国籍，欲借机侵略中国。只是由于阿睦尔撒纳受到阿布赉的监视，沙俄的阴谋才未得逞。清朝大军一撤，阿睦尔撒纳就潜回伊犁，再次作乱。乾隆派出名将兆惠再征伊犁，并嘱咐“除恶务尽”。兆惠是和阿玉锡一样的孤胆英雄，他只带80名士



格登山堡 位于昭苏县格登山，碑文上是乾隆皇帝的御笔，记载了18世纪中叶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的经过。

兵，专挑深夜、大雾时进攻，又用计赶跑敌人马群，使其无法奔逃，大破敌军。阿睦尔撒纳再次逃往哈萨克，不料此时哈萨克中玉兹汗阿布赛正要归附清朝，欲拿他当见面礼。阿睦尔撒纳无奈，只得徒步逃往俄国。清政府与沙俄曾订立条约，互相引渡逃犯，但清政府多次照会俄国，要求引渡阿睦尔撒纳，沙俄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将他保护起来。2个月后，阿睦尔撒纳得痘症而死，俄国才充好人，将其尸骸还给中国。

至此，“无边草色入天青”，西域重新归入清朝版图，同时沙俄对我国领土的鲸吞蚕食也得以遏制。

清朝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同地方割据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乾隆把平定地方割据重新统一的地区，一律称为“新疆”。四川的大小金川（金沙江地区）、云南的乌蒙山区、贵州东南的古州和西南的安顺、镇宁等地，都曾被称为“新疆”。平定准噶尔后，西域被称作“西域新疆”。19世纪初，伊犁将军松筠主持编成《伊犁总统事略》一书，1821年，道光皇帝钦定书名《新疆识略》。自此，“新疆”即成为“西域新疆”的专称，一直沿用下来。

## ● 二万舆图通指掌



准噶尔被平定了，但从准噶尔贵族手中解脱出来的天山以南地区并未就此太平，因为“大小和卓”之乱旋即又起。明朝末年，天山以南产生了和卓的势力。“和卓”二字，是阿拉伯语的译音，意为“圣人的子孙”，所以，凡是和卓，都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据说，天山以南的第一个和卓名叫玛墨特，是16世纪从撒马尔罕迁来的，深得察合台汗后裔的信任。玛墨特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在宣传教义上产生分歧，长子伊敏创立了白山派，次子依沙克创立了黑山派。

1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在天山以南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和卓在教徒中的影响和权力也越来越大，察合台后裔大权旁落，很不甘心。当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斗争激化时，察合台汗伊斯玛也勒积极支持黑山派打击白





# 新疆两千年

山派阿柏克和卓，企图收回一部分权力。阿柏克逃到西藏，求助于达赖喇嘛。达赖写信给噶尔丹，求他帮助阿柏克。噶尔丹就借势出兵，废除黑山和卓，扶立阿柏克和卓为傀儡，将天山以南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到噶尔丹策零时，白山和卓阿哈玛特不甘永作傀儡，就起事反抗，但被噶尔丹策零击败，连同大儿子博罗尼都、小儿子霍集占一起被软禁起来。清军平定达瓦奇后，将他们救出，然后让博罗尼都统治天山以南，让霍集占在伊犁掌管当地的维吾尔族。他们俩就是历史上的“大小和卓”。

大小和卓在清朝的帮助下才一跃从阶下囚变为天山以南地区的统治者，但他们却忘恩负义，先后背叛了清廷。先是小和卓追随阿睦尔撒纳叛乱，失败后潜逃回新疆天山南部地区，打着“反对异教徒”的口号煽动反清叛乱。大和卓最初还犹豫不定，认为清政府“恩不可负”。但小和卓很快网罗和胁迫了一批军政显要人物和白山派信徒，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反动势力，大和卓经不住狂热的宗教蛊惑，最终也成为叛乱首领。

公元1757年，小和卓在库车打出“巴图尔汗国”的旗号，自称“巴图尔汗”，与已经统一新疆的清朝中央政府决裂，发动叛乱。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地先后卷入。库车的阿奇木伯克鄂对反对叛乱，逃往伊犁投奔清军，残酷的小和卓下令捕杀了鄂对的全部家属。

清朝对付“大小和卓”的办法是“先软后硬”。先派招抚使前去招降，小和卓将招抚人员全部杀害。这一来，清朝就完全将叛军置于不义之地。1758年，清政府派出平叛大军，先以雅尔哈善为将军，后来此人因贻误战机被斩，改派在平定阿睦尔撒纳战役中立功的大将兆惠领兵进剿。

是年秋天，兆惠统兵4000进攻叶尔羌，在城东喀喇苏河边扎营，喀喇苏河译成汉语就是“黑水”，所以这支军队称为黑水营。由于后继部队未能及时赶上，黑水营遭到大小和卓军队的围困，但是久攻不下。这支清军缺少弹药，兆惠就定下“草船借箭”的妙计，他让部下故意引诱敌人开枪放炮，使枪炮都打在树上，然后清军砍树当柴，挖出铅弹数万颗，从而解决了弹药问题。黑水营真是福星高照，在他们耗尽粮草后，居然在挖水渠时挖到了先前维吾尔人民为防止准噶尔贵族抢劫而窖藏的



晚清和田统领和他的儿子及卫兵

粮食，因此固守3个月，毫发无损。1759年1月，清朝援军到达，大破叛军，大小和卓战败分别逃窜至喀什噶尔和叶尔羌。

1759年夏，清军“宜将剩勇追穷寇”，分兵直取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大小和卓自知大势已去，疯狂抢劫当地人民后，逃往巴达克山国。巴达克山国国王苏勒坦沙将大小和卓擒住处死，同时遣使向清朝表示归附。大小和卓贪心不足，意欲分裂祖国，最终只能落个身首异处。

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彻底完成了重新统一新疆的伟大事业。当时的著名诗人王芑孙有感于祖国的辽阔幅员，赋诗道：

“二万舆图指掌通，  
大荒直北是西濛。  
冰天火地皆尧壤，  
一发祁连界画中。”

在反对大小和卓的分裂主义的过程中，有一位少数民族领袖人物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就是当时的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额敏和卓坚决拥护祖国统一，在清政府征讨大小和卓时，屡立战功，被封为镇国公。额敏和卓逝世后，公元1778年，其子苏来曼建造了一座塔来缅怀他，此塔名为“额敏和卓报恩塔”，又名“苏公塔”，位于今吐鲁番市区以东2公里处。苏公塔下是吐鲁番最大的清真寺，与古塔浑然一体。苏公塔是新疆各民族团团结的象征，同时也将永远激励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的统一而共同奋斗。

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后，根据新疆的实际情况，在天山南北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制，从其结果来看，还是卓有成效的。

在军事上，清政府采取“军府制”。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全称“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犁将军的主要职责是：“统辖天山南北各地驻防官兵，兼管全疆行政事务，并统辖归附清朝的中亚及哈萨克各部。”伊犁将军是天山南北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由满族亲贵或蒙古重臣出任。伊犁将军的设置，使中国北部防线最终形成横贯东西的完整体系。清政府又在乌鲁木齐设都统，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全称“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全疆军事指挥系统分为北路、南路、东路三部分。北路各级大臣受伊犁、塔城参赞大臣节制；南路各级大臣受乌鲁木齐都统节制。全疆各级大臣又都受伊犁将军统辖。

清政府在南北疆派驻重兵，以加强边务防卫，驻疆清军总数4万左右，以北疆为重点。北疆以驻防军为主，南疆全是换防军。

在行政体制方面，清政府根据新疆的民族习惯和社会历史状况，实行三种不同的行政制度。在汉族较多，和内地联系紧密的乌鲁木齐以东地区实行州县制，其民政管理与内地州县基本相同。1767年，乾隆帝下令将乌鲁木齐定名为“迪化”，1773年，设迪化直隶州属于镇迪道。在天山以北的游牧民族蒙古和哈萨克中，以及在天山以南的哈密和吐鲁番维吾尔中，实行“扎萨克制”（蒙古语“执政官”），任命各部首领为扎萨克，管理本族行政、司法事务，扎萨克受清政府监督和任免。在天山



以南其他地区，清政府沿用维吾尔旧制，保留“伯克”（维吾尔语“首领”）制，并使伯克成为清朝正式命官。“伯克”原指各地驻军首领，行政官员则谓之“阿奇木”，后来，“伯克”和“阿奇木”逐渐混为一谈，出现了“阿奇木伯克”的称谓。清政府又规定了伯克回避制度，规定高品位的伯克不准在本城任职，小伯克不准在本村任职，以免他们通过家族和教派的关系贪赃枉法。同时规定，伯克和阿訇不能兼任。

清政府对新疆各族上层人物实行重用政策，尊重他们的威望，对于归服清朝早，在平定各次叛乱中功劳卓著的人物特别优待。对于普通维吾尔百姓，清政府并未强迫他们剃发易服，只有三品以上的维吾尔官员和享有爵位的维吾尔王公才剃发，穿满族服装。

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与新疆实际情况相适应的政策，在巩固新疆安定局面，促进新疆开发，抵抗外来侵略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 ●横绝大漠回奔星



“大小和卓”之乱被平定之后，新疆安定发展了半个多世纪，19世纪初，当年的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在浩罕国的支持下侵入新疆，再次制造混乱，但在清政府的打击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反抗下，张格尔之流最终也难逃败亡的下场。

处于费尔干纳盆地的浩罕汗国，在清初曾经归附过清政府，那时它只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小国。19世纪初期，浩罕国利用清朝开始衰落的机会，大肆进攻分散的哈萨克和柯尔克孜部落，控制了哈萨克草原和帕米尔以西的广大地区。其疆域东北到达伊犁河流域，北到锡尔河，西达咸海，南接印度，一跃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扩张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帕米尔高原及其以东地区虎视眈眈，垂涎三尺。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浩罕便成为和卓后裔的庇护所。到19世纪初，流亡在浩罕的喀什噶尔和卓后裔多达200余人。清政府曾多次向浩罕要求引渡大和卓波罗尼都的后裔，浩罕统治者均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

公元1819年，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强占浩罕商人萨赖占的女儿，萨赖占羞忿之极，将女儿杀死，抛尸参赞衙门以泄愤。清政府派伊犁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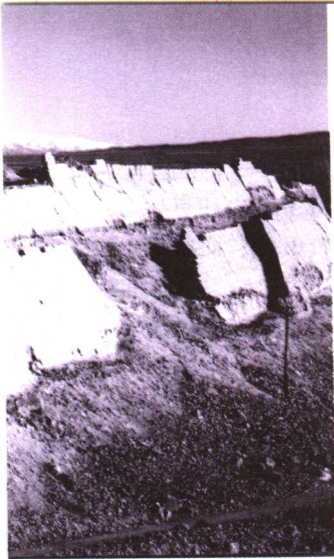


清官署——蒲犁厅旧址

军庆祥赴喀什噶尔查办，庆祥庇护斌静，以革职查办草草收场，引起喀什噶尔群众不满。“斌静案”发生之后，大和卓之孙张格尔在浩罕统治者的支持下，利用新疆的不平静局势，乘虚而入，带领数百人从帕米尔第一次入境作乱。但他们入境后遭到清军伏击，几乎被全歼，仅张格尔及其亲随狼狈步行逃脱。这次张格尔虽未得手，但已给清政府提供了一个教训：派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定要行为公正、检点，避免因个人的过失导致群众对中央政府及其派驻机构的不满。当地方官员犯事之后，一定要果断处理，不留情面，这样赏罚分明，才能平息民族情绪，确立威信。

1824年，张格尔第二次入境作乱，未果。两年后，他第三次入境，并在距离喀什噶尔80余里的阿图什村建立起第一个据点，开始了大规模的作乱活动。喀什噶尔参赞庆祥（原伊犁大臣）闻讯后，派兵千余前往围剿。张格尔利用狂热的宗教煽动，裹胁白山派信徒1万余人，围攻喀什噶尔汉城。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一时难以攻破，于是张格尔向浩罕求援，并“约破西回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早已垂涎我国南疆的浩罕玛达里汗带领300侵略军赶到喀什噶尔增援张格尔。浩罕侵略军遭到清军反击，死伤惨重，玛达里气得“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在他带领残兵败将向帕米尔高原退却时，张格尔乘机火并了他的殿后部队，组成了自己的3000人卫队。这年9月26日张格尔匪军攻破了喀什噶尔汉





城，自称“赛伊德·张格尔·苏丹”（意为“圣裔张格尔国王”）。不久，英吉沙、叶尔羌、和田等地也相继陷落，塔里木盆地南缘地区尽为张格尔所据。

英国殖民主义者企图利用张格尔作为分裂割占我国天山南部地区的工具。张格尔攻取喀什噶尔之后，英国派出间谍20余人为张格尔充当顾问，训练军队，提供援助，其中5人“寸步不离和卓”。张格尔在占领区横征暴敛，广占民田民宅，比当年的大小和卓更为暴虐。

1826年8月，清政府派伊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带兵3.6万余人，进剿张格尔匪帮。8月初，清军在柯坪歼灭了张格尔的有生力量3000余人，从此势如破竹，接连收复了英吉沙、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张格尔魂飞胆丧，逃入帕米尔高原的群山中藏匿起来。1828年初，张格尔趁春节期间边防松懈，潜入阿图什进行抢劫，结果由于维吾尔人民群起反抗，张格尔一无所获。他正欲原路逃回之际，清军将领杨芳闻讯，带兵阻截，在喀尔铁盖山将匪徒们团团围住。张格尔穷途末路，准备拔刀自刎，清军将士飞马上前，将他活捉。张格尔被送到北京后，清政府不再手软，将他斩首示众，以儆有叛逆之心者。

张格尔的叛乱事件，暴露了清朝内政腐败和国防废弛两方面的严重问题。清政府总结经验教训，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首先，针对官员腐化问题，实行各级大臣官员的考核制度，即每届年终，由将军、都统、参赞大臣对各城大臣做出鉴定，上报中央，将军、都统、参赞本身若有问题，允许下级大臣向中央直接检举参奏。还增加官吏俸禄，实行“高薪养廉”。以避免因他们的不法行为激起民族情绪。其次，为防止狂热宗教情绪对群众的煽动，清政府对伊斯兰教干预政治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不仅阿訇不能干预政事，如果阿訇的子弟做了伯克或在政府干事，他也不能继续做阿訇。另外清政府还加强边防训练，实行携眷驻防和屯田等等。这些措施如果能严格执行，应该会很有成效；只可惜它们根本没有被完全贯彻。



清政府对于浩罕支持张格尔作乱，非常恼火，要求浩罕交出和卓后裔。浩罕拒绝后，就禁止它们来新疆通商，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同时驱逐浩罕人，准许居留的浩罕人也受到苛刻限制。

至于浩罕，这个发育不良的沙漠帝国，后来又支持了几次不成功的和卓后裔在新疆的叛乱。到十九世纪中期，它自己也逐渐被另一个殖民帝国——沙俄所吞噬，而沙俄，渐渐成为新疆的最大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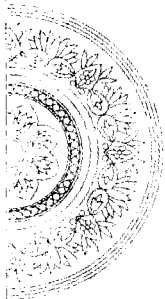
## 二、东归英雄行

### ●拳拳赤子心



在前面我们曾提到，卫拉特蒙古四部中，有一部名为土尔扈特。17世纪初，准噶尔部势力强大，意欲兼并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不得已从新疆的塔尔巴哈台出发，向西迁徙。他们远离故土，迁到了伏尔加河流域。后来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游牧基地，定居下来。

当时，俄国政府还不能有效地控制伏尔加草原。土尔扈特牧民在那里休养生息，倒也相安无事。可是，沙皇俄国实力增强后，就逼土尔扈特人臣属于它，每年都强迫土尔扈特人缴纳大量租税。土尔扈特人不断反抗，善战的土尔扈特骑兵甚至去攻打伏尔加河沿岸的俄罗斯城市。沙俄见强迫不成，就企图从宗教上控制土尔扈特人。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常常比武力更容易控制一个民族甚至将这个民族煽动至一种疯狂状态。土尔扈特人以前信奉的是喇嘛教（佛教的一分支），沙俄想使他们改信东正教。300多年前在天山南北伊斯兰教与佛教的斗争中，前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使维吾尔族全部皈依于其门下。但在这次的东正教与喇嘛教的斗争中，后者没有让步。不过土尔扈特人毕竟处于沙俄的统治范围以内，而且东正教的攻势也越来越强，土尔扈





涅巴锡像

特的首领感到了威胁，土尔扈特部民思念故土的心也越来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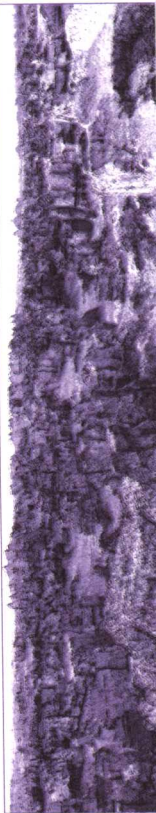
“清朝崇奉喇嘛教为国教；皇帝对蒙古各部格外优待。”来自故乡的这些消息渐渐传到了辽阔的伏尔加大草原，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部民兴奋地奔走相告，他们虽然身在异域，但始终心向祖国。当时的土尔扈特汗阿玉奇听到这些消息，立刻产生了派人回祖国与中央建立联系的念头。当时噶尔丹在新疆称霸一方，经新疆到内地的道路受到阻隔，可是阿玉奇仍然决定派使者回国。

他命令使者绕道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北京。使者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到达北京。

康熙皇帝隆重地接见了来自伏尔加草原的土尔扈特使者。土尔扈特人的一片赤子之心令康熙大为感动，他马上特派内阁侍读学士图理琛为朝廷使臣，去伏尔加探望他们。

图理琛也是绕道西伯利亚，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到达阿玉奇汗的驻地。土尔扈特牧民听说清朝使臣的到来，都换上节日盛装，扶老携幼，前来拜见。当图理琛高举康熙皇帝谕旨出现时，人们欢呼跳跃，亲切地簇拥着从祖国来的亲人，久久不肯散去。

阿玉奇汗接受了康熙皇帝的谕旨和礼品，又从图理琛口中听到清朝把喇嘛教奉为国教以后，西藏达赖喇嘛到北京觐见皇帝，受到隆重礼遇的事。图理琛还告诉他，清朝很倚重蒙古各部，清朝的好几位皇后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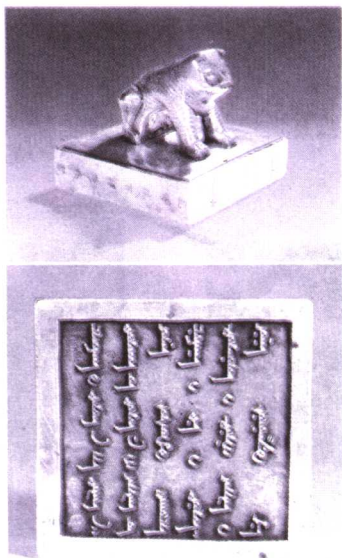
蒙古王公的“格格”，许多蒙古王被封为汗王。阿玉奇联想起自己的部族多年来颇受外国的欺凌，不禁感慨万千。图理琛在土尔扈特部受到热情款待，1715年，他回到北京，用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异域录》一书，详细记载了这次出使的经过。

从此，土尔扈特人与祖国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不时派人到北京贡献土特产，到西藏拜谒达赖喇嘛，派商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进行贸易，换回茶、布和蒙古族所需要的传统商品。

## ● 回归的启示

光阴荏苒，几十年之后，清朝已是乾隆皇帝在位了。此时土尔扈特人在伏尔加河两岸已发展到十多万户，他们回归祖国的信念并未被时间所消磨，反而与日俱增了。

1761年，17岁的渥巴锡继承了土尔扈特汗位，颇得部众拥戴。1767年，渥巴锡准备率部东归，由于叛徒告密，沙俄加强了防范，并策划扶植已改信东正教的土尔扈特贵族敦杜克夫家族取代渥巴锡的汗位。1768年沙俄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战，土尔扈特人被强征从军，死伤达7—8万人。1770年夏，沙皇再度下令，凡16岁以上的土尔扈特男子都必须上前线，土尔扈特人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危险，于是渥巴锡毅然决定东返。1770年秋，他从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战的前线回来后，召集了部族上层首领的秘密会议，决定东返伊犁，并决议等到冬天伏尔加河结冰以后，两岸部众一起行动。不料当年冬季偏暖，河水久不结冰，而东归的



清乾隆四十年为褒奖土尔扈特部首领率部回归祖国而赐的印玺

消息已经走漏，渥巴锡担心再呆下去会陷入危险境地，只好忍痛抛下北岸的同胞，率领南岸17万部众启程。他们杀死住在部落里监督他们的俄国人，高呼着：“我们的子孙永不当奴隶！”“我们要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举世闻名的回归祖国的万里征途。出发以前，渥巴锡带头点燃了自己的木制宫殿，部众烧毁了所有的帐篷，表现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渥巴锡在东归途中亲自率领1.5万名骑兵作开路先锋，妇女老幼赶着牧群居中，留下1万名战士殿后。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闻讯大发雷霆，责骂大臣说：“你们居然这样漫不经心，让整个部落在你们鼻子下暴动，逃出神圣的俄罗斯国境，罗曼诺夫家族将为这件事蒙受永不磨灭的耻辱。”那些大臣吓得战战兢兢，急忙派大军追赶，又十万火急地命令哥萨克骑兵在土尔扈特人东归的道路上阻截。在乌拉尔河畔，土尔扈特的殿后部队与哥萨克骑兵展开血战，不幸全部壮烈牺牲。1771年8月底，渥巴锡率领的土尔扈特部众终于渡过伊犁河，到达伊犁附近的卡伦他木哈，回到祖国怀抱。8个月的残酷战斗、艰难跋涉，加之饥寒交迫，瘟疫流行，土尔扈特的牲畜死亡殆尽，人口死伤大半，幸存者仅7万多人。

清朝获悉土尔扈特人归来的消息，立即派兵接应。渥巴锡会见了伊犁将军伊勒图，献出其先世所受明朝永乐八年汉篆敕封玉印一颗及各种礼物。乾隆皇帝命令伊勒图和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负责接待安置，发放衣食，拨给牧场和耕地。又拨库银20万两，购买牲畜、米面、茶叶、布匹、棉花、毡房等物，赈济土尔扈特部众。天山北部的卫拉特各部，天山南部的维吾尔人民更是大力捐助牲畜、粮食、布匹，接济土尔扈特，许多伯克因此得到政府嘉奖。

1771年9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了渥巴锡，请他一起在木兰围场行猎。之后乾隆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的碑文，记载了土尔扈特西迁和回归的缘由、经过以及回归后被安置抚恤的情况。这两块石碑至今仍矗立在承德城外的普陀宗乘庙内。乾隆皇帝还将渥巴锡册封为卓



理克图汗（卓理克图是英勇的意思）。土尔扈特部被分为新、旧两部，分别安排在新疆的阿尔泰山和科布多等地，归伊犁将军和科布多大臣管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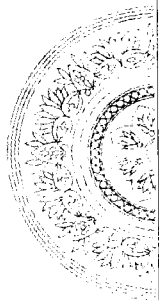
土尔扈特人反抗沙俄压迫，万里回归祖国，在中华各民族为巩固和发展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他们的行动也给后人留下许多启示：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任何一个民族想要发展、壮大都必须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离开了祖国的怀抱，在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必将最终成为别国的附庸。今天的世界上，有人疯狂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对于他们所鼓吹的一切能导致的结果，只要看看那些因分裂而战火纷飞的国家 and 那些因获得所谓“独立”而颠沛流离的民族就可以知道了。相信任何一个理智的民族都不会无视这些现实，同时，也不会忘记土尔扈特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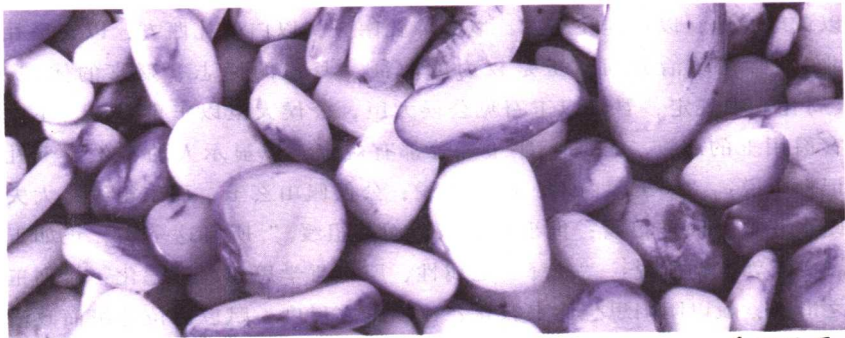
## ●古玉出昆仑



清代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乾隆皇帝微服私访，行至北京西华门外的真武庙，发现其中有一只放菜的大瓮形状奇异，且隐隐发出绿色光泽，乾隆心知此乃宝物，“乃命以千金易之”。运回宫中后，经玉匠辨别，认为这件重达7000斤的大瓮乃是稀世珍宝，名叫“溱山大玉海”。它原来是元朝皇帝忽必烈宴请群臣的酒器，可贮酒30余石。这件玉海周身浮雕有海龙、海马、海鹿、海犀、海螺等，浮沉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极具神秘感和浪漫主义色彩。此玉器原放在万寿山广寒殿内，明万历年间广寒殿倒塌，流落到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不识此宝，用以作菜瓮。乾隆皇帝命名匠高手对此玉海进行了四次修饰，又亲自赋诗三首刻于玉海膛内，并在团城盖一玉

三、玉石的魅力





和田玉石

瓮亭放置。直到今日，登团城，观此玉海的中外人士仍络绎不绝。据专家测定，制作此玉海的原材料是来自新疆的和阗玉。

乾隆慧眼识玉的故事将我们的视线引入玉的世界。玉，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特色之一，同时，中国玉中质地最优的和阗玉也代表着新疆的辉煌。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玉有着民族传统的内涵，它是物质的观念，又是社会的、文化的综合观念。东汉时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一书中，提出了玉的定义：“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觚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甫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忤，洁之方也。”他把玉的物理特征比附为五德，这些物理特征是：光泽滋润而柔和；表里一致，从外可知内部；声音舒畅而清扬，远远可以听到；质地坚硬，不能弯曲，只能折断；断口有棱角，但不很锋利。什么玉具有“仁、义、智、勇、洁”这五种特征呢？专家研究表明，只有新疆和阗玉完全具有这五种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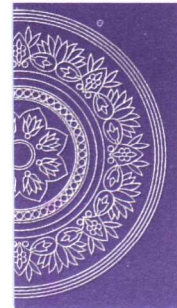
《史记》中记载了和阗玉的产出情况：“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明确指出了和阗玉来自昆仑山。和阗玉的特征使它被广泛运用于各个方面。在道德方面，“君子比德于玉”，不仅有《说文解字》的五德之说，儒家还有九德、十一德之说，玉成为仁、智、义、礼、乐、忠、信、德、道等社会道德的象征。在宗教方面，人们用玉制作仪礼祭祀之器，并作了严格的规定。《周礼》中说：“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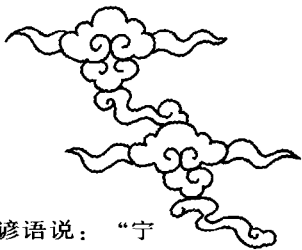
以黄琮礼地，以青珪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在政治方面，玉是权力的象征、身份的标志、财富的体现。《周礼》中规定，君王以玉召见公侯大臣，公侯大臣以玉事君王。不同官爵用玉的服饰、佩饰、印玺等等都有规定，以显示人的身份。《礼记》中说：“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纆；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纆；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纆；世祖佩瑜玉，而基组纆。”所有这一切，正如玉石专家郭宝钧所说：“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这一切，为人们爱玉、崇玉、敬玉提供了精神支柱。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对玉的爱好是极特殊的。玉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它象征着高贵、纯洁、友谊、吉祥、平和、美丽。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黄金有价玉无价”之说，皇室之珍、连城之璧，都离不开玉。玉不仅联结了新疆与内地各族人民的友谊，也是诸侯城下之盟和战争媾和的标记，更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信物。玉还被蒙上各种神秘色彩：佩玉以求避邪除凶，食玉以求长生不老，服玉衣以求尸体不朽。总之人们以玉为美、以玉为荣、以玉为贵，玉成为中国人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正如《礼记》中所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



玉是如此神圣美丽的瑰宝，因而在中华各族人民中流传着许多关于玉的来历的动人传说。在中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山海经》中，记述了玉的神话，说：“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扬，黄帝是食。玉膏之所出，玉色乃清，五味乃馨，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一古老的神话，说明玉是多么的珍贵，它与中华民族的始祖、天地鬼神连在一起。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就非常向往：“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



在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传说中，玉是美丽而善良的姑娘的化身。相传古代于阗国的玉河畔，居住着一位技艺绝伦的老石匠，他带着一个徒弟。他在60岁生日那天，于玉河中拾到一块很大的羊脂玉，就精心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玉美人。老石匠情不自禁地说：“我要有这样一个女儿该多好啊！”玉美人果然变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姑娘，拜老石匠为父，老石匠给她取名为塔什古丽（玉花）。不久，老石匠去世，塔什古丽与小石匠相亲相爱。可是，当地一个恶霸，趁小石匠外出，抢走了塔什古丽，妄图强迫成亲。塔什古丽不从，恶霸就用刀砍她，她身上发出耀眼的火花，点燃了恶霸的府第，而自己化成一缕白烟，向故乡昆仑山飞去。小石匠得知后，骑马去追，沿路撒下小石子，成为后人寻找玉的矿苗。维吾尔人民历来崇拜玉，谚语说：“宁做高山的白玉，不做巴依（地主）堂上的地毯。”



## ●美玉质如兰



新疆和阗玉，是中华玉石中的佼佼者，是新疆的骄傲。在中国原始社会的传说中，就有了新疆玉器流传中原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琯。”《尚书大传》载：舜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尧致舜天下，赠以昭华之玉。”《大戴礼记》称：“昔帝舜以天德嗣尧，布功散德，制礼朔方……西王母来献白玉琯。”黄帝、尧、舜，是中国古文献中的传说人物，西王母是神话人物，关于他们之间交往的记载固然不足以为据，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原很早就对新疆玉有了了解，毕竟在6000年前，先人就已开拓了新疆与内地的联系通道——玉石之路。

1976年冬，考古学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了一座王室小墓，墓的主人是商朝的殷王武丁之妻“妇好”，入葬年代距今3200年左右。在这座墓葬中，出土玉器达756件之多，造型优美、色泽鲜润。这批玉料，经





专家检测“基本上是新疆玉”。考古收获进一步证明了新疆玉很早就运到内地的历史事实。

秦始皇统一全中国后，继续以和阗玉为宝。他的丞相李斯曾写道：“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宝，此数宝秦不生一焉。”晋人王子年的《拾遗记》还记载了一个神奇的小故事：据说秦始皇起游云台时，曾“穷四方之珍材，搜天下之巧工”，使其云集长安。西域骞霄国献玉工列裔给秦始皇。列裔琢的两只白玉虎，栩栩如生，但他并不琢眼睛，说是防虎跑掉。秦始皇得悉后，派人在每只玉虎头上用漆点了一眼，结果两只虎真的跑了。有人报告，在山中见两只虎，只有一目，秦始皇使人验之，果为列裔所琢之虎。故事虽然夸张，但可见人们深信，玉是有灵性的。到汉代张骞“凿空”，开辟“丝绸之路”时，和阗玉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时和阗玉被用来做皇帝的玉玺，白玉成为皇帝的专享，“群臣莫敢用也”。

汉代以后，中原和西域都经历了长时期的战乱割据，这对新疆和阗玉向中原的运送产生了极大影响，直到唐朝重新统一西域，中原人民才又得见和阗玉的风采。

元、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高度发达，对外贸易兴旺，新疆处于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中，交通畅通，经济发展。这一时期，和阗玉的开发步入鼎盛时期，玉器工艺美术也发展至高峰。

元朝皇族非常喜爱和阗玉，曾派人到新疆要玉，并设立驿站，将玉运到大都。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下了关于和阗玉的宝贵一页。他说：“忽炭国（指于阗国）……城东有白玉河，西有绿玉河，次西有乌玉河，皆发源于昆仑。”“玉有两种，一种较贵，产于河中，采玉之法，几与采珠人沿水求珠之法相同；另一品质较劣，出于山中。”元代采和阗玉有专业采玉工人，元世祖忽必烈下令免去采玉工人的差役，这样，民间采玉增多，玉石不断运往内地进行交易。元代维吾尔族诗人马祖常在一首诗中记述了玉石贸易的情景，诗说：“波斯老贾渡流沙，夜听驼铃识途柎。采玉河边青石子，收来东国易桑麻。”

元代的琢玉匠人，以邱处机最为著名，他是当时道教七真人之一，成吉思汗曾在西域召见过他，并封他为国师，赐号“长春真人”。他在北京白云观主持道教时，率领徒弟琢玉，成为琢玉鼻祖。过去北京玉器行业每逢邱处机生日那天（腊月二十四日）都要放假，到白云观跪拜鼻祖，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

明代的琢玉工艺更加发达，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吴郡。”吴郡即苏州，苏州的琢玉大师首推陆子冈，他“用刀雕刻，遂擅绝。今所遗玉簪价，一枚五六十金。子冈死，技亦不传”。他的作品大部分全落款“子冈”，“子刚”、“子刚制”等，其神妙之处在于，落款往往在极难察觉之处，如一只玉猫，落款就在猫耳朵眼里。

在清代乾隆时期，经多次平叛斗争，清朝重新统一了新疆，建立了政权机构，使之社会秩序安定，促

进了新疆经济发展。和阗

玉的开发不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超过了以往

任何时代。诗人肖雄曾赋诗感叹采玉盛景：

“玉凝羊脂温且腴，昆仑气脉本来殊。”

六城人拥双河畔，入水非求径寸珠。”

清代的新疆民族玉琢空前繁荣，在和阗、叶尔羌、喀什等地都有玉器手工业，琢成了许多



和田玉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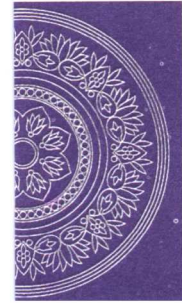




精美玉器，并带有民族特色。目前，故宫博物院就存有一只极珍贵的玉刻诗大盘，此玉盘乃和阗玉琢成，是厄鲁特玉工所制，很具民族特色。它是乾隆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时缴获的。乾隆亲自撰诗，命刻于其内，诗记述了玉盘的来由。因此，这玉盘不仅是珍贵文物，还是祖国统一的见证。

玉料来源充足，加之乾隆皇帝爱玉成癖，以及社会经济条件，使得清代的玉器空前发展，和阗玉在中原的影响达到了最高潮。清代的玉器做工之精、器形之众、使用之广、数量之多，都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玉器所不能媲美的。仅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历代玉器就达数万件之多，流于民间的更难以数计。

和阗玉，以其无穷的魅力，独特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新疆的瑰丽多姿，也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无穷的光辉。



# 下篇

百年榮辱




# 国耻家仇

宝地，也没能逃脱侵略者罪恶的魔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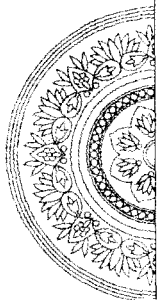
掠夺。富庶的中国很快成为西方列强劫掠的对象，新疆这片祖国西北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却迅速地发展起来，并对外实行野蛮的疯狂的殖民自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已渐显颓势。而这时，欧美的

## ● “补天派”的疾呼



公元1839年6月3日，广东虎门海滩周围人山人海，当一股浓烟从海滩上两个15丈见方的大池中冲天而起，直上云霄的时候，人群沸腾了！这时，站在一旁高冈上指挥着这一切的那位清朝大员却面色凝重。他就是中国清政府禁烟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人林则徐，这一幕也正是这场禁烟运动中最高潮的一幕——虎门销烟。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年自号浚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他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他接受的是传统封建教育，但也受到了具有革新思想的师友的良好影响。他沿着封建科举的老路，由秀才、举人而进士，逐步挤进封建统治的行列，从监察御使、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一步步上升到巡抚、总督等高位。



从19世纪30年代起，鸦片流入中国，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情况，林则徐尖锐地指出：“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838年，道光皇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翌年3月，协同总督邓廷桢查办鸦片事件，至此，禁烟运动在沿海直到新疆的全国范围内展开。林则徐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高举反帝斗争旗帜的第一人，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人物。可是，正当他全力以赴领导人民同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顽强战斗的时候，却遭到了清王室中投降派琦善之流的诬蔑和陷害。1840年农历9月，他被昏庸的道光皇帝革去了官职，并充军发配伊犁。次年7月，林则徐行至途中，奉旨暂免遣戍，协助大学士王鼎治理黄河。1842年，河事竣工，林则徐仍贬戍伊犁。

1842年农历7月6日，林则徐从西安起程，历时4个月，于农历11月9日到达了伊犁将军府的驻地惠远城（在今霍城县），寓居于南街鼓楼前东



林则徐塑像

边第二巷(又名宽巷)。在谪居新疆期间,林则徐跋涉于天山南北,遍历10城,努力从事屯田事业,并建议朝廷把部分垦田分给维吾尔人民耕种,“改屯兵为操防”,这实质上都是从发展新疆经济,巩固西北边防出发的。因为他早在广州译辑《四洲志》的时候,就对沙皇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当时他就得出结论说:自彼得大帝之后,沙俄之所以强盛“非因兵卒之众,全因马上乔捷”。他敏锐地意识到,对沙俄的侵略要认真对付。来到新疆,经过实地观察后,林则徐更进一步地感到沙俄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威胁,他在新疆主持农田水利建设,就是为了做好抵抗沙俄侵略的准备。虽然,林则徐在1845年正月被朝廷调回内地,但是,一直到他回归中原辞职还乡之后,他都没有忘记新疆的军事防务之事,时刻保持着对从陆上来的侵略者的警惕之心。这位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封建制度的“补天派”,在外来侵略者面前,不愧为坚定的“抗战派”,也确有军事家的远见卓识,直到他去世前,他还在大声疾呼:“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历史证明,林则徐的预见全然不错。

## ● 砥砺戈壁



沙皇俄国原来是一个欧洲国家，并不与我国接壤，16世纪30年代，沙俄的东部疆界仅达里海。为了实现其向东扩张的野心，沙俄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即在所侵占的重要地方修建堡垒，驻扎军队，作为侵略据点，接着向堡垒附近实行武装移民，并将这些堡垒用公路连接起来，成为堡垒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又将堡垒线向前推进，以侵占更多的土地。

1587年，沙俄开始修建西伯利亚（即额尔齐斯）堡垒线，当年建成托博尔斯克城堡，此后又逆额尔齐斯河南上，陆续修建了塔拉、鄂木斯克、帕夫洛夫、谢米马拉丁斯克等城堡。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把征服中亚和我国新疆作为俄国重大的国策。到1720年，沙俄建成了西伯利亚堡垒线。这条线全长1600公里，沿线每隔20至25俄里（1俄里等于1.0668公里）建筑一个哨所，随后建立殖民村，以“筑垒移民”实现其扩张政策。1735年沙俄又开始修建奥伦堡堡垒线（又称伊姆线、锡尔河线、西线）。西伯利亚堡垒线和奥伦堡堡垒线是俄国早期向东侵略的众多堡垒线中的两条最重要的堡垒线，它们对新疆和中亚形成钳形攻势。

西伯利亚堡垒线建成后，沙俄侵略者沿额尔齐斯河进一步向南扩张。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沙俄已侵入我额尔齐斯河、布尔津河和阿尔泰的克兰河捕鱼。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有名贵鱼和鲤鱼。从1803年至1845年间，沙俄在这一地区掠夺的渔业资源，就达50万卢布。

后，沙俄侵略者沿额尔齐斯河进一步向南扩张。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沙俄已侵入我额尔齐斯河、布尔津河和阿尔泰的克兰河捕鱼。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有名贵鱼和鲤鱼。从1803年至1845年间，沙俄在这一地区掠夺的渔业资源，就达50万卢布。



与此同时，沙俄侵略者又从谢米马拉丁斯克出发向西南方向的哈萨克草原扩张，逐渐侵入我国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1831年占领了爱古斯（即阿亚古斯），并越过爱古斯河向勒布什河流域推进。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成为各



资本主义列强奴役宰割的对象。沙俄自以为侵略中国方面落后于英帝国主义，因此，对中国的人侵显得比以前更为野蛮和疯狂了。在新疆，沙俄先是采取“迅速地、悄悄地和连续不断地”（恩格斯语）推进的方针，进而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它在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加速建立军事堡垒，实行武装移民，修筑公路，推进堡垒线，进行地形测量，积极谋求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建立领事馆和开设贸易圈。

1842年，日益腐败的清政府为了支付英、法、美等列强大量赔款，竟不顾西北边疆的安危，采取了缩减新疆军费、裁撤伊犁镇总兵军事机构的极其错误做法，这样就给了沙俄大规模军事占领的有利之机。

1844年，西西伯利亚的俄军沿着额尔齐斯河和爱古斯河迅速向南推进，在额尔齐斯河至阿拉套山共建立了42个村落，武装移民达1万多人。接着，沙俄又派兵继续向前推移，在中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堡垒，作为侵略据点。1846年，沙俄出兵越过勒布什河强占了我哈喇勒河（即库克乌苏河上游以北地区），第二年于今塔尔达库尔干非法建立了科帕尔堡垒，并很快地从比斯克防线调来200多名哥萨克，屯积粮食，“加强伊犁河以北地区哥萨克人的定居，以便随时具有做好战斗准备的武装居民”。科帕尔成为沙俄进一步向前侵略的强有力的据点。

1847年，新疆南疆发生了“七和卓之乱”。在浩罕汗国统治者的鼓动下，逃亡在国外的和卓后裔买买提明（又称卡特条勒）、倭里罕、伊善罕、塔瓦克尔、克齐克罕、阿克恰干、萨比尔罕等人纠集1000余名匪徒，侵入天山南路，攻占阿图什、喀什噶尔和英吉沙尔等地。清政府派兵平定了叛乱。这时，沙俄军队便趁火打劫，最终占领了所谓谢米列契斯克地区，即我国七河地区（七河指爱古斯河、勒布什河、阿克苏河、巴斯坎河、科克斯河、卡拉塔尔河、伊犁河）。

1850年，沙俄派出由50名步兵、1个哥萨克连和2门轻炮组成的侵略军从科帕尔出发，进犯伊犁河南岸，遭到当地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数千牧民的顽强抵抗，迫使沙俄侵略军狼狈逃回科帕尔。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沙俄乘清政府无暇西顾，进一步加紧侵略新疆。1851年，俄军再次入侵伊犁河南，在中国哈萨克族居住区大肆骚扰，并攻占了乌楚别克。1852年，沙俄在爱古斯至塔城大路上的我塔城

旧址雅尔城，建立了乌尔扎尔村。这是沙俄强迫清政府在伊犁、塔城通商后建立的一个新据点。

1853年，清政府因粮饷拮据，停止了陕甘两省调往新疆的换防官兵，规定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八城应设防兵，由伊犁、乌鲁木齐 齐绿营内调拨，这就减少了新疆的总兵额，削弱了边 防力量。

1854年，清政府又因经费不足，将汉各营兵员裁撤1/4。同年，沙俄外伊犁地区建立一个巩固的据点，进一步向伊塞克湖地区和南疆推进，向中亚的扩张，乘机又派遣1个步兵的哥萨克部队，侵占了我国阿拉套山麓



塔城的满 为了在 以便进 并配合其 营和300人 阿拉木图河岸

的古尔班阿里玛图，第二年改名为维尔内（今阿拉木图）。这是沙俄侵占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步骤，维尔内从此成了沙俄进一步侵略我国新疆的大本营。之后，沙俄的大批侵略军移驻到中国境内，并着手大批移民，非法建立了阿拉托夫州，归西西伯利亚总督管辖，大批中国各族居民被置于沙俄的残暴统治之下。

这样，由于侵占了我国古尔班阿里玛图，沙俄就建立了一条新的堡垒线，即新西伯利亚堡垒线。这条堡垒线是西伯利亚堡垒线的延伸，它北接谢米巴拉丁斯克，中经爱古斯和科帕尔，南至外伊犁地区的维尔内。从谢米巴拉丁斯克到伊犁河，每20至25俄里建立一个驿站，每站都驻有足够数量的哥萨克马队。这条堡垒线犹如一把刀子，切断了我国伊犁与塔尔巴哈台间边防部队的正常边境巡逻。其中科帕尔至古尔班阿里玛图一段，深入中国境内750公里，从而割去了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的领土，迫使这块土地上的我国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牧民归属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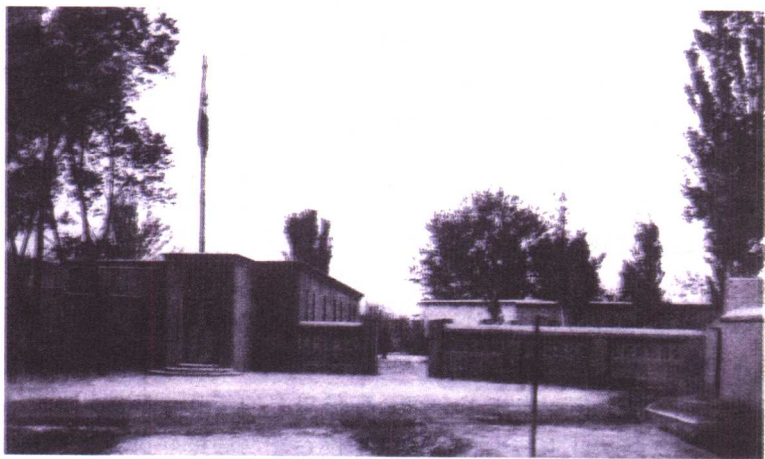
沙俄建成新西伯利亚堡垒线以后，以古尔班阿里玛图为侵略新疆的大本营，继续向南、向西推进。1856年，沙俄侵略军占领了伊塞克湖的山谷盆地。1857年，南疆发生了和卓余孽倭里罕的叛乱，沙俄认为这是独占南疆，实现其从叶卡特琳娜二世以来侵吞计划的极好机会，打算立



即派人潜入喀什噶尔，支持倭里罕的叛乱。由于清政府迅速平定了叛乱，使沙俄的美梦没有实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又出兵侵占了托克马克和比什凯克，把侵略魔爪伸到了楚河上游地区，这时沙俄几乎占领了全部楚河沿岸的地方。

在武装入侵、建立军事据点的同时，沙俄还在我新疆地区非法进行“科学考察”、地形测量和地图绘制等活动以窃取情报，为进一步扩大对新疆的侵略作准备。1840年俄国人卡列林与基利洛夫等潜入塔尔巴哈台山区侦察，次年在哥萨克武装护送下，窜入勒布什河、阿克苏河上游及阿拉套山区。这年秋，俄国少校科瓦列夫斯基借商队为掩护，先后潜入伊犁、塔尔巴哈台，搜集商业、矿藏及自然资源情报。与此同时，施伦克等人先后窜到巴尔喀什湖、萨司克湖、阿拉湖、伊塞克湖、伊犁河南岸及塔尔巴哈台山区，以收集植物标本为名，窃取情报。1842—1843年，沙俄上校西利维列姆等人非法武装测绘北起额尔齐斯河、南至楚河之间的地图。1847年，沙俄军官尼凡季耶夫奉命测绘俄国人以前“一无所知”的伊塞克湖附近地图，又秘密测绘了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地图。1851年，沙俄总参谋部大尉古特科夫斯基率队测绘由爱古斯至塔尔巴哈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喀什噶尔俄国领事馆

台的商道。1856年初，沙俄上校哈密多夫斯基率大队人员测绘伊塞克湖地区的地图。1856—1857年，谢苗诺夫斯基先后两次窜入伊塞克湖、楚河上游、伊犁城等地刺探情报，又率哥萨克兵入侵招哈山口，登上汗腾格里山，潜入特克斯河上游，窥测伊犁通往喀什噶尔的通道穆素尔山口，到天山中部考察。1859年，军事地形测量团伊凡梯也夫又完成了谢米列契斯克地区的北部、巴尔喀什湖与卡拉塔尔河之间到阿拉套山、以及从阿拉湖到巴尔喀什湖北端的地形测量，并绘成地图。1860年，根据天文考察团长所率领探察队的测定，沙俄又完成了谢米列契斯克和外伊犁边区地图。

这样，到1860年止，沙俄既武装占领了我国西北广大领土，又完成了除斋桑区和库尔楚姆区以外的，从沙宾达巴哈经额尔齐斯河到巴尔喀什湖、楚河这块我国领土的地形测量和地图绘制工作。沙俄扩张主义分子认为根据这些地形测量和地图，可以“相当确切和详细地标明国界线”，也就是说，沙俄所必需的，就是如何将它强占的地方，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合法化”。

### ● 潘朵拉之匣



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一只“潘朵拉的匣子”，一开启它，灾祸和痛苦就会从中而出。因此，后人常把那些会给人带来不幸的东西称为“潘朵拉之匣”。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一位赴华传教的医生写信给林则徐，他说：“要‘补救’当前中国与列国之间存在的幸，只要两个词就可以表达：‘光荣的条约’。”这个所谓的光荣的条约，正是中国近代名副其实的“潘朵拉之匣”。

1841年，清政府在英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进攻下，屈膝投降。第二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帝国主义者订立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的“潘朵拉之匣”自此被打开了。接着，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帝国主义者签订了《黄埔条约》、《望厦条约》等一系



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沦落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成了一块“肥肉”，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争相宰割和吞食遂使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新疆物产丰富，但经济发展落后，是帝国主义者理想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市场。沙皇俄国对此非常了解，因此，它不断以武力为后盾，对新疆进行领土蚕食和经济侵略，同时还妄图以条约形式掩盖其罪恶的本来面目。

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我国西北边疆不准俄国来进行贸易。18世纪末，俄国商人开始了与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的非正式贸易，因清政府严格限制，这种贸易数量不大。19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沙俄急于要求通过“贸易”对新疆进行经济侵略。鸦片战争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进行“五口通商”等侵略权益，贪婪的沙俄更是迫不及待地把经济势力伸向新疆。1847年7月至1848年6月，沙俄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辟喀什噶尔、伊犁和塔尔巴哈台为通商口岸。对签订有关通商章程的要求，清政府一直持回避态度。1850年1月，沙俄第三次提出前议，清政府怕“致激事端”，被迫同意在伊犁、塔尔巴哈台两处通商。

1851年7月，沙俄代表科瓦列夫斯基来到伊犁。随同而来的，还有扎哈罗夫和塔塔林诺夫等人。科瓦列夫斯基曾任俄国驻华东正教布道团的监护官，当时任沙俄矿业工程学校上校，是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分子。他曾游窜于埃及、中亚及中国等地，以探险为名，盗窃大量情报，因为沙俄扩张有功，后来当上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和枢密大臣。扎哈罗夫和塔塔林诺夫都是沙俄在北京的东正教布道团成员，所谓有名的“中国通”，沙俄侵华的得力鹰犬。

谈判从7月20日开始，科瓦列夫斯基等人从一开始就无理取闹，仍然纠缠于早已为清政府拒绝的喀什噶尔通商问题。尽管中国代表伊犁将军奕山、参赞大臣布彦泰等一再重申中国方面的意见，科瓦列夫斯基等人仍然疯狂叫嚣，不可理喻，后来见奕山等人主





叶尔羌官员

意已定，又向奕山索要文据，以便销差。但当文据到手，有关伊犁通商的条款议定后，科瓦列夫斯基再次提出喀什噶尔贸易等“数年或数十年再看机会试行通商”的无理要

求，如此反复无常的无赖行径，激起中国代表的愤怒，勒令其将文据缴回，并警告说，如果继续出尔反尔，“即通商之事亦可中止”。科瓦列夫斯基等人这才不得不暂时收起无理要求。但沙俄打通我国南疆贸易的野心始终未死。

1851年8月6日，《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在沙俄的威迫诱骗下正式签定。这是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侵略新疆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沙俄套在新疆各族人民身上的第一副枷锁。条约规定：伊犁和塔尔巴哈台成为中俄通商口岸，俄国商人有权在两地建立贸易圈，在圈内盖房、存货、居住，在清朝拨给的草场中放牧俄国商人的牲畜；俄国商人享受免税的待遇；俄国在两地设立领事，名义上是为了处理两国在通商口岸的外交关系和管理俄国侨民，实际上，俄国领事馆是沙皇设在中国境内的间谍中心。条约还规定了领事裁判权：俄国商人犯罪，中国地方当局不能过问，由俄国领事去审判。从此，大批俄国商人涌入伊犁和塔城，并在两地建立了规模颇大的贸易圈，低价收购中国农牧民生产的干果、皮张、牲畜、羊毛、肠衣等土特产，高价倾销俄国运来的洋布、火柴、糖、皮、呢绒等工业品。沙俄商人甚至在领事和俄国军队的支持下，在中国境内抢夺金矿和煤矿。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利用清政府在战争中的不利地位，威胁和要挟清政府接连签订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但霸占了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且无耻地声称中俄在新疆西部的“边界未定”，为继续侵略新疆设下“埋伏”。

1861年8月，俄国军官巴布科夫奉命到塔尔巴哈台侦察情报，向俄外交大臣提出分割中国疆土的具体方案。1862年1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亲自主持召开御前特别会议，决定以《北京条约》第二条为基础，强迫中国政府承认以常驻卡伦为界。同时以武力占领常驻卡伦以外的中国领土，造成既成事实的边界线。

1863年8月，俄国代表巴布科夫与清政府代表明谊在塔尔巴哈台会谈定界，五次会谈后，谈判陷入僵局。沙俄便按计划出动军队向中国纵深地带的常驻卡伦推进，在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伊犁、纳林形成四个军事包围圈。清王朝在“兵连祸结”的局势下，屈服于俄国的压力，接受了俄方的划界条件。

1864年9月，沙俄再次施展其卑鄙手段，巴布科夫与扎哈罗夫等率领600多名全副武装的俄兵前来谈判，“逞兵挟制”。10月，沙俄终于逼迫清政府又签署了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以后，又通过1869年和1870年订立的《中俄科布多界志》、《中俄乌里雅苏台



伊犁将军府衙署

界约》及《塔尔巴哈台界约》三个边界子约，沙俄鲸吞了中国西部疆土44万多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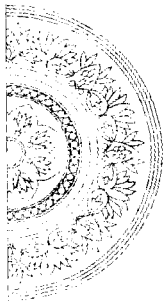
沙俄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清朝的腐败统治，激化了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1864年6月6日，库车率先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军攻克库车城。不久，起义浪潮席卷天山南北，形成了库车、乌鲁木齐、喀什噶尔、伊犁、和田等五个起义中心。起义后在新疆出现了几个互相对立的政权，这种混乱局面，使新疆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 二、 边疆危机

### ●引狼入室

1864年，新疆各族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地主和宗教头目篡夺，他们纷纷自立为王：库车的热西丁自称“汗和卓”；乌鲁木齐的妥明（即妥得璘）自称“清真王”；和田的艾比布拉自称“帕夏”；喀什噶尔的司迪克称王；伊犁的迈孜木扎提自称“苏丹”。这些割据一方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发生争夺，互相攻打，这种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给浩罕国匪帮和沙俄军队的人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喀什噶尔起义爆发后，喀什噶尔白山派首领托合提马木提艾来姆占据回城称王，但不久，伽师回族封建主金相印父子，勾结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赶走了托合提马木提艾来姆，夺取了王位。这时，寄居喀什噶尔回城的浩罕商人乘机插手其间，策反部分伯克、阿訇投书浩罕，欲借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为了控制喀什噶尔局势，也派使者金相印去浩罕联络，企图将流亡浩罕的南疆和卓后裔接回喀什噶尔，借以稳定其统治。正是这件事，引起了新疆近代史上的轩然大波，造成了引狼入室的严重



后果，司迪克等人从而成为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当时，浩罕正处在对抗沙俄兼并的斗争中，已面临亡国的危险，不可能抽出更多的力量染指喀什噶尔，但其统治者仍不愿放弃这次侵略新疆的“良机”。浩罕摄政王毛拉阿里木库里召见匿居的大和卓波罗尼都的曾孙——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任命他为喀什噶尔汗，同时派浩罕军官阿古柏随同前往，执掌一切行政，“他人不得干预”。

阿古柏全名为穆罕默德·阿古柏，1820年生于浩罕汗国的匹斯坎特镇。他在浩罕动荡的政局中素以投机钻营、玩弄权术著称。此次，阿古柏被封为“库什伯克”（地位仅次于艾米尔的高级军职），委以“拉什卡尔巴什”（意为总司令），名义上是随布素鲁克从塔什干出发东进，实际的任务却是挟和卓后裔入侵新疆。

1865年1月，阿古柏在浩罕纠集了68名亲信骨干，由金相印引路，“护送”布素鲁克入侵喀什噶尔。他们借和卓后裔布素鲁克的名义，沿途不断纠合各类人员加入侵略队伍，当深入到距喀什噶尔70公里的明约洛卡伦时，这支入侵军已初具规模了。到了喀什噶尔，司迪克将布素鲁克迎入喀什噶尔回城，但对阿古柏的到来大为不满。而阿古柏则利用群众对和卓的盲目崇拜来骗取支持，首先，他把布素鲁克扶上汗位；然后，他反客为主，把司迪克及其追随者逐出了喀什噶尔。司迪克被逐后，回到家乡帕拉吉地方（今属阿克陶县），聚集了7000多人，进攻喀什噶尔。但是，引狼入室、自食其果的司迪克，很快被阿古柏匪帮击败，被迫流亡塔什干。

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回城立足之后，便向四处伸出侵略的魔爪。这时，恰好叶尔羌城阿奇木伯克尼牙孜受到当地回民军和库车热西丁和卓势力的联合围攻，向喀什噶尔的布素鲁克求救，于是阿古柏乘机带领一支数百人的入侵军开进叶尔羌。在叶尔羌城外，回民军和库车联军以优势兵力向阿古柏发起了进攻，他们高喊着“杀死安集延人”的口号（安集延是浩罕汗国的一个城市，当时人们把浩罕人称为安集延人），致使阿古柏军队遭到惨重失败，几乎全军覆没。死里逃生的阿古柏率领残兵败将连夜退往喀什噶尔。

阿古柏惨败于叶尔羌，他的部下却得逞于英吉沙尔。阿古柏率败军

退至英吉沙尔，协同已攻克回城的入侵军加紧围攻汉城。4月11日，守城清军开城投降，英吉沙尔遂成为阿古柏入侵南疆后以武力攻占的第一座城池。英吉沙尔的陷落大大助长



喀什噶尔老城

了入侵者的气焰，同时也使阿古柏控制了喀什噶尔至英吉沙尔地段，取得了战略回旋余地。阿古柏一面把“胜利”的消息和一份“战利品”送往浩罕请功；一面按浩罕的旨意，让布素鲁克“照帝王规则”正式登基称汗，以掩饰其侵略者的面目，为进一步扩大入侵作准备。

### ● 杀戮时刻

1865年秋，阿古柏率兵向被围困了一年多的喀什噶尔汉城发动总攻。此时，一伙在宫廷倾轧中失利的浩罕官员在玉努斯江的率领下，指挥7000多名入侵军亡命喀什噶尔，他们同时还挟持着倭里罕、买买提明等和卓后裔。经过一番简短的权衡和犹豫，这一批入侵者决定与阿古柏合流并随即加入攻城战役的最后阶段。得到了这批残兵败将后，阿古柏大大地增加了侵略本钱，于是，他的丑恶嘴脸也变得越发狰狞了。

9月1日，清军绿营守备何步云向阿古柏投降，阿古柏军队进城后，居然纵兵屠城7日，城内各族居民惨遭杀戮，血流成河。

玉努斯江的到来，向阿古柏宣告了主子毛拉阿里木库里之死，而事实上，此时的浩罕汗国也已在沙俄的兼并和内部的倾轧中迅速瓦解了。





由于返回浩罕已绝无可能，这就促使阿古柏决心在新疆建立自己的统治王国。对阿古柏来说，他会不惜使用任何残暴手段来达到这一卑鄙目的。

不久，阿古柏向叶尔羌发动了第二次进攻，但这一战又以阿古柏的惨败告终。这次军事上的失败，引起了阿古柏侵略集团内部的尖锐冲突。侵略军中的吉尔吉斯官兵拥布素鲁克和卓等西窜，策划袭取喀什噶尔，踢开阿古柏，自立为汗。阿古柏闻讯，连夜疾驰返回喀什噶尔，攻城41天，镇压了兵变，秘密处死了倭里罕，又将布素鲁克软禁于英吉沙尔，剪除了内部的异己势力，站住了脚跟。

1866年6月，阿古柏率军第三次进犯叶尔羌。此时，以伊斯哈克为首的库车军已在叶尔羌布防，回、汉两城守军共2万多人准备迎击敌军的进犯。汉城内回民守军提议与库车军及占据着叶尔羌回城的阿奇木伯克尼牙孜等联合夜袭敌营，不料尼牙孜秘密派人先向阿古柏告密。联军劫营部队中了埋伏，损失惨重。不久，伊斯哈克与汉城回族民军头目先后投敌，阿古柏遂占领了叶尔羌。

1866年12月，阿古柏率军进至叶尔羌与和田交界处，即令停止前进。他假借布素鲁克和卓名义写信给割据和田的“帕夏”艾比布拉，请求准许他到和田朝觐圣人陵墓——乌鲁克麻扎。艾比布拉受骗出城相迎，立即被阿古柏逮捕，俘送叶尔羌监禁。阿古柏诈取和田后，入城布置兵力。和田人民见情形骤变，奋起反击，拼死抵抗，甚至连妇女也参加了战斗。入侵军的屠杀持续了一个多月，不屈的和田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坚持了一个多月，5万多和田军民惨死于阿古柏的屠刀下，护城河及所有沟沟坎坎都填满了尸体，其景象惨不忍睹。



1867年5月，阿古柏向热西丁和卓发动了攻势。首战阿克苏，乌什依鄯教派头目不战而降，阿古柏军占领了阿克苏城。入侵军遂长驱直入，偷袭牙依德（今拜城县西察而其），招降了哈木丁率领的库车援军，夺取拜城，攻占赛里木、黑孜尔（今克孜尔）据点，兵临库车城。库车守军虽然连续重创了入侵之敌，但因孤城难支，终陷敌手。库车人民英勇不屈，继续坚持战斗，杀伤敌人无数，阿古柏之子胡达·胡里·伯克就丧生在库车城下。由于寡不敌众，库车城最后被阿古柏占领，热西丁和卓也被俘处死。入侵军占领库车城后，驻守喀喇沙尔的伊斯哈克（前被阿古柏从叶尔羌放回）献城投降，最后一批库车军民被出卖了。至此，南疆方圆4000余里国土沦入外寇的铁蹄之下。

在两年半的时间内，阿古柏终于靠着惯用的阴谋欺骗、购买诱降、军事袭击以及疯狂的血腥屠杀等卑鄙手段，侵吞了塔里木盆地周围的各个绿洲。1867年2月在进攻库车前，他就迫不急待地废黜了布素鲁克汗，并自我陶醉地自封为“巴达吾来特阿孜”，意思是“洪福之王”。按当时中亚对南疆的习惯称呼，阿古柏建立的反动统治被称为“哲德沙尔政权”。“哲德沙尔”是维吾尔语七座城市的意思，即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和乌什）。

1869年，阿古柏以朝觐为名，把布素鲁克和卓逐出新疆，又把买买提明和卓及其弟用毒酒灌死。投靠外国，冀图在外国的卵翼下分裂祖国的和卓后裔，终于死在外国主子手中，这是古今历史上此类人物的一贯下场，可谓死有余辜。

1870年3月，阿古柏继续东进，首先进犯吐鲁番。吐鲁番军民齐上阵，迎头痛击侵略军，一举歼灭敌军数千人，并且对大败而逃的敌人穷



一八三



追不舍，一连收复了库尔勒、库车和拜城，取得抗击阿古柏斗争的重大胜利。因吐鲁番军民领导人缺乏彻底驱逐入侵者的决心，没有乘胜追击到底，自动从库车撤回，这就给了阿古柏重整旗鼓的机会。阿古柏回到阿克苏大杀回族人民，滥施报复，然后又集结兵力，卷土重来，接连攻陷数城，再次逼近吐鲁番。吐鲁番人民英勇抵抗，从5月到11月的半年时间内，共消灭敌军3.3万人。但由于阿古柏利用挑拨离间、分化瓦解等手段，破坏了吐鲁番各族军民的团结，吐鲁番守将马仲于11月1日开城投降，出卖了吐鲁番军民的抗战成果。

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后，于11月21日，进攻乌鲁木齐。“清真王”妥明组织了号称10万的各地回族民军出城迎战，并主动向阿古柏发动了进攻。但由于指挥不当，战斗最终失利。阿古柏随即对乌鲁木齐各族人民进行疯狂屠杀，这个杀人成性的恶魔居然下令见中国人就杀，小孩、俘虏一个不留。妥明被这种血腥屠杀吓破了胆，将各族兵民弃之不顾，于11月下旬开城投降。阿古柏接着又派兵袭取了玛纳斯。至此，整个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和天山以北的部分地区就相继处于阿古柏侵略军的统治之下。

## ● 边城浩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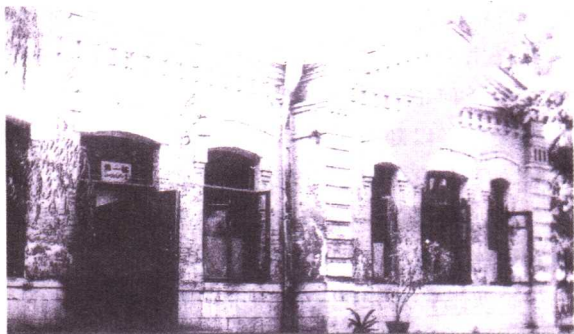


自1865年阿古柏入侵南疆以来，新疆各族人民英勇抗敌，前赴后继，不断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但由于各地封建割据头目大多只关心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各自为政，不能一致对外，有的贪生怕死，临阵败退，有的甚至认贼作父，拱手出卖祖国河山。致使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遭到失败，造成数千里领土沦陷，数百万同胞被蹂躏的历史悲剧。

浩罕军官在侵略新疆的过程中，竭力投靠俄、英两国，希望两国都能支持他的侵略行径，而俄、英在中亚及世界范围内的激烈争夺，也使他们各自从本国利益出发，对阿古柏政权采取了拉拢和扶植政策。1866年，阿古柏与沙俄政府达成非正式协议：双方不干涉对方行动。1872年，阿古柏与沙俄签定了《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条约规定俄国承认阿古

柏为“哲德沙尔”领袖。

阿古柏与英国勾结得更加紧密。1869年他派人赴印度与英国当局挂钩，次年，再派人赴印度，并带去致英国女王及印度总督的信。英印当局则派



喀什噶尔的英国领事馆

弗赛斯等人多次潜入喀什噶尔活动，并以大批枪支弹药装备阿古柏的军队。1874年，英国与阿古柏签订了《英国与喀什噶尔条约》，条约规定英军承认阿古柏为喀什噶尔与叶尔羌的“艾米尔”，阿古柏则给予英国更优于俄国的特权：允许英国在喀什噶尔设“大使”、“领事”，并可以“置产”。与此同时，阿古柏又企图通过奥斯曼帝国用伊斯兰教国家的宗教影响和政治影响来巩固他对新疆的统治。他遣使前往朝见奥斯曼帝国苏丹，表示愿意奉奥斯曼帝国为“哲德沙尔”的宗主国。奥斯曼苏丹也封阿古柏为“米拉胡尔比什”（即“艾米尔”），并送给他大批武器。

阿古柏建立的“哲德沙尔”政权，是依靠封建神权进行殖民统治的。在政治上，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在思想上，利用伊斯兰教来维护其统治；在经济上，实行军事封建采邑制。“哲德沙尔”政权在各地的执政者——阿奇木伯克，其中绝大部分是跟随阿古柏入侵新疆的浩罕人，也有少数是本地民族上层统治阶级中的投降派。阿古柏为了镇压新疆人民的反抗除建立6.6万人的常备军外，还在各地设有警察和特务组织。

阿古柏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把侵略战争鼓吹为伊斯兰圣战，在占领区内又把宗教变成他统治人民的工具。他随意扩大宗教寺院的占地面积，兴建大批清真寺、宗教学校和麻扎（宗教显贵的墓地），并赋予宗教头目极大的权力，以此来笼络和收买一些宗教头目。

他以宗教统治代替行政管理，废除清朝政府在新疆推行的法令、法



# 新疆两千年

规和行政制度，一切都以伊斯兰教法典《沙里阿特》为根据，在城乡普遍设立宗教法庭，“哈孜”（宗教法官）根据《沙里阿特》进行审判，可以用任何借口处罚劳动人民。“拉伊斯”（检查执行宗教法规的人）的皮鞭，可以随意抽打人民。妇女被迫戴上面纱，否则，将受到鞭打。同时，阿古柏封闭和捣毁佛教寺庙，强迫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信仰伊斯兰教，提出杀“卡甫尔”（异教徒）的反动口号，为此，被杀害的汉族和满族人民达4万人之多。

事实上，凡是维护祖国统一和维护民族团结的人，即使是伊斯兰教信奉者，也同样遭到阿古柏的血腥屠杀。如在和田，有5万维吾尔人被杀；在乌鲁木齐，连妥明派去“感化”阿古柏的几百名手捧《可兰经》的儿童也惨遭杀害。

在社会经济方面，阿古柏实行的是军事封建采邑制。他把强占的城乡土地分封给他的大小爪牙，各级文武官吏的俸禄，直接取自于被封领地内的劳动人民。官吏们在自己的统治区内可以任意向劳动人民索取钱财，并强迫人民从事无偿劳动。各地的赋税种类繁多，而且税率没有定额，他们想征收什么，就征收什么；想征收多少，就征收多少。如伊斯兰教规定征收的乌尔（农业税），原定税率是收获量的10%，后来却增加到30%。为了向百姓强征苛捐杂税，各地都拥有一批税吏，多的达500~600名，最少的也70~80名。

阿古柏本人对于财富的占有更是贪得无厌，他不择手段地对人民进行搜刮。除各地的阿奇木伯克要向他进贡金钱财物外，他还将侵占的土地作价出卖，所得金钱全归阿古柏本人。第二年，他又派人以“调查”为名，将出卖过的土地硬说成是新垦的耕地，再次作价出卖，再掠取一笔金钱。对于阿古柏这种敲骨吸髓的剥削行为，当地人民十分愤慨，他们骂阿古柏“将七层地皮都卖完了”。在阿古柏的统治下，新疆各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被搜刮殆尽，广大人民群众终年不得温饱，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许多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新疆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甚至出现了买卖奴隶的历史倒退现象。阿古柏则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尸骨上，筑起了寻欢作乐的“天堂”。他们随心所欲地挥霍着剥削来的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阿古柏的行宫就



遍布各地，在喀什噶尔、阿克苏、叶尔羌、喀喇沙尔、吐鲁番、托克逊等地都有建筑豪华的宫殿，他还掳掠600多名各族妇女充当后宫。毛拉木沙在《伊米德史》中写道：“他们成天骑着高头大马，挥霍金银，吃着人间少有的饭菜，携带女人随心所欲地干着各种丑事。”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柯尔克孜族民歌，歌词大意是：“黑色的猫头鹰在头顶上惨叫，罪恶的战火在草原上燃烧，柯尔克孜人的家乡流着鲜血，大地母亲，为她的儿子在痛苦号啕，号啕——痛哭——痛哭——号啕，灰色的恶狼在白骨堆上嗥叫，阿古柏的马队像黑风在咆哮，柯尔克孜人的太阳是谁抢去了，大地母亲，为她的儿子在痛苦号啕，号啕——痛哭——痛哭——号啕……”这首歌反映了阿古柏的残酷统治和在黑暗岁月中的人民悲愤的心情。

阿古柏的暴虐统治，必然引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断反抗，其中对阿古柏的统治打击最沉重的是乌鲁木齐地区的武装斗争。1871年5月，乌鲁木齐民团首领徐学功联络各地民团向入侵军发起进攻。一战收复乌鲁木齐满城，进而围攻汉城（迪化），生擒阿古柏的傀儡头目马仲。9月阿古柏再次纠集1万多人马二次入侵乌鲁木齐，徐学功抵抗失利，退出了汉城。1872年2月，乌鲁木齐回族人民起兵反抗，他们与汉族民团徐学



功等部联合，向盘  
阿古柏则遭  
一路烧杀  
者于南疆”。  
玛纳斯一带



据乌鲁木齐的敌军发动围攻。  
其长子率军第三次入侵乌鲁木齐，  
劫掠，“屠乌垣回、汉，迁其壮  
于是，阿古柏侵略势力在乌鲁木齐、  
又得逞一时。人民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

但是，新疆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苦难，盼望得到内地人民的支援和帮助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了。据毛拉木沙在《伊米德史》一书中记载说：“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在街头巷尾成群结伙地在一起议论着‘汉人就要来了’的消息，不管这些消息是真还是假，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愿编织出许多故事，以悦人心，更悦己心。”而此时，清朝政府也已逐渐认清了阿古柏的侵略本质及其巨大的危害性，用武力讨伐阿古柏入侵者被提上了清朝政府的议事日程。

## ● 风雨伊犁



伊犁河发源于天山，全长1000多公里，注入巴尔喀什湖，流域面积约14万平方公里。清代的伊犁地区是指伊犁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以伊犁河为界，伊犁分为东、西两路。俄国对伊犁的野心由来已久，还在新疆各族农民起义爆发之前，就曾多次派兵侵入伊犁西部，抢劫牲畜，烧毁村庄。1864年俄国又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我国西北边疆44万平方公里领土，其中包括占伊犁地区面积4/5的伊犁西路的大部分地区，伊犁仅存九城及周围防营驻扎、屯田区。尽管如此，俄国仍欲壑难填，伺机占有伊犁全境。当阿古柏匪帮侵吞新疆南部，进而侵犯北部时，沙俄政府急不可待地出动了军队，强行霸占了我国伊犁河谷地，并且张牙舞爪，妄图鲸吞北疆，进一步囊括南疆。我国西北边疆形势继续处于危急之中。

伊犁苏丹政权建立后，曾要求俄军撤出其侵占的伊犁塔兰奇耕地，并拒绝俄国商人进入伊犁贸易。俄国与伊犁当时的割据政权艾拉汗政权之间关系日益紧张。俄国认定清王朝已无力恢复在中国西北几省的政

权，更不可能收复伊犁，结束新疆的割据局面。所以，俄国必须“参与”中国西北边疆事务，以便利用新疆的战乱局势扩展俄国在当地的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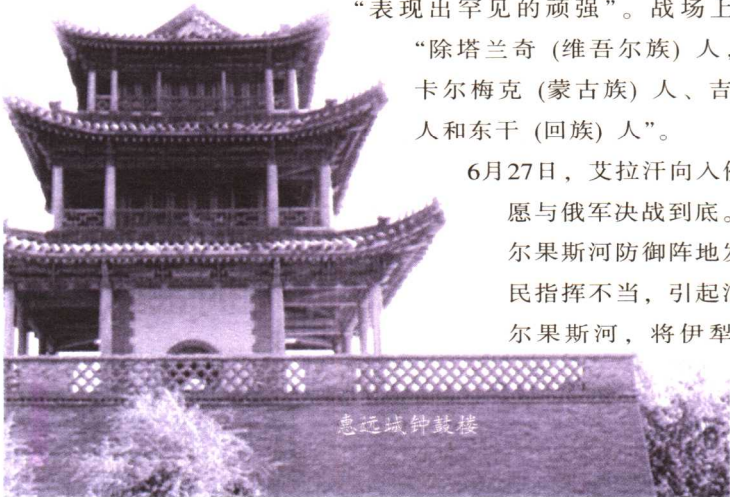
1870年，伊犁艾拉汗政权已同俄国断绝了一切往来，双边摩擦、纠纷不断增加。6月，5名俄民非法闯入伊犁南境特克斯地区狩猎，被伊犁哨所士兵击毙1人，俘获3人。俄方乘机提出4条通牒及多项无理要求。8月，俄军出动天山部队侵占了伊犁南部通往阿克苏的战略通道——穆索尔山口，拉开了入侵伊犁的序幕。

1871年4月，原属中国的哈萨克族阿勒班部落首领塔扎别克，因起兵反抗沙俄殖民统治失败，率领1000余户牧民投奔伊犁苏丹政权。沙俄诬称伊犁苏丹政权插手其间，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侵占伊犁的战争。

1871年5月8日，沙俄向伊犁苏丹艾拉汗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在7天之内交出塔扎别克，否则“将出动我（俄）国部队”。5月15日，沙俄先派出一个步兵连和90名哥萨克组成前卫分队，携带两门大炮，向伊犁推进。5月17日，俄军入犯霍尔果斯河西岸，伊犁军民退守马扎尔堡，切断河流、渠水，使俄军缺水难行。19日，伊犁军民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发动了反击冲锋，终因武器简陋，战斗失利。俄军攻占马扎尔堡。伊犁军民再次采取切断水源、坚壁清野等斗争方式击退了敌军。

5月19日，俄军沿伊犁河南克特缅山入侵伊犁南境。遇到伊犁军民的顽强抵抗。6月10日，俄军攻占了克特缅村。次日，伊犁援军分三路向俄军发动反击，与俄军多次白刃肉搏。各族军民协同作战，前赴后继，“表现出罕见的顽强”。战场上倒下的伊犁军民中，“除塔兰奇（维吾尔族）人，还发现有很多汉人、卡尔梅克（蒙古族）人、吉尔吉斯（克尔克孜族）人和东干（回族）人”。

6月27日，艾拉汗向入侵军递交了战书，表示愿与俄军决战到底。次日，俄军向伊犁霍尔果斯河防御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布防军民指挥不当，引起混乱。俄军乘机渡过霍尔果斯河，将伊犁军民逼入清水河子城



惠远城钟鼓楼





# 新疆两千年

堡。6月30日，俄国向清水河子城发动猛攻，伊犁军民以城堡为依托，骑兵向两翼展开，利用城外地形，顽强地阻击俄军的攻势。战斗从黎明持续到深夜，清水河子城失守。次日，俄军进犯绥定。7月2日，艾拉汗接受了沙俄提出的投降条件，把塔扎别克缚送给敌人，并交出了库存的武器。7月4日，艾拉汗亲自引导沙俄侵略军进入宁远（今伊宁）城。伊犁各族人民付出无数鲜血和生命的反侵略斗争，就这样以艾拉汗的投降而告终。其后俄军在精河、大河沿一带建立哨卡，派驻官兵，将伊犁及其周围约7.36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霸占。

沙俄侵占我国伊犁的战争是一场卑鄙无耻的战争。它是背着清朝政府悄悄进行的。在沙俄已经出兵侵略伊犁的初期（即5、6月间），沙俄驻北京公使还装模作样地向总理衙门交涉，要求清政府早日出兵，“设法以除此‘乱’”，还表示“本国愿帮助收复伊犁”，丝毫没有提起沙俄已出兵伊犁的勾当。9月1日，沙俄侵占伊犁之后的两个月，该公使才转告清朝总理衙门，说俄军已于7月4日“克复伊犁城池，请定如何办法”，表示“本国愿将所得伊犁地面交还贵国”，还假惺惺地催促清政府“迅即派员前往接收”，“将一切办理章程商量妥协”。

清政府获悉沙俄侵占伊犁，大吃一惊，即与沙俄驻京公使作进一步的交涉。这时，该公使又一反前议，声称清军必须将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城克复后，才能谈判交还伊犁。清政府感到事态严重，当即谕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沙俄谈判接收伊犁事宜。荣全抵达塔城，使沙俄颇为狼狈，它没料到清朝官员居然会真的到来，于是竭力寻找借口，并改变会谈地点多次，最后在爱古斯会谈时，又一再推诿，荣全无法，只得返回塔城，暂时驻扎该地。

下半年，总理衙门继续与沙俄公使交涉接收伊犁问题。俄方重复提出在爱古斯会谈中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作为交还伊犁的先决条件，清政府表示一定的让步后，该公使又老调重弹，仍然把交还伊犁的时间，推迟至中国收复乌鲁木齐，伊犁与北京的交通畅行无阻之时。在当时沙俄的心目中，这是清政府难以办到的，也许是永远也办不到的，那么，伊犁就可以永远霸占在沙俄自己手里了。



# 还我河山

当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屈服过。为了解除新疆危机，收复失地，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军事家在宗棠致命疆场，建树奇功；外交家曾纪泽据理力争。『探虎口索已投之食』，收复伊犁。其后，新疆建省，其一系列措施或可对后世有所启发。

## ● 海塞之争



## 一、大将西出师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写的是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一位收复新疆的英雄人物，他就是一代名将——左宗棠。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举，接着考进士，三试不第。从而弃科考，悉心钻研兵法，谙熟三韬六略，孕育将帅之法。与朋辈交游，喜为壮语惊众，又尝以孔明自比，人们都笑他狂妄，惟独友人胡林翼极力称赞，说他横览九州，才智超群，必成人器。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累官至巡抚、总督，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封疆大吏，后因功奉诏回京，晋升为军机大臣，佐理朝政。由于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偏见，左宗棠参与过对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镇压，但总观全局，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功大于过的爱国志士和民族精英。

1872年，左宗棠上奏朝廷说：“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度，妄引过荒艰巨为任，虽至愚至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即浩罕）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待绸缪，若此事即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区区愚忱，窃有不敢不尽者。”同年，他在一封家书中也曾说：“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人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子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由此可见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思想。

1873年春，左宗棠在写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并明确提出了收复新疆的具体方案。他指出，从军事上讲，要抵御俄国，必先稳定新疆；欲收复伊犁必先攻克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形势稳固以后，就可明示俄国，伊犁乃我疆域，寸土不可相让。他还提出了





行动措施的细节。但由于清廷内部意见分歧，顾虑重重，举棋不定，在朝廷的决策层中发生了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9月，中日签订了《北京条约》，这标志着中国近代海防的一个新的危机的到来。但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他的《筹议海防折》中，却公然主张放弃新疆，他说什么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叛乱后，朝廷直接派官管理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不为值”，并且认为新疆北邻俄国，南近英属印度，“即勉强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李鸿章强调“海防”，主张放弃“塞防”，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他的结论是：对已经出塞和准备出塞的军队“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撤停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这对西征之军等于釜底抽薪，当然要遭到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有远见的官



员们的极力反对。

左宗棠不是不要“海防”，而是主张东西兼顾，海防、塞防并重。事实上他任闽浙总督时就深知海防重要，并实实在在地从事海防建设，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但他绝不肯接受李鸿章放弃塞防的种种谬论。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痛斥李鸿章的错误主张，指出“若沿海各省因筹办防务，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议，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指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后果必然是“扶起东边倒西边”。当时地方督抚中，丁宝楨、文彬、吴元炳都力陈抗俄的重要性，湖南巡抚王文韶更是主张“以全力西征”，他指出“沙俄鲸吞我国西北，已迫在眉睫，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

1875年1月，地方督抚对“筹办海防”的复奏已基本汇齐，正准备进行由亲王、郡王、大学士、六部、九卿参加的“廷议”时，同治皇帝病死，“廷议”推迟到次年春天。在第一阶段的讨论中，围绕着收复新疆的问题，已出现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而第二阶段的“廷议”则远远超出总理衙门的原奏范围，实际上成了收复新疆还是放弃新疆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一场原则争论。

当时官居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权高势大，年龄比左宗棠小，正是年富力强之时，有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督抚，是按照他的

调门随声附和，主张暂停西征。此时，英国公使威妥玛为阻挠清军西征，向李鸿章施加压力，1874年1月，威妥玛派文参赞梅辉立（Marers.W.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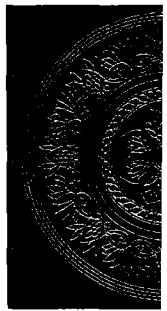


到天津，向李鸿章建议把伊犁让与俄国，天山南麓给阿古柏，以期缓和英俄矛盾，并卵翼阿古柏政权。李鸿章参加完同治皇帝的葬礼后，回到天津大肆活动。在他的唆使和鼓噪下，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甚嚣尘上。在一片要对西征停兵撤饷的叫嚷中，新疆的命运的确令人担忧。

值此关键时刻，左宗棠挺身而出，力排众议，据理力争，他上奏朝廷，针对李鸿章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奇怪逻辑，明确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所谓“并重”，不等于平均使用力量，这里有个缓急之分，匮乏之分，“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然而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当时日本人虽入侵台湾，《北京条约》对此已有了结论，“故东南海防并非燃眉之急，而西北之军饷奇缺……若此时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从历史上看，乾隆年间勘定西域，当时满朝文武颇以兴师为疑，乾隆皇帝不为所动，开新疆，立军威，终竟其功。不但前代的九边皆成腹地，就是由蒙古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皆可分屯列戍，斥候遥通。所以京畿之地百多年无烽燧之警。我们今天受惠于前人的伟举，我们同样也要站得高一些，替子孙后代想得远一些，周全一些。

新疆既然不可放弃，那么在当时是否有收复的可能呢？持失败主义思想的李鸿章认为，收复新疆是办不到的；而左宗棠的看法是：勿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只要“剿抚兼施”，“粮运兼筹”，西征是可以取得胜利的。这一点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左宗棠与李鸿章意见相左，一时相持不下。此时光绪皇帝刚登基，年幼无知，朝廷大权由慈禧太后一手把持，她对军国大政并没有什么主意，好在那时她还能听得进大臣的意见。当时在朝廷众臣中威信颇高的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站在了左宗棠一边。他说，如果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不仅破关而入，陕甘内地震动，就是蒙古诸部也将叩关内徙，坏我京师肩背。到那时要是海防进一步危急，陆海两面受敌，如何抵御？因此他主张，火速派大军出关，先解新疆燃眉之急，待塞防基本稳



定后再来认真从事海防建设。他还认为，目前左宗棠手下的部队，都是百战之师（刚镇压完农民起义——作者按），如果乘锐出关，攻未经大敌之寇，乌鲁木齐是不难指日肃清的。文祥的明确表态使左宗棠的意见在清廷里占了上风，左宗棠的个人主张由此变成了清廷中央的官方意志。

派谁去任主帅呢？西北荒凉艰苦，后勤补给运输线长，恐怕一般将领都难胜任。早在俄军侵占伊犁时，清政府就派逗留于甘肃高台的乌鲁木齐都统成禄和直隶提督刘铭传二人各率所统军队经由肃州出关入疆。但是成禄迟迟不前，刘铭传称病不至。此刻，除了左宗棠，清廷已无将可点了。这倒应了25年前林则徐对左宗棠的预言：“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左宗棠此时虽已年老力衰，心血耗散，但还是从大局出发，毅然挂帅西征。他也深知“争赢”不等于“打赢”，征途甚艰！

1875年5月3日，清廷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同时，根据左宗棠的意愿，清廷还任命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将“无应变之才”的原乌鲁木齐都统景廉，以及“同役而不同心”的西征粮台督办袁保恒调开，组成了以左宗棠为核心的新的西征军最高统帅部。从此，揭开了用兵新疆的战幕。

## ● 回疆凯歌



左宗棠在西北和新疆问题上，卓有远见的论述颇多。早在他21岁时所写的《燕台杂感》的第三首七律中，对新疆置省、开屯、时务均已预及。后来又认真读了关于新疆的专著《西域图志》；接受了林则徐提出的“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的观点和“将来完成我（指林公）的大志惟有靠你（指左公）”的重托，奠定了他经营西北，收复新疆，巩固西陲的思想基础。他曾说：“周秦汉唐之时，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又曰：“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非仅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铁，防不

胜防，即西北关山，亦将无晏安之日。”

但是，要收复沦陷十多年的新疆，困难是很多的：既要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集巨额军资，又要在军粮无着、路途艰苦

的条件下筹粮、转运；既要在政敌攻讦、谤声四起的逆境中冒政治风险，又要同狡诈而凶恶的英、俄殖民者周旋。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但他却怀着“朔雪炎风，何容措意”的豪情，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

鉴于新疆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产粮不多等客观条件，左宗棠决计花较多的时间从事战前准备。从1875年5月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日夜操劳，为西征新疆筹措兵员装备和军饷，并积极组织粮运工作。

他强调西征部队要精，不可多而滥。他大刀阔斧，裁掉了西征军中的冗杂疲弱之师。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提出要尊重官兵个人的去留意愿。入疆作战十分艰苦，他不想强迫部下勉强出关，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资遣回籍。汰剩的官兵既是自愿，士气自然饱满，对他们进行纪律约束也比较容易。再加上战前的强化训练、实地演习，一支精而又精的西征队伍便基本上形成了。

西征军出关作战的对象是阿古柏匪帮，也有可能与沙俄军队作战。阿古柏匪帮的武器装备主要来自英国，是比较先进的，沙俄军队更是装备着清一色的近代枪炮。为了尽量缩小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甚至



回王墓(哈密回王是清代哈密的地方封建领主,对清政府稳定新疆、维护祖国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争取到一定的优势，左宗棠对出关作战部队的轻重武器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左宗棠给西征军主力部队新配了各式火炮10多门，枪1000多支。他建立了一支拥有116名官兵的专业炮兵队，装备了后膛炮12门。这支炮队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支与外敌作战的近代化专业炮兵。他还给前线指挥配发了双筒望远镜，这种东西对于当时一般的中国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左宗棠采用双管齐下的方法解决武器装备的来源问题。一方面，他委托大买办胡光墉（即胡雪岩）在上海向洋行采买军火；另一方面，又命令1873年春开设的兰州机器局，加紧给西征军修造枪炮，制造弹药。该局具有制造多种炮弹、枪弹，改制劈山炮、抬枪，仿制部分德式后膛枪炮的能力，所造枪炮弹药在西征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所需军费方面，左宗棠亲自作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精密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8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100斤粮食运输100里为单位，估算出全部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作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共需白银800万两。为了防止意外，保留余地，他向朝廷申报了1000万两，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楨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就想摊派各省，从地方财政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一时凑齐，会贻误战机。军机大臣文祥过问了这件事，他亲自去找皇上陈述利害关系。皇上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500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500万。”左宗棠拿到军费，又在筹粮、运粮上做出妥善安排，较好地解决了自古兵家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问题。

准备工作就绪，左宗棠才统帅在西北地区集结的各路清军向新疆进攻。左宗棠考虑到清军入疆作战的第一期目标是阿古柏，而非盘踞伊犁的沙俄军队，阿古柏的主力在南疆而不是北疆，论地理形势北疆可以控



制南疆，而南疆却不能控制北疆。所以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左宗棠任命老湘军统领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自己坐镇肃州，就近指挥西北战事。他告诉刘锦棠，要充分利用清军仍然控制的北疆哈密、巴里坤、古城、吉木萨尔等要地，一举攻占乌鲁木齐，扼住新疆总要，然后南攻阿古柏主力，西阻伊犁俄军东窥。

西征军收复新疆一共经历了三大战役，第一大战役就是攻占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位于东西天山接合部的北麓，三面环山，北部及西北部较为开阔，但有古牧地（今米泉）为其外卫，形势险要，清军欲取乌鲁木齐，必先破古牧地。1876年7月28日，刘锦棠率大军行至阜康，再向前百里即为古牧地。据守古牧地的是白彦虎，白彦虎原为陕西回民起义领袖之一。1873年春白彦虎至肃州，该处回民首领马文禄不纳。白彦虎乃会合西宁等处回民，携带家眷约万余人，经敦煌于9月抵达哈密，至哈密后，白彦虎与当地维族头目玉素甫联合，攻占哈密回城。10月，清兵攻入回城，白彦虎携哈密王之母至吐鲁番，降附于阿古柏，出卖了回民起义的根本利益，成了民族罪人。白彦虎替阿古柏卖命，当了抵抗清军的先锋。由阜康至古牧地有大路，沿途一片沙砾，饮水困难，此外，还有小路可通。刘锦棠侦知此情，假装从大路进攻，吸引敌军，同时以主力袭取小路，一举突破敌人防线，进至古牧地城下。8月17日，清军借助开花大炮的威力，轰开古牧地城墙，全歼守敌6000人，惟白彦虎逃脱。次日又乘虚捣隙，占领了防守空虚的乌鲁木齐。

第二大战役是收复达坂城——吐鲁番一线。这是打开南疆门户的关键一役。西征军攻占乌鲁木齐之后，刘锦棠提出要立即进攻南疆，但左宗棠认为不可，他再次强调了“缓进速战”的原则，指出：隆冬将至，大雪封堵天山，进攻诸多不便，战线拉长使兵力日渐分散；应利用严冬时节休整部队，加紧运贮军粮，一俟来年春暖花开，再大举进攻。

次年4月，士气旺盛的西征军向达坂城进发，攻势凌厉，势若破竹，仅半个月功夫，就顺利收复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这次战役是双方主力的一次决战，阿古柏匪军受到致命打击，被歼被俘者达2万之众，占阿古柏总兵力的一半左右。左宗棠对这次战役评价很高，认为是西征用兵以来的一次大胜仗。阿古柏匪帮受此打击，内部乱作一团，南疆各



# 新疆两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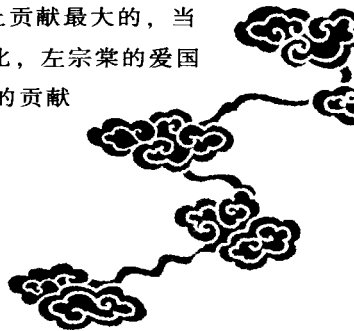
族人民也纷纷起义。阿古柏见大势已去，遂于5月下旬服毒自杀。阿古柏之子海古拉携其父尸西逃，逃至库车时，被其兄伯克·胡里所杀。伯克·胡里率部退守南疆西四城，并在喀什噶尔称王。

被阿古柏残余势力占据的南疆八城分为东四城和西四城，东四城是指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西四城为叶尔羌、英吉沙尔、和田和喀什噶尔。东四城守备空虚，清军在9月发起攻击后，只用了一个月就陆续将它们收复。此后又经三个月的战斗，南疆西四城也被攻破，白彦虎、伯克·胡里在沙俄的庇护下窜入俄境。1878年1月，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之外，全部光复。帝国主义列强蚕食南疆的阴谋受到致命一击。


清军之所以能够击败阿古柏、白彦虎，迅速收复新疆，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左宗棠的督率指导而言，关键是他能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正确战略方针。此外，他对西征军纪律的严格要求，对新疆收复地区人民的安抚，对敌军俘虏的宽大处理，也对战事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他曾三番五次地写信给西征军各路将领，要求他们严格约束部下，“勿淫掠，勿残杀”，要做“王者之师”，“以王土、王民为念”，“只打真贼，不扰平民”。根据左宗棠的指示，西征军每收复一地，都要设立善后局，负责办理招恤流亡、恢复屯田、奖励开垦、修治道路和水利等工作。对于敌军俘虏，除了首恶分子，一般都给衣粮，令其自由去从。

左宗棠以收复新疆的丰功伟业获得了广泛的赞誉。1878年1月，他被清廷晋升为二等侯爵。据说清廷最初打算授予他公爵之位，但有人拿他与曾国藩相比，说后者打败了太平天国，有再造清朝之功，才得到一等侯爵爵位。保土之功不能大于再造之功，左的爵位也不能高于曾国藩，所以改授为二等侯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收复新疆的爱国壮举是绝不能与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相提并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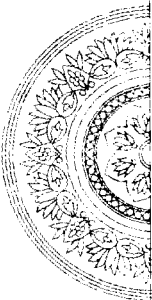
有位历史学家说，自唐太宗以后，对于祖国领土贡献最大的，当首推左宗棠。这实非过誉。与稍早一些的林则徐相比，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与之媲美，其反侵略的勋业，对祖国的贡献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 ● 生死豪情




清军迅速收复被阿古柏匪帮霸占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增强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意志和信心。悬而未决的伊犁问题，也成为当时清朝政府的中心问题而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初沙俄曾借口乌鲁木齐尚未被清军收复，伊犁与北京交通不畅而拒绝交还伊犁，声称“代为管理”。如今它的这些借口都已破产，清政府遂决定趁热打铁，迅速派人与俄谈判，收回伊犁。



不幸的是，清政府派错了人。吏部右侍郎、署理盛京将军崇厚被选中，崇厚是一个典型的投降派，早年经办天津教案，到过法国“谢罪”，这就有了“向能办事，于中外交涉情形亦俱熟悉”的美誉。清廷封他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头衔，又授予“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大权。而对于如何收回伊犁，如何应付和回击沙俄曾经提出和可能提出的种种要挟，清政府都未曾予以考虑，也未给崇厚以明确的指令，只是指望人去地回，早日了结。崇厚奉旨后，即决定由海路赴俄。

对于崇厚之使俄，当时就有人提出过意见。翰林院侍讲张佩伦反对授崇厚以“全权大臣，便宜行事”的名目。他指出，如果有关系重大而又来不及详细审议的事，沙俄强迫崇厚做出决定，那么，他一个人的话岂不就断送了国家的边疆？他还认为“使臣议新疆，必先知新疆”，建议不要走海路赴俄，应当“由陆路前往，与左宗棠定义而后行”。张佩伦是明智而有预见性的，但这些可取的意见都未被考虑。1878年11月8日，崇厚一行搭乘外国轮船从上海出发。

清政府决定遣使赴俄，使沙俄处于尴尬境地，它不愿同中国人讨论伊犁问题，却又没有理由可以拒绝。于是，它决心挑起边境事件，以制造事端，向清政府施压。阿古柏匪帮的余孽分子白彦虎和伯克·胡里逃入俄境后，沙俄拒绝了中国关于引渡他们的正当要求，将他们豢养起



来，并唆使他们窜犯中国边境。但入侵的土匪全被驻防清军和当地人民擒获，他们供出后台老板就是沙俄，铁证如山，沙俄的罪状又多了一条。

崇厚到达俄国后，显然没有利用我国边境军民歼灭入侵股匪的胜利，力争掌握谈判的主动权，回击侵略成性的沙俄。相反，却被沙俄虚伪的礼仪，甜蜜的话语所欺骗，堕入了沙俄精心设计的圈套，充当了沙俄的代言人。他在向清政府的报告中，说什么沙俄在中国增设通商口岸和领事馆，“彼尚无成见”；分割中国土地“实属无几”；要钱亦“数目无多”。清政府感到崇厚过于让步，损失太多，列举数端电令拒绝，尤其是对于分界问题，指令“断不可许”。熟料9月下旬，接崇厚复电，说是“约章定明，势难再议”，又说已经动身赴黑海里瓦机亚行宫签字去了。这就是崇厚未候朝旨擅自签字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机亚条约》）。

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虽交还了伊犁九城，但却侵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片地区以及沟通南北疆的两处山口，伊犁屏障尽失，三面被围，其势有如沙俄囊中之物。此外中国还要支付俄国人500万卢布（合银280万两）的占领费，允许俄国在嘉峪关、哈密等七处设立领事馆，并给予俄商在新疆、蒙古免税贸易特权等。

崇厚订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全国上下同声谴责崇厚擅权卖国，要求杀崇厚“以伸公愤，以儆将来”。总理衙门迫于形势，也认为崇厚所订条约损失太多，“断不可行”。刘锦棠认为“非决之战胜，别无善策”。左宗棠提出“先折之以议论”，“次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即用外交与军事两手对付沙俄，但立足点要放在拼力一战上。

1880年2月，清政府正式致书沙俄，表示崇厚“违训越权”，所订条约“事多窒碍难行”，特派驻英法公使、大理寺少卿曾纪泽为钦差大臣出



使俄国，重新与俄商谈伊犁事宜。不久，又令刘锦棠帮办新疆军务，将回国后即行革职拿问的崇厚定了“斩监候”的死罪，表示对新疆防务的重视和对崇厚及其所订条约的不满，以平息全国人民的普遍义愤。

沙俄眼看已经写上条约的权益为清政府所否决，恼羞成怒。在虚声恫吓的同时，加紧调兵遣将，大搞军事讹诈。在中国东北、西北边境，俄军骤增至数万人，伊犁俄军达12万余人，甚至出动黑海舰队到中国黄海示威。

此时，左宗棠提出了以武力收复伊犁的行动方案，根据此方案，清军分三路进逼伊犁。1880年5月，左宗棠从肃州出发，亲自前往哈密。在他的马后，一队威武的士兵抬着一口黑漆棺材，以表示他有去无回、马革裹尸的抗敌的决心。“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左宗棠为了保卫祖国的边疆，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他“虽知壮不如人，而孤愤填膺，诚有不知毫之已及者”。

就在左宗棠调兵遣将，厉兵秣马之时，他忽然接到清廷的谕旨，要他迅速离开新疆，回北京“以备朝廷顾问”。原来，清廷对与沙俄开战终怀恐惧，加上李鸿章的反对和一些外国人的恐吓，清廷最后决定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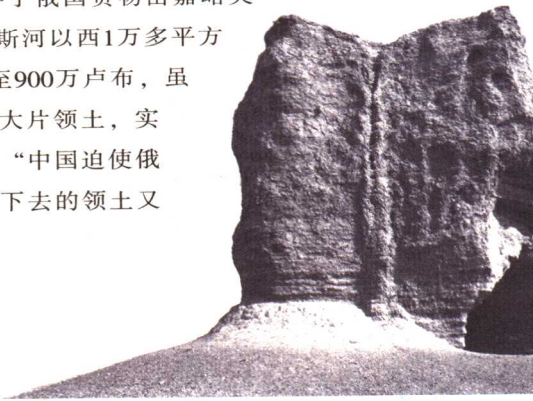


依靠谈判来解决伊犁问题，所以要将一意主战的左宗棠调离新疆。左宗棠以七十高龄，白发临边，却不得一战，不禁痛心疾首。他虽然最终离开了新疆，但他为收复新疆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伊犁附近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成为曾纪泽谈判的强大后盾。

曾纪泽，乃曾国藩长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他处事不惊，立场坚定，且足智多谋；这次为要回崇厚所出卖的利益而进行的谈判使他名垂中国外交史册。

谈判的地点在俄国的圣彼得堡，沙俄占尽天时地利，他们妄图用恐吓甚至人身威胁来使曾纪泽处于彻底的劣势，在谈判正式开始前就输掉几分。曾纪泽的对策是，一到彼得堡就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他深谙外交技巧，将伊犁问题的始末和沙俄的卑鄙行为在记者面前讲了一清二楚，从而一下就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与曾纪泽的外交手腕相比，沙俄的恐吓威胁就是活脱脱的土匪伎俩了。

曾纪泽谈判的主导思想是：以收回领土，取消沙俄在华特权为主要目标，绝不轻易松口，而在赔款数额上可以作一定让步。在今天看来，他当时的决策是较正确的，毕竟赔款的数额是一定的，而割地和丧权则贻害无穷。沙俄最初并不接受他的提议，并以发动战争相威胁。曾纪泽临危不惧，正面警告俄国：“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鄂（俄）国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他同时利用沙俄急于腾出力量解决西线土耳其问题的企图和担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干预的顾虑，采取以拖代战、扩大国际影响的战术。最终，沙俄不得不同意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沙俄同意交还特克斯河谷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通往南疆的穆扎尔山口，并将原增设的7处领事减为2处，放弃了俄国货物由嘉峪关运进内地的要求。但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赔款则由500万卢布增至900万卢布，虽仍属不平等条约，但能改约，保住一大片领土，实属不易。有一位英国外交官评论道：“中国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 ● 长治西陲



在新疆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各族人民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斗争，终于赶走了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新疆各地却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得残破凋零、惨不忍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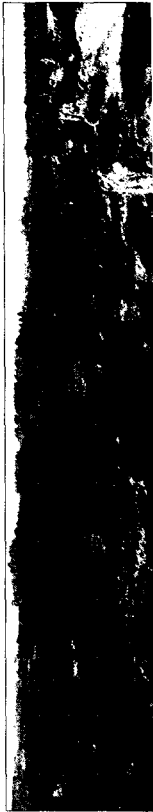
清政府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每收复一地，就在当地设立善后局，以重建当地经济并稳定政局，它还兼管地方民政、司法、赋税等事项，在实际上行使着地方临时政府的职能。随着新疆全境的光复，尽早建立全疆范围内的有效统治就显得愈发必要。1877年7月4日，清政府指令左宗棠对新疆今后的工作做出通盘筹划。26日，左宗棠奏《遵旨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其实早在1820年，那位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著名学者龚自珍，就曾著文《西域置行省议》，提出了在新疆全境建立行省、全面推行郡县制的主张。对于王公伯克，他建议“赏给协办府事官名号”或“赏给协办县事名号”。平定张格尔叛乱后，他更进一步主张“夺伯克之权”。当时伯克制度还存在，龚自珍要求清政府从上而下地限制和削弱王公伯克等封建领主的势力，为郡县制的实施准备条件。龚自珍的建议没有被清政府采纳，他的新疆建省主张，就此沉睡了半个世纪，直到新疆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动后才又被提出。

新疆设省涉及清政府在新疆统治制度的重大改革，事关大局，故清廷犹豫不决。1878年，清廷询问左宗棠：“郡县之制以民为本。……除旧有各厅州县外，其余各城改设行省，究竟合宜与否？……倘置郡县，有无可治之民？不设行省，此外有无良策？”令左宗棠“寻一可进可退之计”。左宗棠上奏指出，在新疆设军府，只管军政不管民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南疆各地建立之善后局，正在行使管理民政的职权，“是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

左宗棠几次上书，从维护清政府的利益出发，论证新疆设行省的必要性、可能性，他认为新疆尽快建立行省有以下几方面有利条件：

第一，可乘边疆收复之盛势。“天山南北两路还隶版图，气象一新，







文庙·乌鲁木齐

中外群属，耳目咸及。……取我固有之地而治之，疆索固然”，有利于加强中央对边疆的管辖。

第二，可乘防营未撤之兵威。底定新疆，

西征数万将士驻防各地，“既可壮疆臣之声威，即将来（建省后）设立制兵，亦可就中挑选久经战阵之才，错落布置其间，士气既扬，军威自壮”。有利于巩固建省后的边防。

第三，安定社会，顺应民心。新疆甫经收复，百姓“新出水火”，民心思定。此时建省，有利于稳定社会和恢复生产。

第四，旧制荡然，百废待举，为施行建省新制提供了良机，一但设立道县，“督、抚睹闻亲切，黜陟分明，乐事劝功，人知自奋，污染渐涤”。

第五，边疆建省，与内地划一，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杜外敌覬觐之心。倘若一味拖延建省，“万一强邻窥伺，暗煽拼飞，后患方兴，前功尽弃。与其抢忧于事后，曷若审慎于几先”。

左宗棠还恳切地说：“臣亦知改省之初事繁费巨，业已移督江南，诸事自有主者。而身居江表，心系西陲，乌尧之言，终难自默。”一片热忱溢于言表。

清政府终于被左宗棠等打动，1881年，刘锦棠提出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乌鲁木齐汉城即迪化城。省会设巡抚一名，下设三道：镇迪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道以下各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不再总统全疆军务，仅管伊犁及塔城边防。清政府接受了刘锦棠

的方案，1882年12月24日正式批准执行。1884年，刘锦棠出任新疆第一届巡抚，这标志着新疆省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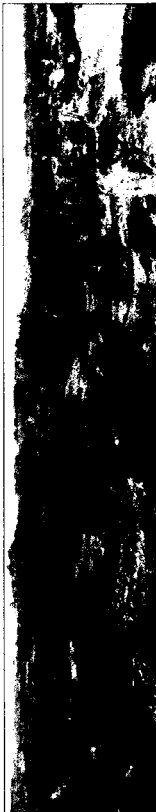
1884年的新疆建省，是在旧的统治制度已经瓦解，不实行郡县即“不足言治”的情况下实现的。即使这样，反对新疆建省的人也不少，他们认为在边疆地区“皆不可以郡县治”，应当“撤去郡县而专立军府，略行前代卫所边军之制”。这个主张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也同清政府维护自身利益的愿望相抵触，遭到了否决。在实际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阻力。正如刘锦棠所说：“有因一处之妨，而致疑全局之多碍；有因一端之阻，而动谓众务之未宜。”尽管如此，新疆省毕竟是迎着各方面的阻力，在祖国的西陲确立下来了。

新疆建立行省，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实现了新疆与国内其他各省行政制度的统一。以前，新疆的王公伯克暗中扩充势力，对抗中央，是清廷的心腹大患；现在，在阿古柏匪帮被驱逐，经战乱的王公伯克势力衰落之际，清政府将民政事务牢牢掌握在手中，并通过建省，将它用立法程序完全确定下来了。地方封建王公势力的削弱，对于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者与地方民族上层中的反动头目相勾结，制造分裂阴谋，煽动分裂叛乱，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疆建省，也为清末中国边疆治理制度改革树立了一个典范，其后1885年台湾建省，20世纪初又有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改设行省，外蒙古议设行省等。

我国历代用兵西北，主要目的在平乱，平乱之后在于羁縻，很少用心彻底去改造西北。当初唐太宗被拥为“天可汗”，这是一种万王之王的荣衔，可是一到翻脸时，你是你，我是我，谁也管不着谁，几千年不能解决的问题，直到新疆建行省，改土归流，设立郡县，一切政治经济制度完全同内地各省相同才得以解决。

新疆建省以后，大力发展农业、养蚕业、缫丝业、采矿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赋税，新疆的经济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却贼心不死地盯着新疆，它们仍不时地将魔爪伸向新疆，以攫取新的利益。



## ● 帕米尔悬案



帕米尔位于新疆西南部，古代称为葱岭，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按照自然地理状况，整个帕米尔地区可分为8个部分，又称为“八帕”，由北向南依次为：和什库珠克帕米尔、萨雷兹帕米尔、郎库里帕米尔、阿尔楚尔帕米尔、大帕米尔、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瓦罕帕米尔。

近代帕米尔地区居住的主要民族是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1759年秋，清军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时，柯尔克孜族首领阿济比代表居住在天山以南的柯尔克孜族15部归属清朝，清政府还在阿尔楚尔帕内伊西洱库尔以北树有御制记功碑。

因而这块地方被称为

“苏满塔什”

（“苏满”

意为文

字，



“塔什”意为石头，苏满塔什就是树有文字的石碑的地方)。帕米尔东南主要是塔吉克人的游牧地。塔吉克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若干世纪分布在帕米尔东部的操东伊朗语的部族。17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游牧在帕米尔东南部和西南部瓦罕帕米尔等地的一些塔吉克人逐渐集中到色勒库尔一带，与当地居民及周围的维吾尔、柯尔克孜等民族融合成为我国的塔吉克族，色勒库尔成为塔吉克族人民的聚居区。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当地建立了色勒库尔回庄（今塔什库尔干县），归叶尔羌参赞大臣管辖。将近两千年来，塔吉克族人民世代生活在这里。

进入19世纪后，浩罕汗国强盛，开始向帕米尔扩张。但直到60年代沙俄吞并浩罕时止，浩罕势力仍在阿赖岭以北，整个帕米尔地区一直属于中国。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也规定，中俄边界“行至葱岭，靠浩罕界为界”，帕米尔在中国界内。1878年清军收复新疆后，加强了对帕米尔的管辖，先后在当地设置了8个稽查卡伦，派军驻守。又修筑道路，建立驿站，进一步完善了对帕米尔的管辖。

由于帕米尔在中西交通和战略地位上都十分重要，英俄两国对该地区早就虎视眈眈。1881年，曾纪泽在俄国谈判伊犁问题时，俄国就提出无理要求，企图侵吞玛里塔巴山口以西的帕米尔地区领土，被曾纪泽拒绝。《中俄伊犁条约》规定，中俄两国在帕米尔的边界线“照两国现管之界勘定”。但是沙俄完全不顾“现管之界”这一条约规定，在1884年勘界和签订《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时，把中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分界线的起点，从帕米尔北部的阿赖岭移到东北部的乌孜别里山口，并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往南，“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这样，俄国不但把中俄边界划到了玛里他巴山口，而且又往南延长了200多里，直到乌孜别里山口，侵吞了中国帕米尔西北部阿赖各地和允珠库克等好几百平方公里领土。两条走向之间的三角地带则成了“待议地区”。这个地区本来就是中国领土，在具体议定勘分以前，中国自然应在这里继续行使自己的主权。

19世纪80年代末，英俄在中亚的争霸加剧，由此形成了英俄争相侵



# 新疆两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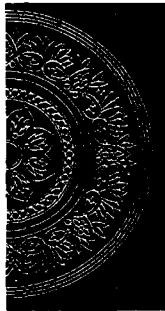
夺中国领土的所谓“帕米尔问题。”此时，西方列强相继向帝国主义过渡，开始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俄国将长城以外的中国东北、蒙古、新疆等视为己有，不容他人插足，而英国则为了把俄国势力挡在离兴都库什山尽可能远的地方，也力图侵占中国帕米尔。1890年初夏，英国指使其傀儡军强行侵入阿尔楚尔帕米尔中部的伊西洱库尔淖尔周围，硬说这一地区是他们的领土，并以武力攻占了中国的苏满卡伦。沙俄为了确立自己在帕米尔的霸权，也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加紧了武装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的准备。

从1888年起，俄国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两次派遣格罗姆勃切夫斯基潜入中国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政治、军事侦察活动。1891年8月，俄土耳其斯坦总督费勒夫斯基公开提出取消《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关于帕米尔划界的规定，声称俄国应沿萨雷阔勒岭和慕士塔格山划界，占有整个帕米尔。同年，沙俄出兵帕米尔，践踏“俄国界线转向西南”的规定，侵入“待议地区”。1892年1月3日，俄国连续召开两次政府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并审定了俄国对帕米尔的政策，做出了：与清政府谈判，改定中俄在帕米尔的边界，将整个帕米尔划归俄国；在谈判的同时，出动俄军抢占帕米尔等两项决议。

在边界谈判中，清政府代表坚持帕米尔属于中国的立场，毫不退让。俄国遂采取欺骗手段，声称：“中国驻防帕米尔卡兵撤退，俄国必立即派员与中国（按《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合勘帕米尔分界。”清政府为促成帕米尔划界，于1892年6月下令帕米尔驻防马队三个营及各卡伦守兵暂全部撤入萨雷阔勒岭以东。清军退兵的同时，俄国即准备好了一支1500多人组成的特遣部队。

1892年6月2日，扬诺夫上校率领特遣军侵入帕米尔，他们先集中在中部的木尔加布地区，然后分兵向各地窜犯。一路破坏中国卡伦哨所，驱赶守卡官兵，不但侵占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规定的“待议地区”，连同界约规定的中国所属的帕米尔部分也一并强占。至10月，俄军侵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2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帕米尔领土。

俄军强占帕米尔后，于1892年1月15日提出要求议定帕米尔边界。清政府同意了俄方的要求，但声明划界必须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



为依据。从1892年11月至1893年4月，中俄双方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帕米尔划界谈判。这次谈判，由于俄方蛮横无理和中方坚持只商议“待议地区”而毫无结果。清政府为了防止俄军继续入侵，被迫在萨雷阔勒岭东麓布防，中俄双方的军队沿岭对峙。

俄国在与清政府谈判帕米尔划界时，还同时与英国秘密进行着私分帕米尔的讨价还价勾当。在俄军强占帕米尔之后，英国于1892年8月提出划分英俄在帕米尔势力范围的界线，以防俄军继续向南推进。此后不久，英俄就私分帕米尔举行了秘密谈判，经过激烈的争吵，1895年3月11日，英俄背着清政府签订了关于划分帕米尔势力范围的《英俄协议》。协议规定了两国在帕米尔的“分界线”，双方保证不超过分界线。《英俄协议》是两个瓜分中国帕米尔领土的强盗分赃协定，历届中国政府从来未予承认，因而是非法和无效的。

1894年春天，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甲午战争迫在眉睫，清政府在军事上受到的压力很大，一时无暇顾及帕米尔问题。4月12日，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照会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冻结中俄帕米尔划界问题的会谈，双方军队暂时保持各自的位置。俄国政府企图利用清政府当时的困难处境，造成既成事实，以达到永远霸占帕米尔的目的。4月23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答复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同意暂停谈判，并且明确表示：“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他认为应该保持此项以1884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俄国自知理亏，只得复照同意中国驻俄公使的意见不再坚持以萨雷阔勒岭划界。

从1894年中俄两国互相照会后，有关帕米尔的划界谈判一直没有举行，俄国始终霸占着我国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大片领土，因此，中俄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帕米尔未定界的问题。十月革命之后，沙皇被推翻，苏联政府也一直未予正确对待，以致直到今天，帕米尔问题仍未解决。



西部烽燧

了一曲曲感人的革命诗篇。

代，大批共产党员来到新疆，他们坚决抵制反动势力，不怕牺牲，谱写朝统治而抛洒鲜血，然而他们的胜利果实却被军阀政府窃取。三十年二十世纪前半期的新疆，处于动荡和纷乱之中，革命党的志士为推翻清

## ● 山雨欲来

19世纪末，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和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腐败不堪，国力更加衰弱。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先后发生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运动，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危难中挺身而出，高举革命大旗，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斗争遍布全国各地，革命风暴愈演愈烈。新疆虽然地处西陲，离内地十分遥远，但革命党人的足迹也踏上了新疆的土地。



革命党人到新疆与清政府实行“新政”有关。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意欲挽救其统治。当时的伊犁将军长庚对推行“新政”非常热心，他在伊犁积极组建新军，为此，从湖北等地的新军中抽调一批骨干到新疆，又从各地招募士兵进疆，组成“伊犁新军混成协”。新疆巡抚联魁，于1906年将原有的防营练勇改编成新军称“新疆陆军”。新军中参进了许多革命党人，当长庚到湖北新军中抽调新军骨干和招募兵勇时，一批革命党人乘机加入新军来新疆。他们主要有杨缵绪、冯特民、李辅黄、冯大树、刘先俊等。

一、  
辛亥风云录

杨缵绪，湖北武昌人，毕业于日本户山陆军学校，在日本留学时，就颇具革命思想，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先任教习，后升任湖北陆军42标标统，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08年，他奉命调派伊犁，许多革命党人随他前往。到伊犁后，他先任伊犁新军标



统，后升任协统，成为后来伊犁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冯特民，伊犁起义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毕业于湖北自强学校，早年参加同盟会和日知会，并为日知会的评论员。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曾在湖北陆军第8镇工程营当兵。参加过群学社，当过《申报》记者，主办过《楚报》，曾以“鲜民”的笔名“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疑”。1907年1月，武昌日知会被清政府破获，会员刘静庵等人被捕，冯特民等人被通缉，他被迫离开武汉。1908年，冯特民联络革命志士李辅黄、郝可权、冯大树、李克果等人随杨缵绪的部队到新疆，他被推举为伊犁同盟会的负责人。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他在杨缵绪领导的模范营里当书记官，以此公开身份作掩护。

革命党人对舆论宣传工作十分重视，为了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推动革命进程，1910年3月，他们在惠远城创办了《伊犁白话报》，冯特民以冯超的笔名担任主编。该报内容新颖、形式活泼，具有鲜明的反帝特点。冯特民在报上发表文章，揭露沙俄干涉我国主权，随意枪杀我国人民，却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逃脱法律制裁的罪行。为了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报上辟有“爱国活历史”专栏，用各族人民的斗争事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针对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的特点，大力宣传



伊犁惠远城

民族平等的思想，教育各族人民应互相尊重。该报以汉、满、蒙、维4种文字发行，在新疆迪化、塔城、宁远等城市和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设有“代派处”。《伊犁白话报》是新疆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民主报刊，在各族人民中起到了启蒙作用，因而获得了“振聋发聩，开通民智”的美誉。

革命党人把做好军队的争取工作当作起义准备工作的重要一环。他们利用在军队担任职务的方便条件深入到新军中，联络内地各省在伊犁的士兵，鼓动起义。经过他们的努力，大批士兵纷纷加入同盟会，新军逐渐成为伊犁反清斗争的骨干力量。

伊犁的哥老会，当时也是反清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哥老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帮会组织，势力很大。冯特民代表同盟会争取哥老会，经过一系列的工作，革命党人在哥老会中秘密地组织起一支义勇军，委任伊犁哥老会首领徐三泰为义勇军团长。

杨缵绪还利用他自己的职位在伊犁上层人物中做争取团结的工作，伊犁知府贺家栋就是被争取过来参加革命党的。冯特民和冯大树等人为了消除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民族隔阂，在各族人民中间进行了长期艰巨的工作，获得了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维吾尔族人民上层代表阿奇木伯克、富商玉山巴依、牙合甫巴依，回族绅士沙懿德、马秀文、韩玉书等都逐渐倾向革命，有的人直接参加秘密的革命活动，有的人给予革命党人财力物力的支援。为了解决起义时所需的枪支弹药问题，冯特民与李辅黄到伊犁将军府弹药储备库去做管理人员黄立中的工作，向他宣传革命思想，给他介绍内地各省的情况，终于使黄立中站到革命一边，答应起义时献出库存的弹药。革命党人一系列的活动，促进了伊犁革命形势的高涨，武装起义的时机日渐成熟。

当革命党人在伊犁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迪化也充满了蓬勃生机。当时，迪化革命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刘先俊。刘先俊是湖南宁乡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在湖南、镇江等地军营任职。1910年11月，袁大化继任新疆巡抚，动身来新疆之前，在内地各省网罗人才，培植自己的嫡系亲信，刘先俊被人推荐给袁大化。刘先俊抓住这个机会，到新疆发动革命。他到迪化后，大量发展革命力量，联络各界仁人志士，酝酿

起义。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武装起义工作加紧进行，新疆已出现了“一夫振臂，应者四起”的革命形势。

## ● 迪化枪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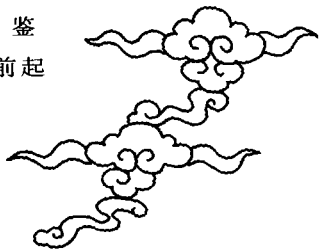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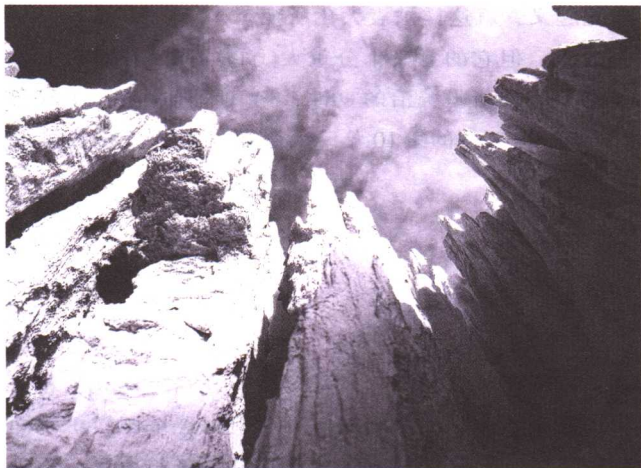
1911年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著名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的胜利震动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形成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在新疆从事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和新疆各族人民也受到极大鼓舞，他们为在边疆吹响革命的号角加紧准备。

在迪化，刘先俊首先与从伊犁前来的革命党人张英杰、贾鸿钧、万象春等人取得联系，分头进行秘密活动。他们深入到哥老会中发展革命力量，迪化哥老会首领刘海汇和忠义堂头目黄大发、马万荣、陈光模、唐小云最先响应。他们还联络了官府中倾向革命的人士，刘先俊又去古城策动外应力量。革命党人迅速地组织了起义的领导机关，分设了攻击部、防卫部和机要部。为筹集活动经费，刘先俊带头出资1700两白银，其他革命志士也纷纷慷慨解囊，很快筹款白银5000多两。

一切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都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或是内讧，更可怕的是——叛卖。正当刘先俊等革命党人紧张地做着起义准备时，有人在督练公所门前贴出匿名揭发信，声言将于某日起事。12月20日，袁大化得到侦探密报说暴动主谋是刘先俊，他立即宣布全城戒严，命令马队营官刘雨沛秘密侦察刘先俊的踪迹。此后迪化城内社会秩序大乱，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现款，到店铺抢购商品。28日上午，混入革命队伍的符西恒、肖炳南等人向袁大化自首，交出起义者名单。袁大化立即派兵将起义军统领唐小云、陈光模逮捕，并于当天晚上将他们杀害。刘先俊在群众的掩护下躲过了袁大化的搜捕，鉴于形势，他与万象春、马万荣等仓促决定当晚9时提前起义。

1911年12月28日晚，刘先俊率领100多名起义军，以左臂缠白布作为记号，伪装成巡夜士兵进攻抚署东





营。原先答应作内应的卫队长王学赋突然叛变，不但不配合起义，反而率队向起义军开枪射击。这样一来，起义军原打算从袁大化的卫队中获得枪支弹药的计划落空

了。易道造和魏尧阶等带领部分起义军进攻炮营，又未攻下。喻少良、贺玉仙等进攻警察一区，也由于原来约定响应起义的警官柱瑞麟叛变而失败。起义军先后三处受挫，加之迪化城门紧闭，城外起义人员无法进城配合作战，城内起义军只能孤军苦斗，退入巡防营内固守。袁大化调集陆军马队将起义军层层包围，刘先俊见大势已去，便对万象春说：“你赶快设法出城，去伊犁继续活动，还可以东山再起，不要等到天亮被袁大化一起捕杀。”万象春哭着不忍离去，刘先俊说：“军人以流血为光荣，以流泪为耻辱。你们赶快起程，我就是牺牲了，也是继承黄花岗72烈士未竟之事业，一定不会被人们遗忘，虽死犹荣。”在刘先俊的催促下，万象春同邓祥麟、刘海江、喻少良、刘福田、马林等，与刘先俊挥泪作别，秘密潜出城外，他们冒着严寒，在冰天雪地里昼伏夜行，终于到达伊犁，同伊犁的革命党会合。

刘先俊在天亮前被袁大化部下韩启风发现而被捕。他遭到严刑拷打，但始终坚忍不屈。临刑时，他对监斩官大声说：“寄语袁抚，毋杀同胞，上天干怒。”说完英勇就义，年仅29岁。被围困在巡防营的起义军，继续顽强战斗，袁大化见一时难以取胜，改用诱降的办法，向起义军送去亲笔信，许诺只要缴枪，除去首犯，其余的人一律释放，得到的回答却是起义军更猛烈的射击。次日中午，袁大化残酷地用大炮轰击巡



防营，终于攻克。迪化起义，就这样被袁大化所扼杀。

迪化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十分重大。它如同一声惊雷，响彻天山南北，敲响了清王朝在新疆统治的丧钟，揭开了新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序幕，就在迪化起义后的第10天，伊犁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起义。

## ● 伊犁狂飙



革命党人杨缵绪、冯特民等自1908年到伊犁后，在当地建立了较深的革命基础。1911年，武汉革命党人发出密电，从上海经俄国转伊犁同盟会，揭露了伊犁将军志锐、新疆巡抚袁大化和陕甘总督长庚等人策划拥护宣统皇帝西迁的阴谋，要求“伊犁应迅速起义，以破彼偏安，而完成全民革命”。这一密电对已经接近成熟的伊犁起义，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当时的伊犁将军志锐，是个极其反动的封建官僚，1911年底，他勒令停办了“讥弹时事”的《伊犁白话报》，之后又以新军协标营士兵与武备学堂学生发生斗殴为借口，将协统杨缵绪和各营团官兵全部解散，分批遣回内地。更让群情激愤的是，志锐在隆冬季节，勒令被遣散的新军士兵将所穿皮衣全数交库。虽经杨缵绪再三请求，志锐表面上答应让士兵经过游牧地区以后再交，但他暗地里却命令领队大臣在士兵所经过的要道，强行截留，迫使士兵忍冻折回军营。对于遣返内地的军官，志锐则迟迟不发旅费，致使他们坐困伊犁。志锐的倒行逆施，使本已十分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加之迪化起义的消息传至伊犁，人心为之振奋。伊犁革命党人决定即时起事，他们迅速组织了起义指挥机关，共同推举杨缵绪为总指挥，冯特民、李辅黄为干事。这样，革命党人领导的伊犁起义就在1912年1月7日晚爆发。

根据起义指挥部的部署，起义军共分五路，一路由冯特民、黄立中率领至南库，夺取枪支弹药；一路由李辅黄率领攻占东门，迎接城外起义部队和哥老会首领徐三泰率领的义勇军进城；一路由冯大率率领进攻



副都统署；一路由郝可权率领进攻将军署。以上四路起义军，战斗进行得都比较顺利，实现了原定计划。但是，由李梦彪、李英、邓宝珊等率领的进攻北库的起义军，却遇到了新旧满营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对于旧满营，杨缵

绪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出面劝导，向他们宣传民主共和，指明前途，使他们停止反抗，弃械投降。而新满营，依仗新式武器和武备学堂部分学生的支援，仍负隅顽抗。若再拖延时间，敌人援兵到来，起义军就会遭到内外夹击。于是，革命党人决定，邀请前任伊犁将军广福出山，利用他和现任将军志锐的矛盾，让他来调停。广福来到北库，以前任将军的身份命令新满营停止抵抗。新满营慑于起义的威力，便借广福调停之机，宣布投降。8日凌晨7点钟，伊犁起义宣告胜利。志锐被起义军逮捕，在鼓楼旁处决，以泄民愤。

伊犁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建立革命政权。起义胜利当夜，革命党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推举杨缵绪为会长，共进会召开会议，讨论关于建立革命政权的问题。在政府首脑人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杨缵绪主张让前任伊犁将军广福担任革命政府的都督，他认为既可“借其名以安伊犁八旗兵勇之心”，以掌握满蒙各旗军队，巩固地方革命秩序；又可“假其名联络袁大化、长庚之辈，为革命谋东进之机会”。冯特民、李辅黄则反对让广福出任都督，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清朝，夺取政权。革命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将它交给广福，岂不是违背革命宗旨。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冯李二人没能坚持住正确意见，同意了广福为伊犁都督的方案。

1月10日，新疆伊犁大都督府宣告成立，广福任都督，杨缵绪任总



司令部部长。新疆伊犁大都督府的成立，宣告了清朝在伊犁反动统治的结束，“军士商民，齐呼万岁”，这说明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

新疆伊犁大都督府建立后，创办《新报》作为《伊犁白话报》的继续。都督府还废除苛捐杂税；严格约束军队，防止扰民，对违纪者严肃惩处。同时，革命政权还提出，各民族之间，不分民族界限，共享民族平等待遇。号召各族军民“保国何分种族，举动最重文明，汉、满、回、缠（当时指维吾尔族）、哈均应一视同仁，平日私仇私利，此时概勿寸心，同造共和幸福，众志成城，将来大局底定，大家何等光荣”。这可以算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民族平等的政权。

新疆伊犁大都督府成立后，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将起义军和军标营、镇标营合编为“新伊陆军第一师”，亦称“民军”，由杨缙绪兼任师长。

伊犁起义的胜利，使新疆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政权，形成了伊犁民军和迪化清军对峙的局面。新伊大都督府成立后，立即致电新疆巡抚袁大化，敦促袁赞成共和，响应革命，然而，顽固不化的袁大化却回电说，要“以兵戎相见”，并命令陆军协统王佩兰率领军队进攻伊犁，妄图扑灭革命烈火。新伊大都督府为对付清军进攻，除整顿现有军队外，还在九城招募回、维、蒙、锡伯、汉各族人民，编成部队，加紧操练，建立东进支队，由前敌总指挥李辅黄和东进支队司令徐国桢率领支队一旅和独立骑兵团东进迎敌，他们士气高昂，口号是“攻取迪化过春节”。

1912年2月，伊犁民军与迪化清军在精河遭遇。战斗一开始，伊犁民军就掌握了主动权，清军节节败退。正当民军乘胜追击之时，骑兵独立团团团长钱广汉（此人是前伊犁将军长庚的门徒，伊犁起义后投机革命）突然率军叛变投敌，他将李辅黄的部队诱至清军重围中，导致民军受到惨重损失，清军由败转胜。伊犁的革命党人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杨缙绪率军前去援救，又调察哈尔、厄鲁特两营马队1000名，限期到精河会师。杨缙绪到达精河后，

召开誓师大会，慷慨陈词，指出革命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表示自己要与全军共存亡。2月23日晚，杨缵绪率军奇袭清军驻地，察哈尔、厄鲁特马队从两侧包抄，将清军团团包围，杀敌无数，缴获大批枪弹和给养。残余清军逃回乌苏，民军乘胜追击，与清军相持于乌苏城下。

正当伊犁的革命之火席卷全疆时，全国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12年12月12日，宣统皇帝退位，但民主共和的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1913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后，北京政府电令新疆改巡抚为都督。3月27日，袁大化遵照北京政府“速停战争”的命令，不得不向新伊大都督府停战求和。于是，双方代表于4月在塔城和平谈判。

此时新疆局势大乱，袁大化已无法控制，他于4月25日被迫宣布辞职，推荐他的同乡旧友喀什道尹袁鸿佑继任新疆都督，他自己则以辞职费为名，卷走白银30万两。袁鸿佑的思想比袁大化还要反动和顽固，让这种人当都督，对新疆的革命一定很不利，所以，喀什哥老会首领魏得喜、边永福又奋起刺杀了袁鸿佑。

袁大化再次推荐老奸巨猾的新疆提法使、镇迪道尹杨增新。5月底，袁世凯委任杨增新为新疆都督。杨增新要求与伊犁临时政府重开谈判。从6月到9月，经过反复谈判，杨增新又要弄无数花招，伊犁的革命党人最终妥协退让，与杨增新达成协议，决定双方停战，撤退军队，承认杨增新为新疆都督，主管军政，取消伊犁临时革命政府，新疆的辛亥革命自此半途而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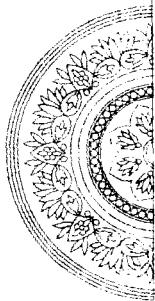
## ● 镇边楼上的奸雄



清朝政府为了纪念“定远侯”班超在我国西域地区的丰功伟绩，于同治初年（1826年），指示新疆地方官员在乌鲁木齐修建了一座八角亭，名为“定远亭”，1870年阿古柏侵入乌鲁木齐后，定远亭在战火中焚毁。辛亥革命之后，窃取新疆都督宝座的杨增新，又在“定远亭”故址修建了一座三层小楼，称作“镇边楼”。杨增新修建镇边楼的目的，在于镇压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运动，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之建镇边楼者，实欲借斯楼以镇静镇定之力而常惕焉。意在鉴以往之危险，而思所以长保之治实也”。

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杨增新，祖籍江苏江宁，他本人出生于云南蒙自，清朝光绪戊子（1888年）考中举人，次年考中进士，先在北京任小官，后在甘肃任知县、知府、道员、巡察等职。1908年进京朝见慈禧，“慨陈戍边大志”，得到慈禧赏识，委为新疆阿克苏道尹。杨增新1911年到新疆时，正值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新疆巡抚袁大化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把杨增新留在省城，用作膀臂，“以阻新潮之汹涌”。杨增新颇得袁大化重用，担任了提法使、镇迪道尹，他还以“借回民以制汉民之革命”为借口，招募了五营回兵，自任督统。伊犁起义后，惯于玩弄权术的杨增新，翻手为云，凭借手中的五营回兵，逼袁大化让职于他。1912年6月5日，杨增新剪去发辫，脱掉清朝的五品官服，穿上民国督军的礼服，爬上了统治新疆的宝座。他向中央政府和各省发出拥护共和的通电：“新疆孤悬塞外……值此中原多事之际，中枢兼顾不暇……诸公洁身高蹈，而委之于增新，际此危急存亡之秋，正匹夫提当事业之机，至于成败利钝，均所不计。”短短几句电文，其勃勃野心昭然若揭。

杨增新一向信奉老庄道术，一上台，他就修起镇边楼，并把他的所谓“政纲”编成一幅对联，刻制在镇边楼上。上联是“共和实草昧初



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下联是“边庭有桃园胜境，狙率南回北准，浑噩常为太古民”。这幅对联是杨增新实行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的自白。他想搞小国寡民的“无为而治”，但这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新疆是根本不可能的。首先是哈密的农民暴动，给了杨增新当头一棒。哈密人民多年来深受哈密王的奴役和剥削，辛亥革命后，哈密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杨增新应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的请求，派兵前去镇压。在反动势力的联合围剿下，起义首领铁木耳被迫退居山中。杨增新怕农民武装据山成势，别生事端，一再派人上山招抚，他指示回兵营长李福寿手捧《古兰经》，口诵“穆圣谕”，以宗教手段将铁木耳骗至乌鲁木齐，不久便施计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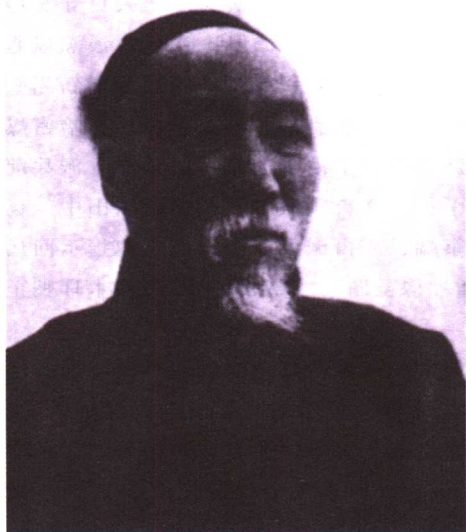
在辛亥革命中被革命党人所倚重的哥老会在全疆各地不断发展，他们杀贪官、济平民，大有火山爆发之势。杨增新对他们进行赶尽杀绝，在他上任三年后，哥老会就在新疆绝迹。对于伊犁起义的领袖们，杨增新

采取了分散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将他们逐一调出伊犁，派往全疆各地，杨缙绪被派为喀什提督。留在伊犁的冯特民、李辅黄等人被杨增新的心腹匡时秘密暗杀。匡时回省城复命，杨增新特意在镇边楼为他设宴庆功，匡时来到楼下时，忽然背后枪响，被杨增新埋伏的特务击毙。由杨增新亲自领导，马福兴负责指挥的五营回兵，

是杨增新上台的武装后盾。杨掌权后，恐马福兴邀功生异，就把他派往喀什，逼走杨缙绪，接任喀什提督。同时，又把疏勒县长马绍武调回省城，在镇边楼上秘密授意他刺杀马福兴。马绍武手捧《古兰经》，面朝西方宣誓：“不杀马福兴，提头见督军。”不久，马福兴就被他的教友马绍武送去见“真主”了。

阴险毒辣的杨增新经过频繁的明镇暗杀，仍恐“人心动乱，边局陆





杨增新

危”，所以经常登上镇边楼，观测星象变化，察看时局动向，企图以更为毒辣的手段，保住他的“桃园胜境”。此时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北京袍笏登台，复辟帝制。“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杨增新，竟然自打嘴巴，立即奉袁称臣，并进贡黄金15包，从“洪宪”皇帝袁世凯手中买到一顶“一等伯爵”的诰封。不料好梦不长，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发动讨袁起义，一时全国响应，袁世凯被迫服毒自杀。这一晴天霹雳，

把杨增新轰得进退维谷，不知所措。杨增新的卫队长夏鼎、特务头子李寅，看出了主子的苦衷，暗中建议杨增新放弃“伯爵”，响应云南起义。杨增新听罢，未置可否，轻声一笑，含糊其辞地说：“云南是我的故乡嘛！”就在这年元宵节期间，杨增新大摆宴席，广酬群僚，酒过三巡，杨增新借故退席，随即枪声大作，夏鼎、李寅脑崩血溅，丧命席间。参加宴会的群僚正惊慌失措、丑态百出之时，杨增新亲手捧出一面五色国旗，让卫士当场悬起。尽管杨增新没说什么，人们却把抵制讨袁的罪责，强加在死者的身上。

元宵节过后，乌鲁木齐仍花灯炫耀，鞭炮不停，到处都是庆贺讨袁胜利的欢声。杨增新得意洋洋地登上镇边楼，享受“胜利”的喜悦。突然，一尾彗星划空而过，杨增新注目一看，彗星陨落的方向正是阿尔泰。当时阿尔泰的确是杨增新的心腹大患。阿尔泰从1905年划为特区后，直属中央管辖。北洋政府派驻阿尔泰的办事长官张庆桐，不但可以和杨增新平起平坐，而且对杨增新有所制约。张庆桐派到乌鲁木齐的特



务人员，多为杨增新抓获。更让杨增新担心的是，沙俄势力严重威胁阿尔泰，这也影响着新疆的安全。因此他派精锐部队到中俄边境驻守，使俄国侵吞阿尔泰的阴谋未能得逞。1918年，杨增新利用张庆桐部下对其的不满情绪，策动兵变，并以中央鞭长莫及，阿尔泰与新疆肘腋相连为由一举兼并阿尔泰，设立阿山道。杨增新还把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诱出阿尔泰草原，安置在吉木萨尔牧居，以便就近监视。不可否认，杨增新兼并阿尔泰的目的是扩大势力范围；但此举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祖国领土统一的作用。

杨增新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长期处于“浑噩”的愚昧状态，实行闭关自守政策。设在星星峡的关卡，不但阻止外省人员进入，就连内地寄来的书报信件也要严加检查。杨增新认为只有这样，人民才会“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可是时代的巨轮，绝不是一道人为制造的“铁门关”所能遏制的。留日学生樊耀南，就是破关而入的先驱，他来而复去，去而再返，给杨增新增添了无穷烦恼。杨增新委任樊耀南为军务厅厅长兼外交署署长，又给他“迪化道尹”的头衔，想以此笼络他。但樊耀南却“假痴不癫”，将计就计，利用

既得权力，积极进行倒戈活动。当时建设厅

长阎毓善与樊耀南颇有交情，本想进行规劝，但事关重要，不便明谈，于是含

沙射影地作对联一副送与樊：“谨慎小心，未睹霍光之过；谦恭下士，颇有王莽之风。”

樊耀南看后，虽意识到事机有所泄露，但仍不露声色，暗地里加紧革命部署。他准备待时机成熟就

杀掉杨增新，打破新疆的沉闷局面。1928年7月7日，是新疆俄文法政学堂的毕业典礼，杨增新作为学堂的创办人参加。仪式之后，举行宴会，席间，樊耀南突发暗号，其卫士闯入餐厅连发数枪，将杨增新当场击毙。这个常在镇边楼上设宴杀人的独夫，自己也得到同样的下场。

“七七政变”之后，由于樊耀南等人对形势估计不足，行动仓促，又无军队支持，也无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金树仁在军队支持下，很快



镇压了“七七政变”，樊耀南牺牲。从此，新疆进入金树仁的统治时期。

杨增新的统治虽然反动保守，但他对苏俄采取了较明智的态度，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保持中立，后又与其合剿白俄匪兵，保持了新疆边界的安全，与苏俄的经贸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疆经济的发展。

## ● 昏庸的“亲乡”督办

杨增新惨淡经营了17年的“世外桃源”被1928年的“七七政变”的枪声打破了。省政务厅厅长金树仁打着杨增新“忠实信徒”的招牌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金树仁上台当天，就给南京政府拍发电报，报告政变经过。9日，省议会议长饶孜阿吉召集各界上层人士，联名发出拥护金树仁主持新疆政务的声明。当时的南京政府是樊耀南发动这场政变的支持者，所以对拥护金树仁上台的喧嚣，迟迟没有表态。直到8月20日才发布了一项“应先组织新疆省政府委员会”的指示，并勉强任命金树仁为省主席，至于总司令的职位，却未让他兼任，南京政府本想找一个人来牵制金树仁，但一直未找到，所以到1932年秋天，才任命金树仁为督办。这样，金树仁就攫取了新疆的军政大权。

金树仁原籍甘肃河州，杨增新担任河州道尹时，创办了河州书院，金树仁就在这个书院读书。后来杨增新升为甘肃省高等学监，就把金树仁从河州调进省城，送入高等学堂深造。杨增新主政新疆之后，将金树仁招来



1928年的迪化(乌鲁木齐)

作军务厅书记员，1915年6月金树仁参加新疆县长考试，由于杨增新照顾，他考录甲等，被委为阿克苏县长，不久调回省城任政务厅厅长。可以说他完全是杨增新一手栽培起来的。

金树仁目光狭隘，思想平庸。他上台以后，顽固地推行“亲乡”政策，起用河州同乡，排除异己势力，当时流行的民谣说：“早上学会河州话，晚上就把洋刀挎。”

1930年，甘肃南部部分地区发生旱灾，金树仁从狭隘的地域观念出发，把河州难民大批接来新疆，并借口“清理旧制”、“改土归流”，把原来哈密王封建采地划分给河州难民，从而引起哈密农民的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金树仁调集了4个团的兵力前去镇压，都被和加尼牙孜缴了械。和加尼牙孜得到了金树仁的洋枪装备，实际上成了拥有武装力量的“哈密王”。金树仁由于无力对付，只好任命和加尼牙孜负责哈密防务，于是形成了哈密的地方武装割据，与金树仁分庭抗礼。当时西北的割据势力马仲英也攻入新疆，其部将马世明攻占吐鲁番、鄯善等地，并围攻省城，金树仁的军队伤亡惨重。

哈密农民起义是为反对金树仁的反动统治而爆发，但逐渐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1933年底，和加尼牙孜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者穆罕默德·伊敏的策动下，在英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下，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他本人任总统（实际并未到任），沙比提大毛拉任总理。其“政府”组织纲领鼓吹“一切操突厥语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叫喊“要反对突厥民



1931—1934年进疆征战的马仲英



族以外的一切民族”。这个伪政权对内除了宣布以伊斯兰教立国之外，还实行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大批无辜的汉、回族人民和其他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和迫害，由此充分暴露出该政权是一个极端狭隘、反动和凶残的民族分裂主义政权。这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破坏国家统一，为各族人民所不齿。它“成立”两个月后，就被马仲英所属的马世明部和马绍武、马占仓部联军所攻破，宣告破产。“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覆灭，告诉我们在中国搞民族分裂主义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谁也破坏不了的。

金树仁腐化无能，全疆形势失控。金树仁政权中的“少壮三杰”，即督署参谋处长陈中、迪化县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三人商议决定发动政变，推翻金树仁。1933年4月12日，他们策动由当年被俘收编的白俄组成的归化军起兵反金。金树仁本想依靠重兵在握的盛世才挽回局势，孰料盛世才看到金大势已去，并不帮他，只是按兵不动。金树仁只得电请中央，辞去军政要职。随后，窃取政府准备向苏联购买汽车的1000多两黄金，取道西伯利亚逃至天津。至此，新疆的政权再次易手，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正悄悄来临。

## ● 边疆“混世魔王”



1933年“四·一二政变”之后，掌握新疆实权的是盛世才。盛世才，字晋庸，辽宁开源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917年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见北洋军阀得势，弃文学武，进入广东韶州讲武学堂，结识教员郭松龄。郭松龄后来在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当旅长，盛世才毕业后，投奔郭松龄，当了上尉参谋，又被保送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1925年，郭松龄反对张作霖，盛世才曾回国帮助，郭失败后，盛世才又回日本，继续读陆军大学，但因学费无着落，又结识投靠了蒋介石，由蒋介石供给学费。1928年毕业回国，正赶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于是他摇身一变，披上“左派”伪装投入北伐洪流，北伐失败后，被调任为一厅

三科科长。1930年金树仁到内地招兵买马，盛世才为实现个人野心，应聘来到新疆，初任上校参谋主任，继而晋升为少将参谋长。1932年2月，马仲英派马世明围攻省城，盛世才在解围战中初显身手，被金树仁升为东路剿匪总指挥。瞭墩一战，大败马仲英部队，从而名声大振，晋升为中将。

盛世才来新疆之前，曾对他的朋友说：“我到边疆去，要打开一个局面，将来或者做一个东亚的红军司令；不然就找一个老朽长官，假意殷勤，待其死后，继承其权利；或者认蒙古王

公为干爸爸，待其死后，袭其王公爵位。”在这番话中，盛世才的野心家、阴谋家和投机家的嘴脸暴露无遗。

“四一二政变”前，盛世才和陶明樾、陈中、李笑天交往密切，政变时他虽未露面，却心下欢喜。他抢占城外的“一炮成功”制高点，拥兵观望，以要挟政变当局，准备攫取权力。4月14日，在政变者组成的临时委员会上，有人提议：“新疆大局未定，盛总指挥带兵多年，所向成功，应被选为临时督办，事变当晚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陶明樾、陈中、李笑天出于无奈，只得同意。盛世才就这样依靠军事实力，坐享了政变成果。

盛世才一上台，就开始进行残酷的“大清洗”。他先伪造证据，清除了威胁他统治的“四一二政变”策划人陈中、陶明樾、李笑天。继而又网罗罪名，杀害了在新疆的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澜成、杨耀钧等14人，



盛世才





# 新疆两千年

最后逮捕了临时省主席刘文龙，开始了他的军事独裁专制。

盛世才独掌大权后，为了哗众取宠，于1934年4月提出了以“保障新疆永久为中国领土”为主要内容的“八项宣言”；同年9月提出了以“实行民族平等”、“发展经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九项任务，同时还提出“反帝、和平、建设”三大政策。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盛世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虑，为顺应当时的政治形势，于1936年7月14日发表了《七项救国纲领》，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年11月，张学良秘密派遣南向忱、董佩卿二人来乌鲁木齐，表示欣赏盛世才的抗日主张。所以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盛世才就发表了“披肝沥胆陈中央”的抗日声明。所有这些，虽然都是盛世才“应变”的权术，但是，在他当时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中，关于实施“亲苏、联共”的政策，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1937年，盛世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把他的施政纲领充实为“反帝、亲苏、清廉、和平、建设、民族平等”六大政策。这年5月，与我党达成协议，将退居在星星峡的400名中国工农红军接到乌鲁木齐，并要求中共中央派遣优秀干部陆续来到乌鲁木齐，并于1938年正式成立八路军驻疆办事处。

盛世才虽然伪装成“左派”，但是他的反动本质仍不时有所暴露，正如陈潭秋同志在1939年所指出的：“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盛世才以他的个人行为证明了这一论断。他一面大肆渲染“六大政策”的“革命性”，一面却说“六大政策是超然于国内两大政党的第三政治集团”；一面大讲“马克思主义在新疆有‘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广阔天地”，一面却说“新疆不是国民党的天下，也不是共产党的天下”。1938年盛世才假借“养病”名义去莫斯科，在苏共最高领导人面前，挑拨中苏两党关系，大肆诬蔑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返回新疆后，他一面迫害共产党人，一面又致函斯大林，恬不知耻地说：“我是最忠实的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者。”盛世才表面上声嘶力竭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暗地里却对日本间谍大西忠说：“我十分仰慕日本的政治制度。”他在宣布“欢迎进步人士帮助我们建设新疆”的同时，却又指示其特务机关为每一个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人设立专案，跟踪监视，罗织罪名。1942年5月，盛世才召集全市1000多名青年知识分子，亲口宣布：“在不久的将来，每一个反帝会员都将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群众的掌声未息，他就开始了大逮捕。

这次大逮捕，是在苏联反法西斯战局紧张和国民党掀起新的反共高潮的形势下进行的，盛世才撕下了假面具，公开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他把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员和各族进步人士全部逮捕入狱，并于1942年7月3日上书蒋介石，表示归诚。但是，善搞政治投机的野心家盛世才，这次却弄巧成拙。他把国民党引进了新疆，国民党很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控制了他。盛世才为了维持他统治了近12年的独立王国，又开始玩弄花招。他给斯大林写信，表示要痛改前非，把请求苏军援助的密件交给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同时，他又炮制新的“阴谋暴动案”，1944年8月11日他大批逮捕国民党员，对蒋介石说这些人是“共产党奸细”，对斯大林说这些人是“托派”。盛世才的故伎谁也骗不了，不得不下台。1944年8月29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盛世才为中央农林部长，宣布撤销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任命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别无出路，只得低头认输，他拿出5万两黄金贿赂蒋介石，然后带着历年实行“清廉”政策所搜括的大量财富，用30辆大卡车

装载，灰溜溜地离开了新疆。9月3日，三区革命爆发，国民党军队大批调入新疆，驻扎在迪化等重要城镇。自此，国民党开始直接统治新疆。

俄国领事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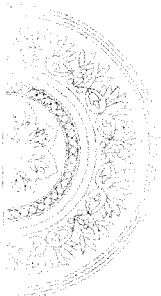


### ● 陈潭秋鞠躬尽瘁

盛世才在新疆主政初期，伪装成“左派”，假惺惺地向中国共产党要求派人到新疆来工作。中共中央早就看出盛世才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但出于加强新疆的革命力量、传播革命思想的考虑，还是派遣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来新疆。在他们当中，就有中共一大的代表之一——陈潭秋。

陈潭秋同志生于1896年，湖北黄冈县人。1920年他在武汉组织了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1924年起，他开始担任武汉地委书记，1926年，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满州省委书记和福建省委书记。1933年，他进入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粮食委员，次年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作为中共驻新疆的党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的负责人来到新疆。

陈潭秋同志的任务是领导当时在新疆的150多名党员干部，并且根据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帮助盛世才制定和执行以抗日、亲共为中心的六大政策。他还组织了一个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叫做“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反帝会创办了一个刊物叫做《反帝战线》。陈潭秋对反帝会和《反帝战线》的领导是通过反帝会的秘书长共产党员黄孚民同志进行的。反帝会经常利用《反帝战线》这个刊物，向新疆人民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毛主席的著作，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打击日寇的光荣事迹都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很受群众的欢迎。反帝会的活动让伪装进步的盛世才感到畏惧，他害怕新疆各族人民的革命觉醒，不久，就把黄孚民调离了反帝



会，从那以后，反帝会就逐渐失去了革命的意义。

当时，以陈潭秋同志为首的我党在新疆工作的同志，以他们的言行给各族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人们都在背地里亲切地称他们为八路军。为了工作的便利，当时陈潭秋同志没有公开他的身份，而是以“徐杰”这个名字住在八路军新疆办事处里，所以办事处的同志都叫他徐先生。陈潭秋经常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来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上党课，讲中国革命历史，他常说：“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是做好工作的基础。”他把轻视政治理论的人，叫做没有头脑的人。

陈潭秋同志对待工作十分认真，同志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总是耐心倾听，听到问题就问，直到弄清楚为止。他向同志们交待工作时既慎重又具体，使大家听了思想明确，工作有了指导思想。他对同志们的缺点和错误，总是严格地指出，毫不留情地批评。对于同志们工作中的困难，他则非常关心，每当同志们接受任务出发前，他总是鼓励说：“去吧，工作的困难虽然多，但只要联系群众，保持清醒头脑，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陈潭秋同志对大家的生活也很关心，当时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里住着一些养病的同志，他常常和医生研究治疗问题，帮助改进病人的医疗条件。平时，他自己生活上非常俭朴，夏天穿一身灰制服，冬天穿一套蓝棉衣，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吃住在一起。他没有工资，每月领到的几元钱津贴费还不够买烟吸。有一次，他由于工作疲劳过度而患了重感冒，炊事员蒸了一只鸡给他，他却说：“我不需要吃鸡，还是拿给其他体弱的同志吃吧！”

陈潭秋同志来新疆时，正赶上红四方面军由李先念同志率领的那部分驻扎在新疆，当时被称为新兵



陈潭秋烈士像



# 新疆两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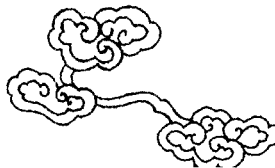
营。这支部队在八路军的编制中是一个纵队，其中又分为航空队、装甲队、炮兵队、通讯队等。每逢星期天，陈潭秋就亲自给战士们上课。他经常给新兵营的同志们说：“你们手中不论掌握了多么好的武器，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武装你们的头脑，你们的武器就不能够消灭敌人。”

1940年，这支部队离开了新疆，开赴抗日前线；他们一走，盛世才就开始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抗日志士和民主青年。到1942年，盛世才看到德国法西斯疯狂逼近莫斯科，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相勾结，残酷扫荡我抗日根据地，他就彻底撕掉了伪装革命的假面具，新疆的局面开始恶化了。陈潭秋并没有向盛世才的倒行逆施让步，在统一战线尚未最后破裂时，他还是本着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向盛世才不断提出建议和批评，希望他改正错误；盛世才不听他的劝告，反而以德报怨，想尽办法打击和迫害我党在疆人员。常常因为一件小事，就给以记过、罚薪降职处分。当时《新疆日报》有一个排字工人错将“办事”的“办”字误排成“辨”字，盛世才看到后借机发作，立即下令把我党在《新疆日报》的工作人员，从编辑、校对到副社长，一律记过、罚薪。从这件事，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当时我党在新疆开展活动的艰难了。

陈潭秋同志早就认清了盛世才的“狼种猪”本质，他经常对同志们说：“我们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天山戈壁，插翅难飞，每个同志都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免得临时惊慌。”同时，他又勉励大家：“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我们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多争取一分钟，对于抗战、对于新疆各族人民都是有利的。”

果然不出所料，1942年春天，盛世才将我党在新疆各地工作的同志，都调回乌鲁木齐，软禁在南梁。但陈潭秋同志临危不惧，他号召同志们要抓紧时间，积极开展整风学习，加强革命气节教育。他教导同志们，要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钢铁意志，要有“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夺”的战斗精神。

1943年9月17日夜，丧心病狂的盛世才秘密杀害了陈潭秋同志，和他一起遇害的还有毛泽民和林基路。陈潭秋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其他被俘的共产党员，他们牢记陈潭秋同志生前的教导，坚持与国民党斗争，直至最终胜利回到延安。



## ● 毛泽民血洒边疆

毛泽东主席晚年时曾对他的卫士长回忆道：“我有个弟弟曾在新疆工作，他为了革命，为了新疆人民奉献了他的生命。”

毛主席的这个弟弟就是毛泽民同志。他1938年去苏联治病路过新疆，由于盛世才再三要求，党中央便决定把他留在新疆，帮助整顿当时十分混乱的新疆财政工作。当时他化名周彬，担任省财政厅厅长。那时，官僚地主横征暴敛，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盛世才匪帮的爪牙几乎“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他们以扩充军费为名搜刮百姓；日夜开动印钞



毛泽民烈士像

机，使纸币充斥市场，物价一日数涨，通货膨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人们形象地说：“钞票一大把，只换烟一包。”

正当新疆财政经济处于困境时，毛泽民同志以惊人的毅力带病上任，他曾经担任过中央苏区国家银行经理，后来在长征途中担任中央苏区银行队负责人，因此有丰富的财政经验。他挑起新疆财政厅厅长这副担子后，从调整财政组织入手，规定了严格的财政纪律和公务人员奖惩条例，以此堵塞贪污漏洞。他制订了一整套经济核算制度，接着又实行币制改革，制止滥发纸币，从而稳定

了物价。当时发行的“新币”，最小面额为1分，这在新疆货币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使用这样小的计量单位来发行货币，充分说明了物价日益稳定。有了良好的物价基础，毛泽民同志便信心十足地开源节流，减轻人民的赋税，发展对外贸易和商业，发放工、商、农、牧贷款，以推动生产发展，改善人民生活。这些措施实行后，新疆的财政经济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百业俱兴的繁荣景象。例如在南疆的巴楚县，农民世代租种地主的土地，仅有的生产工具坎土曼，也是世代相传的，磨得又短又钝，无钱更换新的。政府发放农业贷款后，巴楚县长共产党员李志梁用





毛泽东烈士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时的办公室兼卧室

这笔款购置了1万把坎土曼，发给缺少农具的农民，对农业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共产党人的威信也在维吾尔群众中树立起来了。

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制订了新疆经济建设的三年计划。从1938到1941年，在农牧业方面，全疆开垦荒地400多万亩，牲畜增产两倍以上；在工业方面，兴建了独山子油矿和头屯河铁厂以及许多生产日用品的小工厂；在交通运输方面，毛泽东同志调拨大量资金，修筑了从乌鲁木齐起，东到星星峡，南到喀什、和田，北至伊犁、塔城等地的公路干线。

由于毛泽东同志严格执行财政纪律，一丝不苟地抵制盛世才一伙的贪污行为，触怒了盛世才，1941年，他被调离财政厅，去民政厅任厅长。毛泽东同志一到民政厅，就废除了腐朽的“乡政农官制度”，亲自起草了“区乡选举法草案”和“区、村公所组织章程”，建立了由农民自己选举产生区、乡长的选举制度。在市政组织建设上，拟定了“街长选举办法”和“街长办事组织章程”，由群众自己选举街长，行使民主权利。同时还亲自起草“区村长须知”。他还亲自给初、中级行政干部讲课，训练革命干部，培养他们艰苦朴素、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毛泽东同志的教导下，许多青年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使当时新疆的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变化，民主和进步的气氛洋溢在古老的边疆。

毛泽东同志为了边疆各族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常常废寝忘食，不顾自己的身体。由于工作繁重，体弱多病的他曾经多次昏厥过去。人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到新疆来，就是要为新疆各族人民多



做一些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人民的事业，每一件都有时间性，不能因为个人健康而受到延误。”毛泽民同志生活非常朴素，解放以后，一位曾与毛泽民同志共过事的同志回忆道：“毛泽民同志当时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职务，但衣着饮食完全同普通人一样。他从内地带来一顶旧皮帽，一直戴到入狱以后，一双旧毡筒也是多年未曾更换。他没有什么嗜好，饮食非常节俭，只喜欢吃自己家腌制的酸白菜，他把财政厅发给他的薪金的绝大部分交了党费。”

毛泽民同志在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和地方封建势力的种种阻碍下工作，必须和他们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他说：“政府凡有措施，务求集思广益，不可独断专行。”只有进行了不断的斗争，才能使共产党的政策和思想在群众中得到传播。由于毛泽民等同志的努力工作，党在新疆各族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这引起了盛世才的猜忌和仇恨。1942年，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这三位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最先被捕。毛泽民同志在监狱里、法庭上，经受了敌人的种种折磨，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节，绝不低头。

毛泽民同志遇害之后，战友们还清楚地记得他在临刑前的慷慨陈辞：“我家为国家、为革命已经牺牲了嫂嫂、妹妹和弟弟，只要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再牺牲我的生命又怕什么！”

### ● 林基路一心为民



1943年和陈潭秋、毛泽民一起英勇就义的还有林基路同志。林基路是1938年党中央派到新疆来的大批干部中的一位，最初他在省城迪化担任新疆学院的教务长。新疆学院是新疆大学的前身，当时是新疆的最高学府。林基路为了宣传革命思想，唤起各族青年的爱国热情，就联合省一中、一女中的负责人，开展全市性的红色歌咏活动。革命的歌声打破了古老边城的沉闷气氛，一时间《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开路先锋》《大刀进行曲》响彻天山南北。林基路还亲自写了《新疆学院院歌》，和青年们一起放声高唱：





# 新疆两千年

“民族的命运负担在肩，  
努力莫迟延。  
团结、紧张、质朴、活泼，  
争当抗日教育的模范，  
……  
时代的青年，  
勇敢向前……”

由于林基路和他的战友的宣传，新疆的青年思想活跃起来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也逐渐开始觉醒。盛世才看到群情激昂不利于其反动统治，就把林基路及其战友调到南疆各地，想分散他们的力量、削弱他们的影响。然而盛世才这次却打错了算盘，因为他把这些革命战士调得越分散，革命的种子就传播得越广泛。

林基路被调到库车当县长，他没有嫌库车偏僻贫瘠，而是把这个任命当成是接触广大维吾尔农民的好机会。因此，林基路到任第一天，就亲自处理人民来信，接见来访群众。当时，有不少人被平白无故地关在监狱里，他们的亲人都要求伸冤。鉴于这种情况，林县长一面不分昼夜地翻阅案件记录，一面又找狱中犯人以及了解案情的人谈话。经过核对，他发现其中有不少穷人是受地主巴依陷害的。查明情况后，林县长马上把这些无辜受害的人开释出狱。他们出狱时，都感到特别奇怪，怎么官府还没从他们身上榨出点油水，就破例放人了呢？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位林县长，是八路军里来的，八路军的官，个个都是廉洁奉公，替穷人说话办事的。

当时，库车县各机关的情况十分复杂，一些胡作非为、不学无术的人把持着重要职位，不搬开这些绊脚石，要改变政府的工作作风是不可能的。于是，林基路就大刀阔斧地整顿了县级机关，撤换了一批代表地主利益的、不称职的官吏，提拔了一批正直可靠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官员。县财政局是直接关系到全县人民利益的机关，林基路就培养了一个受群众拥护的维吾尔族人担任副局长，同时，又让共产党员蒋连穆同志也担任副局长。至于基层政权的区长、乡长、街长以及管水利的“米拉甫”，以前都是由县政府直接任命，因而这些职位经常被地主通过贿赂县长而



林基路烈士像

窃取，借以搜括百姓，大发横财。林基路接任县长后，坚决惩办了那些向他行贿的人，宣布区、乡、街长和“米拉甫”一律改为民选。这些措施，使当地的地主豪绅大为震惊，他们简直无法理解，世上竟有不贪赃枉法的官吏。

林基路到任以前，库车县里有200多名政务警察，这些家伙穿一身特别的服装，后背上写着“政务警察”四个大字，分布在全县各地，每天游街串巷，横行霸道，百姓们叫苦连天。林县长为了替民除害，就派人抓来一个民愤极大的警察，亲自审问，判了重刑。这种杀一儆百的作法是对全县贪官污吏的一次警告。不久，他又把这些维护地主利益的警察大部分都开除警籍，只留下20多个比较好的。

自从毛泽民同志担任新疆财政厅长以后，新疆的财政工作有了很大改观。可是，库车的情况却没多少好转，其主要原因是库车的财政局长纳莫因贪赃枉法的缘故。林基路为了摸清情况，就步行下乡，访贫问苦，倾听群众的反映。在乡间，林基路到处都听到关于苛捐杂税太重的抱怨，农民都希望政府减轻负担。林基路回到县里，一检查税收情况，发现税收项目竟有20多种，而且税额也规定得很大，他和副局长蒋连穆一研究，就把税收项目由20多种减至7种。此项改革，立即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税收项目虽然减至7种，可收税的办法仍然相当落后，弊病很多。往常的作法是包税制，由政府把一区一乡的税额规定好，包给当地的豪绅。这样一来，乡绅地痞就乘机层层增加税额最后落在农民头上的数目比政府规定的大了好几倍。林基路为了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命令财政局长纳莫因停止使用包税制，以后收税由政府派专人负责，并且要履行严格的手续，把收来的税款存入银行，私人不得动用。

按照以前的惯例，在库车做县长，除了可以拿到一笔优厚的薪俸之



外，还有两项高出薪水好几倍的额外收入，美其名曰“奖金”、“税收提成”。这实际上就是公开的贪污、变相的分肥。林基路拒绝这种不明不白的“奖金”，其他官员一看，也都不敢拿什么额外的报酬了。在林基路的倡议下，他们只好心疼地把这些钱捐出，作为修缮县政府的经费。

当时，农民纳税的形式主要是交粮，贪官污吏们想尽办法在收粮的过程中揩农民的油水。当地居民给收粮的人起了个外号叫“仓老鼠”。“仓老鼠”负责验收粮食的质量，他们把农民送去的粮食箕了又箕，筛了又筛，一口袋粮食能弄去少半袋，然后他们就把筛箕出来的粮食据为己有。过斗的时候，就更离奇，有一个家伙专管“踢斗”，他穿着大皮靴，照着装得满满的粮斗猛踢一脚，把斗里的粮食踢撒许多，农民必须再用自己的粮食把斗补满填平才算完事。有一天，正当收粮的家伙又玩弄这套把戏时，林县长穿着便服在一旁看得一清二楚。林基路当场宣布撤销他们的职务，让同来的几个职员接替他们的工作。农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们激动地说：“库车的天变了，林县长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库车的天变了，然而并未维持很长时间，不久，乌云便又笼罩了新疆的上空。盛世才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在库车致力于清除官僚地主反动势力的林基路，自然是“黑名单”上的头号人物之一。盛世



林基路烈士纪念馆

才将他投入监狱，库车人民为之痛哭失声。

林基路对盛世才的罪恶行径感到愤慨万分，眼看着自己和生龙活虎的战友被敌人关起来，不能为拯救民族危亡出力，他感慨万分地唱道：

“哦，民族苦难的亲娘，  
为你五千岁的高龄，  
已屈死无数的英烈；  
为你亿万年的伟业，  
还要捐弃多少忠良？”

在被捕的共产党员中，也出现了个别败类，他们在革命队伍中得不到个人主义的满足，就乘机出卖革命，走上了叛变的道路。林基路非常鄙视那些软骨头，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反动派的皮鞭下，昂起高尚的头颅，在敌人的刀枪面前，挺起正直的胸膛。

1943年9月17日夜，林基路和陈潭秋、毛泽民一起光荣就义。至今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林基路在狱中写成的《囚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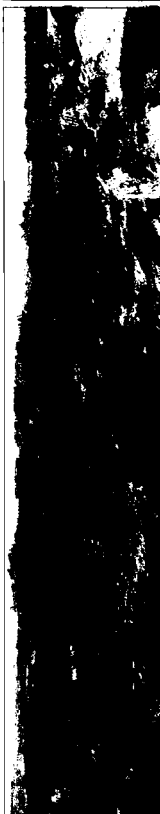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砍头枪毙，告老还乡，  
严刑拷打，便饭家常。  
囚徒，新的囚徒，坚定信念，贞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染成红旗，万载飘扬！”

## ●杜重远执着人生



在盛世才统治时期，献身于新疆革命事业的，不仅有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些爱国的民主人士。杜重远，就是他们中间的佼佼者。

杜重远，生于1897年，吉林省怀德县人。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为人正义，热情豪爽。早在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1917年，他东渡日



# 新疆两千年

本留学，专攻陶瓷制造专业，决心以“实业救国”。1923年，杜重远毕业回国，在沈阳创办肇新陶瓷窑业公司，采用国内先进的工艺流程进行生产。在他的努力经营下，这家公司的产品畅销全国各地，颇受国人欢迎。1930年，在中共的影响和领导下，社会各界的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发展国货，抵制日货”在上海举办了“全国国货展览会”，杜重远亲自参加开幕式。由于他当时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爱国实业家，因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入侵东三省，杜重远“实业救国”的梦想被日寇的铁蹄踩得粉碎。从此，他抛弃幻想，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30年代初期，国民党统治开始走向法西斯化，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当时的爱国名流邹韬奋、杨杏佛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周刊，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国民党对此十分恼火，想方设法要加害邹、杨两位先生。邹韬奋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活动，而滞留在大陆的杨杏佛先生则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34年，杜重远从战友的血泊中挺身而出，接手主办《新生》周刊，坚持抗日宣传，无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35年5月4日，《新生》刊登了《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人说辱骂了他们的天皇，借机挑衅，国民党政府屈从于日方的无理要求，勒令《新生》停刊。蒋介石为讨好日方，以便达成反共的默契，又将杜重远先生逮捕入狱，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也是杜重远先生的政治生命的转折点。国民党在这件事的处理上，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对日妥协，这就让杜重远擦亮了眼睛，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高举抗日大旗的只有共产党。在《新生》停刊时，杜重远写下《告别读者诸君》一文，他在文中大声疾呼：“舍得一身刚，敢把皇帝拉下马。”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寄语读者要“鼓起勇气，担当历史的使命”。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篇极具胆识和号召力的战斗檄文。

杜重远先生在狱中时，上海的地下党和他取得了联系，并动员社会舆论多方进行营救。1936年4月8日，蒋介石在全国爱国舆论的压力下，被迫释放了杜重远先生。杜重远一出狱，就急速赶往西安，敦促张学





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不久，发生了“西安事变”，杜先生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恩怨，极力支持中共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并从中斡旋努力说服张、杨两位将军，对于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推动作用。1937年“七七政变”之后，杜重远奔走全国各地，热情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的光辉战绩。同时，他还利用和盛世才的同学关系，多次访问新疆，写下了许多篇介绍新疆情况的通讯，在文化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因此，有许多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纷纷来到新疆工作。在此期间，他还到过武汉、香港等地，并在那里与我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志进行多次会晤，这对他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化有着决定性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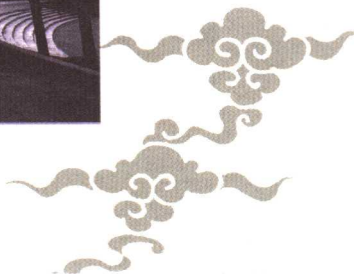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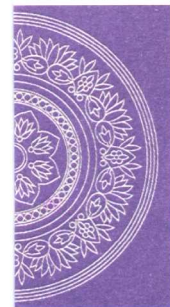
1939年，国民党见威逼吓不倒杜重远，就想用高官厚禄来利诱他。蒋介石厚颜无耻地说：“只要杜重远站到国民党一边，就给他个中央青年部长当；如果他不愿当官也可帮助他出国。”当时也确实有很多华侨富商和美国友人劝他出国，他们愿聘请他、资助他去办实业。但杜重远摒弃了高官和出国的诱惑，毅然选择了到偏僻的新疆来吃苦，为建设抗日大后方出力。

当时，盛世才正伪装进步，想利用与杜重远的同学情谊，借助杜重

远的声望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他曾多次邀请杜重远来新疆工作。这回真的来了，盛世才表现得十分亲密，接待特别热情。他安排杜重远当工业厅长，可杜重远却选择了新疆学院院长，盛世才对此虽心中不满，表面上还是一口答应。

杜重远为了办好新疆的最高学府，为祖国的边疆培养出一大批有文化、有思想的抗日救国分子，他先后从内地聘请茅盾、张仲实、赵丹等知识界、文化界的著名爱国人士来新疆任教，并从内地采购来大批书籍充实学院的图书馆。为了带出良好的校风，他以身作则，虽然他家住校外，但每天早上他总是提前到校，和学生们一起上早操；偶尔因故不来，第二天也要向同学们说明理由。他常向师生们说，只有做到“有纪同遵，有则共守”才能办好学校。当时学院办公室门外挂着个“意见箱”，由于长期无人过问，已经落满灰尘。这件不起眼的小事，杜院长也很重视，他规定“意见箱”由学生自治会负责，每隔三天开一次锁，把意见分门别类，交给有关部门认真处理，这对改进学院的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

杜院长为了把全院学生引向抗日救国的康庄大道，亲自动手编写讲义，在全校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课程。每逢周末，他就把全院学生集合在一起听课，由他担任主讲。他讲课虽有讲义，却从来不照本宣



科，而是如演讲一般，侃侃而谈，抑扬顿挫，挥洒自如，兴之所至，旁征博引，意气纵横；而且言语简洁，声音洪亮，就是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他讲课的内容针砭时弊，既生动又具体。听他讲课既能增长知识，又是一种艺术享受，因此，他的课不仅受到校内同学的欢迎，就是校外的中小学老师也经常来听。

杜先生办学的宗旨在于抗日救国，因此，他提倡面向社会，学以致用。1939年8月，杜先生亲自任团长，由文学系系主任张仲实、教务长郭真先任副团长，率领200多名师生组成“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去伊宁、绥定、精河、乌苏、呼图壁、独山子等地，向各族人民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揭露日寇在内地无恶不作的强盗行为，宣传前线军民英勇杀敌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在沿途各地的演说，从不重复，各有特色；而每一次演讲，又都能感人肺腑，震撼心灵。杜重远和他的学生们创作了大型话剧《新新疆万岁》，深受群众欢迎，几乎在每地演出后都得应要求再加演一次。杜院长和他的学生们通过演讲和话剧，将革命的思想传遍天山南北。

然而，杜重远的老同学盛世才却不可能容忍他在新疆继续启发民智，因为这将最终威胁到盛世才自身的统治。1940年冬，杜重远和盛世才的关系急剧恶化，杜先生被迫辞职闲居家中。不久，他就被盛世才逮捕入狱。盛世才捏造各种罪名诬陷他，先说他是托派，准备串联中共中央的托派分子搞阴谋暴动，为此，共产党员们提出抗议，盛世才被迫让毛泽民同志参加审讯，杜重远的罪名由此被否定；盛世才不甘心，又说杜先生是汉奸，收了汪精卫的2万元钱到新疆来活动，这个罪名连南京政府都不相信，准备派人复审。盛世才惟恐阴谋败露，连忙于1943年5月2日以“苏联间谍”、“中共秘密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重远杀害。因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牵连被捕的，还有赵丹等人 and 新疆学院一半以上的师生。

杜重远和盛世才多年同学，两人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杜先生因爱国而献身，英名永存；盛世才却双手沾满同胞的鲜血，永远为祖国人民所不齿。



图 1





# 走向光明

族军的配合、新疆各族人民及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和平解放。

协的斗争。1949年9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三区民族军猖獗一时，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新疆各族人民与这股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在境外帝国主义的煽动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姑息纵容下，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也在治方面起了积极作用，它牵制了国民党的大批军队，为新疆的解放做了准备。与此同时，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这场三区革命，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盛世才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伊

## ●三区革命



盛世才在新疆长期实行独裁统治，投靠蒋介石后推行反苏、反共、反人民政策，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国民党势力入疆后，加紧了对各族人民的压迫、剥削，这使得新疆各地的反抗运动逐渐高涨。1944年9月初，由于国民党当局强迫牧民捐献军马，直接导致了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地区爆发武装起义，这就是“三区革命”的开端。

1944年10月7日，三区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首先在巩哈县取得胜利。11月7日，伊宁市郊维吾尔、哈萨克族人民组成的游击队举行了武装起义，当天夜里攻占了专员公署和警察局，国民党的军政官吏和残余部队退守飞机场等地。伊宁起义军又先后攻占了绥定、察布查尔、霍城、巩留、新源、特克斯、博乐、温泉等地。1945年1月底，伊犁起义军全歼据守伊宁机场的国民党军残部。至此，伊犁地区除精河外全部为起义军占领。

1944年11月12日，各地起义代表在伊宁召开会议，成立了临时政府。封建宗教头目、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艾力汗·吐烈窃取革命果实，当上了政府主席。在他的把持下，同日通过了九项政府宣言，这个宣言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如国家领土完整、民族关系、政教关系等方面，均有严重的错误。1945年1月，临时政府对九项宣言作了部分修改，通过了第二个九项宣言，但是有许多根本性的错误观点仍保留了下来。

1945年4月，三区临时政府组建民族军，其中心任务是将国民党的势力从塔城和阿勒泰地区赶出去。为此，他们制定了北、中、南三线同时作战的计划。其后，民族军三线出击，不仅使伊犁、塔城、阿山三区连成一片，其军事前锋还直逼玛纳斯河西岸，与国民党军隔河对峙，并



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其他地区的统治。

三区革命初期，虽然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但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一批封建上层分子，攫取并把持了革命的主要领导权。他们狂热地鼓吹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煽动民族仇视，甚至打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公开分裂国家统一，破坏领土完整，妄图将三区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引入歧路，使其为他们的罪恶目的服务。

三区政府中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代表的进步力量认清了艾力汗·吐烈的真面目，逐渐与他和他的小集团决裂。阿巴索夫曾就读于新疆学院，是林基路的学生。1945年，三区先后成立了以阿巴索夫为主席的民主青年团和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党的章程，是以苏联共产党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为蓝本的。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等人一起将艾力汗·吐烈清除出了革命队伍，组成了新的三区革命领导核心。他们认

真总结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于革命初期曾出现的脱离祖国、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明白无误地表明：三区革命是中国本土范围内的人民群众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绝没有分裂疆土的含义；对于革命初期把汉族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加区别乱打一通的错误，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把三区革命置于中国民



三区革命纪念碑

主革命之中，对于它的作用有了比较正确的估价。

中国共产党非常关注三区革命。1946年底，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在南京出席国大期间，阿巴索夫和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取得联系，向董必武同志汇报了三区革命的过程以及人民革命党的工作情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董必武派专人携带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随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到新疆工作。

毛泽东主席对三区革命的作用和意义是这样评价的：“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 ● 联合与破裂



1944年10月，吴忠信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开始了他对新疆为期18个月的统治（1944年10月至1946年3月）。吴忠信上台即逢三区革命爆发，到1945年9月，三区临时革命政府的军队已占领玛纳斯以西，吴忠信“剿抚兼施”的反革命两手彻底破产。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同日，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同年2月，雅尔塔会议讨论了战后世界安排等问题，8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承认新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关于新疆内部纠纷，苏联政府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中国内政。

在上述背景下，1945年10月17日至1946年6月6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在迪化举行了和平谈判，签订了和平条款。其正文主要内容是：政府给人民以选举权，由人民选举自己所信任的各级行政官吏；扩充省政府组织，委员名额定为25人，其中10人由中央直接派定，其余15人由各区人民代表保荐，中央任命；人民有宗教信仰、发展本民族的文化与艺术、出版、言论、集会、国内外贸易之自由；准予组织民族军；于事件解决10天以内，互相开释被拘捕的人士。

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省政府正式建立，由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



# 新疆两千年

兼新疆省政府委员并兼主席，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和七区代表包尔汉分别任委员兼副主席；又由中央、三区、七区的其他代表分别任委员兼各厅厅长。联合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可概括为“和平、统一、民主、团结”八个字。值得注意的是，在联合政府委员中竟有泛突厥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以及泛伊斯兰主义分子艾力汗·吐烈。这些人势必成为联合省政府施政纲领贯彻执行的障碍。国民党政府为了操纵、破坏新疆联合省政府，还任命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监察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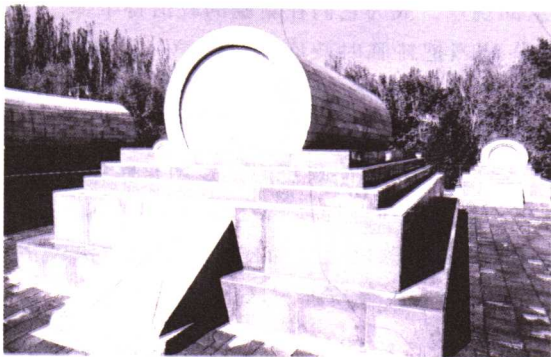
新疆联合省政府成立不久，国内形势突变。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和支持下，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疯狂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新疆的国民党军方和联合省政府中的国民党人员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不断破坏和平条款的实施，蓄意阻挠联合省政府的工作，甚至扶植反动势力，向三区根据地发动进攻。

1946年11月，蒋介石免去陶峙岳新疆警备总司令的职务，改由宋希濂接任。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反对和平条款，认为张治中对三区革命力量所采取的同情态度是“软弱退让”，支持宋希濂的强硬态度。1947年5月10日，张治中致电蒋介石，要求辞去新疆省主席职务。5月21日，蒋介石为了打击三区进步力量，任命泛突厥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穆罕默德·伊敏为副主席兼建设厅长，艾沙为秘书长。泛突厥主义分子尽管从30年代起就在新疆蛊惑人心，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像这样得势过。三区方面对蒋介石的任命表示强烈反对，当天阿合买提江就向张治中要求，撤销任命，省主席仍由张治中兼任。5月下旬，阿巴索夫在人民革命党的会议上指出：“国民党顽固分子已经堕落到了与泛突厥主义分子、分裂主义分子同流合污的地步。如果我们容许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们势必也要和麦斯武德同流合污。而这是我们党的立场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我建议人民革命党全体党员对麦斯武德采取坚决的反对态度。必要时，我们宁可不要和平条款，也要坚持我党的政治立场，绝不与泛突厥主义分子合作。”同年8月，三区代表全部撤回伊宁，表明他们与泛突厥主义分子以及国民党当局的彻底决裂。

## ● 沉渣泛起

20世纪40年代，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猖獗一时，艾力汗·吐烈、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等人疯狂鼓吹这两股反动思潮，在新疆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泛伊斯兰主义，也称大伊斯兰主义。它产生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濒临灭亡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是我国古代西突厥的一支，16世纪它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但18世纪后期它成为西欧殖民者瓜分的对象，领土逐渐缩小到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小块地方，从而引起奥斯曼帝国苏丹兼国内伊斯兰教总教长“哈里发”阿卜杜尔·海米德二世的惊惧。他在抑制了本国宪政运动，恢复独裁统治以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转而谋求精神世界的统治，大力倡导泛伊斯兰主义，梦想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教皇。泛伊斯兰主义的基本内容是：所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地区，都应该并入统一的政体，结成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中国的新疆地区和前苏联的中亚地区也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在新疆鼓吹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沙比提大毛拉和艾力汗·吐烈等人。30年代在喀什建立的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就是由沙比提大毛拉操办的。三区革命初期攫取了领导权的艾力汗·吐烈曾狂



三区革命烈士陵园（前后排列着阿合买提江等七位烈士陵墓）

妄地叫嚷要在新疆、甘肃、青海开拓伊斯兰的土地。总之，长期以来，国内分裂主义分子都把泛伊斯兰主义作为他们的理论武器，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仇杀。因此，泛伊斯兰主义一直是新疆的一大政治隐患。

泛突厥主义，也

# 新疆两千年

称大土耳其主义。它于20世纪初兴起于土耳其。20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了资产阶级革命，海米德二世被推翻。为挽救帝国衰败的历史命运，青年土耳其党倡导泛突厥主义，以便恢复奥斯曼帝国的荣耀，统治亚洲操突厥语的各民族。泛突厥主义者宣称，操突厥语的诸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因此，这些民族应组成统一的国家。中国的新疆地区，以及生活在这个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均被圈入这个臆造的国家中。由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只讲民族和宗教，煽动强烈的宗教狂热和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因而成为帝国主义在中亚和中国新疆搞分裂颠覆活动的工具。在新疆鼓吹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麦斯武德、艾沙、穆罕默德·伊敏等人。早在杨增新主政时期，他们就鼓噪一时，形成一股分裂主义势力。杨增新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自身统治，将麦斯武德驱逐出境。但是，他们的流毒并未能肃清，一有机会他们便沉渣泛起，破坏祖国的统一和新疆的安全。

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将我国新疆地区称为“东突厥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这是一个完全杜撰的地名，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讲，还是从法律的习惯的角度讲，我国从来都不曾认可过“东突厥斯坦”这个地名。这个名称只能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地缘学名词。艾力汗·吐烈、麦斯武德等人鼓噪这个杜撰地名的用意，就是要否认新疆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讲，“东突厥斯坦”融汇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全部观点，成为它们在新疆的政治寄生体。

三区革命初期，艾力汗·吐烈把持临时政府通过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九项宣言”，公开地鼓吹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国家”，公然宣布脱离中国，企图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违背我国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愿望的反动活动必然遭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的进步力量剥夺了艾力汗·吐烈的领导权，确立了新的领导核心，并重申三区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社会进步，从而廓清了一度笼罩在三区上空的政治阴霾。

1947年，麦斯武德等人重返新疆掌握大权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甚嚣尘上。首先，他们以穆罕默



德·伊敏的《东突厥斯坦历史》为纲，纠集一些分裂主义分子编写反动书籍，企图歪曲历史，分裂祖国；其次，创立阿勒泰出



乌拉斯台山口（1944年三区革命游击队曾在这里与国民党军队展开过激战）

版社，致力于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其三，出版维吾尔文的《自由报》、《火焰报》，每天在报上写的口号是“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族”、“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们的故乡是东突厥斯坦”；其四，穆罕默德·伊敏和艾沙开设一个图书馆，从土耳其运来大量宣传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书籍；其五，积极组织成立各种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团体；其六，大力提倡所谓“语文统一运动”，事实上是让维吾尔语土耳其化。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突厥语统一的研究班，草拟了维吾尔语土耳其化的方案。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与宣传，使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越燃越炽，一时间成为新疆的分裂思潮。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三区革命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刊物和全疆各地进步力量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猛烈抨击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的反动立场，揭露他们极不光彩的个人行为。1948年8月1日，在三区方面的倡导下，成立了“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阿合买提江任主席。该同盟使用了“新疆”这个法定名称，这个严正立场，对于当时的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用“东突厥斯坦”代替“新疆”的鼓噪，是针锋相对的有力还击。

事实证明，麦斯武德等人是一伙民族败类，他们和国民党顽固分子一起成为镇压和屠杀新疆各族人民的罪魁祸首。不仅如此，他们还是企图分裂国家的凶恶势力。他们的残余分子，甚至在90年代还流窜于国外，干着破坏新疆安定和国家统一的勾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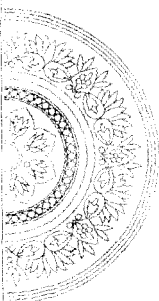


## ● 黎明前奏




新疆联合省政府破裂以后，张治中为了与三区再度合作，于1948年8月撤换了宋希濂，由西北行辕副主任陶峙岳任新疆警备部总司令；又于1949年1月9日撤换了麦斯武德和艾沙，由包尔汉任新疆省主席，刘孟纯为秘书长。这种人事变动，客观上对新疆和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从1948年下半年起，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丧失了约154万兵力。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领导人亲自接见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同志，就解放新疆问题进行了交谈，鼓励他们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挺进大西北并准备最后完成解放新疆的任务。在国民党和谈阴谋破产后，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接着，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华南、西南、中南和西北广大地区进军。

1949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攻占了西安及关中地区，然后会同华北野战军继续西进，8月26日攻克兰州，9月5日攻占了西宁，23日人民解放军进驻银川。至此，西北已解放陕、甘、宁、青四省。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宣告和平解放。这样，新疆之敌孤立塞外，毫无退路，人民解放军兵临玉门关下，直叩新疆大门。形势迫使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做出选择。新疆各族人民以及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渴望和平，迫切希望走和平解放的道路。而当时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则逐渐形成了主和派和主战派两种势



力，即以陶峙岳、包尔汉等为代表的进步派，希望新疆和平解放；以马呈祥、麦斯武德为首的顽固派，坚持顽抗到底。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后，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屈武等人参加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留住北平。6月26日，张治中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身份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并劝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为此，同一天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新华社社评——《评张治中声明》。张治中先生的声明和新华社的社评，不仅在新疆的国民党统治区，而且在三区也得到广泛传播，三区曾将张治中的声明和新华社评论翻译成维、哈文字，印刷了3000多份，广为散发。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军政当局开始慎重交换对时局和新疆出路看法。

中国共产党根据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做了大量的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7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将军，经绥远转发电报，劝导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和刘孟纯等，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根据形势发展共商对策，准备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早在国共谈判期间，周



八路军办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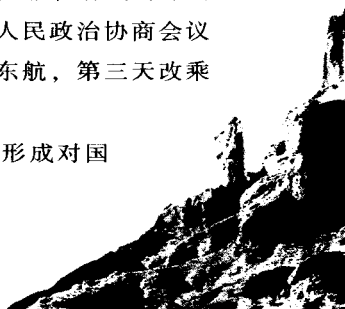
# 新疆两千年

周恩来同屈武谈话时也曾指出：“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破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周恩来还通过乔冠华做陶峙岳堂弟陶晋初的工作，使陶峙岳终于成为军方主和派的主将。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新疆的方针还得到了苏联的支持。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就中苏关系问题进行谈判。邓力群以政治秘书身份同行。谈判期间苏方透露：据可靠情报，美国企图将西北“五马”撤到新疆，与当地反动势力相结合，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此计划如果得逞，将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危害，对苏联也极端不利，因此建议解放军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在获悉此消息后，决定将原定1950年进军新疆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底。为了配合上述行动，苏联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三区力量，从军事上牵制国民党。于是中共中央便决定派遣在莫斯科的邓力群，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负责与三区联络，并促进新疆的和平解放。三区与中共中央之间，通过邓力群的“力群台”开始了密切联系。

邓力群到伊宁后，转交了毛泽东于8月19日致阿合买提江的邀请信。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三区革命“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并邀请三区革命政府选派5名新疆代表于9月上旬到达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三区革命政府接受毛泽东的邀请，派遣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拜克、阿巴索夫、达里列汗和罗志五位代表，于1949年8月22日从伊宁去苏联，27日飞经苏联伊尔库茨克市到外贝加尔山附近时，因气候恶劣，飞机不幸撞山，五名代表及机上人员共17人全部遇难。毛泽东主席在唁电中称他们：“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国人民永远纪念。”9月3日，噩耗由苏联驻伊宁领事转告赛福鼎，赛福鼎和邓力群商定，派“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常委赛福鼎、塔城副专员阿力木江、新疆学院教授涂治三人代表新疆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9月8日，三人由伊宁乘飞机经苏境东航，第三天改乘火车到达满洲里转赴北平。

人民解放军的大兵压境和三区方面的积极配合，形成对国



国民党军队的夹击之势。国民党在新疆的部队已走投无路。新疆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已是形势所迫、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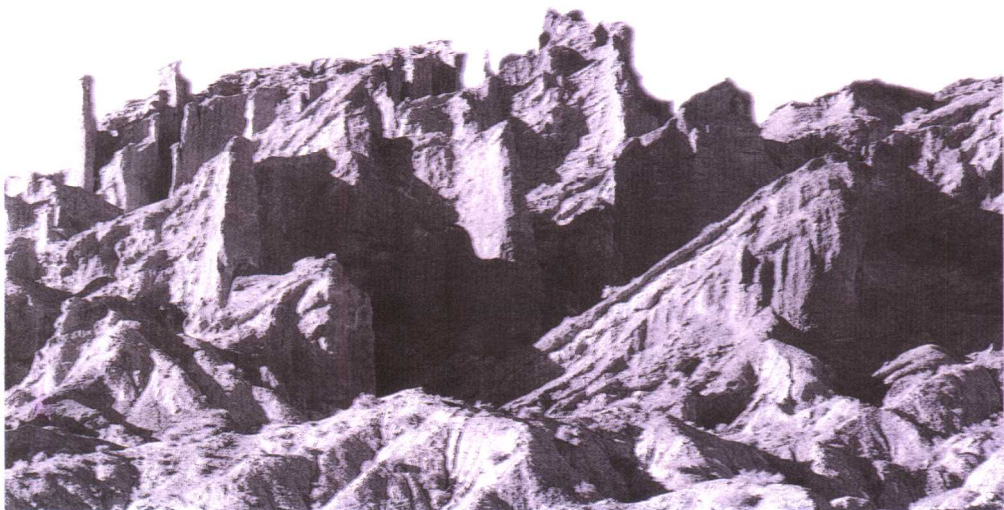
8月26日，兰州解放，迫使新疆国民党当局做出最后的抉择。8月31日和9月1日，陶峙岳分别召集包尔汉、屈武和马呈祥等人正式举行专门会议，讨论新疆走什么路的问题。会上，除马呈祥仍坚持把部队拉到青海、宁夏外，其他人一致表示无条件接受中共中央和平条件，实现局部和平。

9月10日，张治中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分别给陶峙岳、包尔汉发电，劝其“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断行动”，并对起义的准备做了具体询问和安排。9月15日，党中央联络员邓力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翌日与陶峙岳会晤，传达了党中央对解放新疆的态度、宽厚政策以及稳妥办法。这对陶峙岳、包尔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军政人员鼓舞很大。会晤后，陶峙岳表示坚决遵循张治中来电意图从事，关于和平起义的问题，则完全听从中共中央的决定。

21日前后，陶峙岳即按邓力群转来的中共中央指示派曾震五将军作为自己的代表，政府方面派屈武及哈斯木江二人为代表，飞往兰州面见彭德怀副总司令，商谈解放新疆的具体事宜。同时，包尔汉致电毛泽东，称此间“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



二五七



## ● 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凌晨，陶峙岳召集警备总部紧急会议，宣布重要人事命令，决定由莫我若任整编78师师长，韩有文任整编骑一师师长，要求各尽其职，约束部队，防止变乱。9月25日，新疆国民党军队在陶峙岳将军率领下发布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9月26日，新疆省政府委员在主席包尔汉率领下发布省政府起义通电，宣布“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9月2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陶峙岳、包尔汉及新疆军政起义人员发来复电，表示嘉许，希望他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新疆和平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起义通电发布后，全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但是，当时还存在一股反动势力，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土匪、特务和起义部队中的顽固分子进行着种种破坏活动，企图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和平起义后的安定局面，阻止解放军进疆。

早在中共中央争取在政治上解决新疆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就已做了军事上的安排。1949年10月10日，解放军第二军、第六军在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的率领下，由酒泉出发，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从空中到陆地，数路大军齐头并发，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

先遣支队战车团在团长胡鉴的率领下，于10月10日由酒泉出发，13日抵达新疆哈密。20日15时进入迪化市区，各族人民倾城欢迎，迪化市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接着，王恩茂、郭鹏率领第二军各部和罗元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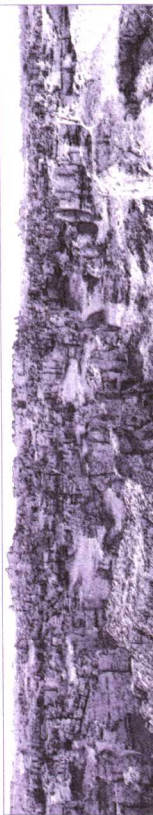
张贤约率领第六军各部陆续进驻新疆各地。“三区”民族军也从玛纳斯河西岸来到迪化。11月7日，第一兵团领导机关也进驻迪化。

1949年12月17日，第一兵团部队与“三区”民族军及和平起义部队在迪化胜利会师，彭德怀、张治中、王震等亲临检阅。同日，新疆军区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为第一副司令员，陶峙岳为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为第三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为包尔汉，副主席为高锦纯、赛福鼎。在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镇压叛乱的同时，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编工作也在加紧进行。

12月20日，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改编伪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治委员王震，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

同日，遵照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命令，“三区”民族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军长列斯肯（俄罗斯族），副军长马尔果夫（塔塔尔族），副政委曹达诺夫·扎伊尔（维吾尔族）。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一



部分，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新疆方针的提出；新疆各族人民迫切要求和平的愿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进军；三区革命力量的存在和配合；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等人为新疆和平解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都是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重要因素。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到新疆，最终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新疆的和平解放，使新疆的社会经济免遭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失，为解放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建设新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它使新疆迅速建立了革命的新的社会秩序，为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生活在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摆脱了苦难深重的旧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五星红旗，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谱写了新疆历史的新篇章。



## 主要参考书目



《史记》，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75年版。

《汉书》，班固著，中华书局1975年版。

《资治通鉴》，司马光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新疆简史》（第一、二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维吾尔族历史》，刘志霄著，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西域文化史》，（日）羽田亨著，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丝路古道上的文化》，（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沙埋和阗废墟记》，（英）马克·奥立尔·斯坦因著，殷晴、剧世华、张南、殷小娟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丝绸之路》，（瑞典）斯文·赫定著，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新疆石窟艺术》，常书鸿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 新疆两千年



《丝绸之路乐舞艺术》，《新疆艺术》编辑部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新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王堡、雷茂奎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唐朝对突厥的战争》，王小甫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荒漠独行》，杨镰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西域史话》，刘维钧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2年版。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行旅》，田卫疆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年版。

《左宗棠传略》，左焕奎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新疆概览》，刘宇生、张滨、刘晓庆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有七千年甚至更长，自西汉初年归属中国版图后，已历经了两千年的沧桑。这两千年，是可歌可泣的历史，无数的英雄志士，为了开拓和保卫这片疆土而运筹帷幄，赴汤蹈火；这两千年，是雄浑壮阔的历史，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不知上演了多少群豪角逐、悲欢离合的活剧；这两千年，是绚烂多姿的历史，那些宏伟的石窟、神秘的古国遗址、动人的音乐舞蹈，似乎都在追忆着西域当年的风韵；这两千年，是水乳交融的历史，新疆各民族人民在这里和睦相处、繁衍融合，为开发建设新疆团结奋进，为外御侵略、内抗分裂而并肩战斗。

新疆的历史是不好把握的，自古以来这里民族众多，迁徙频繁，而可供参考的史料又极度匮乏。经过一番努力，《新疆两千年》这本书终于问世了。也许本书在许多方面还不够成熟，但笔者旨在让每一个希望了解新疆的人都能轻松、透彻地读懂新疆，从而更加了解新疆、热爱新疆。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新疆考古所王炳华教授、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陈世良教授、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杨侃同志审校了此书；新疆思创公司王国中先生给予了热忱帮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因出书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1998年5月5日

特别声明：

本书中所使用的部分图片的作者无法确认，请版权拥有者及时与本社联系，并提供可靠的证明材料，以便支付稿酬。

